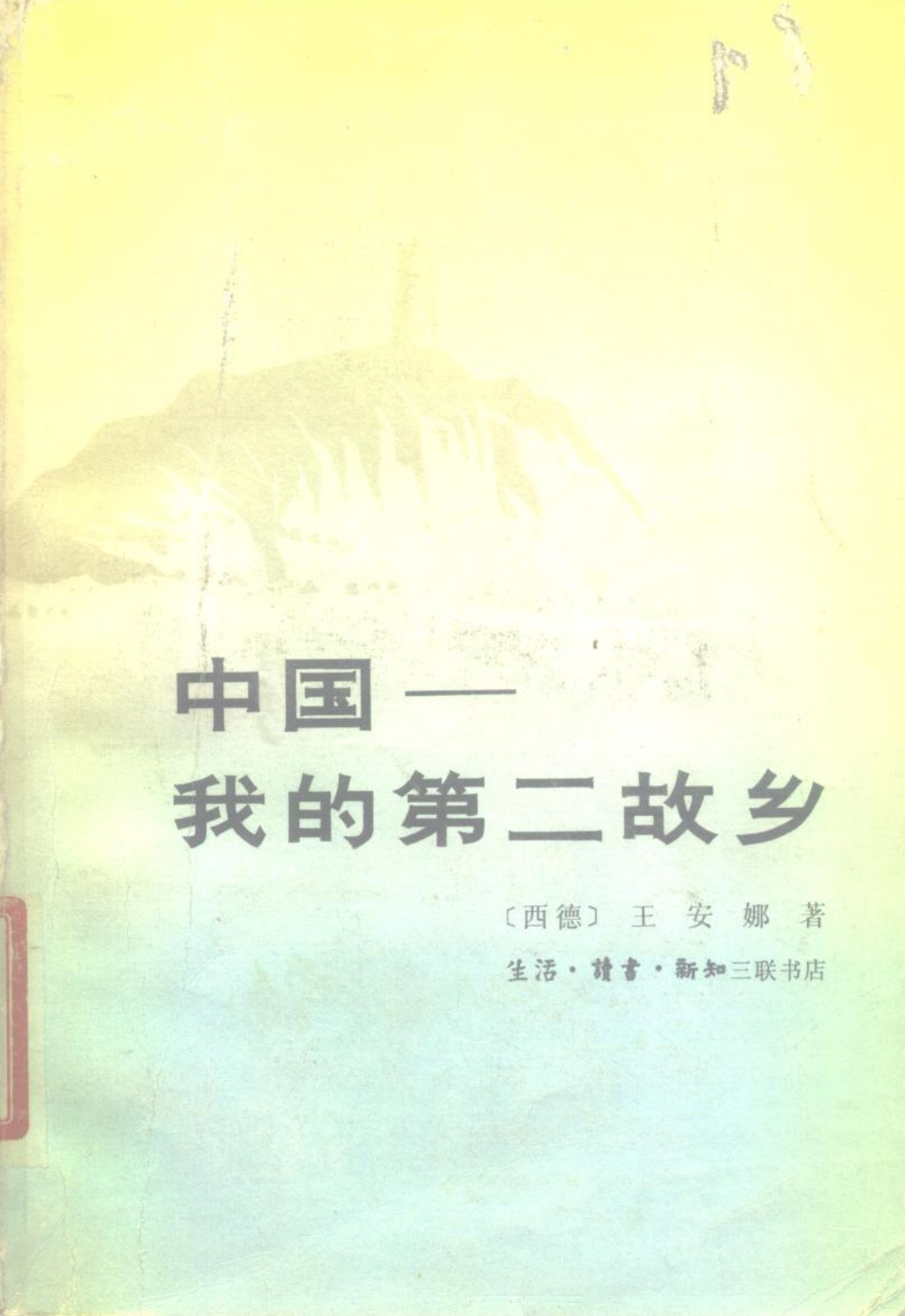




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西德〕王 安娜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K285/1

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西德〕王 安 娜 著

李良健 李希贤校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0207



760207

Anna Wang
ICH KÄMPFTE FÜR MAO

Holsten Verlag

Hamburg 1973

根据汉堡霍尔斯特出版社 1973 年版校译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西德〕王安娜著

李良健 李希贤校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82,000 字

1980 年 5 月第 1 版 198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70,000

书号 3002·219 定价 1.25 元

出版说明

DC15.117
本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安娜利泽博士)所著的一本回忆录。

王安娜一九〇七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一九三一年起，她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她和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婚，一九三六年二月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个春秋。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中国民主革命极其艰苦的年代，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个时期里，王安娜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而不倦战斗的战士，和中国人民同患难，共命运，在抗日大后方辛勤地工作，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为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作出贡献。一九五五年，她离开中国返回东德，一九六一年移居西德至今。

本书所叙述的，是作者在中国的前十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书中对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方面人物和事件，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都有不少介绍和描写。了解这些，对于每一个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将会是有益的。

本书初版于一九六四年，再版于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八年，

香港曾根据本书日译本出版过中译本。现在的这个译本是根据德文原著一九七三年新版，参照已有的中译本，校译而成的。书名经作者同意，改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书中注释，均为校译者所加。

这不是一本系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个人的回忆录。书中涉及到大量的人和事，又是作者在事隔二、三十年之后追记的。因此，书中某些叙述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我们难以一一作详尽校正，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同志和单位的热情支持，这里一并表示谢意。

三联书店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一月

中译本著者前言

中国之行结束后，我为本书中译本写了这篇前言。在这次旅行中，我重访了我在多年以前曾生活过的城市。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西安和重庆亲身经历了对中国命运，从而也对世界历史产生根本影响的历史事件。

一九三七年初我在延安结识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元帅住过的窑洞，这些窑洞如今已成为博物馆了。新中国的基础就是在这里，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奠定的。

今天，一九七九年，我重游延安。它不再是只有平房的小城市了，到处都是新建的多层楼房，一所拥有五百个床位的大医院即将竣工。

一九三七年我在这里时，住的是一间窄小的房子，睡的是土炕；而今天我下榻的地方却是一家华丽的新式饭店。

宽阔的街道代替了昔日的羊肠小路，甚至去唐朝古塔也能乘汽车了，颇为方便。从宝塔山上眺望延安城及其周围的景色，使人心旷神怡。

当年我们过延河，只能艰难地蹚水或骑马；如今延河上已架起了许多新式桥梁。

西安——一九三六年初至一九三七年我曾生活过的城市，也使我忆起了它的过去，看到了它的今天，展望了它的未来。

我参观了杨虎城的公馆，当年我曾在这里住过数月，还参观了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话剧《西安事变》使我看到了以戏剧形式再现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历史事件。这部话剧不仅在艺术上引人入胜，而且对年轻一代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同中国各地一样，西安城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多层住宅、宽阔的街道和疗养区。过去西安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工厂，如今在它的郊区，人们都能看到许多工厂建筑。

特别使我喜悦的，是那些数不尽的新栽植的树木和许多新建的公园。工作之余，各阶层居民都可以在这里休憩；而过去只有少数富豪才拥有供他们自己散心的私人花园。

当然，中国的变化不仅仅限于城市。我在西安近郊的一个人民公社里看到大量的使农业生产得以提高的灌溉设施。生产大队队长自豪地给我指着那一望无垠的麦田，精心管理的果园和菜园。绿油油的麦田，丰收在望。队长的自豪是有道理的。

我在一个农民家里作客，女主人热情地给我倒茶。屋内洁净，陈设虽然简单但很实用。和城市一样，这里也有电灯。屋里摆着一架缝纫机，这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

从西安到重庆我乘的是火车，这条铁路是解放后修建的。本书的读者会知道，当年我曾在这段路上旅行过，那时历尽艰辛，花了足足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今天，我坐在舒适的车厢里，欣赏着沿途秀丽的景色，仅一日的工夫便到达重庆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度过了六个春秋，重新与它见面，我的心情激动万分。在我的这本书里，我对这座城市在国民党统治下所呈现的那种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可怕情景作了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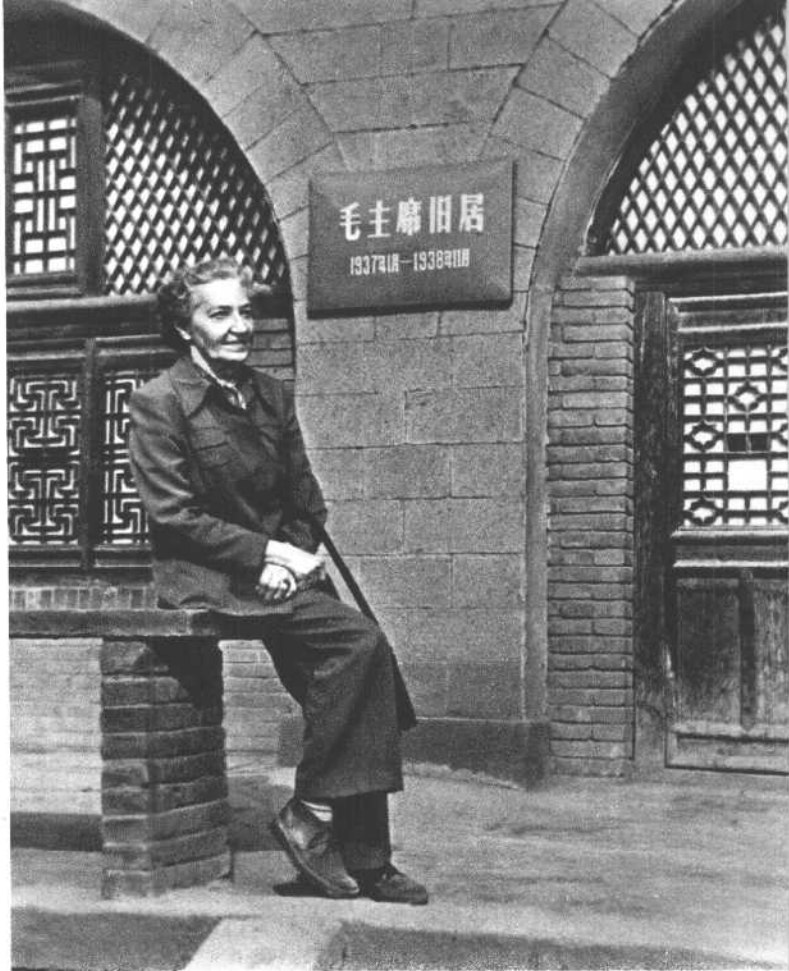
我对这座城市是非常熟悉的，可是今天到了这里，我几乎迷失了方向。到处是新的街道，新的房屋，新的花草树木！“整个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我对陪同人员说，“人们不仅看到了今天，而且也已经看到了未来。”

在中国，年老的一代还知道那可怕过去，记得苦难、压迫和剥削的刻度表，同时也记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所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得到解放的英勇斗争，而中国的青年人则没有经过那些岁月。所以，应当让青年人了解过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明天而工作。

因此，我欢迎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并且希望它在今天，在建设时期里，能有助于发扬老一辈革命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所深刻表现的那种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Qian Qun'.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



王安娜近影（一九七九年）



王安娜与卡尔逊(前左二)、叶剑英(前左三)、董必武(后左一)、
李克农(后左三)等在武汉 (一九三八年)



王安娜乘小船由汉口撤往长沙途中



王安娜与周恩来、王炳南、
龚澎在重庆（一九四二年）



王安娜与沈钧儒
（右一）、王炳南
在重庆宅前



王安娜与埃德加·斯诺(右)、路易·艾黎(左)



王安娜与李公朴(左二)、茅盾(左三)、爱泼斯坦(左五)、
章汉夫(左六)等在重庆 (一九四四年)



周 恩 来

(一九四六年)

宋 庆 龄

(一九四六年)





邓颖超、康克清同志亲切会见王安娜（一九七九年）



王安娜、王黎明
与杨妈在西安
（一九七九年）

目 录

中译本著者前言	1—3
前 言	1—3
序章 历史的概观	5—17
一 西安——西方的和平	19—57
去中国之路	20
我的中国家族	28
夜访“虎”将军	34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	38
我的妯娌玉英	41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	44
炳南的病	48
将军的官邸	50
“少帅”——与西安告别	53
二 上海	59—83
中国东部之行	60
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63
救国会	66
鲁迅	70
我们的儿子黎明	72
只身在上海	74
西安事变	80

三	重返西安	85—117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	86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9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事件	94
	“事变”以后的西安	98
	初会红军	104
	在沈夫人家寄居	106
	去三原郊游	110
	金先生	113
四	延安	119—162
	去陕北途中	120
	访问窑洞的人们	124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129
	周恩来	133
	朱德	136
	长征	140
	毛泽东	143
	“土匪头目们”	151
	“边区”	154
	去上海的消息	157
五	抗日战争爆发	163—198
	拜访何香凝女士	164
	孙逸仙夫人	167
	抗日战争爆发	172
	一个“爱国”的黑社会分子	178
	随路易·艾黎接受现场教育	181
	制定合作社计划	188

动身去自由的中国·····	191
六 汉口·····	199—224
前线城市相互对抗的潮流·····	200
一条生命获救了·····	206
红十字会与前线·····	209
一个美国叛逆者·····	217
日军的进击·····	220
七 彷徨之旅·····	225—265
遇炸·····	226
“短征”·····	231
关于医疗方面·····	236
参加八路军的故事·····	238
老红军战士们的自述·····	242
在老苏区·····	249
长沙大火·····	254
衡阳郊外的“远足”·····	258
桂林·····	260
八 继续漂泊·····	267—293
由旱路进入印度支那·····	268
重返上海·····	271
在敌国·····	276
在印度支那负责运输·····	280
王太太来了!·····	287
在云之南的云南省·····	289
九 战时的首都——重庆·····	295—315
重庆的旧与新·····	296
柳夫人的故事·····	300

贵州之行·····	303
我们的“房客合作社”·····	310
蒋介石与国民党·····	313
十 前往华北前线·····	317—350
穿过四川踏上旅程·····	318
在“工合”的旗帜下·····	324
八路军和游击队·····	326
在敌后·····	330
穿越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	335
五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	339
国际和平医院·····	344
重返国民党地区·····	347
十一 战争的岁月·····	351—410
政治前途乌云密布·····	352
皖南事变——新四军突遭袭击·····	358
对国民党的反对日增·····	362
经济的破产·····	368
轰炸季节与平静的冬天·····	372
饥荒及其后果·····	375
史迪威将军的使命以失败告终·····	379
与孙夫人合作·····	383
外国人与外国来的客人·····	392
战争结束前数年间的的生活·····	401
战争结束·····	404
告别重庆·····	408
后 记·····	411—414

前 言

这是一本回忆录，写的是种种际遇和事件。这一切虽已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现在回忆起来，仿佛仍然历历在目，恐怕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都不会忘却。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住在中国。二十年来的见闻观感，一直在内心激荡。在我回国后的长时期里，有时我把这些见闻观感讲给朋友们听，并在我的有关中国革命史的讲课和研究中，把它们用作素材。由于种种顾虑，我对把自己亲身体验的记录集辑出版，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所体验的历史，与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太密切了。

在这本书里，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谈到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喜欢以一定标准去衡量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各国都大同小异的。因而，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普普通通的；并不只是宋庆龄（孙逸仙夫人，中华民国国父的遗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廖承志、王炳南等，他们在今天已是举世闻名的人物。我和上述人物相识，曾与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那时候，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之外几乎还不为世人所知。由于我不是记者，他们并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对我

来说，他们是朋友、战友、旅伴或者是熟人。而其中有一位曾是我的丈夫。

我在中国交友的范围极广，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犹如中国社会的万花筒。他们中既有将军、政治领导人、官吏、知识分子，也有农民、苦力、士兵乃至盗贼。从国际知名的妇女、名门闺秀到褓姆、女佣以至女奴隶，都有我的朋友。我所认识的人，有贫有富，有激进分子也有反动分子。此外，我的外国朋友中，有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名士”诸色人等，五花八门，恰如过去中国的缩影。

要在某一个国家生活，写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懂得该国的语言用不着说是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会说中国话，才能与各阶层的中国人结成亲密的关系。否则，在观察各种事件和现象时，就会有被翻译的有色眼镜妨碍之虞。能说中国话，就可免了这种担心，就可用中国老百姓那样的眼睛去观察、评价各种事件和现象。

这本书所写的一切都来自我实际的体验。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则是从友人、旅伴处听来的。不过，人们出于对我信任而亲口告诉我的，或在书信中提到的那些秘而不宣的事，以及不宜公开的事，只要当事人还活着，我都不予发表。

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这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二十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一种社会形态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从旧到新、从悲观失望到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经历过旧社会的腐败与混乱，经历过对使千百万人痛苦、焦虑的残酷现实的反抗。我还经历了一场残酷战争的恐怖和痛苦，以及内战所造成的荒废，然后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中国过去数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成是二十世纪

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发生的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现代革命，更由于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中华民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之一，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

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跳出就事论事这个框框，去尝试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以及他们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巨大变革。为此，对那些乍看起来是唐突的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不能只凭想当然，而应该根据客观的事实加以解释和说明。

我这本书并不是充满异国情调、眯起好奇的眼睛去观察“土人”的不可思议的记录。我对这个国家的描述，也并非象娱乐读物那样处理。但我对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人们所怀有的深情眷恋和尊敬心情，想必读者是可以理解并产生共鸣的。

无论哪一位著作家，恐怕都难免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感受和偏爱之心。即便是我的立场，也并非“完全的无党派，非常客观”。战争期间，我们在中国曾这样说过：

“到了大炮吼鸣之声可闻的前线，超越一切的‘客观’和漠不关心无疑是不存在的；完美无缺的睿智也是不存在的。这里有的是同情、恐怖、愤怒，还有拥护某方面的感情。”

我就在中国人的近旁，近得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对于压迫、苦难、屈辱的愤怒和反抗的呼声。因此，我不能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站在所谓客观的立场上。

哲学家庄子曾说过：

“道无终始。”“消息盈虚，终则有始。”^①

① 出自《庄子》《秋水》篇。

序 章

历史的概观

在这个序章里，我试图为缺乏中国历史知识的读者说明我这本回忆录的背景情况。

从地理上看，中国的面积相当于欧洲从乌拉尔至大西洋的地域，即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当西方诸民族中大多数仍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身披兽皮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了。

据考古学上的研究证明，中国在商代（公元前十六——前十一世纪）已发明文字，并沿用至今。中国对世界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比西欧诸国要早得多。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人比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更早完成了几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创造。指南针、地震仪、纸、火药、印刷术等，都是中国最早发明的。

至六世纪为止，中国是对世界提供丝绸的唯一国家。中国开始制造陶器，比欧洲要早一千年以上。

直到十九世纪，这个巨大的国家几乎与世界其它地区完全隔绝。连太平洋也起不到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通路作用。无

论什么时候，中国的眼睛都不向着国外而只是向着国内。在各个时代里，中国与西欧都有过一些接触，但它们对中国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中国固有的称呼——“中央王国”，意思是中国乃世界的中心。这个名称显示了中国人对外界的立场。这个特征的痕迹，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拭抹掉。

从风物的观点来看，中国极富于变化。北部气候良好，南部是温暖的亚热带地域，东部有肥沃的平原，西部山岳高耸。国土的三分之二是山地、沙漠，或不适宜于耕作的土地。即使是今天，耕地面积也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二。可是，在中国却住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

中国是大河之国。长江、黄河，以及东北国境与苏联相接的黑龙江，都是世界的长河。这些河流，在数千年间，与中国的居民生死攸关。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给许多灌溉设备提供了水源，构成廉价的水道；但另一方面，多年来，它们在广大地区泛滥成灾，威胁到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

就象古埃及的情况一样，在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由于与水害搏斗，并出于修筑、维护堤防和灌溉设备的需要，自然地形成了若干大的村落，以后终于形成国家。从周朝（公元前一〇二七——前二四九年）开始，中国文明的独特风格便展现出来，这一风格至今仍残存着。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对此后二千年中国的国家秩序，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观，定出了种种清规戒律。

孔子并非宗教的教祖。他用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教义不是宗教而是道德论。与影响西欧思想的希腊古典哲学之民主主义和共和制的理想主义相反，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以权威为中心，其它社会集团要无条件地服从某一社会集团，以保障社会

的平稳与调和。社会以集团或家庭为中心，个人没有任何地位。现存的社会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变更的、无可非议的。孔子的伦理观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不管是对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还是对贫穷的农民。从人与人的各种纵横关系，直至各种细微末节，它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妻对夫、弟对兄、子对父，都被认为是理应服从的。居下位者应服从居上位者，万人都要服从皇帝。皇帝被认为是英明伟大的，是孔子教义的化身，就象是民族大家庭里的父亲一样。

中国的皇帝自称为天子，自认为受命于天所以为帝。如果他滥用“天命”，这一王朝早晚便会面临崩溃的命运。但新的王朝也仍然奉孔子的教义为楷模，而行使政治的权力，必定是掌握在一小撮信奉孔子教义的学者手中。这个阶层，在规定上虽说是殿试及格者便可加入其中，但实际上能够接受考试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的，仅限于富裕阶层的子弟。

总之，仅限于在特权阶级内部选拔人才这一原则，使儒家体制成为全世界最稳定的官僚权力体制。在数百年间，中国人认为儒家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相信自己是完美的人类。虽然有好几次中国被文化水准较低的民族征服了，但中国人的这一看法仍然没有改变。每一次都是征服者为中国社会所融合，为中国人所完全同化。

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不是宗教的教祖，尽管他的以道教而知名的学说，发展成了一种民间的宗教。老子学说的奇妙条理与儒家奉行的干枯的实用教条适成对比。老子的无政府精神对儒家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竖起反叛之旗，他嘲笑儿子的孝心和对祖先的崇拜。老子认为，人归根结底都成尘土，先祖亦不例外。与黑格尔一样，老子也相信万物永远是运动转化的，他否定

固定不变的道德论和制度。但宣扬回复自然的老子，既不能排除儒家的体制，也不能驱逐自印度传来、主张拯救人类要靠来世的佛教。到二十世纪，儒家体制才开始它的根本性的崩溃。作为国家秩序基础的儒家体制，经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国成了共和国以后，便不存在了。

比儒家体制远为顽固地延续生存的是儒教在社会和精神领域里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人固有特性的东西，许多都可以从儒家思想找出它的根源来。也就是说：不喜欢变动、对其它的社会集团不关心、知识阶层对农民生活的无知、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对同胞的苦处漠不关心；用一句话来说，这种“特性”就是缺乏社会良知之类。中国从前极为普遍的一种习性是没有公开批评，理由是“不好看”，批评别人被认为是不给“面子”。这种习性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反反复复地进行的“整风运动”，也为的是力图清除这种旧的习性，使“现代的”特性代之而生。

同样，认为在道德、文化方面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这种感情，使儒家的思想体系得以延续。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也完全和儒家学者一样，是教条式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而后者信奉孔子的教义。“以德服人”的儒家教条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从前的中国人，由于极为相信统治者的道德，不管是什么人对统治者都盲目地完全服从。今天的中国人，则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确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作为楷模对社会进行变革。

中国人的一大特性是对宗教并不关心，这是西欧的思考方式所难以理解的。这一特性也可以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得到解释。与印度的情况相反，宗教在昔日的中国社会只是起到从属

性的作用。道德、伦理，还有哲学，光是这些，已足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思想基础。

最初，主要是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保守的儒家信徒反抗来自外国的宗教基督教。对基督教，他们原先与对待同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一样，也持宽容态度，但后来便变得不可忍受了。自然，反抗基督教绝不只是单纯出于传统上的原因，更由于基督教与企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扼杀古老中国的西欧诸国暗中勾结。

以学者身分在北京清朝宫廷里服务的耶稣会派基督徒，被视为来自外国的“稀客”而受到宽容。但十九世纪初到中国南方的传教士们，并不满足于只被当成是耶稣信徒的地位。他们跟随商人与军人一起到来，其目的是强制性地把鸦片和基督教同时传入中国。

在中国南方的各港口，输入的印度鸦片大为泛滥。中国方面对此虽然多次抗议，发出种种禁令，但都毫无作用。当清朝政府的一名大官没收了二万箱鸦片并加以焚毁时，英国采取了战争手段作为报复。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同时开始的是屈辱和在压力之下割让领土。这些，中国人至今没有忘却。在悠悠数十年间，由于外国通过暴力所实行的门户开放，软弱无能的清朝的权益不断地遭到剥夺。把中国当成殖民地支配，不仅是一个国家，所有工业和军事列强都这么做。

这些列强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专横跋扈，而且还施以野蛮的破坏行动。对此，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忘却。一八六〇年，外国军队掠夺北京风景优美的颐和园^①，珍贵的艺术品遭到破

① 这里指的是颐和园的前身，即清漪园。清漪园于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焚毁。

坏。对这些外国军队来说，掠夺寺院、皇宫、陵墓等有如欢乐的消遣，其结果使得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博物馆以及收藏家们的珍藏品大为增加。

在中国，人们还不会忘却，所有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排除外国干涉的尝试都由于外国军队的介入而遭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史上可算是规模最大的革命之一，它与义和团起义一样，被外国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对中国显示“惩戒”，列强经常采取一致的行动，要求获得更多的特权，要求清朝作出更大的让步。

进入一八九〇年以后，为了抵御西欧的进攻，保护自己，必须向西欧学习的思想在中国日渐普遍。朝廷的官吏和学者虽然并不认为外国的文化比中国优越，但认为这些野蛮人亦即“洋鬼子”也有值得学习之处，特别是在技术和军事方面。

名门子弟被派往外国留学，无数的西欧书籍被译成中文，人们对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的维新思想满怀激情。在日本，皇室站在革新运动的前列，中国则与之相反，皇太后与宫廷的保守派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因此，一切改革的尝试在萌芽阶段便被扼杀殆尽。就这样，以和平的方法一无所成。要使中国不致彻底灭亡，沦为亡国奴，只剩下一条道路，这就是革命。

选择这条道路的，是在中国被称为“国父”的孙逸仙（孙中山）博士。孙博士生于一八六六年，出身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在华侨中间生活了几年。由于生活在西方以及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的缘故，华侨的思想较在本国长大的中国人远为进步、开通。他们与同样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城市的商人和实业家一样，成为现代的市民阶层。

与学者和朝廷的官吏相反，对这些改革派的市民阶层来说，

除了革命以外别无生路。不久，他们便从其它阶层的青年中间找到支持者。他们要求推翻清朝，把中国建成共和国。一九〇五年，孙博士在日本创立革命同盟会，成了建设共和国运动的支柱。同盟会后来改称“国民党”。这些革命家反清的精神标志是自己剪掉辫子。辫子是清朝政府强迫留的，是服从清朝的一种象征。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孙博士在他有名的著作《三民主义》一书中有概括性的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民族主义（即要求中国独立）、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主旨是“耕者有其田”，以此为目标来解决土地问题。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革命派的第一个目标达到。满清被推翻，中国成了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的力量还很薄弱，这是由于还没有一种安定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可以代替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整个国家和每个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在支持共和国的少数进步人士面前，仍然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和没有受过教育、对政治持消极态度的广大农民，这些人没有参加这场革命。

铲除了中央的权力，结果却造成国内割据分权倾向的抬头，各自扩张势力范围的军阀割据时代开始了。这些军阀中有些人就象是传奇式的人物。他们大部分出身于苦力和贫农，有过为匪作贼的经历，后来爬上了手中控制着广大地区的独裁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的巨富与欲望，他们的“宫廷”与私邸的豪华富丽，简直有如传说似地令人难以置信。军阀所需要的金钱弹药，都得到外国势力充分提供。这些外国势力为中国的分裂和软弱而高兴。外国的报纸写道，中国人没有治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因此，外国的控制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欢迎的。

不过，各个军阀为扩展自己的地盘而互相争夺的战争，大部分并不是流血的。由于没有军队的军阀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军阀之间为了不损耗兵力，宁愿采取以“银弹”决胜负的办法。当冗长的谈判结束时，“胜方”便付给同意认输的“败方”一笔和解费，“败方”虽然失去面子，但却以相当数量的金钱来自慰，并且保存了自己的军队。

真正的受害者历来都是农民。象蝗虫群似的军队把他们的村子洗劫一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日军对原德国殖民地的占领，促使革命运动的火焰重新燃起。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主要是进步的知识分子。

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也适用于中国；日本非法占领的领土必须归还给中国。这些要求被列强拒绝了。于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先是在北京，接着在其它几个城市，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新的革命浪潮的主要目标，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为传播新思想，创办了许多杂志，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欧文学作品。大学的教授们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成立了专门的学会。陈独秀便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创建共产党，并多年担任党的书记。李大钊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曾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一九二〇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杨开慧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

诞生未久的苏联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共同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使中国人亲苏。苏联不仅自动放弃一切沙皇政府时代的特权 and 租界，而且

还是向孙逸仙博士提供援助的唯一国家。当时，孙博士正为保卫广东的共和国政权，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因此，苏联的这些行动受到高度的赞赏。一九二三年，孙博士与苏联结成同盟，接着，国民党与一九二一年创建的共产党建立了同盟关系。在三年内，国共两党的合作使革命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

苏联援助孙博士的广东政府，提供金钱、武器和派遣顾问团。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苏联留学。这些青年中，有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孙博士死后，苏联顾问团想让蒋介石当他的继承人。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与其合作。周恩来担任了一九二四年在广州近郊黄埔设立的著名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与其时任该校校长的蒋介石共事。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局和社会状况都有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断高涨的反帝运动，至此已达到最高潮。同时，工人运动壮大起来，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诚然，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由于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也由于在世界大战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的跃进，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城市的市民阶层，包括实业家、商人和占大多数的小市民，都参加了反帝运动，从而使它发展成为群众运动。运动很快便取得初步成果，使外国感到不快和惊慌。由于中国沿海各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外国的工厂、银行、贸易及运输等都陷于停顿，被外国人雇佣的仆役也离职而去。

一九二四年，在广东整编不久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指挥下，对军阀势力采取军事行动，仅仅几个月，便把中国南部的广大地区置于广东政府的控制之下。革命军乘胜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出发，沿江而下，向南京和外国势力的中枢上海进军。

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英国政府被迫取消了它在中国的租界。在上海，国民革命军和准备暴动的罢工工人里外夹攻的威胁迫在眉睫，如果果真成为事实的话，将会给外国势力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在上海市内的华人区，在秘密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指挥下，已进行了暴动。

然而，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中国的这一革命，由于内部发生叛变，受到致命的打击。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了自己的战友，毫不留情地以残忍暴虐的手段镇压他们。蒋介石借以上海为地盘的黑社会集团之力，杀戮了成千上万革命者和嫌疑分子。在工人居住区的街道上，血流成河。在震撼人心的《人类的命运》一书中，作者安德烈·马尔罗描述了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

这些事情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的开端，关于这些事情的原因和背景，有许多意见相左的说法。但其结果则是无可争辩的。革命的力量被粉碎了，由此得益的首先是外国势力和中国的统治阶级。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政府立即被各国承认。与此相反，当年孙逸仙的广东政府为得到外国的承认，虽然经过了多年努力，一直得不到答复。就这样，外国的借款和其它经济援助、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

将近十年时间，中国处于无法想象的恐怖状态之中。恐怖行动的牺牲者，包括有工会组织里的工人、苦力，忠实地信奉孙博士的“耕者有其田”原则的农民，学生和科学家，以及许多有才能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害的科学家中，有几位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教授。

最先成为恐怖行动的目标的，不用说，自然是共产党人。到

一九二八年，共产党人已有五分之四被杀害。蒋介石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毫无疑问，应归功于毛泽东。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指示背道而驰。那个指示说，革命运动今后仍应以城市为中心——如果按此行事的话，革命或许便会遭到可怕的彻底失败。毛泽东在中国南方的农村建立了新的革命中心。农民代替城市的产业工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在今天已是毋庸置疑的了。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十年内战的恐怖年月里，我想在中国只有少数人能预见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因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仍很单薄，经常要在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情况之下连续作战，而且，还被蒋介石和外国称作“土匪”。

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农业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只有把千百万贫苦农民当成同盟军，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谈了自己作为农民协会组织者的体验。这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极为重要、极有指导意义的作品之一。

毛泽东借助于武装起义的农民之力，在湖南省与江西省交界处无路可通的险峻山岳地带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在这个根据地与以朱德、周恩来为首的革命军军官所指挥的革命军战士会师，合力抵抗蒋介石政府军的攻击。

在这个根据地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了消灭这些“土匪”，蒋介石进行了五次“围剿”，但他的军队每次都被击退。

毛泽东制订的关于游击战的著名战略和战术，便是在这个年代产生的，并在抗日战争中臻于完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论文中集中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在以冯·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制订了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是要用碉堡组成一个包围圈来围困红军。

红军为免受围歼，不得不放弃了中国南部的根据地。于是，那有名的传奇式的“长征”便开始了。

“长征”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行军的障碍不仅有敌机和敌军，还有饥寒交迫之苦。红军行经十二个省，一直到达陕北，走了一万一千公里的漫长征途。“长征”后，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致公认的领袖。红军久经考验的战士，在与外界隔绝、甚至和苏联也没有联系的孤立状态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长征”，把自己锤炼成为优秀的政治骨干。这些优秀分子今天仍掌握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国民党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镇压，共产党的影响在一九三五年以后仍急速增长。那些不论怎么说也不是亲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发表的切合实际的政治路线有了共鸣之感。著名的作家、科学家建立组织，呼吁与共产党协商，停止内战。他们对政治迫害、独裁的抗议，与共产党人为求抗日呼吁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不谋而合。

一九三一年，东北不战而沦入日本之手。一九三五年，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以及威胁到中国民族工业生存的日本商品大倾销，引起了举国上下一片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

一九三六年，位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省省会西安，成了抗日运动的中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迅即给西安带来了热气腾腾的局面。

西安驻有蒋介石为与红军交战而配置的东北军。无论是这支军队的司令官还是西北军的司令官，都无心实行蒋介石的作

战计划。因为他们对自己指挥下的军队的士兵非常了解。日本正企图占领整个华北，这时候，如果与红军作战，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在西安，虽然表面平静，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三六年夏天，大转变的准备工作稳步而顺利地进行。这个大转变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实现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共同合力抗战。

一九三六年，我来到中国。我到的地方，正是西安！

—

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 中 国 之 路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但每一念及和母亲分离，恐怕要经过悠长的岁月才能重见，这一点实在使我痛苦。当时的我，更万万想不到此别竟成永诀。母亲和我都还没有预感到，可怕的灾祸不久就要向德国和世界、向我们的头上袭来。

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象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的许多朋友和同辈人，受这种瘟疫之害，竟连保护自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他们都被纳粹主义的毒牙所害。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尽管我一九三五年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拿了护照，但再一次被捕的话，少说也要受几年铁窗之苦吧。朋友们劝我亡命国外，那对我来说似乎也是难以忍受的。我还年轻，精力旺盛，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何况我和我的丈夫或许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呢！

对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喜欢柏林，胜过欧洲其它任何一个城市。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的朋友，遍及各市，有工人、科学家、司机和学生。他公开的身分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

组织在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离开柏林。

我们是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去的，这是因为炳南认为这条路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从“后门”即中国的北部进入炳南的故乡陕西省，就可以不用经过反共的南京政府所统治的东部各省。

这条路线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必须通过一九三一年被日军占领的满洲(东北)。但我们认为，通过满洲只要乘两三天的火车，总会顺利吧。事实上，我们刚离开柏林几天，纳粹秘密警察便到我们的住处搜捕，而当时我们还不知情。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那样从容了。但是，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纳粹秘密警察忘记了向日本当局通缉我们。我们总算平安无事通过满洲。等我们安全到达中国西部之后，才知道纳粹秘密警察曾搜捕我们。

我们在莫斯科呆了四天，每天排满了日程。白天参观非正式旅游者认为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晚上则和中国朋友们促膝谈心，直到深更半夜。和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所进行的讨论，可能对炳南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我在莫斯科所遇到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个人例外。

此人是细高个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拜访我们。他讲起话来声音不高，但却带有一种中国人少有的激情。

“这个人是谁？”我问炳南。

“我们的客人叫李立三！我给你介绍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在上海，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资本家中间引起惊恐和不安。”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这个人曾经把几十万工人组织起来，并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他们起来暴动。他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他的语言的感染力，即使在莫斯科流亡期间也没有丝毫减弱。

李立三远离祖国已经多年。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中国革命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从城市开始。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所制订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把党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党，而只是撤销他们的党内职务，有可能的话就把他们送往莫斯科。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作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又重新返回祖国。不过，从此以后他不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全盛时期已一去不复返。因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不是工人，而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

在通过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我学习中文，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炳南和一位同车的乌克兰老人交上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人下国际象棋，自得其乐。

到满洲去的乘客很少，只有炳南一个是中国人。在边境，我们下了车，费了很多时间才办完苏联和日本两方面的麻烦重重的海关手续和护照手续。然后，乘上开往哈尔滨去的所谓满洲

铁路的列车。经过一夜疲劳的旅程，第二天我们到达哈尔滨，在俄国人地区一家满不错的旅馆落脚。旅途中吃够了油腻的俄国菜，现在终于吃到美味的中国菜了。因为没有中文报纸，炳南要来看，旅馆的人竟惊讶地望着他。“满洲国”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竟然连一份中文报纸也没有。大概是认为，读日文报纸不就行了！

第二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坐上往南去的列车。当时，日本所控制的地区到万里长城为止，我们再往前走就好歹到中国了。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万里长城以南的港口城市——天津。

当我们刚刚在自己的车厢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就有一个服装整齐的日本人，在我们的旁边坐下来。他客气地问我们，是否会说英语。我点头称是，但同时抱歉地说，可惜我丈夫只懂德语。一会儿，炳南和我都察觉此人是日本秘密警察的密探。不过，他的质问倒很率直。

“你的丈夫对满洲国有什么看法？在曾经属于支那人的土地上旅行，你丈夫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这是他想知道的。

“我的丈夫现在只感到长途旅行劳累得很，”我对他说。

“那是什么书？”当他看见我从口袋里掏出中国地图册的袖珍本时，他大感兴趣地问。他拿着地图册边看边咋起舌头，不无遗憾地说：“这本旧地图册很成问题，它还把满洲国划成是支那的一部分哩！”

他把地图册合上，蛮不讲理地拿着。

“我只对地理名称感兴趣，”我有点恼火地说，“而这些地名好象并没有变更。不过，如果你想没收这本地图册的话，那就请便吧！”

这个日本人一再赌咒发誓地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想要刁难

我的意思。他怎么敢冒昧地对一个德国人做这种无理的事情呢！话虽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把地图册还给我。经过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终于悻悻离去。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

此后，直到边界，我们这位“护送者”再也不见露面。在山海关，我们下了日本管理的列车，在海关办完了行李手续之后，登上开往天津去的中国列车。

海关的检查从来是不愉快的。山海关的中国检查官尤其不讲理。其中一个检查官，把我们的行李乱翻一通，犹恐不足，终于找出一支气枪，看得他伸长了脖子。那是我们送给炳南的外甥的礼物，在旅途的各个海关检查中都没有受到过留难。那个检查官说，这是武器吧，是武器的话就一定要没收。和他辩论，毫无用处；对他说明这是玩具，他也不予理会。我想，大概是他看上了这支气枪吧。

我们死了心，准备把那支气枪送给他了。这时，我们的那位日本“护送者”突然出现。他用粗野的话训斥那个检查官，命令他立刻把气枪还给我们。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日本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过，使我们惊讶，也使我们为那个检查官脸红的是，他对日本人的命令竟然恭恭敬敬地服从。他一边低声下气地向我们道歉，一边遵命而行——然而，这是在中国国境的车站，本来日本人是没有权利指手划脚的啊！这就是中国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这不就是说，实际上华北也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吗？

我们急忙收拾好行李。显然，我们不必再受海关检查了。因为我们仿佛已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

我们两人都这样想：如果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既看不见日本人，也看不见向日本人俯首帖耳的中国人的城市，该多么好啊！

炳南看看自己的表，低声地说：

“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不会再发生别的事情吧。”

这时候，我看到刚才那个日本人正微笑着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炳南低声骂道：

“那个家伙，这次又想搞什么名堂？”

“蒙你盛情相托，把地图册暂时放在我这里，现在我想把它还给你。”

他把地图册交给我，先发制人地说：

“不要使你们对我们满洲国的日本人留下坏印象，这是我的重要职责。我知道，失去这本地图册，你会感到不愉快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还没等我想出词儿来，他一边鞠躬，一边补充说：

“你拿着这本地图册，可能会碰到麻烦，所以我才替你保管。”

说完他便走了，而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我们乘坐的列车在中国风光明媚的土地上进发。这次漫长的旅程就要结束，实在令人兴奋。我们在天津停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杨秀峰在北京^①等我们。我们很高兴能再见到几年前在柏林分手的杨秀峰。

杨在京、津的大学任教。他有着典型的中国教授的风貌，身材瘦削，戴眼镜，有些古板，然而确是一个非凡人物。

和战后许多中国学生一样，杨也崇拜苏联，认为苏联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二十年代末期他在苏联的时候，并没有进大学学习理论知识，他只是实地体验已经从许多书籍中了解到的苏联生活。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在苏联从事过各种工作，他

^① 当时叫北平。

在苏联的最后职业是集体农庄的电气技术员。

杨到德国时，曾经和我们谈过在苏联的生活体验，但我已淡忘了。只记得当他一九三三年初到德国时，我们曾为他担心不已。他结束了留苏生活后，不打算直接回中国去，想先到西欧住几个月，弄一些证件证明他没有到过苏联，以免回国后遇到麻烦。但是，当时的德国是和西欧各国隔离的，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中转站。杨预定乘苏联船在汉堡上岸。炳南为了接应他，在海员俱乐部佯作下国际象棋，有时还要设法避开警察的盯梢，为此弄得疲惫不堪。这样过了多天，杨才在等候中出现。两人相会后，随即乘火车离开汉堡，前往柏林。

杨在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租了一间简朴的住房。在柏林的那些日子里，我和炳南每星期日去远足，杨都和我们一起去。当时住在柏林的中国朋友们，对远远近近的郊游都没有兴趣。他们对背着背包远足的乐趣，还不能领略。但杨却很欣赏柏林郊外的风光，作诗吟咏盛开的繁花，不知疲倦地在森林里留连忘返。

杨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要到比利时去住几个星期，临行时，我们和他约定在天津或北京再见。现在我们终于重逢了。这一次，一九三六年三月，就象我们在柏林带领他参观时一样情意殷殷，他带领我们游览北京，浮光掠影地观看了金黄色的琉璃瓦屋顶、洁白的大理石阶梯、绛红色的城墙以及古木蔽日的寺院和宫殿。这时，我的唯一愿望是，将来能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悠闲地从景山远眺紫禁城，欣赏那精美绝伦的中国建筑艺术珍品；或者，在郁郁苍苍的古杉下漫步，也是一种赏心乐事。

我第二次再到北京，是那以后十三年的事，但没有见到杨。到一九五九年，我最后一次去中国旅行时，才能和我们的老朋友

杨教授在北京重聚。这时，人们称他为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最大的游击区^①的政府主席，那时，人们称他为杨主席。抗战时，到杨任主席的地区访问过的外国记者，都把他描述为亲切、聪明的教授。他穿着游击队的制服，看来稍有异样之感。在那个从日军手中夺回的解放区，任务异常艰巨，但他总是极为圆满地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部长。

在那一望无际的黄土之间，令人意想不到的，蓦然现出嫩芽初吐、点点柔绿的麦田。列车在辽阔的华北穿行。经过多天疲劳的旅程，在三月的一个大风天，我们抵达洛阳。在这里，我见到了丈夫家的第一个成员，他就是炳南的大哥，当时正在洛阳军官学校求学。

对洛阳的市容，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见街道上狂风怒卷，夹着阵阵黄沙，吹得人眼睛剧疼，难于呼吸。路人都戴上特别的面罩，或者用手绢紧紧地捂着脸。风太猛，我们坐人力车到洛阳城郊的军官学校，也得把车前的布帘落下，就象是下着大雨。此后，在我的印象中，洛阳总是黄沙滚滚、风尘弥漫的。

我对大哥的印象很好。他为人开朗，和蔼可亲。尽管穿着军官制服，却令人感觉得到农民的那份敦厚淳朴。他衷心地欢迎我，但我说中国话的能力还不能和他交谈。

第二天，我们从洛阳继续踏上西行的旅途。列车在深山峡谷的窄路上行驶，处处仍是单调的黄土风光。当天下午，我们到达陕西省的省境，来到古时候的要塞潼关。我们从潼关沿着与黄河成直角的方向前进，景色迥然一变。炳南自豪地指着华山之巅说，那是中国的五岳之一，他曾和父亲一起登上峰顶。

^① 即晋冀鲁豫边区。

接着，我们来到叫做临潼的小地方。唐代的皇帝们曾领着文人逸士到这里避暑。诗人李太白也曾来过，我读过他不朽作品的德译本。

日落之前，西安城郊在望，接着是巨大的城墙，最后是座落在城墙外面的现代化车站映入眼帘。我们到了我的新故乡西安——西安，意即西方的和平。

我的中国家族

“我们先到旅馆去吧，”列车到达现代化的西安车站时，炳南说，“我们回来，没有告诉家里人，现在不知道父亲还在不在大莲花池街的家。”

真想不到，竟然有三位朋友到车站接我们。那时，我对中国特有的一种又快又准、被称为“竹电”的口口相传消息的办法毫无所知。我问在柏林时就认识的方先生，怎么会知道我们到达的时间。他向我解释道，他们是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得知我们到达中国的消息的。此后，每天晚上都到车站去接我们，好象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样。“我们只不过白白地等了四天而已，”方先生谦逊地补充说。

朋友们领我们到离车站不远、全市最现代化的西京招待所。在西安，这家由中国旅行社新建的旅馆，就象是座落在中世纪环境里的二十世纪孤岛一样。在陈设华丽的拱顶餐厅里进餐，或在设备齐全的舒适的客房里休息，会使人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欧洲、至少是上海的大旅馆里。这家旅馆从经理到主厨，都是上海人。他们的神情就象被流放到这里来似的，看到从外国来的和从东

部各省来的稀客，便唠唠叨叨地诉说西安的居民是如何如何的不文明。

朋友们离开旅馆后，我看到炳南若有所失的神态，便说：“还是先回家看看好，说不定有谁在呢。”炳南深为感谢地看着我。

我们走出孤岛般的旅馆，便是一片荒野。在这没有行人的昏暗的街上行走，仿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晚上九点左右，西安的市街已在沉睡之中。

在冥想中走了一会儿，便见巨大的城墙在黑暗中显现。看到城墙，我不由得想，西安什么时候有过与它的名字相称的和平呢？城墙约十人高，城门口可以并行三辆牛车，它建于一千五百年之前，从没有拆除过。抗战期间，它的四角形的有顶盖的胸墙，在日军空袭的时候，曾经保护过西安的市民。

我们顺着街道往前走，来到另一座巨大的城墙的跟前。这是帝制时代的“紫禁城”的围墙。在义和团之乱时，年迈的慈禧太后曾逃进这里避难，这座城池就成了皇居。人们把它叫做新城，也叫新都。现在，除了城墙上安有机关枪之外，和数百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中国，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即使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有两种人还是随时可以在路上遇到的，那就是挑着担子卖小吃的流动小贩和人力车夫。我一直弄不懂，他们深更半夜还在街头奔走叫卖，果真有人在这种时候有胃口吃一碗面条，或者要乘车回家吗？这两种人，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这天晚上，我们急着回家，很快就截到两辆人力车。大约二十分钟，便进入内城。内城的街道狭窄，店铺都已关门闭户。过了一会，人力车在一道门前停下，我们终于到了大莲花池街的家。

炳南用金属制的大门环敲门。门那边，老家的房顶在夜空中清晰可见。它那优美的形状，使久别归来的人感到亲切。门环沉重的撞击声响了一阵，便听到自远而近的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问了一声：“谁？”炳南用特有的陕西口音回答：“我。”

我对“我”这个回答颇觉有趣。屋里的人只听到“我”的回答，怎么能知道对方是谁呢？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名字呢？”我想。但事实上，屋里的人只听炳南的一声回答，便把门开了。真奇怪，那个老佣人真能分辨出已多年不见的炳南的声音吗？

炳南向侧面亮着灯的房子匆匆走去，我踌躇地跟在他后面。我曾不知多少次在心里思忖过的这一瞬间，终于到来了。对我来说，人生的新的一章正在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我会变得怎样呢？我能够适应我并不熟悉的中国家庭的生活吗？家里人是从内心乐意地接纳我，还是抱拒绝的态度呢？

炳南因为忙于政治活动和考虑将来的计划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不大注意我对家庭的疑问和看法。他长年在国外生活，和家人的关系生疏了。他对家庭的变化，对出国期间家里增加了哪些新的成员，全然不知。除了在柏林接获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外，他的兄弟、堂兄弟和谁结了婚，他在德国时谁生了孩子，他一点也不知道。

在德国时，我对炳南仍是独身并不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相识时，他刚二十五岁。到了中国后，我才知道他在早婚的同龄人中算是一个例外。有不少和中国人结婚的德国妇女，到中国后才发现丈夫原来已婚。按照中国的习惯，这个德国妇女只能是妾。

对此，我不用担心。更使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和公公一见面，便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老爷——家里人全都这样称呼

他——用各种方法，使我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和家人见面时，并没有用很高的声音，说过多的客套话。这种表现感情的方式，是不适合中国人的。可是，毕竟是和长年离别的儿子重聚，从公公闪闪发亮的眼睛里，从他那慈祥的多智的面容上，都可以看到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听到他那发自内心的诚恳的话语，我的忐忑不安顿时云消雾散。我能用几句中国话向他表示感谢之意，自己也感到很高兴。

公公在几天前，刚回到西安。他在县城、炳南的出生地乾州附近的农村过着退隐生活。青年时代，他是孙逸仙博士的热烈支持者，曾全力以赴地为民国奋斗，由于对当权者的腐败异常不满，便舍弃了名誉、地位，告退回乡，用他的热心和公正，主持村政。“要使国家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后来，有一次他曾这样对我说过，“但是，至少我要在本村尽力实现原先想在全国实现的宿愿。”

在接受公公的欢迎后不久，一位年轻妇女走了进来。经介绍得知她叫玉英，是炳南哥哥的如夫人。我们在途经洛阳时见过面的大哥有两个夫人，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为此，我曾对炳南猛烈抨击一夫多妻的制度。尽管我多少已中国化了，但我那固有的普鲁士人的见解是不会有有多大改变的！

后来，我的妯娌玉英成了我的好朋友。她简单明了地教给我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习俗。而我的中文水平能有长足的进步，也是仰仗她的大力帮助。

跟在玉英身后的，是两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这两个孩子是炳南的大哥的长男和堂兄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他们看上去还是睡眼惺忪的。面对着初次见面就象外人一样的叔父和新来的外国婶母，他们羞涩却又充满好奇地盯着我们看了好

一阵。然后，他们在角落的两张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下，一句不漏地倾听大人們的谈话。

末了，又来了一个表弟，他是王家母系的亲属，算不上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他的父母都已去世，公公把他收养。由此可见，公公是个开通的新时代人。

就这样，在西安的家人，都集中到公公的房里来了。炳南和他父亲交谈时，大家沉默着，但都非常留神地倾听着。公公并没有详细地问我们旅途的情况，也没有问炳南在国外的经历——这些，要留着慢慢说。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他都能够满足地听他想知道的事情。现在，公公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们是否和家人同住。他早就考虑及此，为我们准备了住处。他随即领我们到另一座房子。房间粉饰一新，洁白耀眼，给人留下愉快的印象。

“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了！”进入房间时，公公得意地说。

中国的老式宅第，一色全是平房，一进一进独立的房子由中庭和小花园隔开。中庭之间有别致的圆形月门连结。唯独在大门和外庭之间有一座照壁，除了不让路人向里面窥视之外，据说还有阻挡鬼怪进入宅第的作用。理由是鬼怪只会直线行走，不会拐弯。

为我们准备的房子，在第二个中庭。房间狭长，一边全被炕占了。用砖和粘土造的“炕”，是中国北部一般人家的“床”。在房外烧火，便可以把炕烧热。全家人都睡在一个炕上也不罕见。在村里的小旅馆投宿的客人，也多是睡炕的。

我们房里的炕上面，已准备了枕头、色彩鲜艳的绸缎被子，被子整齐地叠在床的内侧，看上去就象一条大青虫。两个枕头都绣上美丽的图案，其中一个用红丝线绣着英文字“Good Morning”，显然，这是专门为我这个外国人而绣的。

炕的上方，挂着中国的彩色年画。画上画的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年轻妇女和五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色彩鲜明。新年的时候，街头处处都在摆卖这种象征着幸福和添丁的年画。这一类画，非常受中国人欢迎。

房里的家具有一张正方形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书桌。桌子的摆法和我们西方的不同，是按中国的习惯一边靠墙。公公对那张书桌特别满意，他高兴地叫我用它来练书法。因为刚才我对他说过，我来之后，头几个月要好好地下工夫学中文和练习书法。

我们大致地看完了新房之后，正要和家人道晚安，突然，大门的金属门环铮铮作响，冲破了夜间的静寂。大家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一个士兵走进来，传达简单明了的军令：杨将军要和你们两位立即见面，让我领你们到紫禁城。

杨将军是中国西北部很有势力的军人。他和我的公公是歃血之交。他们两人都为打倒满清政府、建设孙博士的共和国战斗过。当他的老朋友的儿子炳南，因为和共产党有关系而置身险境时，他让炳南先到日本，然后到德国去避风。

我知道，炳南自己也拿不准，将军对他和外国人结婚到底有什么看法。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外国妇女结婚，一起回国，并不罕见。但是，在西安，炳南是第一个。在柏林的中国朋友们曾经提醒我，“杨将军可能会不信任你，甚至会拒绝接见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对炳南来说，和这位实力人物保持友好关系，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因而炳南对我和杨将军的第一次见面，稍有不安之感。

公公对他的老朋友这个出人意外的要求，却不觉得突然。当我们登上等候在门外的汽车去杨的官邸时，公公微笑着对炳

南说：“杨将军只不过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你的太太罢了！”

夜访“虎”将军

从大莲花池街到紫禁城警卫森严的大门，汽车只要几分钟。途中我们相对无言。和杨将军会面时我应该怎么做，炳南没有指点，我也没有问他。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有着“城之虎”这个名字的杨虎城。我这样坦然自若，是因为我当时还想象不到，在中国，拥有军权的人是多么强横有力，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人们的生死祸福，全由他一人决定。

紫禁城内，明晃晃的电灯照耀着广阔的庭园，盛开的花木在灯光的反射下发出微弱的光芒。我们穿过好几道“月门”，慢慢地向一座灯火辉煌的建筑物走去。当我们拾阶而上，刚刚走到阳台的时候，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壮健、身着普通军服的男子向我们迎来。他就是“虎”将军。他一边和我们寒暄致意，一边用审视的目光看着炳南和我。随后，向我介绍那位和他一起迎候我们的年轻夫人。她叫谢葆贞，杨将军的第三夫人。她虽然是二妾，但和杨将军一起住在城内，实际上已取得正式夫人的资格。她仍然沿用未婚时代的姓名，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新型的妇女们——葆贞也以此自许——不喜欢被称为“太太”。这种例子很多，在我后来的朋友中，就有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的李“小姐”、谢“小姐”。这些“小姐”们都是贤妻良母。

杨虎城于一九二六年，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打败他的军事对手，确立了他在陕西的统治地位。他的老乡们在他当权后，也不称他为“杨将军”，还是和从前一样，叫他“九娃”，以示对

他的亲昵和敬爱。“九娃”即第九子，杨是一个贫苦农民的第九个儿子，因此，也就简单地按出生顺序来给他命名。这在一般的农民家庭是司空见惯的习俗。当时，那些敢闯敢冲的农民，不愿顺从悲惨的命运，便铤而走险，踏上剪径之途。杨也选择了这条道路。在他同乡的眼中，这条生活道路并不卑微。在中国历史上绿林好汉往往是本领高强、受人民爱戴的爱国者，他们在许多民谣和古典小说中受到歌颂。

可称为“中国的罗宾汉”的杨虎城，长年在故乡险峻的山区劫富济贫；他向那些甘为满清鹰犬的官兵挑战，并参加过孙逸仙博士的革命运动。他是中国西北部最早投身革命的人士之一。他和我公公的友情，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杨升任西北军的司令官，可以说是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但他并没有完全忘记苦难的青年时代和投身革命的去。尽管由于居高位，拥大权，常常使他干出那些与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事情，他仍然是一个爱国者，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大众美好的未来，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

同样，在杨的夫人葆贞身上也充满着矛盾。她和杨结婚时是一个才十五岁的女学生。据炳南说，她参加过学生的革命组织，甚至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后来，她对学生时代的理想仍然缅怀不忘。但现在，她却成了一个纵情享乐的贵夫人。她有一个有财有势的丈夫，仆从如云，随心役使。长年的奢侈生活使她对学生时代为之战斗的理想，渐渐淡忘了。有时，她虽然也谈及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变革的必要，但却不再付诸行动。

葆贞置身在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无忧无虑；但她可能还不觉察：自己的思想仍然束缚在封建的桎梏里。事实上，她一面从内心深处痛恨旧的社会制度，一面却又受这种制度的毒害和侵蚀。

后来，她曾经暗暗地对我说，尽管将军给她以“正式”夫人的地位，但她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只是第二夫人之下的“第三号”。何况还有一个第一夫人，她的生活就更为惶惑不安了。

葆贞的痛苦是很深的，有一次她对我诉说时，放声大哭起来。她边哭边说：“虎城要是不象现在这样有财有势就好了，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两个人在一起过简朴宁静的生活。”

不久，命运果然考验了她，她坚强地撑住了。

当时，谁会料想到，在她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会吃这么大的苦头呢？她三十四岁时，在流放中病死。蒋介石判杨将军终身监禁，把他关在贵州省一座无路可通的深山的寺院里。那个寺院与外界完全隔绝，周围还派兵严加警戒。葆贞自愿陪伴丈夫，在这里过流放的生活。但是，她年纪轻轻便死去了，并没有看到杨将军一生的可怕结局。将军是一九四九年被蒋介石下令处死的，恰好是在共产党的军队逼近集中营的前几天，杨将军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蒋介石以“人格受辱”为理由，不知处死了多少无辜人士，作为基督徒的他，曾想过这些事实吗？

人不能预见未来的祸福，真是幸运之至。在西安的那个晚上，当我们一起度过午夜之时，正是葆贞人生的最盛期。她并没有中国上流妇女特有的纤细和优雅。她穿贵妇的衣着，看起来却象老百姓的女儿。她的眼睛又圆又亮，孩子气的脸显得很活泼，真难相信她已有三个孩子，而且还是妊娠之身。因为我和她的年龄几乎相同，不久便成了朋友。

在神秘的紫禁城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厅。厅内铺着中国制的高价地毯，陈设着名贵的艺术珍品。当我置身其间时，仿佛觉得自己在—一个东方君主的宫殿里作客。然而，我们坐着的沙发却

是外国货，确切地说，是上海的外国商店造的。那些透明的瓷盘盛着精选过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亮澄澄的十分悦目。新春时节，西安不大有水果，那都是从沿海地区运来的。我还注意到，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中国一般习惯用来奉客的茶，而是咖啡。显然是杨想让我们看看，这里的人是通晓外国习惯的。

我对一般的客套话，和询问我身体好吗之类的问题，能用简单的中国话回答，也只限于此，在这以上就无能为力了。为此，除保持沉默之外，别无他法。但我尽力理解当时谈话的内容：炳南拒绝了将军的提议，这个问题的核心被我抓住了。

他们争论的问题是：炳南准备明天便搬到大莲花池街的家，而杨将军极力表示反对。我很有兴趣地倾听他们的辩论。将军认为，对一个外国妇女来说，在缺乏现代化设备的中国老式宅第里是不可能生活的。他要我们两人继续住在旅馆，费用的问题不用担心。他又说，这个且不谈，现在你们手头不大方便吧，说着他好象是把钱递给了炳南。

对人慷慨，是杨将军性格中固有的一面——对这一点，不久我看得更为清楚。可是，他的慷慨却每每被人利用。中国哪一个掌握军权的人都是这样，杨也不例外，他被一群酒囊饭袋包围着。那些人倚仗着与杨有亲戚关系而在他的“宫廷”里取得地位。杨不通文墨——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书——，又不愿让人知道，怕失面子，对他的“秘书们”提出的各种所谓计划，全都签名同意。就这样，在执行计划的名义下，各种巧立名目支出的金钱，都被那些狡猾的家伙中饱私囊了。

杨当然不是那么愚蠢，看不透那一伙人的诡计，但是，他认为出于体面，对钱财马马虎虎，出手阔绰是理所当然的。炳南却从来没有占过杨的一文钱，也没有利用过他的关系。这大概是

杨对炳南抱有明显的好感和敬重的理由之一吧。事实上，炳南的正直和廉洁也是罕见的。

对杨将军让我们继续住在旅馆的提议，炳南拒绝说：

“内人对中国的生活并不抱有幻想，在德国时我和她已谈清楚了。她完全同意搬到我家去住。”

听炳南这样说的时候，将军显得颇为惊讶。

杨将军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炳南的话。我们竟然对将军的建议加以拒绝，实在是非常大胆的行为。这一只“虎”，大概还不曾有过受人反对的经验哩。后来，我好几次看到，那些被称为大人物的先生们，在将军的面前，为他的威势所慑，战战兢兢，竟连话也说不清楚。

第一个晚上的争论以悬而未决而告终。杨将军是不可能让人说服的。而且，不久就会证明，他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

用欧洲的观念来看，我们在大莲花池街的住处是非常不文明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每天早晨，男佣人挑来几桶热气腾腾的洗脸水，一天要挑好几回。因为，滚滚沙土一直吹进房里来，不得不经常用热水毛巾，擦掉身上的黄尘。此外，夏天天气闷热时，只喝烧开过的热水，最初我也很不习惯，后来才明白喝热水比喝凉水远为消暑。

和中国的其它城市一样，西安也有许多公共澡堂，其中设有单间盆汤和大池。单间经常被举家同来的客人包租。但人多，要挨个儿洗。候浴的人便在休息室喝茶嗑瓜子消磨时光。本来，

洗个澡花不了多少时间，可是许多人把澡堂当作与朋友会晤，或长谈生意经的场所，所以，半个小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春节临近，澡堂生意奇佳，挤满了人。这并不只是为了除污去垢。原来，按中国的习惯，在过年之前，欠债的人只要能避开债主，还债的期限便可以延长，直到五月端午节，甚至六月为止。为此，公共澡堂的大浴池，便成了避债的理想地方。要在光着身子的许多人中间，找出存心避债的人，确实不容易。

妇女到澡堂，一定有丈夫或家人作伴。否则，可能就被误到澡堂拉客的妓女。

最初，对我来说，比没有浴室和自来水更为痛苦的，是没有所谓“卫生设备”。连在德国农村常见的木板搭成的简便厕所也没有。人们都使用有木盖的粘土制马桶。这种最常见的用具，只要放在房间的一角便可。所以，没有能力设厕所的家庭都用马桶。连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马桶的用户也有好几十万。

在中国，马桶里的粪便是颇为值钱的。早上，清粪的人拉着臭气薰天的粪车来倒粪，然后把它卖给农家作肥料。女佣们在路旁用刷帚刷洗空马桶的晃郎晃郎声，成了中国清晨生活的典型旋律。

和中国所有的商贩一样，清粪夫为了让人们知道自己已经来了，边走着边用一种独特的声音呼喊。最初，这种尖叫的声响常常使我从清晨的酣睡中惊醒。我想，这种听了令人打冷颤的凄惨声音，大概是清粪这种卑微职业所使然吧。但是，炳南告诉我，清粪是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初时，我被令人不快的马桶弄得烦躁不安。那时候，我还没有在中国的农民中生活过，根本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后来，我这个生活上的大问题，终于用特殊的方法得到解决。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公园。一位进步的市长在这个公园里盖了一个公共厕所。但是，市民并不象小说《古罗萧梅尔》^①里的村民那样，把厕所当作一种进步的事物而兴奋异常。在西安，这个式样不错的小厕所，被人们所漠视。人们就象完全忘记了它似的，无论男厕或女厕，我一次也没有看到有人进出。于是，这个有用的厕所也就成了我的专用品。我实在要好好谢谢那位进步的市长哩！

在中国的西北部，大多数家庭是男女分开吃饭的。我丈夫的家也是这样。中国的膳食，根据收入和家庭人口的多少而有所区别。菜和肉盛在盘子里，放在圆形的饭桌中间，用筷子夹着吃。最先吃的是家里的男人。吃到他们嘴里的，当然是最好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吃到的已是残羹剩饭。

公公对我是例外，让我和男人同桌吃饭。最初，我感到不大好意思，但又不能违反公公的决定。他对我这样优待，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妇女，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学者”，因而可以享有只有男人才有的权利。

因为公公尊重知识和学习，他还给了我一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特权。他让我每天几个小时呆在房里不受干扰，进行自学。中国的房间没有锁，人们也没有敲门进房的习惯。中国的布鞋底走起路来又没有声音，有人进房里来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公公给我的特权，不管有事没事，总会有人要进我的房里来，那就不胜其烦了。

学习中文书法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公公要家人们注意，不要妨碍我。对这种照顾，我实在高兴得连公公也难以想象。其实，

① 法国作家 G·萧威利亚一九三四年的作品，以幽默的笔调描述一个种植葡萄的村庄的生活。

我需要安静的环境，并不只是为了学习，首先，我要安定一下情绪，以应付生活的急剧变化。这一点，炳南是不能帮助我的。他几乎整天都在外面，和老朋友们联系，和杨将军促膝长谈，有时陪同杨将军去视察，忙个不停。

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桌上度过的。我在描红簿上反复地认真练字——在一个个格子里，一个个字地写。通过反复练习，从简单的点线构成的字开始，到写十划乃至十五划以上的复杂的字，我学习中文书法共通的笔划顺序。如果不领会这种笔顺，写出来的字就会大小参差不齐。

中国人认为，优美的书法比任何形式的画都要美。在书画店，如果说要看最好的画，店员就会立即领你看字画的挂轴。那些字轴，白纸黑字，跃然纸上。现代的中国人，已不用毛笔，多用自来水笔和沾水笔，而以自来水笔为主。我却还象小学生一样用毛笔练字。用毛笔写的字可以看出笔顺是否正确，不用毛笔就不能判断。书法上笔顺的重要，并不亚于构成文字的点线结构。

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认识几千个字。掌握几门外国语固然十分难得，但是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圈子里的一分子，首先要会读、会写中国字。

我的妯娌玉英

我的中国话能够很快进步，完全是玉英帮助的结果。她很有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当我用错一个字时，她马上帮我更正。

玉英在西安上过女校。当我听到她说学校就象天堂一样时，感到非常惊讶。

她对我说：“我在学校里很自由。评定一个人，学校是以成绩作唯一的标准。不象在家里，按辈份来定地位。在家里我是无能为力的。”

这不只是玉英一个人的见解。许多中国妇女都对我说，离开学校之日，便是她们悲伤之时。因为她们要重新回到狭隘的家庭小圈子里去，对“老太太”（即祖母）或父亲唯命是从。至于婚后在婆家作儿媳，那就更难了。

大多数学校设有女生宿舍。有钱人家和那些希望女儿能接受学校教育的进步家长，都让自己的女儿住校。这样，这些志同道合的同龄女子，便和象神灵一样备受尊敬的教师们一道，共同生活几年。

后来，当我自己也在中国执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为什么教师会受到莫大的尊敬。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他还引导学生追求新的理想，企求民族的独立和昌盛，从儒家的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

妇女婚后也不停学，是很少见的。后来我才知道，炳南的大哥准备和玉英结婚时，玉英曾坚持婚后要继续上学。

大哥和玉英认识时，玉英才十四岁。她是孤儿，从小住在陕西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由有钱的亲戚抚养成人，并在当地的学校里上学。当时，大哥是陕西省军队的上尉，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他父亲的挚友杨将军。作为这个县城的驻防军指挥官，大哥有权征用一户上等人的房子做住所。那正好是玉英寄养的那一家。玉英的养父母发现，这个年轻军官对他们的养女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因而感到惊恐不安。但她的养父母没有勇气拒绝大哥的求婚。因为在中国，掌握军队和武器的人，是可以无限制地行使权力的。至于文官，是不能查问、

惩罚他的。

养父母劝告玉英不要违背驻防军指挥官的意愿，但玉英却执意不从。家人责难她，如果只为她个人考虑，可能会招致全家的不幸。

“我曾经考虑过自杀，”玉英含着眼泪对我说。

“当时我想，这样年纪轻轻地就离开心爱的学校，被家务和家庭生活束缚，实在是非常痛苦的。结果，我还是屈服了。但我提出一个条件，让我继续上学。”

“那时候，你知道大哥已经结婚了吗？”我问她。

“不，他什么也没说。我是婚后好久才知道的。”

对生性诚实的大哥来说，向玉英和她的养父母隐瞒已婚的事实，一定是很不好受的。但因为大哥爱玉英，他怕如果以事实相告，求婚就会被拒绝。

大哥和他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十六岁时，就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结了婚。而他梦寐以求的妻子，却是能读能写，能与他一起为新的理想战斗和献身的妇女。

大哥和玉英结婚后，还是没有勇气把事实告诉她。他们两人住在这个驻防的小县城里，日子过得很是称心如意。尽管玉英最初讨厌结婚，但对这个于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她终于从内心深处爱上他了。

可是，大哥接到奉召还乡的命令后，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刻便日益迫近。大哥带玉英回到故乡的老家，在那里，玉英和他的元配夫人相见了。

“最初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玉英坦白地对我说，“那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妇女，竟是大哥的妻子。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是多么痛苦呵！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妾侍！大哥的不诚

实，使我万念俱灰，很长时间不和他说话。可是，他发誓说，除了我，不再和别人一起生活，绝不使我受气，一定好好待我。”

“那么，大嫂对你的态度怎样呢？”我内心充满同情地问。
“她也决不是那么好受吧？”

“她人倒亲切，也没有要我屈从于她。大哥告诉我，她也是旧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他不能简单地把她逐出家门。”

大哥的元配夫人后来对我诉苦：“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把我许配给大哥了。要是说我没文化，没教养，笨，那是真的，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丈夫有合意的女人，我还要把妻子的位置让给她，谁能够体谅我是什么心情啊？”她和玉英一样，说话时眼泪盈眶。对她的话，我实在无法回答。玉英她们的命运，在当时的中国，正是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写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青年们努力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儒家的家庭制度抵制他们的攻击。因此，年轻男子反抗强迫婚姻的方式仅限于和自己选择的第二个妻子结婚。只有极少数能有勇气和家庭决裂，不顾社会习惯势力的反对，而与第一个妻子离婚。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

家里人对我每天到外面稍作运动，感到很不理解。有时，我散步时顺便买点东西回来。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无目的地逛逛而已。

“你为什么不叫辆人力车呢？”玉英问我。“或者，你告诉佣人，让佣人去买不好吗？”

我在天气好时外出散步已经使家人惊讶，天气不好时仍然外出散步，更使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我想让他们明白，长时间坐在书桌旁之后，活动活动对身体很有好处。但这只是徒劳——他们总认为我喜欢散步是显示外国人的与众不同。

当时，西安市的人口约二十五万，住房几乎全都是平房，居民的住处很分散，城内也有许多空旷的地方。西安市的布局 and 北京相同，街道全都是南北、东西向的直街。主要街道是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它们的交叉点便是市中心。外地人到西安问路时，西安的市民不说向左走，向右拐，而是象北京人一样，说成朝西走，往北拐。

天气好的时候，街道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休憩所和办事处。商店和饭馆之类的店铺一早就开了门，收起夜间闭店时用的门板，卷起铺盖，准备客人光临。这些店铺没有一定的营业时间，为了招徕顾客，从早到晚都开着门。

每天，街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那种拥挤程度是欧洲不能想象的。士兵、挑夫、人力车夫、苦力……诸色人等，全都拥到街上来了。流动小贩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大筐，或一头挑着一只小小的木炭炉，沿街叫卖，美味的油炸食物在油锅里发出吱吱的声响。被顾客围着的修理小摊，当街摆着修理的物品。到处都是小孩，数以百计的大大小的孩子在街头巷尾玩耍。清晨，还可以看到一些穿着花花绿绿的绸缎衣服、浓妆艳抹而面无表情的妓女，在街上游来荡去。

到处都是噪音：说话声、叫卖声、小贩招徕生意的角笛鸣声和其它叮叮当当的响声。年轻的小伙子一边摇着成串的大钥匙，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一边喊道：“修配钥匙！”理发师在专心替人刮脸、剃胡子、掏耳、修鼻毛，甚至还有兼做拔牙的。理发店前

陈列着一些牙齿，说明拔技奇佳，以资招徕。充满噪音的街道上空，数不清的鸽子飞过，发出“嗡嗡”声。那是人们系在鸽子尾部的小竹笛的响声。这已经成了中国北部有代表性的风光之一。

在西安的街头，我见到不少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在中国西北部占全体居民的半数，在某些省份甚至占一半以上。中国人把伊斯兰教徒简称为“回”。他们的服装和其他中国人一样，不同的只是头上戴着白色的小圆帽。妇女则多包上穆斯林的白围巾。伊斯兰教徒的脸象土耳其人，皮肤较其他种族的中国人黑，杏眼浓须，很容易识别。

古都西安，又称长安（意为长久平安），曾是中国这个大帝国的首都。西安在唐代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各国的学者和艺术家云集于此。

如今，那黄金时代的宫殿已了无踪影，只留下巨大的城墙。象欧洲那样的纪念碑，中国古时候是没有的。重大的事件都刻记在巨大的石碑上，流传后世，供人瞻仰。

我常到西安东面的碑林散步。碑林，石碑林立，延绵排列。那数百个石碑，已成了历史文物。碑林中最有名的是景教的石碑。这块黑色的石灰岩上的碑文，刻于公元七八九年，它记录了景教派基督徒在西安的活动。

石碑上不仅刻着字，还配图镶边。真可谓是图文并茂，生动优美。

我还喜欢在文庙徜徉。文庙是纪念孔子的庙宇。高高的围墙挡住街上的噪音，庭园里古柏参天，荫影蔽日，静穆无比。孔庙不象其它佛寺，没有供设常见的神像和鬼怪。它那黄澄澄的屋脊，和象意大利蓝天一样的晴空相辉映，显得轮廓分明，充满魅力，令游客为之倾倒。

我还到过西安的一所大清真寺。它的外貌，和中国的寺庙很相象。大殿的房顶很高，屋柱粗大。院内占地很广，空旷处中国式的石碑林立，纯是中国色彩。只有在朝向麦加^①的礼拜堂内的一个小厅，才用阿拉伯文刻着可兰经的经文。因为那个小厅是“女人止步”的，我也不得其门而入。

偶然，杨将军夫人谢葆贞约了我，乘小汽车去郊游。下午，我们就在某个寺院的凉爽的大厅，或在优雅的园亭里，愉快地谈天说地。这些园亭都有巧夺天工的长廊小桥相连，原来是宫廷的所在。李太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都曾咏叹过这里的胜景。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连树影也看不见，蓦地现出绿洲一角，便是临潼。临潼是大山脉脚下的一个小城。那里，在骊山的山坡上，有孔子时代就有的硫磺温泉华清池，离宫的宫顶和殿堂在山中清晰可见。唐朝一个皇帝的妃子杨贵妃曾经在这里住过。她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美人。中国的史书，把唐朝的没落乃至灭亡的原因，都归到杨贵妃的身上。当时，皇帝被叛军逐出皇都，在逃亡的途中，部下要求皇帝把他宠幸的美人处死，皇帝不得不答应了。杨贵妃是在离宫的一座建筑物里自缢而死的。

杨贵妃的故事为中国人所熟知。它成了许多历史小说和戏曲的题材。

这个曾被杨贵妃享用过的温泉，至今还遗留着，因为疗效甚佳，吸引着众多游客。许多个盛暑的下午我们都是在这个温泉胜地度过的。几个月后，临潼这个小城便闻名全国。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蒋介石从西安到临潼的温泉疗养，

^① 麦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

在此被捕。

炳 南 的 病

我们到达西安数周后，在德国从不生病的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经省立医院的医生注射后，高烧虽然暂时退了一些，但病情还没有好转。

说实话，我不太信任西安的医生。当我听说一位美国记者和一位美国医生要到西安来，便起了一个主意。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炳南安心静养，直至痊愈。但这首先要说服炳南。而要说服他，我想医生的话比我说的要有效得多吧。

我和这两位美国人在杨将军处相识。那位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后来是《红星照耀中国》^①一书的作者，并因此而出名。书中记叙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事迹，这本书至今还很有教益。斯诺是个给人印象良好的年轻人，我们和他相见时，他正在访问杨将军。杨将军为这两位美国访问者举行了茶会，炳南和我也应邀参加。杨将军不懂英语，他虽然有正式的译员，但他对译员和外国记者都不信任，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我们出席并为他作翻译，他是会非常满意的。

斯诺在国外听说过我的事，他这次特地请有名的研究中国语言的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维多福格尔写了一封介绍信来见我。维多福格尔的信中说，请尽可能帮助这位事业心很强的采访记者。我后来才知道，他想进入红军控制的地区。他是第

① 中译本名《西行漫记》。

一个采访红军生活的记者。他的尝试成功了。中国的内战，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仍未结束。斯诺为了保守秘密，并没有对我们透露他的计划。因为他是在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宫廷”里和我们见面的，而且这个将军正在“讨伐”红军。后来，我们常常笑着谈起这一段捉迷藏游戏，因为当时不只是斯诺，炳南也和红军在西安的密使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我并没有和斯诺长谈。对我来说，和他的同伴乔治·哈德姆医生谈炳南的病情，更为重要。哈德姆医生的中国名字马海德，更为人们所熟知。这位叙利亚出生的美国人是友好的青年，在瑞士学医。他曾在上海开业，当过两年医生，但他觉得意义不太大。因为他来中国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众多的患者，特别是想参与扑灭可怕的传染病。他从一个中国青年的口中得悉“苏区”生活的实际情况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惜一切，甘冒巨大风险，把自己的医学专长献给共产党人。

他到陕北以后，就用马医生这个名字。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他留在红军中，现在仍住在北京，担任卫生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他诊断的结果，和我原先的想法一样。他认为炳南必须卧床四周，此后还要在家里静养四周，不能外出。他再三叮嘱我，要遵照他的意见去做。

炳南的病，给杨将军一个旧事重提的机会。他坚持说，现在非搬家不可了。当他让我们去看他的新居，同时，也是他为我们预定的住所时，我不能再拒绝了。我在他新居的景色优美的庭园里漫步于百花盛开的路旁和小池边，心旷神怡。我不由得这样想：要是每天在这个天堂一般的地方生活，该多么好啊！

杨将军建议我们住在新居的二楼。他说，他并不是舍弃“紫

禁城”内的官邸，只是在想换环境，休息一下的时候，到新居来住上几天。

我们两人长谈一夜的结果，是对杨将军提出一个新的意见。在新官邸的花园里，有一排平房。我们看中了这排平房，是因为它自立门户，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比在二楼住要好得多。杨将军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连搬家的日子也定了。

搬到新的地方去，我是高兴的。可是，和家人们分离却使我感到难过。和玉英分手，我也很不好受。但是，我预定今秋就要分娩，为未来的孩子考虑，我们新居的庭园是多么好啊，在这牧歌般的小房子里过和平恬静的生活，多么令人向往！

但是，好梦难圆。我们等待到的不是安稳，而是不安；不是居家的平静，而是政治的动乱，最后终于爆发了战争。可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谁能预测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

将 军 的 官 邸

即使是再简单的家庭，搬起家来也是够麻烦的。为此，找了一个人帮助我，他就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佣人夏得胜。

夏得胜出生在与山西相邻的河南省，约二十岁。他人颇机灵，不过，一开始他对给一位外国太太帮佣感到惶恐不安，后来却成了我的很好的帮手。我和他共通之处是，两人都喜欢做自己没有试过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对新任务也毫无经验。

当时，佣人除了很低的工钱之外，别无要求。所以，城里的中产阶级和农村的富裕家庭，都雇有佣人。很富有的人家，还给孩子各请一名保姆。有五名或更多的佣人的家庭也并不

罕见。

佣人中厨师的收入最好。买东西时还可从中捞点油水。厨师有权雇用和解雇其他佣人，监督他们的工作。

夏得胜这个人，的确不能用德文意义上的“佣人”去看待他。他不是天生的“标准”佣人，也不是卑躬屈膝的奴隶。他是个乐天知命的人，只要能有三餐一宿，便心满意足了。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曾有过为食宿担心的日子。

我们不久便知道他很能睡。一办完事，他便成大字形躺在床上酣睡，即使白天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大声地叫他的名字两三遍，他才睡眼惺忪地答一声“哎！”夏得胜做事的时候，总是哼着河南地方戏的调子。河南梆子是古典戏曲的一个变种。这一点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很相似：一般民众都熟悉戏中的曲调。不管是谁，哪怕是文盲，也会哼很多调子。

我们的家有两间房。一间不太大，另一间却又大又长。大间因为家具少，显得空荡荡的。我就用盛开的盆花加以点缀。在西安，不论什么季节，所费无几便可买到这种盆花。把盆栽的花木，移入彩色的大瓷缸里，可放在地板上作装饰。那时，插花刚刚从欧洲传入沿海城市，西安还没流行。举世闻名的中国花瓶，多半成了单纯的装饰品，空荡荡地放在小茶几上或地板上。

中国老式的房间，不用窗帘。一般都是用不透明的宣纸贴在窗户上。可是，我们家都装上现代化的玻璃窗。我虽然不习惯，也只好自己缝制窗帘。墙上挂着一对轴画。画的是一只伏在花枝上的昆虫，笔触细致，栩栩如生。我们的新居布置得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赢得了客人的连声赞扬。我被大家公认为“室内设计师”，而且竟然要接受客户的委托。我的第一个客户是杨将军。杨将军到我们的住处仔细看过后，要求我负责他新官邸的室内

设计。他让我全盘负责，尽可能设计成现代化的、西欧式的。

接受的这个任务，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费用是不受限制的。使我头疼的是墙上的饰画。我找遍了整个西安，只能找到一些彩色风景画。这些画五颜六色，令人看不上眼。虽然将军可能会对这些画感兴趣，但我实在不能把它们当作西欧文化的样板来用。于是，我选定中国的轴画作装饰。在他的卧室里，我替他挂了一幅和他的名字相应的“虎”。他对我的这一设计感到疑惑不解。

将军的新官邸布置完毕后，就在这里开会，接见客人。幸而我们住在花园中的小平房里，没有受到干扰。但有时将军家居时，警卫森严，从大门进入官邸，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天，我远足归来，走到大门边，平日上年纪的看门人不见了，却站着几个粗野的士兵。他们对我说，这是将军的官邸，不准入内。我告诉他们我就住在官邸里，他们似乎觉得我在开玩笑。这时候幸而来了一位秘书，他连忙向我赔不是，送我进去。士兵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们大概以为，“虎”将军又娶了个外国人做妾，藏在这所新房子里吧。

不只是士兵们这样想。有一天，我接到一位美国记者的信，他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作为中国军阀的妾侍是如何生活的，并答应给我优厚的稿酬。后来我才理解这封信的真正意思。记得有一次，在杨将军处和那位美国记者见过面，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在军阀的“宫廷”，在中国的将校之中竟然夹有一个年轻的欧洲妇女，使他感到很奇怪。当时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如实回答道：“就在这所房子里。”这个回答足以使这位以猎取奇闻为职业的记者编出一则富有刺激性的新闻。

我们安闲地在家里生活的日子并不长。炳南在家养病的后

期，来探病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弄得我们连一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没有。这大概是因为客人们知道我彬彬有礼，不会断然拒绝他们见炳南吧。

在中国，会客时间是不一定的。客人什么时候来，都会受到亲切的接待；只要高兴，很晚才走也没关系。来客越多，主人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越显得有威信。这种访问不只是寒暄式的交谈。

探访炳南的客人，动机不一。有的是对炳南久别归来表示欢迎，有的则想听他谈谈德国的事情，或者是征求他对当前政治的意见。此外，有的人是想续老朋友之情，有的则想和他这个备受杨将军信任眷顾的人物拉拉关系。那些和炳南拉关系的人，希望弄个好的差使，或者捞点油水。他们期待炳南照顾远亲近戚之后，也给他们分一杯羹。

炳南在新居静养结束后的头一周，客人蜂拥而来，使他应接不暇，他对我这样说：

“这些客人使我想起从前认识的一位将军的母亲。她接见来客时就问：‘你想要地位，还是钱？’我真想也这么做，这样可以使我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

很少有客人偕夫人一起来访，再说男人们不欢迎妇女参与他们的谈话，所以我总是奉茶后便告退。

“少帅”——与西安告别

从表面上看，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安然无事。但表面的平静是虚假的，实际上是暗潮汹涌。能看透政治舞台内幕的人，便可以预见到：戏剧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受到中国西北部最有权势的人信任的，只有寥寥数人，炳南就是其中之一。他和戏剧性事件的开展，有着直接关系。我们搬到新居还不到一周，一天夜里，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了。

“将军有话对你说，请马上去。”

这样的情况，此后成了常事。杨将军睡不着觉的时候，便派士兵叫炳南去促膝长谈，讨论政治问题。杨将军要处理的事务很多，常常夜不能眠。这时，蒋介石命令杨将军和东北军最高指挥官、被称为“少帅”的张学良，对红军采取断然行动。新的作战行动要在年底展开。

我在杨将军家里举行的晚餐会上，认识了这位少帅。因为他喜欢说英语，所以我破例地被邀作陪。

尽管张学良还很年轻，但他已经体验过人生的波澜起伏。一九二八年，手握大权的张作霖被日本军队暗杀，娇生惯养、放荡不羁的张学良继承父任，成了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东北的统治者。由于受损友的影响，他染上鸦片瘾；身边的人也都是贪官污吏和酒囊饭袋。如是过了几年，这位“少帅”被外国的报纸和国内舆论视为花花公子。尽管他早已戒绝鸦片，开始了新生活，但国内外舆论对他的看法仍未改变。

一九三一年，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不发一枪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军队。几年之后，张学良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对付红军。他愤而抗命，开始时这种反抗并未采取公开的形式。张学良的部下，和张一起过斯巴达式生活的青年军官们，说服了他，与其和红军打仗，不如谈判为好。

一九三六年夏天，得到张学良的默认，共产党的代表数人来到西安。对此，炳南是了解的。其中一位代表还访问了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对我们的问候：“毛主席欢迎你们回到中国。”这时，

我们到西安才数周，由此可见共产党情报机关能力之强。

和红军谈判的成果是，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是，不能肯定，能否使蒋介石停止执行他长期的反共路线。

九月，因为“少帅”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匆匆结束了牧歌式的生活，离开西安去上海。这次去，原先没有计划，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后来，朋友们问我，你的儿子为什么在上海，而不是在西安出生？我答道：“那是因为张学良牙痛的缘故。”朋友们都笑而不信，但事实的确如此。

事情是从牙痛开始的。不知道是痛得实在难忍，还是军阀的兴之所至，张学良用专机从上海把三名外国医生接来，尽管当时西安也有几名中国牙医和一名年轻的外国牙医。在我看来，大概是只有那三名外国医生才能够使张学良放心吧。

富裕的中国人不仅一有机会就给自己的朋友们送礼，而且还让他们分享必需的或者舒适的设备，这已成了一种习惯。杨将军不能算是病人，但身体经常有些欠安。他自己并不把这当成很严重的一回事。“少帅”既然花了不少钱，请来三名美国医生，他便让他们也替杨将军治病，心想他们大概能治好杨将军的病吧。

杨从来没有看过西医，对这三名美国医生的检查治疗很感谢，但又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并没能很好诊治他的病。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最清楚，而且感到不安。他同意到上海的疗养院继续接受治疗，并不只是健康上的理由。以治病为理由到上海，名正言顺，免得受蒋介石猜疑。暂时离开充满紧张空气的西安，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妙着。到上海他可以比较容易和思想一致的抗日人士建立联系，南京政府的特务大概不会想到去监视疗养院和探望病人的客人吧。

与杨将军同行的，除夫人和几个佣人外，还有副官、秘书、仆役及一大帮闲人，总而言之，凡是属于一个军阀的宫廷王国的诸色人等，统统都跟着去了。本来，将军希望炳南同行，因为我预定在十月下旬分娩，炳南不忍留我一个人在西安，所以他没有同行。

杨出发后，我们的家清静得出奇。炳南也有时间在大花园里散散步了。这时才感到，这个大花园的花果是为我们而栽的。珊瑚色的柿子、浓绿的石榴、枣、各种各样的梨，都正是盈熟的时节。我们乐融融地住在这个小天堂里，谁也没来打扰我们。

可是，才过了几天，就接到杨将军发自上海的第一封电报。杨将军热切地希望炳南无论如何也到上海去。接二连三，到后来几乎每天都接到一封提出新建议的电报。杨将军知道炳南不想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安，便建议我们两人一起去上海。

中国的农历八月十五日（约在公历的九月中旬至下旬之间），我们一家团聚欢庆中秋。中秋是中国民间的三大节日之一，对我来说，凉爽的中秋比寒冷的春节和炎热的端午更为畅快。

在银色的月圆之夜，我们一家人在炳南家的小花园里共赏中秋明月。一张张小桌子上，放着月饼和小瓷酒杯。杯里盛着陕西有名的特产凤酒（用蜂蜜泡制的一种甜酒^①）。西安秋夜的凉意，颇似德国的夏夜。我们把酒赏月，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吟诵以秋月、美酒、良友、惜别之类为题的诗歌。

公公微笑着和我碰杯，祝我身体健康。他充满感情地说：“早一点回来！你生一个女孩子就好了，我真希望有个孙女。家

① 凤酒是用高粱酿造的一种白酒，因加用蜂蜜泡制而成为甜酒。

里添丁，我真高兴。”

虽然后来我生下的孩子不是他所希望的孙女，但他对我并没有任何不满，对他的孙子也一样的非常宠爱。

中秋后两天，我们便动身往上海去。我打点了行装，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忠实的夏得胜，临行时还嘱咐了他一番。我是不忍离开这个家的，但当时我还不知道从此不再回来了。失去自己收集起来的心爱之物而毫无惋惜之意，这一点我在当时还做不到。后来，再多、再大的损失，我也能够做到不叹息、不流泪，处之泰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最先把这教给我的，不是别的，而是战争和中国朋友们。

二

上 海

中国东部之行

一个秋天的晴日，我们在西安车站等候出发。初次到达这个车站，也只是五个月前的事。等了一会儿，我们便登上列车，离开西安了。巨大的城墙渐渐远去，列车驶过座落在山脚下的风光明媚的小城临潼，在华山山麓的狭道上行进。华山的峰顶，高低起伏，有如锯齿；阳光辉映，十分壮观。

列车驶抵黄河拐角处的古代要塞潼关，便是杨虎城势力范围的尽头了。从河的对岸开始，一直到内蒙古辽阔的沙漠地带，是阎锡山将军的“帝国”，许多年以来，他是那里主宰一切的土皇帝。他曾和好几个军阀较量，数年之前还和蒋介石打了一仗。但是，每一次都按古来的俗例，双方以妥协告终。

列车进入河南省，我们便看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从这里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尽管河南省土地肥沃，但这个地区缺雨则旱，雨多则涝，不时发生周期性的饥荒。荒年时，数十万人向西逃荒，但其中的大部分农民，又重新回到往往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保证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遇荒年时，则又外出逃荒。如是往往返返，已经成了习惯。

从西安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徐州。我们在徐州不得不和舒适的车厢分手，换乘蓝色特快列车。这种列车在二十年代，因遭强盗袭击而闻名于世，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劳顿，我真想稍为活动一下身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结果却不得不在一家饭店里度过候车的时间。从西安出发后，我已经习惯于被其他乘客盯着看，也习惯于听他们象互相传递口令似的，一个传一个地叫“洋人！”但是，当我走在徐州狭窄的街道上，被看热闹的人们团团围住时，实在是感到有点太过分了。

幸而在此后的旅途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我舒了一口气，心想大概可以平安无事到达上海，生下腹中的孩子吧。

第二天一早，我眺望车外的风光。虽然一晃即逝，却很有魅力。与昨天还是一片黄土的单调景色截然不同，窗外处处是浓淡相宜的苍葱绿野，水田、竹林相连不断，到处可见潺潺流水。即使把中国西北部所有的河流、湖泊、池塘和沟渠汇合在一起，也不及绿茵遍地、丰盈肥沃的江苏省一省水量之丰。数月后，孩子的保姆初次到中国东部来，她和我乍到江苏时的心情一样，被江南的富饶骇住了。保姆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水！这么多的水！如果陕西也有这么多的水，我们的日子可就好过多啦！”

大多数的河流和运河，都修有坚固的堤坝。在车上，可以看到大得出人意外的各种颜色的帆，在绿油油的田野的河道间穿行。帆下的船体部分，被堤坝挡住，没能看见。

到处可见村民和房屋。相邻的村落，就象一条长链子，互相牵连。可是，它们并不象西北的村子那么密集地被围在土墙里，而是择地而居，各得其所。那些粉刷成白色的房子，每家前面都有一个茂密的小竹林，绿白两色相映成趣。

东部和西北部的田野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土坟奇多。在活着的子孙们本来就不多的耕地中，墓地占去了相当一部分。在

西北，我从车厢往外望，只见无数圆形的土坟，全无装点，任凭杂草丛生，在平整得很好的农田里，看上去就象是一个个耸立着的据点。东部就不同，在肥沃的耕地里，一座座石墓，建得有如小房子，和美丽的风景倒很融和，但这种对肥沃土地的毫无意义的浪费，却比西北更甚。

活着的人受死人的牵累，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根深蒂固的。要打破习惯势力，改变这种状况，是将来的政府的一个大问题。这种习俗，在中国已沿袭了数百年。把客死异乡的尸体运回故乡埋葬，尽管对遗属是一种莫大的负担，但已成为无可推却的义务。上海竟然有好几家经营棺木运送的大公司，其业务就是接受委托，代为保管因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未能运回内地故乡的棺木。

在今天的中国，墓地风光见不到了。可是，从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诞生起，为了打破这种旧习惯势力，曾作出过多少努力，耗费过多少时间啊！现在，丘陵状的坟墓，都已平整成耕地。新的墓地，则仿效西欧的样式。

列车越接近上海，这种死人占活地的情况就越严重，每人平均的居住面积就更狭小。上海，这个人口比欧洲几个国家还要多的大城市，向四方扩展，吸引了很多谋职的人。上海附近的农村成了它的穷困的市郊，工人、苦力、小手工业者，住在贫民窟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北火车站位于中国人聚居的闸北区。此外，还有“高级”地区即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九三二年初，中国军队死守闸北，和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当时，日军占领了东北后，把矛头指向上海，但仅限于上海的中国地界。十九路军死守闸北，从此，成了抗日运动的象征。中国军队与外国侵略者作战，并受到上海

市民的积极支援，这一事件不但在中国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而且使世界上那些以为中国人对侵略不知抵抗的外国人大吃一惊。

我们是一九三六年九月来到闸北的，数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不过，那些用水泥板建成的新房子，大概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吧。对穷人来说，在这些房子里生活和工作，已经算是有活动余地的了。

我们到闸北后的几个月，闸北又一次沦为战场。日军把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再次夷为废墟。从此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不只是闸北，许多地方都成了战场。如果和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失去的几百万人的生命相比，闸北的牺牲者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罢了。

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我在往杨将军住处的途中得知，上海这个大城市，实际上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小城镇组成的。将军在上海疗养期间，借用了整座疗养院。原先住院的病人全部被转移到别的医院。对拥有强大权力的军阀，大概不能要求他和其他人同住在一所房子吧！

杨虎城一行住的虹桥疗养院，位于公共租界的虹桥花园别墅区之内。这一带的花园别墅，如果与闸北比较，就有如欧洲和亚洲的差别一样。这里的漂亮别墅，都有大花园，而且陈设豪华，格调高尚，它们的主人全都是外国人或中国的富翁。如果不看人力车车夫和肩挑重担、步履维艰的苦力，而只看那优雅的小轿车在柏油路上行驶的话，真想不到这是中国。

虹桥疗养院是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建筑物，它的周围是一大片整修得很好的英国式草地，乔木林立，点缀着多彩的秋色。杨将军和谢葆贞以及他们“宫廷”内的亲信，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衷心欢迎。我们终于又听到久违了的乡音，这种带点粗野的西北方言，听来令人愉快。我很不喜欢上海话，听起来难受。中国的人们——当然，上海人除外——也都说上海话难听。

按杨将军指示，我们成了“宫廷”的成员，他在许多空屋中拨了一间给我们。尽管消毒的气味和洁白的医院对我来说有些不太习惯，但能够在久违了的沙发床上睡，在明亮的餐厅里从丰盛的佳肴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吃，总算是一件赏心乐事。

最倒霉的，要算是医生和护士们了。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几乎全部是身强力壮的一伙，与医院有缘的人，只是极个别的。医生和护士们得知我就要生产，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一个模样长得很可爱的护士，来到我的床边，把体温计放进我的口腔里量体温。我一再推却也无效。我再三对她说，我现在身体很好，妊娠并不是生病，但这只是枉费口舌。

后来，我终于成功地摆脱了他们，使这些因为无所事事而苦恼的医生和护士们，把注意力转到炳南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炳南曾经生过重病。为此，将军特别关照，给炳南作一次全身检查。这种检查采用了最新的医疗器具，费用昂贵。检查结果，炳南并没有后遗症，真是值得庆幸。在西安时，我曾要固执的炳南足不出户地在家中静养数周，看来效果是好的。

单是杨将军一个人的医疗费，折合成美金就是一笔庞大的数目。而病人对此却满不在乎。他竭尽全力来达到这次上海之行的政治目的。为此，炳南常常和将军一起外出，在疗养院内参加一连串的会谈，每天的时间，全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的这些

活动，看起来并未收立竿见影之效，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期望立即得到具体的成果。他们四出联系，调查对将来的行动有重要关系的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全国各地抗日力量的强弱作出正确估价，要知道其中有多少能与蒋介石相对抗。到那时为止，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与炳南的忙得不可开交相比，我在疗养院的生活简直有如隐居。但只有一点例外，我们几乎每天都开车去看电影。在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象初到上海的两周那样，成了电影院的常客。当然，这不只是因为我对欧美新出品的影片有兴趣，而且也是为了陪杨将军。这种娱乐他在西安是享受不到的，现在自然要尽情地观赏一番了。在西安，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不能和老百姓一起看电影的。而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将军可以说是隐名埋姓，他只不过是许多富翁中的一个，几百头“虎”中的一头而已。再说，每天午后第一场电影，观众很少，特别是我们买的最贵的票，周围的座位都空着。

将军在离开疗养院前一天，挽留我们继续住下去，至少要在疗养院住到孩子出生。我希望能住在普通的住所，而且我们两人都想在上海呆那么长时间，我便向炳南提出，租一间有家具的房子来住。

我们在法租界的莫里哀路——一条小小的清静的街道上，找到一间挺雅致的房子。房东是被称为“白俄”的俄国人。他们是十月革命爆发后逃到上海来的。在法租界，来自俄国的亡命者有好几千人，这里与其说是法国的殖民地，不如说是俄国的殖民地更恰当。

离我们住处不多远住着一位不寻常的妇女。在我的中国生活中，这位妇女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就是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

救国会

中国西北的晚宴，没有夫人同席的习惯。杨将军却极力主张葆贞和我同席，大概是因为他顺从西方色彩很浓的现代化沿海城市的风习吧。在这类社交场合里，我认识了好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在他们之中，我最有好感的是创立、组织“救国会”的抗日运动领导人。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之中有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律师、教师、报刊杂志的编辑以及实业家。中产阶级，在全中国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低，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救国会属下的人，并没有军事力量，他们的优点是：无私的爱国心、诚恳的光明正大的态度。他们并不追求个人的财富，过着简朴的甚至是贫苦的生活。他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失去自由亦在所不惜。

他们的弱点是：影响力仅限于城市，而且只影响到城市里的部分民众。和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城市才代表进步，农村则是落后的代名词。他们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落后的农村。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把救国会的几位领导人，介绍给英国工党著名的政治家斯达福特·克利普斯爵士。斯达福特曾要求我给他引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从事地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人物。

“你们的纲领对农民的状况是怎么提的？”在一次热烈的讨论中，斯达福特问道。

我的中国朋友们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终于，他们中的一位，很直率地回答道：

“我们的工作对象首先是知识分子，也就是中产阶级。至于农民问题，由共产党去搞。”

斯达福特爵士对我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大概已经了解，中国的未来将属于谁……。

救国会的男女成员，并不是共产党人，只不过他们之中有少数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救国会的会长，是一位备受大家尊敬的著名法学家。他身着中式长衫，银髯垂胸，样子就象是中国古画里描绘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沈钧儒，但大家都尊称他为沈老先生。中文里的“先生”，不但是礼貌上的称呼，也含有“教师”的意思。沈老先生和我打招呼时，他那亲切诚恳的样子，真象一位温厚的老教师。沈老对我说，他对德国特别有好感，他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德国留学。后来，我在西安，认识了沈老在西安当建筑师的儿子和他那德国人的儿媳。她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人。

和救国会的领导人初次会见后数周，我才知道沈老有一位德国人儿媳。这竟然促成了我的一次访问，实非始料所及。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应日军要求，逮捕了从事抗日运动的“七君子”，包括沈老先生。可是，对他们诉诸法律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公众对这次逮捕极为愤慨，促使法官——他们几乎全都是沈老的学生——拒绝进行判决。当局出于无奈，只得把这七位（六男一女）名人囚犯，送到上海附近的苏州监禁起来。起初，每天都有数百人前往探监，发生了一连串的示威，以此表达他们对被捕者的事业的同情；政府终于下令，禁止近亲以外的人前往探望。

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位住在上海的美国记者。他绞尽了脑

汁，想写一篇关于苏州监狱里“七君子”情况的亲眼目睹的报道。但是，作为外国人，尤其是作为记者，他是不可能亲自到狱中去的。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可以冒充沈老的德国人儿媳进入牢房。一天，我便和沈老的一个儿子一起到苏州去。我的运气还不错，狱中没有一个官员要我提出证明。

六名囚犯，高兴得要跳起来，高声叫着“哈罗！”来迎接我。有一点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七君子”中唯一的一名妇女。那位女律师被关在女牢里。

我在监狱里呆了一整天。监狱里相当舒适，甚至看守和警察也竭力向这些不寻常的犯人表示自己的同情。

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中，唯独沈老先生是属于前清时代的人物。当时，他殿试及第，由皇帝亲点“翰林”。

七人中年纪最轻的沙千里先生，是沈老的学生。他最感兴趣的是推广合作社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沙千里在工业落后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全力以赴地发展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小规模工业企业。

作家、生活书店的主事人邹韬奋，是救国会成员中的著名人物之一。由于积劳成疾，他的身体极差，而且一年比一年恶化。尽管这样，他仍然非常达观开朗。邹韬奋为了扶植中国的年轻作家，发行了《生活》杂志。他本人也是这个杂志的编辑，热衷于发表年轻作家的作品。

他的出版社，还翻译了一系列西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邹韬奋忘我地工作，对自己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从不照顾。就这样，在1944年，这位天赋奇才终因脑癌而去世。

七名囚犯之一的李公朴，是一位教育家。他是一所中学的

校长，同时在上海的各区举办夜校。小职员、学徒以及所有因穷困而无力求学或继续升学的人都到那里去上学，因为这种夜校，只要交一点学费就可以听讲，接受系统的教育。夜校的校址是借用日间的学校或办公室，由与李公朴志同道合的校长们、店主们提供。任教的老师几乎都是尽义务的。

一九三七年，我曾在这类夜校中的一所教过英文。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些求知欲很强的青年男女更注意听讲的学生。他们在工厂或商店经过了长时间的劳动后，在发着霉臭、灯光暗淡的教室里连续学习两三个小时，这些年轻人的向学精神是多么可嘉。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我实在感到高兴。而且，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最大的收获是，更进一步认识到他们那个阶层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

李公朴现已作古。在抗日战争中，他被国民党的保守派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这是因为他在内地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中等专业学校，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战后不久，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和他的很有名望的同事闻一多教授，在云南遇难。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在大街上的。

同囚之中，还有一位年轻富有的工厂主章乃器。他和那些收入低微、经常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好象不太协调。但他的爱国抗日精神，并不比他的好朋友们逊色。日本是共同的敌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这种共同的认识，把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中国人连结在一起。但他们并不能公开活动，“七君子”的被捕，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当时南京政府还紧紧地抱住对日让步的政策不放，而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间，主张与日本和纳粹德国结成同盟的也为数不少。

鲁 迅

当时，不只是反政府的政治家被迫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象中国现代卓越的作家鲁迅这样的人物，也是如此。我访问鲁迅，是在十月上旬，地点是在他居住的简陋的弄堂房子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才五十五岁，但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已是为日无多了。

尽管他不只是作家、提倡白话文的改革者，而且是学者和导师，备受人们的敬重，但他的著作几乎全都被国民党禁止发表。鲁迅并不是共产党人，他被统治集团视为仇敌，是因为他的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对现存社会的不合理予以抨击，对青年影响很大，进而掀起了文学革命。对同时代的作家来说，鲁迅也是一位导师和模范。

鲁迅开拓了新的道路，这不单是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就语言来说，他的作品也和古典文学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古典文学只能被极少数的学者们理解，而鲁迅则用当时被认为是不文雅的大众化的语言写文章，他把长期以来束缚中国文学的封建枷锁砍断了。

鲁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现存社会的假道德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对国家和封建家庭的统治者的残忍利己固然无情揭露，对被剥削者的无知和奴隶性，也毫不宽容。他俯拾中国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和着涕泪，予他们以生命。

我曾和鲁迅谈过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鲁迅把他写得活灵活现，使

人相信阿Q真有其人。人们甚至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称为阿Q。例如，针对蒋介石以民主主义的外衣来粉饰他的独裁统治，便说，“阿Q也成了民主主义者了。”又如，说阿Q式的人物现在成了革命家了。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本没有阿Q这个人，但阿Q就象真有其人，从一村到另一村，继续他的漂泊生涯。尽管阿Q是他所属阶层的最后的代表者，是封建制度的愚民，但他却不以为耻，反而对旧社会秩序心悦诚服，实在是个自欺欺人的人物。

我对鲁迅说，我最受感动的小说是《祝福》。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有丈夫，还有一个儿子。她在丈夫死后，被迫再嫁，因而严重违反了守节的规条。而且，她的第二个丈夫和孩子，都先她而死，因而更受到思想偏狭、迷信很深的村人的歧视。她活着没有目标，终日为死后的遭遇惶恐不安。一次，她见到一位学者，便执拗地问他，来生是否可以和那被狼吃了的儿子见面；她先后嫁了两个丈夫，触犯了禁忌，死后阎罗王是否会因此而将她治罪，用锯把她锯成两截，等等。

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帮助下，正开始把《祝福》和他的其它小说译为德文。他极力鼓励我，并希望我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绍给西方。他自己曾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著名。

此外，还有一个艺术领域，留存着鲁迅作为开拓者的业绩。二十年代版画艺术在中国得以大行其道，首先是鲁迅提倡的。他把凯绥·珂勒惠支的几幅版画拿给我看，并且谈到准备在这位他极力推崇的艺术家七十诞辰时写一篇文章。后来，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版画艺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鲁艺的艺术家们遵从鲁迅的意见，以珂勒惠支和格洛雷斯等现代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为范例，使中国的传统版画艺术得

到恢复和发展。

鲁迅对我说，希望我务必再来一次，以便给我介绍那些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我的翻译对象。可是，这个意愿未能实现。我儿子出生的那天，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他的千百万同胞同表哀悼。鲁迅不只是伟大的作家和白话文的提倡者，而且是正直的、有勇气的爱国者，他集同胞的尊敬于一身，溘然长逝。

我们的儿子黎明

十月十九日清早，我提着简便的行李，要到离家不远的法国人开办的圣玛丽亚医院去时，炳南把我叫住了，他说：“我叫出租汽车送你去。”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杨将军来的，说是有要事相商。我叫炳南不要送我，“你赶紧到将军那里去吧。估计下午或者晚上你能接到医院的电话，时间还早着呢。”

出门时，我回顾了一下我们的住房。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难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吗？也许，和孩子一起再回来吧。就这样左思右想着往医院走去。途中，分娩前的阵痛，使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路旁停了下来。幸而没有引起来去匆匆、忙于工作或购物的路人的注意，不久终于走到了医院。

孩子是在晚上不到九点出生的。我听到医生用法语说“男孩子”，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儿子。

炳南喜气洋洋地到医院来。给孩子取什么名好呢？和炳南商量后决定，由他给孩子取一个德文名，我给孩子取一个中文

名。炳南稍想了一下就说，他想把孩子叫做莱茵哈尔特。这是他喜欢读的斯笃姆的小说《茵梦湖》中一个孩子的名字。这部小说有许多中文译本，很受欢迎。

我俩还一致决定，叫孩子时只用他的中文名，在中国，有的人除中国名外，还有一个外国名。供人称呼的外国名，多选用一些似乎好听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却觉得没有意思。这种习惯在留美、留英的学生中很普遍。中国的教会学校学生，自然也不例外。这些教会学校学生的外国名，不只是保罗或约翰，还要加上威灵顿、华盛顿之类的姓。在女学生中，最受欢迎的名字是露丝或锺蒂。出乎意外的是，德国的影响几乎没有，简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叫做兴登堡·李或者威廉·陈的。

不管怎样，当我看到刚生下的儿子时，还是觉得中国名字对他很合适，因为他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后来我领着儿子去散步，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收养一个中国小孩。归根结蒂，我们的儿子要在中国长大，要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和炳南尽量使孩子忘掉自己是一个混血儿。混血儿在两种人种之间，结局往往象无根之草。

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中国名字，也不是很容易的。中国人的姓并不多，大概不超过一百以上。所以中国人把人民大众叫做“老百姓”。姓王、姓张、姓李的人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只有名字可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做父母的人给孩子取名，只要从收有数千字的字典里找出适当的两个字来就行了。取单名的也不少。

中国并不象西方那样有通用的名字。女孩子的名字喜欢用花卉、宝石之类的词，或者用合乎女性美德的字。与此相对，则用合乎男性美德的字来给男孩子取名。此外，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或以季节、诞生地为名的，也不罕见。现在，还有“和平”、“跃进”——取飞跃前进之意——之类的名字。

“白玉”、“月梅”，和“铁英”、“永智”这类名字一样普遍，这些名字只是用于称呼，词的原意已荡然无存。这正如德国人听到“特奥多”这个名字，并不会想到它的原意是“神的赐物”一样。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特地让炳南带了一本字典来，专心致志地翻了一上午。我合意的是 Li 这个发音，Li 什么好呢？Li 后面接续的字那么多，我选哪一个好呢？从意义上考虑，我终于选取了“黎明”这个词。“黎”是黑、暗之意，与“明”合在一起，意为快要天亮的时候。

这是我们孩子的合适的名字吧！孩子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暗交替之间。“黎明”预示着新时代就要开始，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我们的孩子黎明，正如明暗相交的意思一样，不也是隐含着两个种族相结合的意义吗？因而，黎明这个名字也可以解释为我从少女时代就信奉的所有种族一律平等的象征。

征求了有学问的朋友的意见，他们认为“黎明”与王这个姓也很相配。于是，炳南和我便决定给孩子取名黎明。当时，并没有出生登记的制度，孩子长大了，对父母亲的命名如果不满意，可以自由更改。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名字并无不满，现在也仍然用着。可是，他大概已想不起，父亲曾给他取过一个德国名字莱茵哈尔特。

只身在上海

我们原先打算在上海过冬，新春重返西安。但天不从人愿。

这是因为政治危机的加速，比预想的还要快，到十二月已达到高潮。

十一月，杨将军从西安来电报，要炳南速返。

我安慰炳南说：“这次请你一个人安心去吧。我和孩子留在这里，一样心情舒畅。天气稍暖一点，最晚到三月份，我便带孩子回去。”

炳南就要出发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小房子挤得简直水泄不通。从早到晚，来客接连不断。他们中有教授、学生、作家、编辑。我不知道，喜欢无休止的争论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也许他们仅仅是特别有耐心罢了。

说他们在“争论”，似乎不十分精确。因为我们一般说的争论，是指如果有不同意见就立即发表。中国知识分子却不同，尽管说话的人兜着圈子长篇大论地说，其他人也都耐心地听。即使说话者在大发谬论，听者也不去打断他的话。直到前者说“我的话完了”，后者才发表意见。

炳南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如何促使抗日运动在全中国热烈展开；南京政府里，哪些人持反蒋路线的立场；和日军交手后，政府军中哪些将军是可以信赖的；国民党的政治家中间，哪些人会 and 红军对话。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从各个方面认真加以检讨。

炳南走后，变得非常清静。这隐居般的生活，给了我再次学习中文的机会。我以火一样的热情，倾尽全力翻译鲁迅建议我翻译的那几部小说。

虽然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大城市。现在，我幸而总算有了较多的时间四处逛逛。

从表面上来看，上海给人的印象，和美国的城市几乎一样。

但是，只要踏入外国人很少到的中国人地区，比如走进现代化大街旁边狭窄的里弄，就会使人产生错觉，如同到了中国内地的小城镇。

走到雕刻樟木的工匠所居住的街道，一阵清香的气味扑鼻而来。在散发香味的樟木上，雕着龙、帆船、宝塔、弯弯曲曲的树和老寿星等等，这些雕刻着丰富多彩的图案的樟木箱大受外国人欢迎。

走到中国人的药房，便嗅到一股香味。这里卖的是珍贵的药材。除了各种各样普通的药材外，还有售价很高的兽角、草根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就象在那些恐怖电影里出现的东西一样。它们全是罕见的珍品。

上海寺庙不多。在破烂不堪的贫民区里，突然出现一道壮观的寺门。门内，庙宇的建筑物就象一座妖魔的宫殿。在大雄宝殿里，仿佛使人感到时光停止了流逝。几个年轻的僧人在金色的大佛像前深深俯首，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捻着手里的佛珠。突然，巨大的铜锣轰响，僧人在香炉里插上已经点燃的线香，带来强烈的气味。

佛像两旁，还有塑造得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镀金神像。军神关羽的眉毛，和炳南的眉毛一模一样，长而整齐，眼梢往上吊。人称这种眼为“关公眼”，是美男子的象征。在中国，长这种眼睛的人也是不多的。

我的一位女朋友听到我说炳南是“关公眼”之后，在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根据眼睛的特征，认出了炳南。后来，她给我来信这样说。

关于关公，有很多传说。他原来是潦倒的商人，后来从军，保护受压迫的民众，终于成为有名的将军。他死后被尊崇为军

神，在庙中受参拜。

完完整整的寺庙很少，大部分都是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用粘土塑造的神像已经倒塌，牛头马面的鼻子上红漆和青漆都已剥落。只有善良、慈悲的观音，穿着杏色绸子的洁净衣服，头上装饰着珍珠和银片。参拜观音的妇女，都把一个绯红色的小布袋吊在神坛上，为自己的孩子祈求好运。

黎明满月后，一个暖和的日子，我带他到法国公园去。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由阿妈领着的外国孩子。这些外国孩子不知道人种的差别，很自然地用中国话作为共通的语言。他们对阿妈比对自己的母亲远为亲近，那些一表斯文的外国夫人是很少领孩子到游乐场来的。

我常常接到炳南的消息。可是，每一封信都很短，内容也仅限于个人。我的中文程度，当时还不能读报。至于外国报纸，极少报道中国的国内问题，即使报道，大部分也是极为片面的。

有时候，中国朋友们来看我，给我讲一些流传着的最新消息。对我得知的西安方面的情况最为关心的是张夫人，这位年轻的夫人，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她的丈夫是救国会的一员，不久前去了西安。她丈夫给她的信，比炳南给我的更短。

张先生经常在我们家，以非常高昂的声调大发议论，使我和炳南都觉得这位演说家实在滑稽可笑。张先生出生在山东省，身高肩宽；他的体格、演说，以至姿势，都使人觉得有些过分。因为他说话的姿势异于常人，我和炳南便暗暗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拿破仑。当然，这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张先生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拿破仑·张。

西北人不善辞令，“拿破仑”在西北得意洋洋之态，是不难想象的。他的演说旁征博引，从古到今，使听者为之动容。听众对

他这位演说家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爱。

他那身材娇小、羞人答答的夫人，曾想和他一道去西安。拿破仑不同意，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留在上海的好。他大概是考虑两人同去的话，要花不少旅费吧。他们夫妇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不随便花钱的，用一个铜板都要算计算计。

白天常有朋友来看我，晚上经常只是我自己一个人。一天晚上，中国朋友约我外出，先到南京路一家大饭店吃饭，然后到有名的仙乐斯舞厅跳舞。

舞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年轻的男子西装革履，仪表非凡，女士们穿着由上海名裁缝精心制作的华贵的绸缎旗袍，非常合适地衬托出她们窈窕的身材。虽然服饰讲究，但舞客们都面无表情，就象是橱窗里的洋娃娃一样，刚张开那惺忪的睡眼。多数人用英语或英、沪语混在一起交谈。英、沪语混合的语言，被认为是最时髦的。

许多双眼睛，都把视线投射到我们这张桌子上来。穿着中国服装的外国妇女出现在中国人的社交场所，这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上海，这一点和中国内地也并无不同。

上海虽然是个国际性的大城市，但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接触有限。上海从十九世纪中叶起，靠外国人的力量，逐步建设成为实力雄厚的工商业中心。外国人把上海当成是自己的城市。工厂、银行、进出口公司、与世界各地相连的航运事业，全都是外国人所有。自然，中国人也开办了一些工厂和银行，因此，为了和这些中国工商业者接洽业务，做买卖，外国人就必须借助于买办。但外国人和买办之间几乎没有私人关系，更谈不上友好交往。

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外国人统治地区，大部分居民也是

中国人。而且，这些地区的税收都来自中国居民，但中国人却不能出入俱乐部和现代化的公寓大厦。在这些建筑物出入的中国人，只限于供人役使的佣人。甚至中国人连公园也不能进去，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提起在公园门口竖起的“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至今还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对中国已经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上海的外国人几乎全无觉察。他们满以为，自己的生活、特权地位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确信可以永久享有治外法权和经济特权。

维持租界治安的是外国警察。长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都是锡克教徒，用警棍殴打人力车车夫，或没收车上的座垫予以惩罚。而要赎回座垫，必须付出一笔很高的罚款，这是车夫们根本负担不起的。

在租界，罢工的工人和其他违法者都要被捕投狱。他们被捕后，就引渡给中国官厅。然后，被关进城门前的龙华监狱，不少人从此就杳无音讯了。

金钱是支撑这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基础。在上海，一夜之间成为巨富的例子，并不罕见。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书名叫《四亿顾客》。难道不正是这个巨大的中国内地市场的四亿顾客，等待着上海生产的或由上海港输入的货物吗？因此，一般人都认为上海的重要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三十年代初期，外国在中国的权力机构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在军队和战舰的护卫下，看起来好象是不可动摇的。最初冲击这些特权并使之被取消，并不是中国人的力量所致。那是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最后一次是一九四一年，三次受到日本进攻的结果。这些进攻宣告外国人支配上海的权力已经结束，这个外国竞相争夺的复杂的大城市，又恢复了中国城市的

旧貌。

西安事变

到十二月初，来自西安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张夫人为此显得坐立不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好象是出了什么事。”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好象害怕我们已受到暗中监视似的。她告诉我，蒋介石已到西安和张、杨两位将军会谈；蒋强迫张、杨和红军作战，一定会遭到拒绝。

炳南的朋友们不断来访，他们问我是否听到西安的情况，并互相交换消息和传闻。然后，又匆匆离去，以便把刚刚听到的情况尽快转告其他朋友。这种口口相传的“竹电”的机能得到充分发挥。以此传来的消息虽不能完全相信，但它的可靠性比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要大，速度也来得快。此刻，中国民众的眼光都注视着西安。西安，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访问西安，是意味着新的内战又要展开，还是意味千百万中国人期待着的转变快要开始了呢？

谁也没有预料到，局势的变化竟是如此急速。当我看到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总司令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报道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临潼遭到反叛的东北军士兵逮捕并被解送西安。在西安的几名国民党将军也同样落到反叛分子的手中。据说在这次冲突事件中，曾有死伤。这篇报道虽然很短，却使我激动得不能平静地读下去。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

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呵！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哄哄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它，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娇小的张夫人深信拿破仑一定置身在战乱之中，担忧不已。我只好安慰她说：“如果电信通的话，炳南一定会打电报来的。即使不通，他也会用其它方法把情况告诉我们的。”

可是，好几天过去了，西安好象和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我们听到的，只是那里情况相当混乱。有消息说，蒋介石现在是否仍然活着，也值得怀疑；又说，他可能已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给枪毙了。

后来，我在西安得知，这些报道全是捏造。双方只是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生过枪击，那是因准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在西安的人员反抗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命令而引起的。

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就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象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

过了几天，在各种交错的流言中，有一种却成了事实。那就是，在南京很有影响力的集团，决意对西安的“反叛分子”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他们全不考虑这样做对蒋介石的生命会带来危险。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中央政府的军队在陕西省边界集结。据报道说，黄河流域的古老要塞潼关，已成了一座大兵营。陇海铁路也只通到潼关，

据说是因为运送军队的缘故。

听到这些消息，我越来越不安。不管怎样，我也要突破难关到西安去。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最初，我只是一个人盘算如何往西安去。起程之前，不管怎样也要等候一下炳南的消息。炳南此刻当然了解，我是多么想到西安去呵！数天后，久盼着的炳南的电报终于来了，电报上只是平安无事，请勿挂念等寥寥数语。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朋友们每天都聚集到我家里来分析情况。我对他们表示去西安的决心，竟遭到猛烈反对。他们认为，妇女孤身一人，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到西安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经过内战的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没有交通工具，吃的和住的都成问题。”

“最危险的是士兵们到处抢劫。”

他们高声地说，无论如何也要我打消这个念头。

当他们理解到不管怎样反对，我的决心也不会改变之后，便对我说：

“只有一个可能性，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宋子文要乘飞机到西安去，就释放蒋总司令的问题进行谈判。宋子文和少帅、杨将军都有密切的关系，凭这一点，你可以和他们同机前往西安亦未可知。”

我发了好些电报给与南京的当权者有关系的朋友，想通过他们，看看有无可能乘飞机往西安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焦虑地等待着他们的答复。刚刚露出一丝成功的征兆，很快就被一

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一笔勾销。

结果是事与愿违。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别无他法。

我决意到西安去，便着手准备。首先是替黎明种痘，买一些食物，还定做了一个竹篮。竹篮里放着防寒用的棉被和枕头，这是往西安的漫长旅途中给黎明准备的。

只有一个人支持我西行的计划。那就是娇小的张夫人。十二月十二日局势剧变以来，我请她到我家来与我同住。一天晚上，她战战兢兢地问我：

“如果你真的要西安去，让我陪你一道去吧！你真有勇气，和你同行，大概我也是可以的。和你一样，不管怎样我也要西安去……。”

我听了大为感动，高兴地抱着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不住地说：

“我们一定能够！就我们两个人！两个妇女，一个小孩，有什么理由去不了？”

炳南来电报告告诉我，与南京方面交涉，让我和孩子乘飞机往西安去的事情失败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即使比这更刺激人的消息，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的决心。十二月二十五日，传来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人们为此热烈欢呼，普遍认为，释放蒋总司令，内战的危险便可避免，表明局势已有好转。

虽然如此，中国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政变和军事变动的影响，在事变以后还会长期存在，并不会如此简单就了结的。但我已不想在上海久等。现在，我的岗位是在西安。

三

重 返 西 安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

在上海，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现在铁路究竟可以通到中国西部的哪些地方。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陕西省边界的潼关，中央政府的军队和反叛分子仍然处于相峙的局面。因而，铁路的联系到潼关便中断了。

“首先，我们得去走一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火车究竟通到哪里。”

我对张夫人这样说，勉励她，也以此自勉。

我们的行李并不多。我最贵重的“小行李”，是装着孩子的竹篮。遇到最恶劣的情况，我和张夫人便提着竹篮走。我一直在注意提醒搬行李的人要小心搬运这个竹篮。他们当然不会想到，篮子里面竟然有个活着的小东西。当我把竹篮打开，他们看到安静地熟睡中的孩子时，都惊讶地笑了起来。把孩子放进篮子当货物搬运，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异乎寻常的事情。

到达稍大的车站，等候换车，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车内的气氛，一列比一列紧张。军警方面对乘客的检查和讯问，也越来越频繁。但我们都一一忍住了。为了谨慎小心，在被问到往何处去时，我不说往西安，而只把途中的某个站说成是目的地。如果说出西安，是会受到怀疑的。

途中，我们两个人不大交谈，而且避免高声谈及我们的计划

和希望。我们的话题，仅限于急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超员的列车里怎样才能找到座位，怎样设法在车站的食堂和车站附近搬运工人的小食堂里弄到食物，等等。我们预先在上海准备的食物，只剩下几罐牛奶，很快就一无所有了。因为，从出发到洛阳，已经足足费了三天时间。

黎明倒很能够忍受各种困难。他是吃人奶的，当然不会不合卫生。至于我们吃的食物，那就难说了。在中国，不管是什么妇女，在公众面前都若无其事地给孩子喂奶，因此，我这样做也不会引人注目。我并不是没有西欧人的羞耻感，只是避开众人的眼睛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离开众人行动，只好如此了。幸而，外国妇女虽然罕见，在我身边围着的观众还不太多，真是谢天谢地。

车站和车站附近拥挤不堪，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候车室，人们找到空地，便铺上席子，耐心地候车。火车时刻表，对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根本看不懂。再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火车根本就不准点，于是他们就在车站里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到了洛阳，谁也不知道继续前行的列车何时出发。当受委托前往侦查的乘客回来报告说，一列火车开了进来时，人们就先恐后地挤到车上去。不管是窗还是门，拚命往里挤，一下子整个车厢便挤得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来晚了的乘客，竟爬到车顶上去。忽然广播传来：“这辆火车不开”，“这是军队专用车”。乘客只好又从火车的窗或门挤出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途中，我们多次被查问，为什么要往西去，目的地在哪里。张夫人和我都一致回答：回家，有事。我答道，我的丈夫生病了，尽早回到丈夫身边是妻子应尽的责任；如果不是丈夫生病的话，怎

么会领着这么小的孩子作这样艰难的旅行呢？领着黎明，对我的通行有助，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检查乘客的军官和士兵，见到篮子里熟睡的孩子，都笑了起来。他们甚至替我在开往潼关的唯一的列车上，找到了一个好座位。在这些官兵看来，我不辞劳苦，为家庭而尽义务，这是很合乎儒家妇道的，外国的妇女这样做，更加值得称赞。

一个多云而寒冷的早上，从车窗向外看去，已可看到潼关在望。这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除夕。我们能否顺利地突破这个最后的难关呢？或是要停留在这个荒凉的中世纪般的城市，在凛冽的北风中四处求宿，在客满的旅馆外面流落街头呢？

我在小食堂里喝着热豆浆，张夫人走来走去向人求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往西安去。据食堂的顾客们说，这几天在“前线”曾多次交火，要找到往西安去的货车，希望极小。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过了一个小时，张夫人回来对我说，上午有六辆货车往西去。这些货车是商人所有，他们要把货物运到陕西省西面的甘肃省去。

张夫人很关切地对我说：

“你和孩子在路上是不是忍受得住，我实在没有把握。这些货车全都是没有篷的，外面很冷，风如刀割，车开起来就更够受了。”

可是，我们克服了这么多困难，费尽苦心，终于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如果半途而废，该是多不值得！货车的司机对我们要求同行起初也不同意，建议我们等候机会再去。我并不为他的拒绝而沮丧，坚持要去。

和我们同乘货车的，有四个年轻的男人。这四个人讲的不是此地方言，看来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旅程受到限制。在那些

检查过往行人的国民党士兵的眼中，他们是很受怀疑的，是“宣传危险思想的分子”。士兵们命令他们下车回到潼关去。

我以纯粹的陕西方言，滔滔不绝地诉说丈夫如何生病，需要我的照顾，我是如何的悲痛。那些不是陕西籍的士兵，要理解我说的话实在不容易。同车的商人却吃吃地笑。货车离“前线”越近，查问就越频繁。我们被警告说，对东北军的士兵要注意，他们是只知掠夺的，决不会让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行。

六辆货车中的四辆，不愿冒险，折回原地。幸而我们乘的那辆货车的司机，下定决心碰碰运气继续前行。最后一次查问时，几个带着大袋行李的商人被命令下车。他们高声地对士兵抗议，说明他们的目的地是兰州而不是西安，但毫无用处。这些士兵大概是想利用这个天赐良机，从这些商人身上敲诈一笔买路钱吧。所以，任你怎么抗议，就是不肯放行。刺骨的寒风，继续前行的愿望，使得商人们很快就唯命是从，慨然解囊。

作为无人区的分界线是一条河，河水很浅，河床却很深。河上有一座桥，不过只剩下了一道道的横梁。剩下的旅客，几个来自甘肃的农民和张夫人，都下了车，小心翼翼地爬过横梁。我又冷又累，了无神气，实在难以下决心下车。

我曾多次乘过各种汽车作长途旅行，对中国司机驾驶技术之高，不能不深深叹服。他们驾驶的样子看起来很鲁莽，但反应极为迅速，因而很少发生事故。大部分司机对机械方面全无知识，对自己驾驶的汽车的内部构造，只知道是一种以奇妙的方式转动的外国机器。但从他们实际驾驶时临急应变和灵活运用的驾驶技术来看，的确是专家。尽管是看来根本不能行驶的道路，他们也能巧妙地通过，实在令人惊叹。

我们的司机，看来并不是第一次驱车通过只剩横梁的破桥

吧，他这一次也圆满地成功了。就这样，最后的一道障碍被克服，通往西安之路打开了！

过桥数分钟后，我们一行人第一次碰到东北军的士兵。他们戴着毛皮的军帽，防寒用的耳盖往上翻起，看上去就象国民党方面所说的那样，令人生畏。出乎意外的是竟受到他们热烈欢迎。这时，我们才舒一口气。没有查问，行李也不用检查。

我们乘坐的货车，一边发出震耳的响声，一边向前开去，经过了好几个有名的地方。这时，我感到有如置身在云雾之中。一种奇异的感觉掠过我的脑海：我的儿子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城市的啊！这个城市是他的故乡，他本来应该在这里出生！

黎明的幼年时代究竟是和平、安定的，或是还要和我们一道，经常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呢？大变动的时代，现在是不是正开始呢？

我来到西安，一点也没有凯旋归来的味道。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因为炳南以为，我早已放弃重返西安的计划。

当我们抵达西安古城的东门时，天色已经入黑。和我们同来的乘客，各自匆匆散去。我和张夫人站在广场上发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用医学的专门术语来说，我这时的病状是因过度疲劳而引起的健忘症。我完全丧失了记忆。张夫人雇了两辆人力车，敏捷地让我和孩子坐上，赶紧把我们送到一家中国式小旅馆。在旅馆温暖的房间里过了一會兒，我渐渐恢复了元气。喝了一碗热粥，头脑才清醒过来。这个奇妙的插曲终于结束了，我和张夫人不禁开怀大笑。

几分钟后，我们用电话和炳南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赶来和

我们见面。他又惊又喜，关心不已地说：“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怎么来的？路上受了很多苦吧？孩子怎么样？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坏了！”

话还没全说完，一辆小汽车开来了。炳南让我们两人和躺在篮子里的黎明一起坐上去，送我们到我熟悉的西京招待所。在那里，张夫人也找到了她的“拿破仑”。我就在那里暂住着。我们那个有花园的家，自十二月十二日那个戏剧性的夜晚炳南离开后，便空在那里。

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简直象梦一样——明亮温暖的房间，柔软的安乐椅，特为我们准备的香气四溢的食物。孩子也用不着我来照料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喂东西给孩子吃，替他换尿布、洗澡、换衣服。我和艾格妮丝初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大除夕的晚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德国时就曾读过她写的书《大地的女儿》。这部令人惊叹的自传体小说，描述了她的出生地科罗拉多的矿区工人的赤贫生活，非常感人。

她实际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妇女。父亲是工人，母亲是洗衣妇。她在幼年时代对贫困的生活就深有体验。她没有上学，求知欲却非常旺盛，她抓住一切的可能和机会，不断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不知疲倦地学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曾帮助过一批在美国从事印度独立运动的印度革命者。美国政府应英国政府之请曾把她监禁起来。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多年来一直无私地援助印度的革命活动，今天在印度仍深受敬重。

一九二八年，她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被派到中国，不久便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产生强烈的共鸣。艾格妮丝对中国的革命理论不大感兴趣，只是出于工农的革命本能，对地主、奸商非常憎恨，从而同情中国革命。她对世上的贫困和不公正有强烈的切肤之痛。在饥饿中受苦的中国农民，被榨尽血汗的苦力，都有如她的兄弟。为了了解他们，以及只要能稍为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格妮丝作出了种种努力，工作起来连休息也不顾。那些只知对民众说教的所谓革命家，对民众的现实痛苦并不采取积极行动。艾格妮丝和他们完全不同，她宁愿献出自己最后的财产、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也在所不悔。

她终生都是个热烈的个人主义者。人们常在背后议论说，就凭这一点，她是决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不管在什么名目下，她都不能容忍压制。她憎恶不纯和虚伪。

幼年时代的冷酷生活，形成了她对外界有一种固有的反抗精神。最初，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制度，反对妨碍她自由发展的一切——反对结婚，反对家庭，反对对妇女的剥削。后来，她要自己的力量写出她目睹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并以此作为毕生的使命。

艾格妮丝关于中国的著作，全都和她本人一样，热情、诚实、专一。她的爱憎非常分明，她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有如她对压迫者的憎恨一样强烈。尽管她对事物的看法有过激的倾向，但她毕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艾格妮丝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有时她认识到，她也常常对她为之而战斗的人们感到失望。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中国，为人们所熟知。青年人对她

的著作评价很高。她以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为题材，以当代的人物为描写对象，在这方面，艾格妮丝是外国作家中的第一个。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之中——其中只有少数人曾和艾格妮丝见过面——对她的评价很差，特别是对她的性格大加抨击。在那些传教士眼里，她简直成了魔鬼的化身。

一九三六年秋，艾格妮丝到西安休养，直到十二月还住在临潼的硫磺温泉，因而那些传教士认为她有策动革命之嫌。也许他们甚至认定，整个“西安事变”是她组织的呢。

其实，十二月十二日事件发生时，艾格妮丝住在西京招待所，她和那里的其他客人一样，都觉得非常突然。十二日早上，西京招待所也成了变乱的一个舞台。那里住着蒋介石参谋总部的高级将领。这些将领曾参加与张学良的谈判。准法西斯组织蓝衣社要艾格妮丝离开西京招待所。十二月十一日，西京招待所经理接到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史沫特莱小姐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不离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他自负。即便如此，艾格妮丝仍然拒不受命，吓得那个经理对她哭诉说：“你难道想要我的命吗？”

毫无疑问，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机枪声、炮弹声大作，艾格妮丝还以为是旅馆受到蓝衣社的袭击。事后，她对我说：

“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声音、叫骂声……。”

艾格妮丝的房间的木门也终于被踢开了，一群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端着枪冲进了房间。看了一下，士兵们离去，只留下两个人。这两个人便在房内四处乱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钱、

钢笔、手电筒、照相胶卷，都被搜去了。他们立即分赃，高兴得叫起来。这两个家伙继续搜掠，一个军官走过来，把一张写有“任何人禁止入内，违者格杀勿论！”的纸条贴在艾格妮丝的房门上，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些士兵中，有没有人能够看得懂纸条上的字也是个问题。

这类事情，对长期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抢劫，是以前中国军队的士兵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与中国的官吏视受贿、贪污为家常便饭，同出一辙。对那些营养不良、军饷低微，或者根本拿不到军饷的士兵来说，除了搜刮居民以作补充外，别无他法。杨虎城的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占据西京招待所时，亦不例外。事后，杨将军得知此事，大为生气，他答应赔偿艾格妮丝所受的全部损失。可是，实际上艾格妮丝能够得到多少赔偿，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有许多“秘书”参与其事，赔偿费都赔到他们的腰包里去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事件

十二月十二日早上，炳南的遭遇也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样。猛烈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炳南也以为是蓝衣社的人来逮捕他。原来，来人是杨将军的士兵，他们奉命前来通知炳南去开会，以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这天凌晨发生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对其中原委全都知道的人，恐怕没有吧。关于“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动机，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以及事件后的影响，有很多书都曾谈及。其中最不可信的，是以《西安半月记》为题

的蒋介石总司令的日记。该书的出版者是宋美龄。

当时的报纸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也非常混乱。苏联的报刊更是极尽夸大之能事，他们甚至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与日本共谋的叛乱，说“少帅”张学良企图以此举来促进日本的侵略计划。

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全体师（团）长，向中央政府及有影响人士联名发出了电报。电报列举了监禁蒋介石的理由。

以八项纲领而知名的救国宣言，陈述了“反叛分子”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结束内战、对日抗战、改组中央政府。

到达西安后不久，我曾和指挥逮捕蒋介石这一行动的高级军官谈过话。他就是孙铭九上校，是他包围蒋介石下榻的临潼离宫的。和蒋的卫队小冲突之后，他踏入总司令的卧室，竟不见蒋的踪影，把他吓了一大跳。

天色未明，在拂晓的晨曦中，孙上校率领士兵在离宫周围搜索，从山麓的小径到山头积雪的岩石，都毫无遗漏地搜过，但都没有结果。孙上校正要结束搜索行动时，他刚好在一个小岩洞的前面走过。这个岩洞在离宫的后面，洞口被一块当地人叫做虎畔石的岩石挡住一半。在山岩的缝隙中，蒋介石这个大人物，竟然只穿着睡衣裤，颤颤抖抖地站在那里。

平时，蒋介石一贯对其尊严和仪表极为重视；如今，在这般情况下被一个下属捕获，真是奇耻大辱。这种屈辱也许比政治上的败北更使他难以忍受。因而，他对张学良元帅和杨虎城将军永远也不能饶恕，一定要把引起这场屈辱的罪魁祸首置于死地，方能平息他心头炽烈的复仇感。

“我可是你们的总司令呵！”蒋介石呐呐地对站在他面前的犹豫不决的年轻军官哀求着说。

孙上校告诉我，这时候，他对蒋介石客气地鞠了一躬后，回敬一句道：

“可是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

总司令在落荒逃命时，被尖锐的岩石边弄伤了背部和双足，孙上校便背他下山，随即十万火急地把他送往西安。临出发时非常匆忙，结果把这位高贵的俘虏的假牙给忘了带走。后来怎么找也没找着。也许是被士兵们当作有趣的战利品给拿走了，他们是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玩意儿的。为了谈判释放自己的丈夫，蒋夫人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了西安，她带来了蒋介石多次在电话中请她设法定做的假牙。蒋夫人到达后，蒋在与“反叛分子”的谈判中，采取了比被捕后不久较为积极的态度。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沉默。当然，没有假牙并不是他保持沉默的全部理由。

蒋介石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些日子里他这条命是不值几文钱的。他自己就常常巧妙地设置圈套，把政敌引诱入彀，然后，把他们“清算”掉。不过，这一次陷入牢笼之中的却是他自己。

军官们，其中以年轻军官居多，要求把蒋介石提交军事法庭审判，把他处决。

在西安负责监视蒋介石的孙上校对我说，当时因为在“紫禁城”内替蒋准备的房子不大舒适，准备给他搬家，这时蒋非常激烈地反对。

“他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对我嚷道：

‘你们要杀我就在这里杀好了，不要把我带走！’

我客气地给他解释了很久，他才逐渐相信我们只不过是想给他换一个住处。”

蒋介石曾经出过重金悬赏一个人的脑袋，如今这个人不费

吹灰之力就能把蒋的脑袋砍掉；当这个人在蒋介石的面前出现时，蒋的惊恐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就是周恩来！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蒋和周已经多次碰头。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两人可能会有再见面的机会。

两人都是浙江省出生。共产党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官吏；反之，总司令蒋介石却出身于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两人为建立孙逸仙博士的国民革命军合作过。一九二七年以后，周站在蒋的敌对者一边。蒋介石曾多次进行“围剿”，终不能歼灭这些敌对者。

十二月的一天，周恩来神采奕奕地站在蒋介石的面前。蒋被捕数天后，少帅张学良的一架飞机把周载到西安。内战多年来，共产党方面不知有多少人牺牲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处刑、拷打，使用了中世纪和现代的种种刑罚。中国共产党人，或者是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谁没有身受其害呢。全家被惨杀的例子也不少见。从夫人被处死的毛泽东，到红军最年轻的战士，都有充分的理由，对此采用报复行动。然而，使蒋介石本人，乃至全世界都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却不是为了复仇才到西安来的。

一九三六年，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非凡的处理方法不能理解。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给我讲述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事情时，大叫这是“历史性的失策！”这是失策呢，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令人惊讶地运用自如的一个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杰作呢？

“事变”以后的西安

释放蒋介石后，人们原以为南京和西安的关系会向正常发展。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西安的电台仍然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而南京的电台则对西安的实际情况大加歪曲，并制造流言蜚语。

晚上，南京电台的新闻报告竟说西安已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吃一惊。当天，我们正好外出，走过熙熙攘攘的热闹街道，街上一切如常，根本没有看到南京电台描述得如此活龙活现的所谓“袭击”、“暗杀”等恐怖情景。

一月初，一个年轻的新西兰人突破包围潜入西安，他就是詹姆斯·贝特兰。他绕过潼关从北面好不容易才抵达西安。他接受埃德加·斯诺的建议，放弃了北京宁静的生活，来到西安，以便通过实地观察来充实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

贝特兰是一个严肃、平和的科学工作者，但他并不隐瞒自己是同情中国的救国运动的。因此，当他受托代替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搞英语广播时，便毫不踌躇地接受了。不久，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给他打来了一个电报，威胁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不要作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行动”。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

唯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象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我在中国最初数年间，究竟换了多少处住所呢？我把那花园里的小房，布置成称心如意的家，曾费了多少心血呵！可是，过不了多久，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又不得不离家而去，回想起来实在太令人遗憾了。尽管我们忠实的佣人夏得胜，替我们把家看得很好，但这次杨将军邀请我们搬到他官邸去住，我却没有拒绝。在寒冷的一月天气里，住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总比那花园小房强，况且，家里还多了一个小孩呢。

舒适的大房子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这座房子是“反叛派将军”的家，它成了战略目标，南京政府的轰炸机每天都在房顶上作低空盘旋，以示威胁。詹姆斯·贝特兰的住处显然也是战略目标之一。他在其他所有住客都搬离之后，仍然一个人留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我和他一样，当飞机在房顶上盘旋时，好几次都起了搬家的念头。幸而飞机只是每天上午很短的一段时间飞来，恐怖的感觉不致于延续得太长。这里的居住环境好，生活舒适，虽然有飞机的威胁，我们仍然希望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炳南尽管听到南京电台威胁说要对西安空袭，而且轰炸机就在头顶飞过，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毫无惧色。最后，我对这两方面的威胁也逐渐习惯了。

到此为止，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平静的，但二月初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却把这种平静的生活破坏得荡然无存。

早在一月末，人们就私下传播着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要造反

的流言。他们要求蒋介石归还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与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到南京去的。可是，青年军官们采取的这种姿态，对少帅本身，对解决他的悬案，都没有用处。十二月三十一日，军事法庭以抗命之罪把张学良判了十年徒刑。这个判决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只是一种形式，因为，三天后张学良即蒙恩赦。但实际上，张学良却从此失去了自由。这使他的部下深感不安。

数天后，佣人夏得胜对我提出忠告，还是取消计划中的访问为好。他关切地告诉我：“今天快到中午时，还听到枪声哩。”我想到南京电台每天的广播，便不以为然，一笑置之。可是，当我走到街上时，却看到店主们，为防万一，全都把他们商店的门板上好了。这是预防不测事件的可靠征兆。市民起初对报纸的报道和电台的广播并不注意，只是看到城门过早地关上，商店纷纷关门闭户，才感到还是在家呆着为好。

炳南一早便出去了。所以，贝特兰来打听消息时，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贝特兰等到晚上十点，炳南还没回来。于是，他对我说，如果炳南带回来什么重要消息的话，请打电话告诉他。说完便告辞了。

过不多久，贝特兰又匆匆忙忙地折回来了。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象恶梦一般的事情发生了。平日镇静自若、无所畏惧的贝特兰，到我家时脸色苍白，尽力地克制着，不让自己颤抖。他说：

“我能够活着站在你面前，真是一个奇迹。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快，一个活生生的人，盘算着种种计划，走着走着打算回家睡觉；转眼之间，可能一切全完结！”

“贝特兰，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讲这种奥妙的哲学道理了，”我打断他的话。“好好坐下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贝特兰在回旅馆的途中，街上连人影也没有，他也不觉得很奇怪。入夜，往旅馆去的路漆黑一团，本来就是行人稀少的。突然之间，黑暗中三名东北军士兵在身旁出现，把上膛的枪口对着他，三人同时高声喝道：“口令！”这一天下午市内戒严令已发布，贝特兰却全然不知，怎么会知道口令呢。幸而，他会说一点中国话。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命运也就可能和一个德国牙医一样，在十二月十二日被士兵们闹着玩似地枪杀了。三名士兵听了贝特兰的解释后，便准许他回到杨将军的家去。

半夜十二点过一点儿，炳南终于回来了。据他说，戒严令是发布了的。原因是两名东北军的将军，因有与南京政府秘密交涉之嫌，被部下枪杀了。局面极为混乱。更其恶劣的是，不少人企图利用这个混乱时机，恶意中伤自己的冤家对头，并将其除掉。

炳南用小汽车把贝特兰送回旅馆，回来时已近半夜两点。我们的卧室和会客室之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所以我听出除炳南外还有什么人来了。炳南和那人低声在谈着什么，谈了一个小时才停止。炳南走进卧室，满脸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他叹着气埋怨道：“真可怕，今天晚上简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人命也不当一回事了。”

和炳南一起回家的那个男人——炳南坐小汽车回家途中遇到他——，是炳南多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他告诉炳南，他刚刚把一个老对头杀掉了，感到惊恐不安，不知所措，只得彷徨街头。他问炳南：“怎么办好呢？”炳南除了劝他逃避之外，别无他法。

混乱的状态来得突然，收拾得也快。与叛乱有关的军队只是极小一部分，比较稳重的军官们很快就使秩序恢复。对这晚上遇害者的情况，我毫无所知。

居住在战略目标似的地方是否合适，我们已经没有考虑的必要。南京政府的轰炸机已停止在西安上空飞行。因为中央政府的军队已准备接收西安，接收工作就要开始。东北军和杨将军的西北军撤出西安，是南京方面强烈主张的结果，这样做是为保存政府的面子云云。

这样的结局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南京政府的军队和官员进入西安，局面会变成怎样呢？他们对这几周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会采取报复行动吗？救国热情高涨，象暴风一样迅猛的国民运动，会不会因此而再次消失、瓦解呢？

我忽然觉得，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罢了。最后，我又一次看到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次示威，充满了愤怒和激动。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楼上看到士兵、学生和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拿着用彩纸和彩绸做成的旗帜，蜿蜒前进。无数农民握着旧式步枪和传统的红缨枪，组成了威武雄壮的队伍，正在通过城门向前行进。少数学生在对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的农民，宣传救国运动的意义；星星之火一经点起，顿时燃成熊熊烈焰，这是值得惊叹的。

游行队伍的前头，是跨在马上东北军骑兵队。骑兵头戴灰色毛皮军帽，给人以强悍的印象，与历史画卷里描绘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远征的情景一模一样。他们骑着的蒙古种长毛小马，是和成吉思汗及其军队一起远征欧洲的战马的后代。

骑兵后面是体格魁梧的步兵。他们在带队的军官引领下高呼口号：“打倒日本鬼子！”“为收复故乡而战！”“抗日万岁！”“张元帅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成一片。学生、工人、农民、店员、妇

女、孩子，同声高唱这首深深引起人们共鸣的歌曲。这首歌出自一位英年早逝的中国作曲家之手，很快就传遍全中国。从黄海之滨到西藏高原，从与印度支那交界的国境到日军占领下的东北，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这首歌。

人数众多的大合唱，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从三十年代开始，合唱这种形式才被用作政治武器。许多合唱歌曲产生了，其中有战斗歌曲和深沉的思乡曲。后者主要是表现来自东北的难民的思乡之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初 会 红 军

南京的电台广播说，红军已占领了西安。实际上，在西安的全部红军，只有共产党的正式代表数人，以及十二月十二日被释放的大约三百名红军俘虏。我曾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起访问过这些释俘，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释俘中竟有约五十名妇女和三十名孩子。他们多数人都有病。在寒冷的十二月，他们躺在冷冰冰的茅草棚里，地上只铺着一些稻草。直到杨将军应艾格妮丝的请求，才允许给他们送去一些被子和食品。

这些红军战士，几乎全都是四川的农民，年龄有老有少，看上去，就象是描写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大都没有穿鞋子，把农民特有的长满茧的大脚板盘在下面，端坐不动。他们一声不响，用红肿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两个来访的外国人。我们对几个年轻的女战士说，希望你们好好保重，尽早回到延安去。这时候，她们那充满疑惑的目光才消失，浮现出含羞的微笑。

从一月以来，西安北面的一个小城云阳，驻有红军的一支小部队。艾格妮丝访问了这支部队，她抵达后不久便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邀我尽早到云阳去，哪怕只呆一天也行。

我兴致勃勃地等待这次短途旅行。我要在云阳见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被一方骂为土匪，却被另一方赞为为中国战斗的战士。在中国人之中，关于红军有无数的传说，实际上和红军见过面的人却屈指可数。要判断这些传说的真伪实在困难。

云阳是一个古老的、半废弃的城市。大片的废墟，表明这个城市具有绚烂的过去。通往宫殿的路上有一道道门，门前是狮子及其它动物的大型石雕像。走进宫殿，却只见处处垂着蜘蛛网，屋梁满是蛀孔，雕刻得很美的窗框，也只剩下一些残片了。

一间破旧的大房子，凛冽的寒风不住地往里刮，石板地上铺着稻草——这就是红军战士的宿营地。由于好奇，我怔怔地看着这些戴着缀有红星的军帽的战士。他们的制服，和中国西北部农民穿的一样，是用硬梆梆的黑棉布做的。由于长期行军，多数战士的脸上仍然流露出疲乏的神色。营养不良，使他们的眼睛溃烂红肿，肺结核也在蔓延，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到冬季制服，到处可以听到重浊而厉害的咳嗽声。

可是，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虚、绝望的表情。他们满脸笑容地欢迎艾格妮丝和我，向我和艾格妮丝提出一连串问题。他们说的是很难懂的江西方言，我几乎全都不懂。据翻译说，他们大多数是四、五年前参加红军的，年龄超过二十岁的不太多。有八年或更长军龄的人，也不过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这些人被叫做“老战士”，被看成是身经百战的勇士。

究竟他们经历过多少次激烈的战斗，负过多少次伤，只有极少数还活着的勇士才能准确地说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休整。对他们来说，现在在城墙外的空地进行的军事训练，比起真正的战斗来，真如同游戏一般。他们的食物，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他们已习惯了忍饥挨饿，一碗玉米饭加上一些卷心菜，对他们来说就是珍馐美肴了。

不论是在队伍行进中，还是在站队的时候，红军战士都唱着雄壮的进行曲、深沉的思乡曲和他们遥远故乡的民歌。指挥的

人举起双手喊“一、二、三！”大家便一齐唱了起来。

他们和当地居民相处得很好。有钱的地主和商人，听到红军南进的消息，便赶紧逃得精光。贫苦农民和小商人，则和往常一样继续干自己的活或做买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即使想逃，也无处可去。当他们知道红军即使买一些花生也要付钱，恐怕会感到惊奇吧。

云阳驻军的一名红军指挥员对我这样说：“我们呆在这个地方时间还不长，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听到本地居民对我们部队有什么抱怨。相反，有许多年轻人来要求参加红军。我们对他们说，现在军服和枪都不够，这些年轻人还是要求参军。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他们也是知道的。我军战士，每月只发一元零用钱，部队经济困难的时候甚至连零用钱也不发。我国的农民是不怕艰苦生活的。他们确信，参加红军，就是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在沈夫人家寄居

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仍然鲜明地涂在各处的墙壁上；写着八大纲领的绸旗，在寒风中轻轻地飘拂。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入西安后，谁也不能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南京政府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救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离开西安是明智之举。

杨将军也在西安西北面的小城三原暂住，观察今后数周事态的进展。杨将军坚决主张炳南也到三原暂避，因为炳南和共产党有联系，处境加倍危险。

我住在什么地方好呢？住在“反叛派将军”家中，自然有危险；搬到中国朋友家中暂住，也不行。因为如果让“可疑人物”

的妻子住在家中，自己也成了可疑对象了。

危险日益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切朋友抛弃了。原先很亲密的朋友也疏远我，即使向他们提出请求，也没有人应允。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柏林时代的好朋友、教育学家江隆基，毫无避讳来探访我，要帮我一把。但谈到我和孩子们的居住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这种情况下，一天，我遇到了沈钧儒老先生的德国儿媳。几个月前我就是冒她的名到苏州监狱去的，后来在西安和她交上了朋友。

沈夫人是一位果断的妇女。和她见面时，我照例谈到住处的问题，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回答道，请你到我家来吧。

她对我说：“我的丈夫去旅行了，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小佣人。”平心而论，如果我接受这个邀请，她的中国丈夫不见得会感到高兴；可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些了。我和沈夫人谈好，尽可能不要妨碍她，就住在她家的偏屋。

这屋子比我们在大莲花池街的住房还要简朴。事实上，屋里只有一个炕。沈夫人让人给我搬来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屋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炭炉，不怎么暖和，幸而我穿的那件中国式厚棉袄倒是挺管用。

现在，我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了。洗尿布和衣服的时候，给我们母子俩弄吃的时候，把木炭炉搗旺的时候，修补一再被猛烈的寒风刮破的窗纸的时候，我都在想着自己奇突的命运，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头脑里盘旋。命运使我从富裕、安乐的家庭里，一下子来到这间破屋子过悲苦的生活——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沈夫人几乎是足不出户的。她以家事为乐，很有耐心地、似骂非骂地教她的小佣人麦八做家务，从早到晚都听到她叫“麦

八!”的声音。麦八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无可奈何地按照女主人的吩咐，匆匆忙忙地在屋里做个不停。沈夫人用的是她学会的上海方言，麦八要听懂她的命令可不容易。

麦八告诉我，市内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军队。一天晚上趁着黑夜来看望我的江隆基也说，南京的军队和中央政府的官员已占据西安了。据江隆基说，由于有力量的“反叛派”已离开西安，所以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可是，他仍然忠告我，尽可能不要在人前露面。

话虽如此，要做到绝对不在人前露面是不大可能的。有好几次，一些男人到沈夫人家来访，他们表面上装出很客气的样子，实际上却露出怀疑神态，东张西望，他们也打听我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却使他们失望。沈夫人总是说：“我家里的事，你们管不着。”

有一天，我们几乎要为保卫家园而不得不采取直接的反击行动。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大门忘了关上，一队十二人左右的士兵，突然闯入庭院，正要把绳子上晾着的衣物拿走时，被沈夫人看到了。沈夫人用尽力气高喊麦八，却不见麦八出来。对手是手执武器的军队，即使是在抢掠的现场的人，聪明的话也应该躲避。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对沈夫人是不合用的。沈夫人把我叫来，我们两人向士兵们猛扑过去，把他们抢去的衣物夺回来。我们这两个鼻子高高的外国人，一个红发，一个金发，用他们全然不懂的外国话高声叫骂，在那些士兵看来，简直是恶魔或疯子。即使是手握刀枪的士兵，也害怕疯子。他们大吃一惊，赶紧把“战利品”扔在地上了。我们乘势追出，把他们赶到门外。沈夫人立即把大门关上，插上门栓。

搬到沈夫人家后，我和佣人夏得胜也分手了。夏得胜再三

对我说，很希望陪我过深居的生活。我谢绝了，劝他找新的工作，不过，我并没有忘记对他说，如果他的境况不好，什么时候到我家来住都可以。他表示感谢，并说：“我替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好保姆吧。现在，保姆照料孩子比我合适。”

不久，夏得胜便领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来见我。她穿着中国北方农民常穿的黑棉袄。我们叫她杨妈。杨妈的丈夫是个贫苦的农民。她的几个孩子，都因传染病或其它病症死去。因为人多地少，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杨妈也走上了许多贫家妇女所选择的道路，到城市做活，当保姆。她们把赚来的钱寄给家里人。事实也是这样，杨妈在自己身上几乎连一个钱也不花的。

杨妈到我家来的时候，只拎着一个小白包袱，连棉被也没有。象蹄子一样畸形的脚，走起路来却出奇的轻巧快捷。她的小脚和她那农民的壮健体格实在不相称。

缠足，与其说是风俗，不如说是一种恶习。在法律上，缠足是被禁止的，但具体的法令执行起来却并不严格，对违犯者也没有加以制裁。在西北部的许多村子，我好几次亲眼看到给小女孩缠足的情形。方法是把脚趾向里屈，用绷带缠紧，一直缠到脚板保持屈曲的状态。这种蹄子似的畸形的脚，却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金莲”。

关于缠足，有一次，一个农妇回答我的问题时这样说：“我们中国农村，保守的男人结婚时一定要女方是‘金莲’的。最近，有的开通的青年愿意娶不缠足的妇女，但他们希望对方受过教育。我们穷人家不能送女儿上学，她们只能和保守的男人结婚。所以只好缠足了。”

忠实的杨妈，长年在我家帮忙，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之一。不管境遇好坏，她都和我们同命运、共呼吸；有待遇更好的

工作，她也从来没想到要离开我们。我们的生活受政治变动的影响很大，经常动荡不安，但杨妈以中国农民特有的耐性，一一忍受了。

从到我们家工作的第一天起，杨妈就把黎明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钟爱。不管什么事情，从来没有见她脸上露出过厌烦的神色。睡眠、休息以及种种久已养成的习惯，她都为黎明而一一牺牲了。

如是过了十三年，到黎明进北京的寄宿学校时，我们不得不和杨妈分离了。我们长时间安慰她，约定和她通信。离别后我们也尽可能地和她保持通信。黎明端端正正地写信给她，节日寄东西送给她。只是有一点，黎明还未能满足杨妈最大的心愿：到杨妈的家乡去看望她。

去三原郊游

政治形势只有徐徐的改善。西安事变的当事者，为了保全“面子”，作出一番剑拔弩张的姿态。但这正如在中国的剧场里看到的武打场面那样，双方都故作惊人之状，其实并不伤害对方的一根毫毛。

炳南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让我在中国的春节（旧历正月）到三原去小住几天。这对住在小房子里、有如过着监禁生活的我来说，实在是很有吸引力的。孩子托付给杨妈我是放心的，她很快就掌握了现代保育法的基本知识，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我搭乘一辆破旧的载重卡车，车上寒气逼人，挤满了放年

假回乡探亲的学生。一路上，好几次看到用骡马拉的大木轮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猛烈地摇晃着行进。这些大木轮车几乎就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交通工具了。我们互相紧靠着坐在用油布裹着的铺盖卷上。在中国，外出旅行时棉被是不可少的。在那些只有一间房的“旅店”里，在炕上或者在几块木板搭成的床上睡觉时，旅客们各自用自己带来的棉被裹着身子睡。把被子叠得平平服服，中国人不愧是能手。我在家里叠被子的时候，总是叠得怪模怪样，杨妈马上替我重叠，她弄得小而整齐，漂亮地恢复被子的原状。

快到咸阳时，司机指着远处的丘陵对我说，那是周朝和汉朝皇帝的陵墓。这些陵墓的高度和规模，都可与金字塔比美。数百年前，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曾产生过绚丽多姿的文化，现在却只有遗迹可寻了。

三原并不象陕西省其它县城那么破旧。这是由于三原出了一个有财有势的大人物。他就是南京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中国，依照历来的传统，做了官的人不仅是福泽家园，也要为本乡本土出一把力的。三原的学校、研究所以及其它一些现代化建筑物，都在向人们显示：身居高位的资助者，是多么大方慷慨。

可是，再往城里走，东倒西歪的房子和破旧的商店触目皆是。这一点，三原和其它小城镇并无不同。那些曾是豪门望族宅第的大房子，已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房子里非常考究的石雕、木刻，光耀夺目的琉璃瓦，线条优美的房顶，都显示出它们曾经是富丽堂皇的。而且，连这些昔日荣华的残迹，用不了多少时间，也将成为挥霍无度的牺牲品。

为什么三原如此荒废，却无人理会呢？对我的这个问题，人们千篇一律的回答是：鸦片之罪。鸦片完全破坏了西北富裕的

家庭，使吸食者倾家荡产。为此，那些出身富裕之家的人，现在衣衫褴褛，拖着衰弱不堪的躯体，象乞丐一样到处游荡，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们只要有一张床和一支烟枪就满足了，为了买鸦片，即使用尽最后一块钱也在所不惜，对祖传家业的荒废，更是漠不关心。

尽管南京政府在法律上是禁止种植鸦片的，但在西北，却到处都种。这条法律也象其它许多法律一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人去遵守它，更不用说那些高官显贵们。众所周知，禁烟局的老爷们恰恰就是最大的鸦片商，他们从中捞取巨额利润。

鸦片不象其它毒品可以偷着抽。只要屋里有人抽鸦片，人们在老远的街上都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甜滋滋的烟味。法律上禁烟所造成的唯一后果，就是烟价提高，质量恶劣的鸦片的买卖大为兴旺。西北的军阀们，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他们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手段，攫取巨额利润，以此来豢养他们的军队。许多肥沃的土地，都被指定用来种植罂粟，这种情况导致耕地严重不足，遇上旱年，谷物失收，就会造成饿殍遍地。一九三六年陕西省曾饿死三百万人，这种可怕的后果，就是种植鸦片招来的。

只有共产党人，才把鸦片造成的毒害彻底根除了。鸦片和酒一样，与共产党的军队是无缘的。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禁止吸食鸦片并不是只记在纸上的条文。在人迹罕至的热河省的山岳地带，那里的居民不仅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曾是鸦片中毒的患者，就连婴孩哭闹的时候，也要用鸦片来哄他们。在这么严重的地区，共产党为根绝烟害的斗争也取得了成功。

在三原的街道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成群的乞丐纠缠不休。“给几个钱吧，财神菩萨保佑你！”他们一边发出哀声，一边跪在我的前面，在冰硬的路上磕头。只要你稍为施舍点钱给他

们，就又会突然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一群高声哀求的乞丐。这种情景，在当时的中国被视为很自然的事情。人们认为，过去一直是乞丐满途，将来也不会改变的。

一般人对穷人的那种冷淡神色，以及赶走乞丐时那种横暴的态度，最初我是难以忍受的。即使我回到自己安静的房间，耳边还是回响着乞食者的抽泣的哀求声和路人喝退跪在面前挡住去路的乞食者的叫骂声。

“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状况呢？”我问炳南。

他耸耸肩。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从孩提时代就看惯这种现象了。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只有根本的社会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等到革命胜利了，中国就再也不会有乞丐了。”

金先生

南京政府与共产党之间达成的政治和军事休战，虽然遭到南京亲日派方面的许多干扰，但紧张的政治形势在各方面都渐趋和缓。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也随而回复平静。因为炳南也回到西安来，我们便另觅住处，从一个北京籍的人那里找到了一所很合适的房子，总算有了着落。

这时，已到达延安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托人捎信儿给我，她说，进入陕北红军的控制地区，并不太难。她劝说在上海的所有美国记者、朋友，务必到延安来，希望他们亲自和“红色分子”交朋友。

她的这一呼吁，对三名美国记者产生了预期的作用。可是，不论是她的信，还是三名记者的旅行愿望，都使国民党特务机关

感到不快。那三名记者在上海机场要乘飞机往西安去时，特务出现了。特务说，很遗憾，如果没有进入陕西省的签证，是不能乘飞机到那里去的。话虽然客气，但警告的态度是很明显的。那时，有好些省份没有签证是不能去的，固然是事实，但这也无非是形式，实际上并非一定要有签证不可。

三名记者中的两人，得悉国民党方面对他们这次旅行是讨厌的，既愤慨又失望，只得取消了延安之行的计划。还有一人并未死心。他心里这样盘算：警察正对他们在机场上取得的胜利心满意足，为何不趁此时机试着乘火车到西安去呢？事实果然如此。两天以后，这第三名记者即《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金先生，终于到达西安了。他虽然风尘仆仆，稍有倦意，但却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他到西安后，按照艾格妮丝的指示，马上与红军的代表接触，商议继续平安无事地完成往延安去的旅程。

我和维克多·金认识，是在他往延安去的前夕，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到我们会面为止，还没有人查问过他有无到陕西来的签证，可是，我没有看错，在餐厅的四周有几名特务喽啰正在暗中监视着我们。

事实上，当天晚上，那些特务便要检查金的护照。他们大概是想用金的护照没有签证作为口实，阻止他往延安去。金保持极为冷静的态度回答道，真不巧，护照因为放在传教士那里，明天早上才能拿出来。这本来是不成理由的，但竟然得到特务的认可。他们大概是觉得对彬彬有礼的外国人，不能过于吹毛求疵吧。

听金先生说，他明天早上五点便要从西安出发往北去，我担心地问道：

“你从延安回来后，打算怎么办？”

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那一点也用不着担心。我在延安的见闻，都装在脑袋里。即使是那些特务，总不能从我的脑袋里取出记事簿吧！我只是担心在延安拍的胶卷，一定要想个好办法，不让他们发现，安全带到上海去。”

十天后，金先生从旅馆给我们来电话：

“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吃一顿便饭吗？见面时，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们。你们看着吧，今晚我多半会被捕的，”他兴致盎然地补充说，“那些先生们，正等着我哩，不过，现在还没有对我采取行动。”

在旅馆的大餐厅里，只有几桌客人。入口处旁边的桌子，坐着两名特务，不时斜着眼向我们这边望过来。看起来，被跟踪的金先生，倒比跟踪他的特务，坦然自在得多。

金先生告诉我们，他曾请旅馆经理代向警察署申报他已回来，但这显然是要经过那些在餐厅监视我们的特务的审查的。饭后，我们和他一起回房间去。他在房间里当着我们的面把从延安带回来的胶卷藏到一个咖啡罐里。这时候，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响起，门开处，进来的就是刚才那两名特务。他们要查看护照，金先生大模大样地把护照交出。那两名特务煞有介事地翻开细看，终于发现金先生是没有进入陕西省的签证的。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其中一名特务郑重其事地说道：“你的护照既然没有签证，我们就不能不把它拿走。”

“呵，要拿走吗？要拿走我的美国护照吗？”金先生故意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嚷道。

“诸位，这个护照是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的财产。我作为美

国公民，是不能容许你们从我手里拿走国务院的财产的。你们如果要拿走护照，不如把我逮捕好了。不过，我要警告你们，考虑一下由此引起的后果。”

金先生的话，听起来好象是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甚至可能会引致中美战争。

这两个可怜巴巴的特务，真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是奉命行事的，但命令中根本没有提及逮捕的问题。而且，这个外国人说的“合众国的财产”、“考虑由此引起的后果”等等，看来并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已至此，他们除了回答要去请示上司，看看如何处理之外，别无他法。

警察署长对这两名特务另发指示之时，大概已接到报告，知道那个美国人和炳南曾在一起。最妙的是，这个警察署长竟是炳南的父亲的老朋友，炳南称他做叔父。在警察署长看来，这件事自始至终，全都是南京政府官厅一手造成的，实在令他大为困惑。他只希望一点，尽快解决问题，而且，还得让南京方面得到一份满意的报告。

警察署长从警察署给炳南来电话，向他的“侄儿”诉说这个美国人给他带来的麻烦，并且问炳南有无妥善的解决办法。

“这样吗？”炳南象是深思熟虑地说。“那个美国人既然没有得到进入陕西的签证，如果是我的话，就让他马上离开这里！”

警察署长用颇为赞赏的声调附和道：“你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我把这件事委托给你吧，请你明天早上替我监视金先生离开陕西省的省境。”

“离境”无非是一番做作，炳南和金先生都各依身份行事。至于成问题的胶卷，金先生已用不着掩掩藏藏了，因为在炳南的“监视”之下，行李自然是不必检查的。在陕西省边界的潼关，两

人分手，金先生安心地往上海去了。

读了金所发表的一系列访问记后，使我去延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艾格妮丝给我来信说：

“请你尽快来！我的房间的炕很宽，够你睡的。”

她的信中还附有一张物品清单，这些都是她所发起的“运动”急需的。原来，艾格妮丝一到达延安就发挥出她一如既往的干劲，开始对各种各样的祸害挑战。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是捕鼠器。

在中国，鼠之为害是甚为猖獗的。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市，鼠的繁殖极快，人们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至于灭鼠之举，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吗？这个词对艾格妮丝是不适用的。在陕北及其相邻的内蒙古，老鼠不仅是一种祸害，而且是一种危险，因为它还传播鼠疫，致使鼠疫成为那里的一种地方病。因此，艾格妮丝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借用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的话来说，这不是蒋介石式的 Anti-Red campaign（反赤化运动），而是 Anti-Rat campaign（灭鼠运动）。

于是，我便在西安到处找捕鼠器。在北京的埃德加·斯诺也和我一样。可以肯定，艾格妮丝还在上海动员了什么。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她这种象传教士一样的热心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连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共产党的其他有名望的党员便都学毛泽东的样。

“要是到延安去的话，最好快一点走，”炳南对我说。

“三月初路还好走，过了月初，下起雨来路便变得泥泞不堪了。黎明交给杨妈照顾，而且我又在西安，你就放心去好了。”

我的去意已决。我也一定要去看看“中国的红星”。

四

延安

良

良

良

去陕北途中

三月初，终于有一个往延安去的良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西安。他的目的是访问陕西省北部的“红色麦加”。厄尔·列夫此行是得到官方许可的。大概是南京政府的官员们发现，禁止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好奇心吧。

我们乘坐的货车，象喘大气似地边发出声响，边摇摇晃晃地行进，在西安的西门，货车穿过了一座高高的石拱门。车上，除我以外，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泼的男女学生。学生们把铺盖卷、几个旧的行李袋和几架缝纫机堆成一座挡风墙，他们背风而坐，谈笑风生。缝纫机是带去给延安的制服厂用的。他们和我一样，都怀着紧张的心情踏上这次延安之行。与学校的学习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社会计划，以及如何实施的问题。

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身边各有一名西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从他们的相处中，我得出上面的结论。西北军的士兵是奉杨将军之命，护送我到西北军控制地区的边界；后者则是奉红军之命来接我的，他忠实地执行任务，并不亚于前者。这两名士兵和我寸步不离。在三原小休时我要去解手，他俩也紧随着我，劝他们不要跟着，费了我

不少力气。

起初，他们分坐在我的两边，为了向对方显显威风，两人都缄口不言。过了不久，这个僵局便打开了，两人不但交谈，还把自己的武器给对方看。他们的武器都是毛瑟式驳壳枪，系着红缨作装饰，装在结实的木匣里。

对一个在此地旅行的中国人来说，在这全程三百七十公里的延安之行的旅途中，每一公里都会引起他对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无限追忆。我们曾乘渡船过渭水。渭水流域的肥沃土地，曾是二千年前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这里诞生的国家以及它的法律、经济形式、传统，经过了多少个世纪，依然延续下来，生生不已。

渭水的对岸，有一个尘埃滚滚的小城镇，名叫中部。中部的近郊，有一座被针松环绕、耸入云霄的高山，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的巨大陵墓。金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寺院，以及为表彰某人的英雄行为或超群的品德而建造的巨大的石碑楼，给这座光秃秃的山平添了几分秀色。我们乘的货车，在秃山的蜿蜒曲折的小道上颠簸行进。分散在山上的小城堡群的灰色壁垒到了山顶便汇集到一处，那就是曾被成吉思汗的军队当作信号塔来使用的望楼。只不过今日的望楼已成废墟。在已现黑色的山脊上，这些古代的城堡废墟，巍然屹立，壮美如画。

群山耸立，形状变幻多端，显现出粗犷的美，令人感到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座山脉奇形怪状，象是被一只巨手撕裂一样。忽地，一座座丘陵出现在眼前，它们好象是一个个精心巧制的巨型圆蛋糕。这些变幻的景色，简直把人引进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

这里的山山岭岭，和华北肥沃的平原一样，都是黄土构成的。地质学者认为，这些罕见的黄土，是过去数世纪里，亚洲中

部的烈风不断地把它们从蒙古和西部地区吹来的。只要雨量充足，黄土本可以化为肥沃的良田，可是，长期以来，由于不断砍伐山林，水土不能保持，大量肥沃的黄土流失净尽。这些黄土流入黄河的河底，使河床变浅，引致黄河下游地区经常遭受洪水的祸害。

时近傍晚，车抵西安与延安之间最大的城市——洛川。一九三六年夏，“少帅”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会谈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候，洛川的北部与共产党支配的地区相接壤。

我们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里，挑了一间稍为宽一点的房间权作一宿之地。房间里只有一个炕。我和三个女学生睡炕，列夫先生只好将就一下，卸下一块门板做床。男学生把随身带着的铺盖打开裹着睡。护卫我的两名勇敢的士兵，象是商量过似的，在炕边粘土地上铺上稻草，就睡在上面。

尽管长途跋涉，我却并不觉得疲倦。我在没有门板的门前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身旁的司机，在抽他的烟斗。列夫先生也没有睡意。西北之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他看来，中国西北部就象是非洲人迹不到的荒漠深处一样，自然有一种神秘之感。从上海到陕西是路途遥远的旅程，这种遥远是不能单以公里来计算的。踏上这一旅程，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一带地方的人，并不住在普通的住房和大厦里。他们象穴居时代的人一样，在吸水性强的黄土深处筑洞而居。妇女身上穿的，并不是那种与苗条的身段很相配的艳丽的丝绸服装。西北部体型健壮的农妇，穿的和男人一样，是宽大的棉衣裤，只是那缠过的双脚上所穿的绣花鞋是鲜艳的，为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服装增添了一点色彩。

虽然这一切给列夫先生的印象平淡无奇，但这似乎并不妨

碍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去观察事物。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他正在幽思苦想，为他的延安之行的报道取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

“埃德加·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他想了一想，又说，“我的书就叫《苏维埃月下的爱情》(Love under the Soviet Moon)，怎么样？我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既然有男有女，那么要收集两三个爱情故事的素材，大概不成问题吧！”

列夫大胆的揣测，被司机的话打断了。“请告诉那个外国人，该睡了，”司机认真地说。“我们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要是顺利的话，只要车子能挺得住，明天傍晚就可以到延安。”

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我们的货车在路上已经抛了好几回锚了。司机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而且发挥了他天赋的灵巧，这次故障，他也是很快就修好，次日，我们的货车又能勇往直前了。道路还是那样起伏不平；货车行驶时，几乎碰到悬崖的边缘，而且是沿着黄土岩绝壁的羊肠小道蜿蜒前行。越接近目的地延安，路上的交通越显得活跃，挑着担子的人，骡马的行列，行商小贩……来往频繁，处处可见。还可以看到打扮得和元朝时代人相似的骑手。那些车轮很薄、用黄铜打制的行李车，就象是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陶器马车一样。

在这充满古色古香的情景中，也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在“朝山进香”的大道上，一队队肩背行李的学生，引吭高歌，向着“红色的麦加”进发。这些步行的学生，和我们车上学生的目标一样，要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去。抗大是最近在延安成立的一所专门学校，有许多学生，甚至是从西安徒步到那里去的。几年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延安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现在，面貌一改，它已成了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抗大有好

几千名学生，寄居在延安周围的窑洞里。这些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为了接受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他们敢于选择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克服种种困难，刻苦地学习。

延安座落在延水的两岸。我们到达延安时，因为不是雨季，从峡谷流下来的延河水并不多，易于涉渡。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黄土岩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与蓝天交相辉映，风景如画。那远处可见的高高的宝塔，是延安的象征。黄色的宝塔，屹立在黄土的山上，色彩非常调和，构成了奇丽的风光。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年间，延安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在延安作出的种种决定，不仅影响到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多人口的历史，而且对其它各国的历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新的政治路线的实验室。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领域的政策，在延安作试验性的实施以后，将来要在全中国推行。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和当时还被称为“土匪”的人们相会。他们在延安的十年里，对中国的六百万人负起领导之责。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他们和其他著名的红军领导人一起，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以后，到达延安。一九三六年，他们把共产主义中国的首都定在延安。

访问窑洞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方八面汇集在这里。红军战士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他们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

“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微笑。艾格妮丝穿着棉制服，她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是译员吴小姐，我在西安早就认识她了。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当时，延安的居民只有一小部分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绝大部分人，由于战争爆发那一年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都离开了遭受破坏的市街，住到窑洞里。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窑洞。这些窑洞，在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说，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此外，战争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户，很有气派。

在中国的西北部，冬夏之间没有春天的过渡，夏天来得很突然。我到延安的第二天，气温遽然上升，棉制服一下子就全都被搁置起来，没有人穿了。幸亏艾格妮丝考虑周到，带了两套夏天的制服来。早上，我便穿了她的一套延安式服装，坐在餐桌上吃早餐。只有一点令我颇费力气，这就是老绑不好那长长的棉布绑腿。我不能象红军战士一样绑得那么好，后来，练习了多次，才绑得象个样子了。中国的布鞋，穿起来很舒服——当时，

在延安没有人穿皮鞋——我在西安就已经穿惯了。

我们在院子里用早餐。餐桌就放在院子的正中，四周围都是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斯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饼，在中国的小吃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斯诺，他常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得精光了。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杯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生，是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加入红军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那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而且已被环境完全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列夫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把列夫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布朗）的人很少。至于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一九三三年，他在莫斯科红

军大学毕业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起初，他为制订战斗方案和制订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份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几年后，他离华赴苏。

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象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视他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它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措施。这样做，既不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

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盛夏时就换上竹帘。从门口进去，便是挖通的宽四米、长七米的房间。房间的外侧，有一个大窗，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因此房间的前半部分显得明亮，令人舒畅。炕很大，和房间的宽度几乎相同，炕下与外墙相通，可以从外面把炕烧热。白天，在暖和的炕上放上一张矮矮的小炕桌，便可在炕上工作，学习，接待客人。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个折凳。木箱上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作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李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住家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不管它来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

妮丝到他家喝茶、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唱了又唱，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那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土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艾格妮丝和我，好几次都是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对我们这些出于一时高兴、深夜始归的行动，艾格妮丝事后总是感到良心受责。

“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而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肃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爱称是“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问，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口号，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它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与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

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珍。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父母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许多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同样，参加红军的妇女也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样，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óng zhì”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的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珍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有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珍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

① 魏玛(Weimar)，德国中部的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国会在此开会，颁布了魏玛宪法。魏玛共和国意指执行魏玛宪法时的德国。

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还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还记得我吗？”

康克清微笑着答道：

“怎么能忘记你这位老朋友呢？最初到延安访问我们的人中间，你就是一个。在战争中，你为我们尽了很多力，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那时她曾对我这样解释：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计划。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很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学生的示威游行。那时，他们都属于同一组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战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我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后来不久，她化名在北京附近的一家肺结核病疗养院疗

养时，险险乎被日军逮捕。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了北京。

邓颖超尽管受到日军的多方查问，仍然平安地离开了北京。

和周恩来结婚，邓颖超本人当然是自愿的，大概谁也不能对此持异议。可是，象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她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妇女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也不少吧。她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对周恩来说来，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孩子。是原来就没有，还是在战乱中失散了呢？没有人特意问过。

周 恩 来

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一个美男子，脸上充满智慧，眼睛乌黑发亮而有生气。只看他的脸是难以估计出他的年龄的。

可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的人格的魅力。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他那优雅洗练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记不忘。

我在延安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

身边的干部到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后来我在汉口、长沙、重庆，几乎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原先他给我的这一印象就更为强烈。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管是对籍籍无名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官、外国的大使，他都一样用充满好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周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朝廷的大官，父亲是有名的教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曾在天津南开学校念书。在学习期间，因为学业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在一起讨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社会 and 文化的种种理论，当时在中国成立了许多组织。周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最初使他从书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是“觉悟”社。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刚刚在中国出版。

本应作为学者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捕，判刑一年。

一九二〇年，周作为“勤工俭学会”的一员到法国去。他在欧洲住了四年。在此期间，他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成立后，柏林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便合并到共产党支部中去。正在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

当时，在周恩来介绍下，一名男子在柏林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申请，在上海原是被否决了的。此人就是朱德。周恩来和朱德见面交谈后，马上让他实现了入党的愿望。这一结果，为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领导

人，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识人之才，真是慧眼识英杰。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到中国，在广州近郊黄埔新创立的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校长，也是一个后来令人瞩目的青年，他就是蒋介石将军。

共产党员周恩来，才二十六岁就成为广东政府的首脑之一。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间，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九二七年，他的组织才能在上海得到再次证明。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约六十万工人，成功地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可是，蒋介石率领乘胜进军的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后，竟然讨伐自己昔日的盟友。在要处死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巧妙地化装逃脱，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革命军即中国红军中。一九三一年，他被任命为红军的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为了使周恩来这个才具非凡的人物脱离共产党，作过种种尝试。可是，富贵荣华的诱饵并未能使周恩来心动。此时，红军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虽然红军正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但让周恩来离开自己的队伍是办不到的。

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在内战中让外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要完成这样一些困难的工作，毛泽东除了交给周恩来去做以外，大概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人选吧。周恩来，现在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理。

朱 德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是周恩来，还有其他人到过德国，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皱折的棉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如果古老的迷信是对的，他一定会长寿的。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中文好了。”

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样，他谈起来还是夹着几句德语；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不明白时，也一定用德语补充说明。他说的是四川话，我听起来觉得比红军里许多战士说的那种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象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

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夫头，得以脱险。只看他那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同他在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为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科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是过书斋生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非法的示威游行，因而在柏林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因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体育馆的集会。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呆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朱德对我说：“你还年轻，但监狱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不过，我被捕时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分子，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至此为止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在这以前，各种工作堆积如山，好几个月我都睡得很少。拘留所很静，也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给我送吃的那个看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

“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呆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呵！”

这时，我记起了朱德这位人物的种种传说。比如，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

朱德的真正历史，自然不象这些传说那样异想天开，但也不乏饶有趣味之处。他出身在四川省一个贫苦的农家，因为伯父家里没有孩子，便过继给伯父，因此能够上学。他进了云南省的军官学校，后来成了滇军的军官。这支军队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中曾起过重大作用。

一九一六年，朱德晋升为将军，在云南省政府内居高位。凡是当时一个强有力的将领应具有的一切，诸如财产、妾侍、鸦片等等，朱德也无所不有。

抛弃地位、财富，决心参加革命之时，朱德的年纪已经不轻。与他在各个战场战斗时完全一样，他坚韧不拔地与旧我作殊死战。首先，为戒绝鸦片，他在上海与汉口之间行驶的英国轮船上呆了几个星期，往返数次，直到戒了烟才登岸。此后，他不倦地学习很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向那些年纪就象自己孩

子般的学生们虚心求教。

朱德在德国住了四年后，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南昌的警备司令。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朱德组织了反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迈出了创建红军的第一步。后来，他任红军的总司令。直到现在，八月一日仍是新中国军队的建军节。

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朱德也不大愿意谈自己的私生活。尽管他多次婉拒，可是，对他的一生怀有很大兴趣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却不住地对他提出种种问题。就这样，艾格妮丝终于从朱德口中打听到，他和他的战友毛泽东一样，在白色恐怖中失去了原来的夫人。朱德在一九二六年与伍若兰结婚，她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斩首。国民党竟把她的头颅悬在柱上曝晒以儆众。

一年后，朱德选择了康克清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康克清是在红军中成长的农村姑娘。朱德对自己的夫人充满自豪，对她的勤勉和旺盛的求知欲一直赞赏不已。他们这对夫妇，在根本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农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他们外表平凡，性格坦率，却包含着过人的领悟力和通过努力积累起来的渊博知识。

要让朱德谈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他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战例。这些战例在今天来说也是游击战的典范。在战斗中逐步形成的这些战术原则，要旨如下：

- 一、敌进我退。
- 二、敌驻我扰。
-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军队的三大纪律，此外还有著名的八项注意，它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守则。这些守则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一些变更。

八项注意如下：

一、离开住户的家之前，要把门板上好，稻草要放回原处。

二、对人和气，助人为乐。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买卖公平。

六、要注意清洁。挖坑作厕所，离开时要埋好。

七、不调戏妇女。

八、对俘虏不杀、不辱。

长 征

我到延安时，命名为“长征”的这一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对于成千上万个参加者来说，还是一次记忆犹新的经历。朱德和其他将军以及其他年老或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许多详细的情况。总的来说，他们虽然各有感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

红军战士把长征叫做“二万五千里行军”，相当于一万二千

公里多一些的距离。红军的几支部队，其中包括朱德率领的部队，甚至走了更长的路程，在两年后才到达西北。

一九三四年秋，红军撤离在江西省的根据地，突破严密的包围圈，杀出一条血路。在这个过程中，红军损失很大，到达贵州省时，只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员。损失的部分，很快得到了补充。这些都是刚刚挣脱奴隶枷锁的青年农民，他们志愿地踊跃参军。红军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以蒋介石的大军为对手，英勇善战，得以避免全军覆没。红军分成几支小部队，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几乎都是在晚上行军。这些小部队声东击西，常常改变行军路线以迷惑敌人，非常奏效。

红军历尽艰险，在长江上游渡河成功后，徐徐通过白彝和黑彝地区。彝族是半开化的民族，因信奉不同而有黑白之分，白彝信奉的是白石头，黑彝则信奉黑石头。他们从几百年前起便生活在四川和西藏边界的山岳地带，为守卫家园而与入侵者进行过多次战斗，没有一次被征服或同化过。彝族被认为是不易和解的对手。

红军把在贵州和云南与苗族和傣族打交道的经验用于彝族，得到他们协助，成功地抵抗了中央政府和四川省的军队。勇猛的少数民族战士，曾机敏地给红军带路，领他们走只有当地居民才知道的山路，安全地把他们带到大渡河的河边。横渡大渡河，可以说是长征最大的难关。三国时代的英雄在大渡河一败涂地，决定十九世纪太平天国最后一支部队的命运的，也是大渡河。因而，蒋介石期望在大渡河边把红军歼灭。

“这真是象和死亡赛跑一样呢，”周恩来对我说。

“我们到达河边是五月末，要准备全军渡河的船只，恐怕要几个星期。那样做的话，在河的北岸占优势的蒋介石军队，就有

足够的时间把我们的部队打败。因此，我军必须强行军赶到二百公里外的铁索桥，这座吊桥是到达北岸的唯一通路。”

红军摆成弯弯曲曲的长蛇阵，夜里，打着数千火炬，穿过河岸的小径，持续行军。时而下陡坡，几乎碰着激流；时而攀险峰，跨过断崖峡谷，其中的艰险劳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用尽全力日夜兼程地行军。

主力部队历尽艰辛来到吊桥下面时，敌人的一支小部队已完全占据了北岸。在桥头堡前约一百米的距离内，桥的横板全被抽走了。在河两岸矗立着的巨大混凝土桥墩之间，只悬挂着粗重的铁索，下面是大渡河的滚滚激流。

参加过长征的战士，生动、详尽地给我讲述了渡河的情况。横渡大渡河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三十名战士，他们冒着危险，攀着铁索到达对岸，制压敌人。这一行动的确是长征的最高峰，克服这一障碍，北进的通路便打开了。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前，便把吊桥修好，全军得以安全地到达北岸。这次渡河，有十七名红军战士牺牲。

困难并不只此为止。接着逼来的难关是，不惯严寒、出身南方的红军战士，不得不衣不蔽体、甚至是光着脚越过七座终年积雪的高山。在冰天雪地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是想在雪地上坐下来休息一下，却滑到深谷之底或冻死在路旁。就这样，几千名战士因此而丧生。

“在你看来，长征途中哪一段最困难呢？”我对给我讲述长征体验的每个战士都这样问。几乎所有的战士都认为，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是长征的最后阶段：过草地。在这阴森森的草原之海里，长满齐人高的芦苇，精疲力竭的战士们不得不在往往是及膝的冰冷的水里跋涉前进。倾盆大雨时，在这几乎全无树木

的草原里，搜索良久也只能找到一些小树枝。在小休时，充其量也只是用小树枝挡一下雨，根本无补于事。

红军接近时，当地藏族的居民便把仅有的粮食全部带走，弃家而去。藏族的女酋长恐吓道，如有帮助红军战士者，便把他活活煮死。

红军战士瘦骨嶙峋、衣衫褴褛，拖着衰弱的身体，在毛泽东率领下，终于到达甘肃省的边境。他们以一往无前的精神，突破了中央政府的防线。其后，又粉碎了西北那些畏惧红军的伊斯兰教专制统治者的攻击，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陕西省北部。从江西开始行军算起，已经一年了。陕西省北部自一九三三年以来便是苏维埃地区。

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红军跨过十八座高山，渡过二十四条河。其中，有好几条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征的全程，通过十二个省、六个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的军队打败了十个省的军队，持续进军。对人数上、装备上都占优势的中央军，则时而揍一下，时而迂回前进。

尽管损失巨大，毛的军队还是到达了目的地——西北。红军幸存的主力部队，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的考验，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他们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毛 泽 东

一九二八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

此，外国报纸和南京政府的报道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连成一体，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件大事。

朱德和毛泽东两人，有类似之处。例如，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有用之不尽的精力；这些内在之处是相同的。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十岁左右，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因为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入党，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较大，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

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剧场里。其实，那不能算是正式的剧场，只是一个照明设备不足的大厅。在大厅的一头，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权作舞台之用。观众是红军战士、学生和老百姓（即延安的普通市民和从近郊来的农民）。

我时而看看舞台，时而望望观众席。这时候，艾格妮丝问我：

“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到剧场来看戏。”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

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毛泽东有无数的传说。和朱德一样，好几回都说他已经死了，报上甚至报道了他死亡的详细情况。毛泽东不仅没有死，甚而不曾负过伤，虽然他参加过很多次战斗。而且，至此为止，他没有患过重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这样的，当他们听到有关自己的传闻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只是一笑了之。就象朱德和周恩来一样，毛泽东也不愿谈自己的身世。直至今天为止，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都还没有正式的传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立即公布：禁止用活着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街道或学校。因此，在中国并没有毛泽东市、朱德路、周恩来学校之类的东西。

毛泽东的老朋友、老同学萧三，是中国南部湖南省出生的诗人。萧三夫妇都是我的朋友，萧夫人是德国人。他给我忆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事迹。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父亲生性吝啬，脾气急躁，对此他深为不满。他的父亲靠米的买卖和极度刻薄而成家，爬上中农阶级。毛在八岁那年被父亲送进学校。父亲送他入学的唯一目的，是想以后能给他记帐、写诉讼的文书。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毛泽东对他的母亲就更为敬重。毛的

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非常好，常趁着毛的父亲不在，暗暗地给贫苦的人家送米和其它生活用品。不过，她对儿子公然反抗父亲也是不高兴的。毛在十岁时，曾反抗父亲离家出走，经过此次出走，父亲对他的态度才改善了。

毛是勤奋的学生，非常喜欢学习。但是，他十三岁时就不得不停学了。父亲要他帮家里的忙，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记帐。一心向学的毛泽东，最后还是再次离双亲而去。他十六岁时进入现代化的学校。入学后，他对孙逸仙博士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很感兴趣。为了表明自己具有共和思想，他不仅自己剪掉了辫子，还和另一位同学合作，不由分说便把十名同学的辫子都剪掉了。那时候，辫子象征着服从清王朝，是应被憎恶的对象。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年轻的毛泽东在故乡湖南省省会长沙的师范学校学习了五年。他和几位同学商议，组织了一个小组，研究、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他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为了将来能适应繁重的工作，不只是单纯增加自己的知识，还进行身体锻炼。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自己就对我说过，他通过登山、游泳、野营、以长途步行的形式旅行等种种方式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倚仗这些，到后来内战和长征非常艰苦的时期，他的身体也经得住。他相信这是由于青年时代努力锻炼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相继有了研究革命问题的读书会，毛和他的朋友在长沙也组织了“新民学会”。不过，他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一九一八年起住在北京，任图书馆管理员。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作为湖南省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

了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成立大会。此后，他就在故乡湖南省的学生、工人、农民中间，专门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为革命做组织工作的日子里，毛泽东越来越确信，中国革命只有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的理论基础，是他的实践经验和他对中国历史的知识。毛泽东的理论，是在与某些革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西欧正统派理论作反复、激烈的斗争中，逐步奠定自己的地位的。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革命得以不断进行下去。中国革命最后终于回复中国式的特性，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不用说全都认为他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者，但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农民革命的继承者；太平天国的创立人，过去数世纪以来推翻旧王朝、建立新国家的农民革命家，都是他们的前辈。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上，放着已经盛上咖啡的杯子。

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慑服。这个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党和红军都确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当我知道这一点时，能不为之惊叹吗？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机，毛泽东现在正以中国这一边远荒僻的地区作为根据地，全力以赴地为革命进入新阶段而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象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象比你们强呢！”

那时候的谈话不用说，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因此，外国人要很好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

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还未越出一九〇〇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这一点使我极为愉快。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

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毛是夜里工作的人。他很晚才起来，用两、三小时在延安的小街上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奇形怪状的投影。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据他说，碰到特别有兴趣的书，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把它看完。深夜两点乃至三点以前他是不睡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够长。

和其他烟酒不沾的共产党人正相反，毛偶然也喜欢喝一点土制的味道不错的红葡萄酒，此外，还非常喜欢抽烟。我看见他喜欢抽的老刀牌香烟的盒子，在房间里散乱地放着。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地区（即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词，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

得很准确。据说，毛有这样的习惯：他在延安城内溜达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要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答道。

“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接着说。“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成将来的解放战争。”

“可是，究竟国民党方面是否已准备和你们协商？”我又问道。

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就根本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我们甚至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到延安来，我们等待着。”

（一九三七年四月，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延安，就两党合作的问题与共产党达成具体协议。同年五月，毛泽东在共产党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一讲话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题公开发表。在这个讲话里，论述了关于统一战线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然后，毛泽东又和我谈到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他

在讲课中谈到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在内战中发展了的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毛对我再一次详细说明在江西省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战略原则的内容。可是，当时那些正统派的党领导人不接受这些原则，他们已被西欧的军事理论俘虏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指在敌人比我方强大时，暂且退避，待条件有利时才进行反击。毛泽东在给我说明时，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兵法和古典小说的事例。比如，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年）以弱胜强的范例以及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中国人人皆知的曹操远征的故事。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他让“小鬼”送我回家。

“请你好好看看延安！”他向我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同样大小，不过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

“土匪头目们”

我到延安，来得正是时候。内战事实上已经结束，为了研究新情况的变化，好几个会议正在召开，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奉召来到延安。一天，在剧场里，艾格妮丝指着好几个人，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们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一天晚上，我和他们中的几位认识了。

“用不着这么早睡吧？”戏演完的时候，向来喜欢聊天的马海

德医生说。“我家里还剩有几瓶红葡萄酒，花生也可以弄得到。”

应马医生之请，来了许多客人，李德的窑洞简直容纳不下了。“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呵？”朱德对着我嚷道。“现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间，国民党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这时候，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场的人好象都知道。

“那是在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以二万五千元。我们的总司令看见了，但并没有把这张告示撕掉，他自然很清楚，农民是不会把他出卖给敌人的。一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的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了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比什么宣传都要有效。我们质朴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这样充满机智的、针锋相对的批语。”

坐在我旁边笑着的男人，蒋介石也许下重金悬赏他的脑袋，数目不比朱德的少。窑洞微弱的光线朦朦胧胧地照着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就象是遥远的历史年代里的人物。他象太平军的领导人，又象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的英雄。宽宽的肩膀，剃得光光的脑袋，又黑又浓的胡须，他活象《水浒传》里的著名头领，又象罗宾汉似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艾格妮丝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贺龙。他并不喜欢提起自己的过去。贺龙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前，实际上是一个“匪首”。贺龙的父亲曾是“哥老会”的领导人。“哥老会”是遍及全中国的农民秘密组织。贺龙继承其父的地位，年轻时就成为故乡湖南省有名的人物。在他掌握的广大地区里，贺龙袭击、抢掠以买卖鸦片致富的行商。可是，农民们对贺龙的队

伍，并不象对军阀的军队那样憎恨。他的队伍决不对本地区的居民劫掠，也决不把当地的鸦片占为己有。

一九二五年，贺龙参加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师长。一九二七年，他率领部属投向共产党的军队，不久便到达毛泽东率领的少数农民军的根据地。

在长征中，贺龙的部队比红军主力部队所受的损失还要大。数以千计的战士，有的在雪山冻死，有的则饿死，或被国民党飞机炸死。可是，他的战士们，宁可在长征途中死去，也不逃亡。在行军途中，有数千名青年农民，仰慕贺龙这位农民领袖，志愿加入他的队伍。贺龙本人，在长征中很能吃苦，这是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已惯于饥饿贫困。

“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途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劳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贺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游击战的名将。从他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巨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受到农民的爱戴，并不难理解。不管他到哪一个农村，都是受欢迎的人物。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叼着他喜欢用的烟斗、浓黑的胡须；他那充满佻皮的眼睛，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富于幽默感的贺龙，在西北，不久便同他在故乡湖南一样，大受农民的欢迎。

就连贺龙的受害者，也不说他的坏话。有一次，一名被贺龙逮捕随即又获释放的瑞士传教士波士哈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位“土匪将军”充满好意的发言，使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那

个传教士会见记者时是这样说的：“如果农民们对共产党人的真正面貌是了解的话，我想是没有人会逃离自己的家园的。”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诙谐有趣，真不愧是这方面的能手。可是，对马海德医生的客人中间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外界就知之甚少。此人就是彭德怀。他和朱德一样，看上去更象一个农民而不象军人。只不过他比朱德年轻一些，约摸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然而，他也是个老红军战士。他的军人生涯可以从十六岁算起，二十七岁当上国民党军队的旅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部起义，带着一个团和军官学校的学生投向毛泽东的农民军。

彭德怀也是湖南人，可是要听懂他说的话却很费劲。湖南方言本来就听不懂，再加上他说起话来快得象开机关枪，就更难听懂了。他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却从小没过过好日子。六岁丧母，后娘虐待他，不得不跑到祖母家里去，可是，祖母待他更不好。因此，他从家里逃出来，那年他才九岁。为了活命，他给人家放牛，到矿里挖煤，给鞋匠当学徒，最后当了兵。在部队里他步步高升。

“边 区”

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远足和骑马的好季节。我应毛泽东先前之请，参观了延安及其近郊。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当时，延安的人口大约有三万人，比红军到来之前增加了三倍——城内有一条大街，杂货店和日用品店都开设在这条街上。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

生和红军的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

延安仍然留着一道古老的城墙，那是宋朝时建造的。当时，延安曾是抵御北方蛮族入侵，保卫国家的前沿阵地。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道巨大的城墙对抵御日本侵略军却毫无作用。后来，由于日军的轰炸，延安城几乎全被摧毁。

在十九世纪宗教混战时代，陕北受到很大的损害。由于伊斯兰教徒大暴动，造成广大地区荒废，许多城镇被毁，居民四散逃亡，了无人迹。在领我骑马通过连人影也见不到的荒野时，一名红军战士告诉我，由于旱灾、饥荒，这个地区曾有数十万人死亡。而在一九二九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中，饿殍遍野，数目达到三百万至六百万之多！

在这个贫困的地区，村落散布在深谷之下。如果不是从高处看，是不会发现的。山腰和山谷的底部可以看到农田。土地是如此贫瘠，使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地方是可以耕种的。

这个地区的人刚毅不拔，独立性很强。连绵不断的生存斗争，使他们具有顽强不屈的性格，就象我骑的马一样强韧。一九二七年，这个地区出生的年轻共产党人刘志丹，号召农民起来反对地主，得到群众的响应，终于成功。一直冀求幸福生活的农民们，把刘志丹看成是理想的化身。

因此，在农民中间流传着无数关于刘志丹如何勇敢、大胆、富有冒险精神的传说。这些传说听起来好像是古典小说《水浒传》里的故事一样。比如，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得到秘密组织“哥老会”的营救，战胜强敌；他和农民军在拚死的苦战之后，终于败北，但失败了仍然战斗不止，如此等等。农民们相信刘志丹是刀枪不入的。对刘的这一信仰，在一九三六年终于结束。刘志丹把

他手创的红色根据地，供毛泽东和红军作为营地。次年，刘志丹在邻近的山西省的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回故乡，随即死去。刘志丹热爱自由，同样，他热爱故乡的群山。生前，他曾多少次在山中转战。死后，他被埋葬在故乡的山中。

农民们对红军从心底里感到满意。如果按西欧的标准来衡量，延安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低得无可再低了。既要与自然作斗争，又缺乏资金和工具，知识也不足，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但是，在我参观途中与之交谈的农民却对我明确地表示，因为不必再为缴纳苛捐杂税而担忧，因为再也没有人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而跟他们打官司，因为那些强迫他们出钱、出劳工的贪官污吏已经一扫而光，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非常满意。

一位老农民给我谈了以前统治陕北的军阀的事情。以“土皇帝”而知名的这个专制统治者，征收四十种以上各种名目的租税。此外，农民们还要供养他的军队。这个土皇帝本人，有十一名妾侍，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占用农民最好的土地以种植鸦片。

“现在这里再也不种鸦片了，”一名年轻的农民说。“战士们也和我们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陕北的居民，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说，几乎全部是文盲，”徐特立对我这样说。他是“边区”的人民教育委员，是一位很受民众尊敬的人物。徐特立六十二岁，在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战士中，有如祖父。徐特立出生在湖南省，曾当过教授和校长，备受尊敬。五十岁时，他舍弃了已有的地位和宁静的学生生活，参加了共产党。他看上去毫无衰老之态，在长征中也经住了考验。他很肯定地笑着说，长征中他失去的只是一只牙。

徐特立在陕北的工作，是需要相当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这是因为他的任务是要与无知和在人们头脑中已扎了根的迷信观念作斗争，然而教育经费却极少。尽管他任人民教育委员的职务为时尚短，但已有许多他认为值得夸耀的进步成果。他希望我注意一下，在延安地区有些地方，缠足的女孩子已不多见了。我特别注意到的却是，延安地区的农民，比起陕西省其它地区的农民要“现代化”。在“边区”，连一个留辫子的男人也看不到了。在陕西省南部的许多村落，一九一一年已废止的男人留辫的风习依然残存。

在“边区”，几乎所有的村子都设有“识字班”，这是供成人和孩子们学习的一种学校。在识字班里，先生比学生年轻并非罕见。教给学生的字数，限定在数百字左右。这样做的结果，文盲的人数逐渐减少，许多人从无知的黑暗中被解放出来，效果显著。

去上海的消息

尽管我原先就只打算在延安住一个短时期，可是一天早上突然接到炳南的电报，还是把我吓了一跳。电报说，因要同往上海，请尽早回西安。到上海去？为什么？任何猜测都无济于事。我不得不和延安告别了。因此，我原先订下的许多计划全都成为泡影。收到炳南的电报后不久，朋友们便给我饯行。这个宴会，使我有机会在款待我的主人面前向他们表示我对延安友情的亲切感谢。在延安的日子，我是永生难忘的。

告别延安，心里是很难受的。我来到中国之后，象延安这样

能够令人安居的地方，别处是找不到的；象延安的人那样爽朗快活的中国人，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建设新社会的高度热情，延安全体居民的意气风发，使我深为感动，真想在延安这个城市多住一些时候。这里是中国的其它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离开延安的眷恋惜别之情，我过去还不曾体验过。

送别的晚餐会，并不象当时中国一般的惯例那样大排宴席——在延安，则已经算是过份奢侈了，有烤鸡、猪肉，还有延安产的上等红葡萄酒。为我送别，大家不住地干杯。朋友们反复地用德语说“*Auf baldiges Wiedersehen!*（后有期）”这样的告别话语。在葡萄酒还未喝尽之前，我们已经没有干杯的名目了。不管什么时候，周恩来都是排难解纷的及时雨。他提议：“各位，让我们为共产国际在世界的各支部干杯！从阿比西尼亚^①到桑给巴尔^②，按照拉丁字母的顺序，各干一杯。”我记得，干杯干到“L”字头时，好象便没有继续下去了。

艾格妮丝开列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让我在上海替她采购。这些物品包括：图书馆用的书籍，给专门照顾她的“小鬼”吃的维生素丸，给生病战士吃的奶粉，不用说，还有捕鼠器。她在购物单上忘了写咖啡，后来我给她补上了。

我在延安，还受委托办另一件事。快要离开延安时，一位能说流利德语的青年来访。这个青年自称何柳华，与我素未谋面，他有什么事要找我？实在使我感到非常好奇。

他说明来意。原来，他请求我替他带一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那当然可以的，”我说。“你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也这么想，”他微笑着说。“母亲现在根本不知道我在什

① 即今埃塞俄比亚。

② 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

么地方，因为我已经有多多年没有和她通音讯了。我母亲是个杰出的妇女，”他继续说。“我的母亲叫何香凝，你学过中国历史的话，我想会知道这个名字的。我的真名叫廖承志，在延安用的是化名。父亲廖仲恺，是孙逸仙博士的最亲密战友之一，一九二五年他在广东被反动派谋害。”

关于廖仲恺，我知道他与孙博士一起在日本流亡时，同心协力，为共和国的创建从事组织工作，建立了国民党。廖仲恺后来是广东政府的领导成员之一。

“你在什么地方学到这样好的德语呵？”我问道。

“在德国。我在汉堡住了好几个月。”

“在那里上大学吗？”我深感兴趣地问。

“不，我没上过汉堡的大学。我是在监狱里。”

据廖承志说，他一九二七年去欧洲，在外国轮船上做中国籍海员的工作。他组织船员，建立工会，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提高工资。为此，警察就来找他麻烦了。他最初是在鹿特丹被捕，被逐出荷兰。后来，在汉堡又是同样的遭遇。在汉堡，他在一艘英国轮船上，组织在该船工作的中国籍海员举行了罢工。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说一点关于你母亲的情况？”我说。

“好的。母亲是一位杰出的、非常勇敢的妇女，”廖接着说。“母亲虽然是在香港一个富商的家庭长大的，但因为父亲是孙博士的战友，遭到种种的迫害和苦难，因而母亲与父亲共尝艰辛。不仅如此，母亲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加入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同盟会的第二名妇女。因此，母亲和孙逸仙夫人是好朋友，她现在也住在上海，我想您一定会见到她的。母亲一直为我出了很多力。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被捕时，母亲为了让警方释放我，用

尽各种办法，终于成功。母亲作为国民党最早一代的成员，又是著名的国民党领导人的遗孀，还保持着很多有力的个人关系。”

“我是不能在上海久呆下去了，这一点母亲也看得很清楚。只是因为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分手时她是很难受的。后来，我离开了红军第四方面军控制过的鄂豫皖地区，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参加长征，然后来到延安。我离开上海后，一直没有给母亲讯息，因此，不管怎样，也要把这封信交给她。”

为了使他放心，我对廖承志说：“我高兴地接受你的委托，能见到你母亲，我是很愉快的。”

“我想姐姐大概也在上海，”廖说。“我姐姐叫廖梦醒，我们通常叫她朱迪，那是她的外文名字。”

“你在延安做什么工作呢？”我进一步问廖。“是在学校做事，还是在军队？”

“不，我在《解放》杂志担任主编，并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我们俩高高兴兴地互相道别，临别时廖说，“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话，我就能够去探望母亲了。”他不必再久等了。第二年，廖承志作为八路军——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称八路军——的代表，到达香港。这时候，因为日军占领上海的华人区，他母亲也移居她的故乡香港。一九三八年，我在香港和廖再见面时，他已不用化名，身上穿的也不是褪色的制服，而是很合身的西服了。

今天的廖承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他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其地位相当于部长。与日本、非洲诸国进行政治谈判和经济谈判时，他每每起主导作用。

当我在艾格妮丝和她的活泼的“小鬼”陪同下，再次穿过延

安的街道时，许多人同我握手、道别。还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朱德用德语频频说：“Auf Wiedersehen！（再见）安娜！”“欢迎你早日再来！”这句不是用德语——几个“小鬼”也这么嚷着，我用中国话和他们交谈，他们非常高兴。

归途的货车上，看不到学生了。几名战士坐在各自的行李上，他们一定要让我坐在最舒适的位子上，我怎么推辞也不行。天下着小雨，朦胧地看到挥手送行的人，越来越小……。

还未进入雨季，货车开得很快。我们又在幻景般的黄土风光之中穿行，货车穿山越岭不停地奔驰。山腰上，是农民住的窑洞。我们在沿途贫困的村子里小休。能买到的食物只是象薄饼一样的烧饼，而且数量也不多。

午餐是玉米粥和一个鸡蛋。吃不上青菜。可是，鸡蛋已是容易吃得到的食物了。艾格妮丝在出发时给我一大袋花生，我和战士们分着吃。

这一带险峻的山中，以前是盗匪出没的所在。因此，战士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注视着山岩后面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坏人。在这一片纯黄的景色里，了无人迹。映入眼帘的，只是掠过柱状浮云的山鹰。

货车到达一个小而破落的城镇，我们就在那里过了一夜。在夕阳的余辉里，周遭的丘陵，宛如一座座魔术师变出来的岩石城堡，可望而不可及。不过，我们的住处却似乎与魔术之城无缘。与我的房间一板之隔，骡、马、猪、鸡吵个不停；房间里还加上老鼠的幽会、嬉戏。我们累极了，都倒在床上。我睡的是两块门板拼起来的床。战士们躺在稀稀拉拉铺在冰冷的泥地上的玉米秆上。即便老鼠怎么闹，他们也睡得很香。透过油灯的昏暗灯光，看着讨厌的小动物在酣睡中的战士之间爬来爬去，我心里

不由得升起一种恶心和困惑的感觉——后来，油灯灭了，我也进入梦乡。

第二天傍晚，西安的巍巍城墙在平原的彼方出现，不久，我们的货车穿过夜间关闭之前的城门，进入市区。我又回到了西安。

五

抗日战争爆发

拜访何香凝女士

我回到西安后，炳南马上把为什么要移居上海的原因告诉了我。杨将军受蒋介石之命，要到国外去作一段时期的“考察旅行”。这是当权者让自己不喜欢的人物离开要职的便利方法。这样做既可以不伤“面子”，如果需要，将来还可以让他复位。

杨将军希望炳南与他一同出国旅行，炳南谢绝了。不过，他同意到上海去。由于政治、军事的停战协定成立，上海的抗日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救国会的活动，现在已毫无障碍，政治犯都已获释。不管从哪一方面看，由于西安事变，政治状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

使我感到松一口气的是，杨妈获悉要到上海后，立即答应和我们同往。为了黎明，我想，即使是到天涯海角她也是愿意去的。对她来说，上海或许已是天涯海角了。

到达上海数天后，我们在法租界租了一座小房子。我们的房子座落在街道旁边的一条狭窄的弄堂里，一排十栋，式样完全相同，我们住在倒数第二栋。上海这类典型的建筑物肯定会给那些精于做买卖的房地产主带来可观的利润，因为每条街道的左右两边都是横弄堂，大弄堂里还套小弄堂，象一座迷宫似的，要找一家人家，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

每一座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天井。高高的围墙，把天井和

弄堂隔开。正门几乎是不用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按门铃、敲铁门都是麻烦的。在后门入口处的厨房，总有个佣人在守候，期待中的客人或至亲好友来访，就高高兴兴地把他们迎进来，大声告诉屋里的主人；不受欢迎的客人到访，佣人便巧妙地把他们挡回去。

过了好几天之后，我拜访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时，用的却是正规的方法，按响正门的门铃。因为我终究不是他们亲密的朋友，自然，也不是令人讨厌的客人。何女士在拉斐德路的住处，是一座和我们的家很相似的小房子。

门开处，上年纪的阿妈看到一个外国妇女站在门口，非常惊奇。我对她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要直接交给何女士，她稍有踌躇，随即把我引进客堂。客堂颇大，陈设却很普通，墙上挂有几幅画着老虎或花卉之类的轴画。这时，我想起廖承志曾告诉过我，他母亲是有名的画家。

过了两、三分钟，一位年轻、风度大方的妇女进来了。她用漂亮的英语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她是何女士的女儿。她就是廖承志曾说过的他的姐姐朱迪，也就是廖梦醒。我安心地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你是从延安来的？你说你和我弟弟见过面？”我刚说完，她便结结巴巴地问。“请等一等，对不起！”说着，便快步走出客堂上二楼去。听得见她在二楼急速而兴奋地用广东方言说话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便陪着一位看上去很温柔、纤弱的上年纪的妇女来了。

这种只有在母亲的脸上才会有的深沉的表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从她的表情里，可以窥见她的一生是充满爱和忧虑的。她那乌黑的眼睛，以一种不安的神色望着我。她大概在想，

这位来客要对我说些什么呢？详细的说明，客套的话语，都是浪费时间，我便把带来的信交给她。她用颤抖的手把信封拆开。“呵，是直接从儿子那里来的，”她感叹地说。“你见过我的儿子吗？”她问道。朱迪倚着她的肩，一起看信。看完，她们两人便急不可待地对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我不知道先回答哪一个好。因为何女士只能说几句英语，她便努力用标准的中国话来和我交谈。就象所有的广东人一样，对她来说，这是很难的。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说普通话。”诚然如此。

不是还有朱迪吗！她精通三国语言，可以给我们当翻译。当我谈到延安时，何女士倾耳细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她感到不满足，再三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们谈话间，梳着长辫在旁侍候的广东人阿妈，不住地给我们奉茶。何女士让她到附近的饭馆买包子回来吃。包子就象是一种带肉馅的小面包，在中国是当点心吃的。

然后，何女士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每一个做母亲的，不管她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能等闲视之的。“我的儿子有妻子了吗？他结了婚没有？”我答道，他还没有结婚。何女士这才舒了一口气。大概她——即使是开通的母亲，也是喜欢这样做的——已为自己的独生子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广东姑娘吧。所以，听到我的回答，她感到自己的愿望还有实现希望。

这个问题后来象喜剧电影的结局一样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廖承志在一九三八年真的和一位广东姑娘结了婚。我想大概就是他的母亲为他找的那个姑娘吧。何女士后来成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孙儿的祖母，真是幸福。

“我，决不会忘记今天，”何女士感动得含着泪说。“你给我带来了这封令人快慰的信，我要永远感谢你。”

我说，这算不了什么，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何女士却很认真，不让我说下去。

她确是没有忘记这件事。以后，在香港，在北京，不管在什么地方见到她，她必定把我请到家里，以美味的广东菜来款待我。她在孙儿面前，总是反复说我给她带信的事。“这就是那位给我带信的太太，”她满面春风地握着我的手说。孙儿们惊奇地听着。

一九四九年，何女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此后数年间，她都是处理华侨问题的主要负责人。因为高龄的缘故，她的职务后来让给儿子了。

如果说，我出于好意做的这么一点小事，何女士就永志不忘，深为感谢的话，那么我对她，不能不表示更深的谢意。因为她使我对她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的妇女。和这位妇女的亲密交往，对我来说是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她，就是孙夫人。

孙逸仙夫人

孙夫人，按中国的习惯称呼是宋庆龄，关于她，已经有许多书写过了，即使是摘引这些书中有关她的章节，也多得可以集成一册。政治家、作家、诗人们，对她的人格和美貌，对她忠于先夫孙逸仙博士的理想的矢志不移的节操，赞美不绝。各种国籍、各个阶层的人，都把她当作为和平与社会正义而战的先驱者；千百万中国人，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对她无比尊敬。

我知道，见到她是不容易的。孙夫人在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一所简朴的房子里，避世静居。这所房子和大量的中英文

藏书，便是孙博士的全部遗产。尽管孙博士经手过数以百万计的巨款，这些都是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为资助国民党事业捐献给他的，但是他没有留下一点私人财产。看到孙夫人过的简朴生活，就会毫不怀疑地认为，在富得出奇的宋家的数百万财产中是没有她的份的，或者是她根本不要。

事实上，由于控制了国家，在中国，宋家甚至被称为“宋家王朝”，宋家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掌握强大权力的家族。这个“王朝”的宗主是宋耀如，他曾用查理·宋这个名字。宋耀如年轻时赴美国，成了基督教徒，取了外国名。他回国后，最初在上海做牧师和教师。后来，他与一名也是基督教徒的名媛结婚，成了实业家，靠做外国机械厂和纺织厂的代理人而成巨富。

宋耀如与孙逸仙博士结交，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他对孙博士给予经济援助，并通过自己的圣经印刷所，悄悄地印发非法的传单。和在国外生活过的许多华侨商人一样，他热烈支持孙博士制订的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计划。

查理·宋把他的子女全都送到美国留学。他有六个孩子，其中四人，在中国历史上担当着重要角色。她们是霭龄、庆龄、美龄宋家三姐妹（她们的诗一般的名字各取爱的人生，光辉的人生，美好的人生之意）和以 T·V·宋知名的长男宋子文。

大姐霭龄，富于领导才干，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才女。与其说她是中国妇女，不如说她是美国妇女。她与富裕的银行家 H·H·孔博士（孔祥熙）结婚。孔祥熙由于与宋家关系很深，后来出任中国政府的要职，当了多年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

最小的妹妹，就是今天以蒋介石夫人而知名的那位。对出身微寒的蒋将军来说，与强大的宋家结成姻亲，为他出人头地准备了跳板。

从历史上来看，起重大作用的是庆龄。她以少女之身，与她年纪大得多、后来被称为“国父”的孙逸仙博士结婚。

多少有点理想家性格的庆龄，是在她自己家里与孙博士认识的。那是一九一二年，她刚从美国回国的事情。孙博士亡命日本之际，庆龄与家人同行，担任孙博士的秘书。一天，她对母亲提出，她对革命家孙博士非常尊敬，希望能和他结婚。宋家的人大吃一惊，这除了因为两人的年龄相差悬殊之外，还由于孙博士已结过婚，也有了孩子。如果与庆龄结婚，孙博士就得考虑与夫人离婚。诚然，孙博士的婚事，是由家里决定的，并不幸福。他的夫人一个人住在中国南方，他已多年没有和她见面了。可是，如果他按照庆龄的希望而结婚，不仅不合中国传统的习惯，与基督教的习惯也是不相容的。因而，宋家全家反对这门亲事。

但庆龄已经决意，不管什么阻挠都不能打消。最后，她离家出走，与孙博士结了婚。这一行动，初次显示出她具有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她认为是对的，就有勇气坚持到底。两人婚后，与宋家内部的关系也得到改善。至少对外界来说，宋家的人不愿意给人以家庭和睦已遭破坏的印象。

一九一五年，孙博士从日本回国，庆龄陪着他遍游全国。庆龄对他来说，是各种场合都缺不了的助手和伴侣。年轻的夫人经常陪着丈夫在公众场合露面，在老一辈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不成体统，但年轻的一代却是深为感动的。庆龄成了新的自由和理想的化身，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庆龄和孙博士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苦难和不安。孙博士作为大元帅在中国南部的广东政府主政期间，常常要逃亡、避难。由于工作繁重，过于操劳，他的身体衰弱，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往中国北部的旅途中，他患了重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他逝世以后，孙夫人决心把实现丈夫的理想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实现这一理想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不能成功的。不久，她和妹夫蒋介石之间，便处于对立状态。她抨击蒋介石背叛中国革命，违反孙博士的遗言。在蒋介石背弃了孙博士与共产党结成的同盟，“白色恐怖”开始的时候，孙夫人离开了中国。

她在国外生活了两年。这两年间，她到过苏联和其它欧洲国家旅行。后来她常常对我谈起，在德国的那几个月，是她一生中充满着愉快回忆的一段时期。因为她在德国生活时，学过一些德文，后来给我的信里，也常常用德文词汇。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在柏林生活时很喜欢的德国民歌和用马铃薯做的薄饼。

一九二九年，为参加孙博士的国葬仪式，孙夫人回到中国。孙博士的遗体，葬在建于新首都南京的大陵墓里。形式上，她仍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但对政治问题几乎不公开发表意见。偶尔发表，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批评并无丝毫变化。

在三十年代，公然发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并不容易。宋庆龄能够发表，大概是因为这对她并不会造成直接的生命危险。因为她仍然是“国父”的遗孀，尽管有人中伤说她已被逐出家门，她仍然是宋家的一员。虽则如此，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是不可能有她那样的言论和行动的。

那是指在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对反对者采取各种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和屠杀的时代，孙夫人代替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千万人，发出了抗议之声。她和自由主义的科学家、作家——林语堂和胡适也在内——创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当这个组织的一员被

谋害时，孙夫人提出了严重抗议。一九三二年，被认为有前途的六名青年作家被捕，遭到残酷杀害之时，她发出了抨击。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六名青年，在上海城门前的龙华刑场，被迫自己掘墓穴，然后生生地被活埋。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只因为他们是现代中国最大的作家鲁迅所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是共产党人。人们认为他们与鲁迅、林语堂、胡适一样，并非共产党人。

当蒋介石的警察开始逮捕有抗日思想的人时，孙夫人又一次提出抗议。一九三六年，她所属的救国会的七名领导人被捕，她表示抗议，并在给法院首席法官的信中写道：“阁下如将七名热诚之爱国者投狱，我也应在逮捕之列。我犯了与他们同样的罪。因我也爱祖国，反对日本的侵略。”^①

孙夫人的言行充分表现了她的真挚、无私、廉洁、勇气和富有同情心。中国人民对她的人格敬慕不已。在中国，人们对宋家三姐妹有这样的评论：“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民。”

在我初次站在孙夫人面前时，我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都惊叹她的美。在宋家三姐妹中，毋庸争论，她是长得最美的。但她自己好象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态度自然，具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温文尔雅。每当我和她接触时，我一再感到，她那并不引人注目的质朴的态度，和她的弟弟及姐妹比较起来，美国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的每一个姿态都给人以一种羞怯感，她每每压制自己，不使自己的柔情表露出来。

孙夫人说起话来细声慢气。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的声音柔和、安详，和妇女的身份特别相称。”

① 这是译文，不是原文。

她的服装也象周围的陈设一样简朴。她虽然穿的是素色的中国服装，也没有打扮，但正是这种质朴使她显得更美。她看起来比我想象中年轻得多。即使时光流逝，她的美也不会消失，这是她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个特点。

我曾在一本书中看到有人对孙夫人作过这样的描写：她的容颜焕发出观音菩萨一般的慈祥 and 开朗。在我看来，孙夫人的脸并不象塑造出来的女神那样毫无表情，她的脸非常生动，有喜悦、嘲讽、机灵、轻蔑、辛辣等各种各样的表情。

尽管她不失仪态，但有时还是象少女一般开怀大笑。她憎恶虚伪和妄自尊大。遇到那些傲慢的摆架子的人，孙夫人总是嘲弄他们一番。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直到一九五五年，孙夫人和我一直保持合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她的尊敬和仰慕与时俱进。

抗日战争爆发

不久前，杨将军伉俪到上海来小住，我们的蜗居也因而来客频繁，显得热闹起来。随将军同来的约有二十名“秘书”，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将陪同杨将军出国旅行。

杨将军打算在出国之前，再去一次南京，和几位领袖人物会谈，炳南也与将军同去。对炳南今后的政治活动来说，与新的抗日路线的支持者保持接触，当然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这些人现在仍在蒋介石总司令的侧近。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炳南是共产党员。一般人都以为他是杨将军的“代理人”，炳南的任务被认为是和那些对将军有助

的有力人士建立某种关系，并且更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关系。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幕后决定的，政治协商、军事同盟等等，都是经过长时间会谈才能作出一致决定的。这种复杂的会谈，一定要有学识渊博的人参加。

杨将军对炳南是共产党员并无不满，反而高兴。因为炳南能够在他与共产党之间起着很好的联系作用。将军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与日本决战之中，共产党会担任重要角色。而对共产党来说，炳南能够在国民党将军的侧近受到信任，从而有机会影响中央政府的要员和军事将领，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中国的形势很紧张，万一对日战争爆发，我会立即回来。”将军自宁返沪，出国前与我们话别时，这样说。“炳南和我约定，在我回国以前，他留在上海。我相信，炳南精力充沛，又值得信赖，他一定会为达到我们的政治目标，特别是为发展抗日运动，好好干一番！”

上海的夏季，真不是舒适愉快的。上海人常常自我安慰地说，“热还好办，湿气才叫人难受。”上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海边”，其实上海离海很远，有许多人在上海住了多年，也未曾见过大海。不过，海洋对上海天气的影响，却是谁都感受得到的。由于持续的闷热，空气湿度高，令人全身倦怠，即使有大雷雨，热气也几无变化。

只有在傍晚时分，习习凉风吹来，才能透一口气。这时候，老老少少，相继走出热得象蒸笼一样的家，到人行道上纳凉。每家人家都在街角的迎风处铺上席子或摆上竹榻、竹椅。谁想看书或打扑克，就坐在路灯底下，其余的人便聚在半暗半明处，喝茶、聊天，巴嗒巴嗒地摇蒲扇，不久便相继进入梦乡。

那些有钱的中外人士，自然不会这样纳凉。在他们来说，不

多花一些钱，纳凉就不够格局。他们大房子里的电风扇转个不停，又有装有冷气的高级电影院可以舒服一番。在夏季，那些电影院即使上映的是无聊的影片，也关系不大，因为它们是补足睡眠的绝好场所。象霞飞路那家有空气调节装置的 DD'S 咖啡馆，夏天真是座上客常满。这家咖啡馆的巧克力蛋糕号称世界第一，吃的时候由昔日不可一世的落魄白俄王妃贵族端到餐桌上来。不过，当你从有冷气的房间出来时，更感到酷热难忍。各种消暑法之中，我觉得最好还是按照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好方法，这就是喝热茶，摇蒲扇，这种健康的消暑法，是我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们对别的事情的担忧甚过酷暑。政治气温与日俱升，暴风雨即将来临。七月七日，可怕的事件终于发生了。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北京附近发生冲突，这次“事变”并不象过去数年间多次发生过的冲突那样，它无休无止，发展成为可怕的长期战争。

当时，又有谁会预想到，这次战争竟扩大到整个中国，酿成惨祸，以至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

中国人绝不好战。但当政府打击侵略者的抗战宣言一经发出，令人压抑的一场恶梦顿时烟消云散。中国，终于到了全民一致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蒋介石，终于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宣言！

由于中日开战，统一战线成为现实。数千名政治犯被释放，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代表，也被邀请担任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工作，共同努力。红军也改称为八路军，受蒋介石指挥。

最初以为“支那事变”——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称谓——在数周内便可结束的日本，不得不把增援部队投入华北。不仅是

中国的士兵浴血抗战，北京的学生也拿起武器参战，数以百计的学生在死伤惨重的战斗中为国捐躯。

不久，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知道战争的上海，也被战火波及了。八月中旬，上海近郊和华人区沦为战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则不受影响，不，应该说是几乎不受影响。

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充满令人窒息的空气。人们不安地预感到好象有什么要降临似的。因为上海在一九三二年曾受日军攻击，所以数千中国人争先恐后地涌入被视为安全地区的外国租界，是很自然的。仲夏之夜本已人头涌涌的租界各条街道，现在更成了人海。柏油路上，到处挤满了挎着包袱行李的一家家人。酒店饭馆，则被有钱的难民占满。

这一天的晚餐比往常稍早，当我们坐到餐桌前时，突然，沉重的炮声使我们惊得站了起来。我们很快就分辨出这是日军向上海市北华人区炮轰的声响。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炮声。此后多年，战争的各种形式，比炮轰上海更为可怖的种种情形，我都一一体验了，但都没有上海的这一次来得可怕。战争会怎样发展呢？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怖的预感，使我颤抖。

我们是估计到这次战争的。战争一定会爆发，我们好几百次这样谈过。现在，口里说的，果真成为现实。日军炮声所至，到处都是破坏和死亡。

第二天，我们对战争的含义了解得更深了。那是八月十四日，我们能从死里逃生，好象也很偶然。

从清早起，我们无目标地在市内转悠。炳南和我都不能安居家中，很想知道上海市北发生的情况。法租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难民，而且有越来越多之势。警察在市南与华人区的通路

上，筑起栅栏和铁丝网。华人区的居民担心他们再也不能进入“安全”的租界了。

难民们出奇地平静，没有人叹息，也没有人呼喊，连疲倦不堪的孩子们，也只是紧挨着母亲，默默而行。

我们沿着黄浦江向北走去，在江边大道上迎面而来的人群，逐渐汇集成一条宽阔的难民洪流。天空黑烟滚滚，表明城郊北站附近的闸北区正遭炮击。

从新亚饭店的顶楼，可以眺望不远处战场的情状。饭店周围高楼的平台，也都站满了和我们一样的观众。象一九三二年一样，闸北再次成为战场。在租界目睹闸北战斗进行的观众，竟象是在电影院看新闻纪录片似的，毫不动容；他们满以为，日军对租界总不会轻易动手的吧，显得颇为安心。

再这样看下去，我们可受不了。在顶楼作为观众看街头的战斗，目睹死亡的发生，这种情景真是连想一想也觉得可怕呢。冒着酷热，我们又回到人流之中。走到华懋饭店，炳南对我说，进去喝一杯冷饮吧。

饭店里的咖啡厅，挤满了顾客。有钱的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边品尝着冰淇淋、咖啡、西点，边透过大玻璃窗无动于衷地望着悲惨的难民群。

“快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我气得浑身发抖，对炳南说。“究竟是哪一样更可怕呢？——是外面那样的悲惨情景，还是在里面的这些漠不关心的人们！”

过了一会儿，咖啡厅的乐队奏起了华尔滋，尽管我们很累，也不想再坐下去了。我们又走到街上去——这对我们来说，可是意想不到的幸运。我们离开之后半小时，刚刚回到家里，华懋饭店的街角便受到饱和轰炸，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遇害。咖啡厅

的一角被炸飞时，大概那个乐队奏的维也纳华尔兹舞曲也该奏完了吧……。

华懋饭店被炸数分钟后，炸弹又落在法租界的“大世界”前的十字路口上。那里聚集着数千名难民。炸弹轰响处，几百名自以为找到了安全避难所的难民因此而丧生。

后来知道，“大世界”的炸弹并不是敌人投下的。原来竟是中国的飞行员误投所致。是出于疏忽，还是由于受到日军对空炮火的威胁而慌慌张张地投下，原因不明，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总之，诞生不久的中国空军的出动，造成了这种可怕的不幸。

上海的攻防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日军起初预定在三周内攻陷上海。蒋介石麾下装备最精良、由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的部队里的两个师，面对连战皆捷、势如破竹、处于优势地位的敌军，英勇抗战。这两个师几乎完全被击溃。

一个步兵营固守在苏州河边与公共租界交界的仓库里。因为他们在被日军围困的前沿阵地上连续战斗了数天，故被誉为“前哨营”。对岸是望不尽的日本膏药旗，只有一面很显眼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仓库的房顶上。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许多群众聚集在仓库周围。一天，日军发炮把旗击落，中国的一名女童子军身携国旗夜泳渡河，把旗子交到守卫仓库的士兵的手中。第二天早上，仓库的房顶上，青天白日旗再度飘扬，数千群众同声欢呼。

由于日军威吓中国军队，如不投降便炸掉仓库，英国驻华机关要求蒋介石采取妥善措施。苏州河南岸，在仓库附近有一个煤气库，如受爆炸后果堪虞。退却的命令发出，这个营从唯一的退路过桥，进入公共租界，在那里受到拘禁。

后来，我曾到过拘禁这个营的集中营，营长告诉我，英国驻

华机关事先曾保证让他们重返华人区。“否则，我们是绝不退却的，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带着痛苦的表情说。事关国际法准则，英国人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不敢冒昧袒护中国方面。

法国人可没有英国人那么严格。在上海市南的战斗中，数千名中国士兵放弃几被攻陷的阵地，涌入法租界。他们被解除武装，拘禁在集中营，但大多数换上平民服装逃到华人区。法国人眼开眼闭，对他们的逃离是高兴的。这是因为要给这许多中国士兵提供食宿，实在是一种负担。当法国人知道住在集中营里的不是士兵，绝大部分是为免费的食物、暖和的住所聚集而来的苦力时，他们便拆掉帐篷，把集中营解散了。

一个“爱国”的黑社会分子

炳南想到前线去，即使去不成，哪怕是回故乡也好。他以为，回西安会比在上海更有可为。可是，在杨将军回国之前，炳南是不愿意爽约的。再说将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回来。于是，他开始全力以赴地为救国会办事。救国会现已合法化，并正在大力开展工作。

我自己，则成了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向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后来，由于新增加了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我又以中国红十字会和妇女会会员的身份，接受了这方面的工作。

通过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接触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资助者杜月笙。上海的新闻界和社交界，都要小心谨慎地称他为“伟大的博爱主义

者”，或者他的某一个公开的衔头。他有不少这类头衔，诸如，某大银行的总裁，各类大公司的董事长，等等，而在上海社交界里，最常用的称呼是双料百万富翁。

就象杜月笙的名字一样，他的发迹史也很有名。他是黑社会组织“青帮”的头子，这已是无人不晓。他通过这一地位捞到家财万贯。当时，上海是与芝加哥齐名的犯罪城市，许多人甚至认为上海比芝加哥更为可怕。被称为“三巨头”的黑社会组织，支配着上海。政府机关对他们也毫无办法。盛传这些黑社会组织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官府保持着极好的买卖关系。

“青帮”算盘打得响当当，组织严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外国人常说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不管是哪一种犯罪行为，他们都标定价钱。根据价目表，可以委托他们把自己的冤家对头狠揍一顿，把他弄成轻伤或重伤。甚至可以请帮会里的打手把他杀掉，也不必担心警察会来找你的麻烦。对方如果是外国人，就要增加一些费用。这大概是因为以“天花”为死因处理“消失”的外国人时，付给警察的“缄默费”很高的缘故。对方如果是中国人，就简单得多了。

中国人的商店自不必说，连普通的住宅也要向各个区域的黑社会组织交纳“保护费”。我初次听到中国朋友这样说时，忍不住笑出来，心想，怎么会有那样的事！但说这话的朋友却笑不出来。据他说，每个月总有一个同样的汉子来，看他的名片，便可知道他是黑社会组织派来的。“保护费”就交给他。万一拒绝交纳或有类似的表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心里明白。

上海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黑社会分子。把人力车租给车夫来谋取利润的车行老板，全都参加了“青帮”。这样，他

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向车夫征收车租。公共租界的所有剧场，也是黑社会的势力范围。他们以暴力来管理剧场的演员和观众。此外，黑社会组织还向澡堂、妓院、茶馆等征收“保护费”。

攻击黑社会恐怖统治的人，毫不例外地被列入阎王的催命册中。连林语堂和胡适，也因为他们的一位合作者的“消失”，不得不停止对黑社会组织的批判。“青帮”的头子杜月笙，一九二七年曾帮助蒋介石残杀工人，获得蒋的嘉奖令。因为这一功劳，杜月笙被任命为以禁止吸食和买卖鸦片为目的的禁烟委员会会长。这个职位使他的收入多了一大来源。谁都知道，他本来就是一手掌握鸦片买卖的，现在成了政府机关的禁烟会会长，就更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最大规模的鸦片交易了。

不管怎么说，杜月笙这个强有力的黑社会的大老板也是个“爱国者”。因此，他答应负担由董显光主持的这个委员会的日常宣传经费。董是名记者，是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大红人。

宣传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发行外文的宣传资料以外，还定期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会见时有茶点招待，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就当前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向外国记者说明中国方面的立场。

我在委员会里的工作包括：出席记者招待会，提出新建议，报告我们的工作成果；此外，我还执笔写宣传小册子。我又被指定收集外国报纸有关战争，尤其是有关中国军队的报道，并将这些报道出版发行。住在中国的知名的外国人，以亲眼所见，赞扬中国军队已有质的变化，以前被讥为“扛着雨伞的队伍”，现在面对优势的敌人，英勇转战，不屈不挠。这些报道对宣传委员会来说自然是对外国宣传的好材料。我写的德文小册子《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兵》，最初在上海发行，上海被占领，宣传机构迁到汉口

后，该书出了英文版。在汉口，我的第二本小册子《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也出版了。

随路易·艾黎接受现场教育

十一月，上海周围渐趋平静。这是因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日本军队，更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侵略之故。十二月中旬，首都南京沦陷。到南京陷落前为止，中国方面对日军残暴行为的报道，在外国总被认为是过于夸张。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已经没有人怀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了。据德国方面的报道——尽管德国当时是日本的盟国——，日军以难以想象的疯狂的残暴手段，仅在数日之间便杀害了南京约五万名平民。绝大部分都是难民，其中有些受到外国人管理的收容所的保护。

一九三七年岁暮到一九三八年的新年，我是一个人过的。炳南在汉口，终于得到了久盼着的杨将军的消息。将军打算十二月中旬回国，随即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任职。为了倾尽全力对日抗战，将军提早结束在国外的旅行。

首都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的中央机关迁到汉口。炳南和杨夫人葆贞，在汉口望眼欲穿地等候杨将军归国。一九三八年一月底，炳南在给我的一封短信中说，谁也不知道杨将军现在的住处，只听说是某地“休养”。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谓“休养”，是指杨将军已被蒋介石逮捕了。杨将军和他的战友、少帅张学良一样，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受到监禁。

我并没有打算搬到汉口去。军事形势是令人不安的，日军不久定会向长江中游地区进击，中国政府的中央机关也就不得

不更往西疏散吧，这种不安之感是许多人都有的。炳南在给我的信中，批评了我的焦躁情绪：

“我与周恩来曾谈起你，他说，你在上海的工作很能起作用，现在还是留在上海的岗位为好。他这样说可能会令你很失望，不管怎样，希望你能忍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出发往内地去。我在上海这几个月，一点时间也没浪费，知识得到充实，这些日子的宝贵，实在是难以衡量的。这首先是有赖于可以称为我的老师的新西兰人——比他更好的老师，大概是不能找到的吧——，他名叫路易·艾黎。其时他担任公共租界工厂的监督，对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社会地位，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自一九二七年起路易就住在上海，但无意成为“中国通”，他以为自己既无能力，又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当他谈起那些虽然在上海住了多年，却对他们家附近的中国人的生活一无所知的外国人时，总是嗤之以鼻。

杨树浦的贫民窟，南京路两边有如迷宫一样的错综复杂的小弄堂，靠近法租界西边徐家汇有如村落一般的居民点，对这些地方，路易都是非常熟悉的。每年，他都选择一个不同的省份去度假。他除了能流畅地说标准的中国话之外，还能说多种方言。

和他一起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这种“探索旅行”对我来说是无可比拟的现场教育。路易熟悉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手工业作坊，熟悉在那里或曾在那里劳动过的数千名工人的身世，因为许多工厂现在已成废墟。然而，他站在一堆瓦砾前面，感慨万分地给我讲述那里过去的情况。

“这里原先是纺织厂，”一次，他对我这样说。“我曾经建议这个工厂的厂主购置现代化的煮茧设备，结果没有成功。这个工厂有几百个八、九岁的女孩子，每天十二小时摇摇晃晃地在满是

沸水的煮茧桶旁边，用红肿的双手去捞茧。如果动作慢一点，就会被认为是不中用，所以许多女孩子都被烫伤了。工头一边不住地打她们，一边让她们干活。这些女孩子都是包身工，几乎是不许离开工厂外出的。下了班，她们就在茧桶旁铺上一块脏布，疲惫不堪地倒在上面，睡得如死一般。第二天清早，同样艰苦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路易向我说明了包身制度，那些被称为包头的人，是无业游民中间的坏蛋，几乎全都是黑社会组织“青帮”的成员。他们出没在江苏、浙江一带的农村，物色贫苦农民的女儿。他们并不说买，而称为“订合同”。包头付给那些贫苦农民一点钱——如果正值周期性的荒年，出价便低得可怜——，这些钱日后由他们的女儿付还。农民父女都不识字，对合同的内容自然无从判别。而要完全按照合同上所订的义务去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包身女工的月薪，除了至少有一半被扣除以外，包头又欺骗她们说已付了巨款给她们的父亲，可是要付的利息实在太高，所以她们负的债也越来越多了。包身制的女工事实上只不过是奴隶，她们被骗入工厂之后便再也不能重返故乡了。

包头每次从农村带三十名或更多的女孩到上海，有几分姿色的，随即被转手卖给市内的妓院。其余的女孩便被分发到各工厂。

在工厂，包身工的住处只是破房，地板便是她们的床。房子里满是虱子、臭虫。但即使是这样的住处，她们也只能用十二小时，另外的十二小时供交替班的另一批女工用。

路易认为，被许多人赞赏的女工宿舍制度，实际上与监狱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女工宿舍制度的含义，无非是在三年里，女工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中。包身工的月薪，四分之一被扣除作

为住宿费，四分之一被厂方征收，四分之一要交给经营女工宿舍的机构，实际上到她们手里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三年合约满后，原来与她们订合同的“公司”还有把她们卖与他人为妻的权利。

我的朋友俞志英，多年来为基督教组织基督青年会在上海纺织业的女工中进行工作。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她曾任上海总工会妇女部长。她告诉过我下面的事情：那些包头中不少人都各与由他们介绍来的几名女工结婚，其目的是除了介绍费的收入之外，每月都可以有定期的业余收入。每逢发薪日，“丈夫”就等在工厂门口，把几名妻子的收入大部分都装进自己的腰包。

公共租界以西，是日军占领区。该区重新向外国人开放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路易邀我一起到日占区去散步。我们怀着做恶梦一样的心情，在瓦砾遍地的街上走着。到处是断壁残垣，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这些死寂的街道，如果勉强说正在修复的话，也只限于大街。在日军监视下，中国苦力正在做修复作业。不过，由于日军禁止埋葬战死的中国士兵的遗骸，苏州河南面的原野，尸骸遍地。这里是日军曾集中猛轰的地方，尽管炮火极为炽烈，中国军队还是据守了数周，阻挡日军渡河。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紧握着的拳头，那里可以看到腐烂的胳膊和髑髅。许多士兵的尸体，都已无从辨识，只剩下军服的布片和标志。这一带的原野，野犬成群，贪婪地啃咬着尸体。

对我来说，还有比这更为可怕的情景，那就是在腐烂散乱的尸体近旁，人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他们看也不看尸体，对他们来说，这已是司空见惯。在断壁残垣旁，农民们尽量避开尸体挥锄掘土，他们怎么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掘土的时候，他们的家属围坐在只剩下烧焦的木桩的家门前，生火取暖。

我们离开了充满死亡和恐怖的世界，又回到租界。这里，酒吧与夜总会林立，一片喧哗嘈杂。紧挨着高高的公寓和宫殿般的商场的，是贫民窟。贫民窟的小弄堂里，满是阴暗的小工场和街道工厂，密密麻麻的住房，简陋得就象临时搭成的棚子。

不过，上海还有另一个世界。那是法租界西南面的徐家汇。这里只有许多由难民开设的小工场还能使人联想起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话，那简直使人感到置身于某一个内地农村的和平环境之中。在属于教会的绿树成荫的花园中，耸立着高大庄严的教堂，教堂周围是一排排漂亮的住宅。市场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摊档鳞次栉比，有卖甜食的，卖馅饼的，卖烤烧的，还有出售各种各样日用百货的，到处人头涌涌，挤满了顾客。大概是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连体双胞胎，用酒精泡在玻璃容器里供人观赏，几个农民站在容器前看得目瞪口呆。大概已泡了不少时日，双胞胎已经有些变形了。

村子后面，是宽阔的菜园。沿着水渠的小路，农家的瓦房一家连着一家。有一处是一个中国人祖先的墓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在那刻着故人的名字的墓石周遭，新松繁茂；在墓旁我经常遇到的唯一生物，是一头又黑又大的公山羊。

路易和我，星期天远足时常常到徐家汇这个安乐窝来。在古木的绿荫下休憩时，路易给我讲了许多他的往事。他的联想丰富，简直取之不竭。他谈到上海，谈到往内地的旅行，还谈到他的两个儿子……。路易在中国收养了两个男孩子。其中一个是从远省人，他的家人在一九二八年的饥荒中都饿死了，路易便收养了他。另一个是河南省人，和他的难兄有着相同的命运。路易不但让这两个孩子受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带他们到过新西兰。路易对他的这两个儿子比什么都要自豪。

中日战争期间，路易又收养了几个孩子。有一次，一位妇女为了要到游击区去找她丈夫，便把她的四个孩子托付给路易。这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六个月，最大的也不过六岁。为简便起见，路易把他们叫做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九五〇年，四个孩子都长大了，路易把他们送还给幸福的双亲。

有一次，我建议路易收一个养女。他说，抚养女孩子是很难的，再则他是个单身汉，不想被人怀疑收养婢妾。

每逢星期天，路易的家一早便热闹起来，来客是穷学生和小职员，他们到路易的家来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痛痛快快地洗一个澡。

来客中有一位是循例必来的上年纪的男人。此人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的印象中，他那磨得破烂不堪的外套和大衣，是连一粒钮扣也没有的。他切一截小树枝或者用捆东西的小绳来代替钮扣。那白发稀薄的头上，总是包着一条黑色天鹅绒的头巾，就象上年纪的农妇包着的那种。路易向我介绍这个人：“J·J·潘出生在上海也算得上是富裕的家庭。他在欧洲生活了近三十年，找到自己合意的地方，他便随意地在那里住一个时期。”

潘与说英语的人，便谈莎士比亚和赫胥黎，与说法语的人，便谈拉辛。他的英语说得很好。他最擅长的是中国历史，讲起中国历史来便兴致勃勃。

在二十年代，潘的自由和生命常常受到威胁，因为他为当时还是革命政党的国民党献出了一切。可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他不求功利，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取得特权的“老党员”的队伍。他常常出于空想订一些不能实现的计划，并以此为乐。只要是出于行善的目的向他求助，不管对谁他都无私地慷慨解囊。后来，

他接受我的建议为军医院服务，我对他的为人就更了解了。在军医院里，他为文盲的伤病员代笔写信，送水果和好吃的食物给他们。有不少想回乡而缺乏盘缠的人也受到他的资助。

一次，我自己甚至也“接收”了一个受路易保护的人。“威尔金斯小姐也是新西兰人，她曾以罗宾汉的笔名出过几本书。她身体有缺陷，又没有钱。但她并不退缩，为了写有关中国的书，她准备在上海住一个短时期，以便进行学习。”路易向我介绍了爱丽丝·威尔金斯，并请我让她在我家里住几个星期。

“她现在住在中国式的三流旅馆，”路易告诉我。“那个地方恐怕不能叫做旅馆，说它是妓院倒还合适。领事馆知道她住在那里，吃了一惊，让我劝她找一个稍为好一点的地方住。但她不听，说是到了中国就应与中国人一起生活。而且，她没什么钱，根本住不起一流旅馆。”

在爱丽丝·威尔金斯看来，我的家似乎是很有中国色彩的。于是她搬到了我家里。她在所写的作品《龙城》一书中，以十分令人喜爱的笔触，描写了我们家庭牧歌式的气氛。关于我，她说我是德国和中国的独特的混合物，她是这样写的：

“她是希特勒国民中的一个，又是被认为唯一纯粹的亚利安人。只有一点是不相称的：无论如何，她对希特勒无法忍受。她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她是头脑明晰、稍为有点自大的东普鲁士的德国人，热情向上；另一方面，有时候她是个中国式的急进派。”

爱丽丝到我家住了数周后，她说对中国的生活已经适应，到内地去旅行也不成问题了。我劝她说，汉口被炸，联系也很不便——只是避而不谈她那残废的腿——，还是不要去了。但这只是徒然，她终于出发了，不久便到了汉口。

在汉口，她要求上前线去，使新闻局局长非常为难。因为要上前线的话，必须有黄鼠狼一样灵巧的身躯，空袭时可以在火车和汽车上跳下来，藏身在安全之处。一个身体残废的妇女却偏要作一次这样充满危险的旅行，谁能负得起责任保障她的安全呢？

爱丽丝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并作为唯一的外国女记者亲眼目睹了徐州沦陷的实况。后来，她企图照原路返回中国军队的阵地时，就有麻烦了。我想，爱丽丝毫不理会战争与前线，一跛一跛地沿着铁道西行时，一定会使日军呆若木鸡。她被日军逮捕，多次受审。据她说，审讯结束后日军把她送到青岛，她从青岛又重返上海——就这么简单！

日军向来认为外国人都是不与他们合作的，于是我便问爱丽丝，受审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你问我说了什么吗？”她若无其事地答道。“什么也不说，只是笑。”

原来如此。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精神病患者的恐怖简直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正是由于日军认定爱丽丝是个疯子，她才凭此得以平安无事，从日军阵地满不在乎地向中国军队阵地走去。以间谍嫌疑被捕，这时候还勇敢地面对强大的日本皇军大笑，正常的人怎么能这样做呢？日军一定是这样想的。

爱丽丝写的有关在中国的经验的书，她后来从英国给我寄来了。收到她的书数年后，听说她自杀了。

制定合作社计划

在路易那里，出乎意外见到一位老相识，真是又惊又喜。他

就是埃德加·斯诺，他的聪明、漂亮、而且很有美国人特点的夫人也和他在一起。

我们各自都有很多体验，谈起来便没完没了。在这长时间的谈话中，一个很有前途的实验计划逐渐形成了。在上海市郊由难民开设的许多小工场和作坊，使路易产生了一个想法：内地是多么需要这些人材和他们的专长呵！

“战争还要延续很长时间，”路易说。“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在上海生产的物资，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损失。因为不仅是工业化的东部地区，而且与中国内地连结的交通线，也将会落到日军手中。在日军还未占领、工业水平低的地区，工厂、熟练工人、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路易常常到中国各地旅行，他知道哪些地方有尚未被利用的资源。他看一眼地图，就可以指着说：“这里出煤出铁，那里有陶土。西北部有很多羊毛，制成毛毯可以满足全军的需要。可是，大凡有资源的地方，却没有熟练工人。这里有几千名难民，有的流落街头，有的在自己经营的极小的手工场里过着贫苦的生活。这样下去，他们都只好替日军工作。”

中国的企业家中，只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内地投资也是上算的。有几个纺织厂疏散到了西部地区，在四川省也新建了几个国营工厂，但光是这么一些是不够的。路易热衷于创办某些新的事业。

路易对中国工人的受剥削，以及雇主们对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等，知道得简直太多了。他最关心的，不只是工人人们的劳动，以及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生活的做法，他还关心工人对劳动的兴趣，给予他们参加管理的权利。

我们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工业合作社。在由路易和斯诺

两人拟订的方案里，展望了中国的工业生产，提出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的建议。这个方案是积累多年实践经验的路易精心制订的。他在方案中预测，难民所能提供的只是劳动力和知识，至多还能提供少量资金，为此，初期的合作社将会是很粗糙的。但随着工具和机械的调配成功，革新的生产方法将可以在实际中应用。

方案中特别强调合作社的组织意义。这种合作社组织的萌芽，在过去虽曾有过，但除少数例外，都以无声无息而告终。原因是绝大多数都缺乏有能力而廉洁的领导人。合作社还遭到保守分子——包括地主、商人、掌军权的人——的破坏。在那些保守分子看来，工人也享有决定权，利润不再高于一切，这都是不合情理的；这与革命一样，是“共产党”的东西。

计划是制订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同盟军。实现这个计划要有资金，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同盟军。

在上海要找到这样的同盟军并不太困难。孙夫人最先赞成我们的计划，她深受感动，介绍她的弟弟宋子文给我们做朋友。经商谈后，宋子文以个人的身份答应给我们这一计划以财政援助。他忠告我们，最好取得蒋介石的正式同意，可以通过他的两个姐妹，即蒋介石夫人美龄和孔财政部长的夫人霭龄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正式的许可文件，就易于得到更多同盟军的协力。

外国人开始对我们的计划表示感兴趣。最先报名参加我们这项工作的外国人，是上海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的秘书。后来，在新成立的促进工业合作社委员会中，他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位年轻的秘书就是约翰·亚历山大。他确信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凯尔爵士也会支持我们的计划。果然如此。

阿奇博尔德爵士其人，和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英国大使完全不同。他的举止并不盛气凌人，也很少受传统观念或偏见的束缚。相反，他却是个不抱成见、开朗、有教养、思想新的人。他并不象驻在中国的许多外交官那样，从内心里就看不起中国人，所追求的只是政治上的表面东西。

后来，在战时的重庆，我常有机会受到阿奇博尔德爵士的招待。这时候，我再次得以证明他是个不怀偏见的人。由于我是德国人，而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他的下属对我的不满溢于言表，但他对我却毫不介意。

与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非常详细地讨论之后，大使答应对工业合作社的计划给予全力支持。这是我们最初所预期的。经大使说项，路易辞去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公职。此外，大使还在汉口会见了蒋介石及其夫人，他们应允尽力使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得以实现。

一切事情都以对中国来说是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着。路易被召到汉口，担任技术顾问。他成功地争取到很多有技术和组织才能的人为这项新计划工作，这些人也和路易一样，宁肯放弃薪俸优厚的职位，愿为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于政府的财政援助和来自海外的捐款，我们得以在短期内建立起工业合作社的体制。

动身去自由的中国

一九三八年夏天，汉口仍然受到日军攻击的威胁。每当我收到来自这个临时首都的信时，早日前往汉口的心情就愈加迫

切。“在汉口这个地方，非做不可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来信这样说。“请你设法尽快来！”艾格妮丝告别延安数月后，便到达汉口前线。她从在汉口的新的体验出发，尽一切可能，想出各种方法，为改善伤病员的医疗条件而奔忙。

也许是朋友们替我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吧——事实上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两人也在这个时候到了汉口——不知道是炳南还是周恩来，终于同意我去汉口。上海的家，仍维持原状。由于汉口的形势非常动荡，如果日军继续进击的话，我们转移到什么地方住好呢？那是难以预料的。

因为我早料及此，便作出对策。爱丽丝·威尔金斯回国之后，我收留了一个中国朋友住在家中。她的家在华人区，已遭战火毁坏。她叫胡关露，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关露是北方人，说的是中国最漂亮的、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北京话。炳南得知她住在我们家里，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一定能说漂亮的国语！可是，他却忘了杨妈对孩子仍然有着绝大的影响力，黎明最初说的话，带着陕西方言固有的那种地地道道的粗野的土腔。

关露是个可爱的、个性有点内向的女孩子。她常常静静地写诗。她对自己的职业并不很喜欢，只是因为靠写诗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如此。她的家人住在北京，但她并不想回到使她感到很受束缚的家人的身边。和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她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虽然她在大庭广众之中会显得羞涩，但如果请她帮忙办事的话，她会有始有终地毫不畏难地干下去，很负责任。

我给关露找了几个想学中国话的外国学生，这对她那份微薄的教师薪俸多少有些增补。当我问她，是否有意继续在我家住

下去时，她高兴得要跳起来。这不只是因为有了安静的住处而感到安心，而且是因为得到我的信赖而欣喜。

胡关露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女孩子，不过，她的心肠太软，每受人请托，总不愿说个不字。一九三九年初，我回到上海一看，家里住满了人。那都是她在战争中无家可归的朋友，求她收留暂住，她没有拒绝。谁知这些朋友又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领来，逼得关露只好住进屋顶下的阁楼里。当我回家看到她时，她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间小房子里，好象觉得很抱歉。

我的行李很快就收拾好了，我只带走最必需的东西，因为这毕竟是一次去“前线”的旅行。其余的一切东西全都留在上海。我以为上海比我准备去暂住的武汉要安全。其实这种想法也是多余的，后来，我留在上海的东西也全都丢失了。不管是留在上海还是带去武汉，结果都一样。

乘大轮船出海，是杨妈有生以来的第一遭。我们不得不采取经过香港的迂回路线。通往内陆的道路，全都被日军占领了。从香港到汉口，可以乘飞机，也可以坐火车。铁路虽然每天都受到日军的轰炸，但很快就修复通车。

对杨妈来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遗憾的。这就是，未能对她的家人讲讲大轮船的奇妙。那在海洋上浮着、象大房子一般的轮船，准会使他们觉得惊奇的。如果她的家人听到杨妈的描述，大概会这样笑着回答吧：“你是到过外国（香港）的，一定以为编一套出来我们也会信吧！说什么上海有十五层或更高的大楼，我们还姑且相信，你说的那艘有几层楼高的大轮船，竟然可以浮在海上，这不是说得太悬乎了吗？”这是因为中国西北部河川的交通工具，除了用兽皮制成灌满空气的小艇之外，别的一无所有。

中国乘客中，有逃离动乱的上海前往安全的香港的富商们，也有和我一样前往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的青年人。两名年轻的姑娘说，她们要到红十字会去工作。一名上海电气公司的工程师，为了要到重庆或桂林工作，放弃了他在上海的那份美差。我想起了路易·艾黎办的合作社，便建议他与路易在汉口的委员会联系。

同船的中国人，不管是有钱的“难民”，还是年轻的爱国者，得悉我决心到武汉去，都感到很引人注目。而外国人却不住地摇头。“外国的妇女、孩子正从汉口撤退，你为什么反而……”他们象是在批评我的这一行动似的。“你们说的是外国人，可我现在是中国人呵！”我回答说。

望见香港，我被它的罕有的景色深深打动了。我想谁都会这样的吧。站在这个众水交汇、条件优越的天然港眺望，只见石山的山腰象佩着珍珠项链似的闪闪生辉，黯黑的海面上，帆船的灯光象鬼火一样忽明忽灭；如此夜色，哪怕只看上一次，也会令人终生难忘。

可是，当我把目光移到维多利亚海峡的对岸，遥望与大陆相连的殖民地九龙埠时，旋即嗅到一股战争的气息。各个船坞都泊满船只。各种国籍的货船正以最高速度在装卸货物。一艘船尽快装卸完之后，等候着的货船随即补上。各个码头上都堆满了木箱和各种机器。扯起成片的帐篷，算是临时仓库。成群的仓库虽然偌大，也还不能容纳准备运往中国大陆的大量物品。

战争使香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外国商人和当地商人的买卖都兴旺起来，香港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香港象磁石似地吸引着中国的资本。那些认为投资在内地是危险的有钱“难民”，都从中国的北部、中部各地汇聚到香港来。

中国的好几个省政府，分别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购买和输送战争必需的物资及其它物品。各个省的政府，甚至每支独树一帜的部队，都拥有可以自由使用的资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各自调配必需的物品，这是中国当年各地形同割据的遗痕。

事实上连八路军也在香港开设了独立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相识廖承志！这样，廖承志母子俩又能生活在一起了。何女士这时已经回到了她的故乡香港。

我和孙夫人重聚，是在她的寓所。那所小房子位于山顶，从上面眺望港湾的景色，非常优美。孙夫人在朋友们的建议下离开了上海，并非为个人的安全——她从不把个人安危列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只是因为她在香港比在日军包围下的上海更能为中国效力。

孙夫人在香港，过的也是朴素而不为人所注意的生活。她的住处很简朴，和她在一起的，只有忠实的佣人李妈。李妈常年和孙夫人命运与共。一九五九年，我在北京与孙夫人会面时，李妈也还和她在一起。

战争爆发以后，孙夫人与她势力很大的娘家——宋家的关系有了相当改善，这是因为战争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命运，但两者之间的违和之感仍然颇为强烈，要一下子达到和解是很难的。直到精力充沛的大姐霭龄来到香港，才真正实现和解。一九四〇年二月，宋家三姐妹初次相聚一堂。她们已有十年没有相会了，这次在香港的团聚，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接着，她们又一起到四川去旅行，受到数千狂热的群众欢呼。这三名美丽聪明的妇女，对中国历史都有影响力，这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因此，群众把她们三人当作为自由而战的祖国终于团结一致的象征。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总裁。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施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

他的反复无常的态度，从下面的实例可见。他最初和孙夫人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建立了关系。一九三八年，他很乐意地担任这个组织的总裁，可是，当政府批评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政治立场后，他便立即辞去了总裁的职务。

我从“保卫中国同盟”创建时起便是它的成员。这个组织的条款规定它不含有政党的色彩。它的任务，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与外国各对华援助机构联络。因此，“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委员会的任务，是与正在进行战斗的地区保持紧密的联系，就这些地区需要什么救济物资，受援地区已经收到的金钱和物资实际上如何使用等问题，汇集情况，定期作出报告。在这一宗旨下，后来出版了名为《保卫中国同盟简讯》的刊物，我也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孙夫人在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职务时，曾提出一个条件，即要求该组织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组织原则。也就是说，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区域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就包括在受援范围之内。

华北和华中的游击区是急需援助的。这不仅由于日军的侵略使该地区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它们几乎没有得到其它救援组织的支援。为此，“保卫中国同盟”认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不

正常状态。“同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原因就在于此。

尽管有人非议“保卫中国同盟”，但是，许多中外著名人士，比起对“同盟”的批判来，他们相信的还是孙夫人的公正性格和原则性。托马斯·曼，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赛珍珠，保罗·罗伯逊，克莱尔·布什，以及孙博士和他原先的夫人所生的儿子孙科，还有著名的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执行委员。华侨尽力援助这个组织，孙夫人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她的丈夫孙博士，深受华侨的尊敬，而孙夫人始终不渝地忠实履行亡夫的遗教，因而很久以来便为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华侨所尊敬和爱戴。

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都纷纷建立了对中国的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上海委员会，都有许多著名的中外人士参加。

香港委员会中最积极的是医疗服务中心主任的夫人希尔达·司徒永觉。这个殖民地里的保守的英国人对她并无好感。这些人把她叫做“红色的希尔达”。这不仅是因为她有一头红色的亮闪闪的头发。在香港，在那群死气沉沉、贪慕虚荣的人的社会圈子里，希尔达这个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妇女带来了一股新风。她有敏捷的组织能力，又能集中精力去做目前急需的事情。她唯一的缺点是过于直率。为此，她和中国人的合作有时候搞得不好。中国人是善于以间接的方法表达自己意见的国民，他们喜欢采用迂回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希尔达参加各种中国人团体的活动，并和她的丈夫合力推行一系列“急进的”改革，例如成立计划生育咨询处等。而这一切也同样引起香港的“中国通”对她的不满。希尔达是“援助中

国红十字会”这个外国人组织的秘书，同时又是“保卫中国同盟”的秘书。这些组织如果没有她的积极协助，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里大概是不能够展开如此广泛的活动吧。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日军进攻香港为止。

自己只承担赞助者的责任，实际工作却委诸他人，这已经成为了香港社会的通常观念和习惯。希尔达却不能满足于此。她执拗地追求某一目标，为求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她不委托于人，而是亲自用电话与人商议，或四处奔走。那些尖酸刻薄的家伙，竟然断定她能够取得这样多的工作成果是由于笼络带点古风的自由主义者、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所致。

司徒永觉夫妇坚决反对种族歧视，不断为中国人享有平等权利而努力。支持他们夫妇俩主张的英国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活动非常积极。他们夫妇俩非常得力的盟友之一、香港的主教罗伦德·O·霍尔博士，因为参加了各种中国人的组织，并与他们积极合作，被扣上“危险的过激分子”的罪名。

“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委员会的中国人成员，除八路军在香港的代表廖承志外，还有我在上海见过的廖承志的姐姐朱迪。

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员，与孙夫人就到汉口接受任务的问题商谈过多次，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到汉口去。我乘坐的飞机，从几乎听不到战争的脚步声的地方，繁荣的海滨城市香港出发，只用了几个小时，便到达处在炸弹和战火威胁下的汉口。日本人还能让我们在汉口呆多久呢？

六

汉口

前线城市相互对抗的潮流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十个月里，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是战时中国的首都。在这多事的十个月里，这个临时首都汇集起一股中国国民的抗战浪潮。在这股比预想的更为汹涌的反抗怒潮冲击下，亲日派政治家们和德国大使劝说中国政府对日军让步妥协的一切企图均以失败而告终。

汉口是中国人统称为武汉的三个城市中的一个。它位于长江北岸，汉江的河口。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汉口被列强视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加以建设。现代化的大厦与银行，巨大的仓库，那些有美丽花园的别墅和高级旅馆，都是汉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不管什么时候看上去，汉口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中国的城市，不如说是国际性的都会。即使在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在一条条宽阔的街道上，现代化的建筑和华丽的商店也是相连并立。但与繁华街道相邻的，却是又窄又脏、乱七八糟的地区，路的两旁尽是土房子和小手工场，挤得密不透风。

汉口原先是五个国家的租界，一九三八年时只剩下法租界。汉口的江岸仍然停泊着各国的炮舰，这是外国人为了让人感觉到，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他们防卫的对手不再是中国人，而是装备精良、好战的日本军队。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租界，拥有一支由安南人组成的小部队及

一支由各种国籍的志愿兵组成的外国人部队。人们认为日军总不会空袭租界，侵犯租界内的私有财产；这种看法虽则是一厢情愿，但也并非绝不可能。为此，那些不管干什么都想赚一把钱的人，便在租界里买房子，或者租房子，如果办不到的话，也要想方设法哪怕是租一个房间也好。

武汉三镇中最为古旧的汉阳，外国人几乎是不去的。而要到汉阳去，只需乘渡轮或舢舨渡过汉江即可。下层人士、包括最贫困的中国人则生活在汉阳。他们非常拥挤地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过着悲惨的生活。一九三八年夏天，数千名汉阳市民惨死于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之下。

武汉三镇中最大的是武昌。武昌在长江南岸，绕蛇山而筑的城墙长达十一公里。武昌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地方，中国由此而成立共和国。我到达武汉时飞机降落的机场便在武昌。在下飞机的瞬间，象是给我发出信号似的，我多少领略到前线城市的气氛。空袭警报响着，我不得不稍候片刻才能离开机场。当时我只想着炳南，别的都没有细想，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在千钧一发之中逃过了大难。

武昌是以广州为终点的一条重要铁路的起点。尽管这条铁路几乎每天都受到轰炸——到七月为止，每一公里的线路受到一百六十颗炸弹轰炸——，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为止仍然可以通车。当时，长江上没有桥，江的北岸则是京汉铁路的起点，直到一九三八年夏天，从这里仍然可以通往陇海铁路的中转站郑州。

当时，武汉有一百万人口，近郊有好几个大的冶炼厂。还有武器库、几个纺织厂以及几千个各种各样的工场。到一九三八年夏天时，武汉是还在中国政府手中尚未沦陷的最大工业中心。

在这里，各种政治潮流错综复杂地对峙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与背叛、怯懦、漠不关心在搏斗。当时，爱国力量仍然强大，而且抗战力量的统一看来也得到保证。但是，小小的裂痕已经出现，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心怀疑虑地开始探测对方的动态，这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就是说，双方都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看看对方是否破坏为使统一战线得以实现而订出的各种协定。国共两党已长期敌对，相互的不信任感也很强烈。双方有许多根本分歧之处，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和解的。

不管内里怎样，从外表看来，当时的汉口，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观点，却能共存于一处，显示出一种不寻常的状态。在各种招待会、集会、会议和宴会的座席上，可以看到政治倾向不同的著名作家、科学家、教育家的身影。在上述各种公开场合，总少不了发表冗长的千篇一律的演说。如果单从这些演说来判断时局，忧虑和不安便是多余的。

可是，私下的谈话比公开的演说有更多真实的东西。

私下交谈给我的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相互矛盾的东西也不少，我之所以能够把从谈话中得来的零碎材料迅速加以整理，从而对时局有明确的认识，首先得力于炳南。由于炳南在周恩来的身边担任“参谋”工作，他的工作与救国会及其它政治组织有联系，与各个阵营的人都有接触，使我也受惠不少。

我在工作上有联系的仅限于两个组织。其一是新闻暨宣传办公室。我在上海写的小册子便由这个单位出版。我受该办公室的委托，继续与他们保持合作。另一个组织是红十字会，我的任务是把红十字会的活动情况报告给“保卫中国同盟”。

杨妈替我们很好地照顾黎明。我们两人办完事回到旅馆时，

黎明早已入睡。我和炳南便悄悄地交换当天的见闻。对我堆积如山的问题，炳南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

一天，炳南带我到中国共产党暨八路军在汉口的办事处。他说，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延安时代的老朋友。

几名士兵把炳南和我领到在旧日本租界一所空荡荡的房子里。这些士兵帽上的红星已不见了，代替它的是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不过，他们在延安时那种生气勃勃的农民表情一点也没变，他们是快乐的，公正无私的。军官和士兵都穿着不佩官阶的棉制服。制服是灰、蓝、土黄的混合色。

“欢迎你来汉口！”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喊。定睛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他衷心欢迎我的到来。自从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天都有许多客人来访，其中有的是外国记者。他们的目的，是要从周恩来的口中，或者从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的博古口中，听取共产党方面对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意见。博古的英语说得很好。

甚至象英国女作家弗雷达·阿德莱一类以反共著称的外国人，也受到友好的欢迎。共产党方面的这种做法，使他们大吃一惊。这位阿德莱小姐在她所著的《战时的中国》（一九三九年伦敦出版）一书中，有如下的叙述：

“中国的共产党人，与英国和美国的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并不偏狭，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家。看来他们并不理会我是否遵从党的‘一贯路线’。他们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历史的革命者。为了达到解放中国人民的目的，他们曾付出了许多牺牲；现在他们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解放极为关注，我想他们不会单纯是共产国际的工具，不会盲目地执行它的命令、

听从它的判断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恐怕是：我是不是中国的朋友？至于我是不是苏联的朋友，则另作别论。”

喝着淡淡的茶，嚼着花生，我们谈论起中国的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各种情况。博古向我详细地询问在上海的中国人情况。他那一头不驯服的头发，那一对藏在大大的角质眼镜后面的乌黑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此外，前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王明，以及我在延安时就相识的叶剑英将军等也提出许多问题。我还认识了年纪较大、看上去身体不太健壮的吴玉章。大家都充满敬意地称他为“吴老”，因为他是共产党内“五老”之一。吴玉章在一九一一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四十七岁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已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吴老，被任命为人民大学的校长。

吴老给我带来了另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的问候。这就是高龄的沈钧儒先生，我最后一次和他会面的地点是在苏州狱中。“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吴老微笑着说。“现在，他可以无阻挡地在汉口为实现救国会的目标而工作了。他是不知疲倦的，他带领着学生和各界人士代表到前线慰问，当他把赠品或旗帜交到士兵们手中时，受到热情的欢呼。”

当我向老朋友们报告，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在上海的中国人的爱国心毫不动摇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同时显露出满意的神色。

“即使只看这一点，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了吧！”周恩来自豪地说。“我们的人民，绝不会向日本军队投降的。即使是沦陷区，也是如此。”

“在上海的中国人中间，有的人与日本军队合作，这也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博古并不隐瞒这一事实。“这种汉奸叛徒，什么时候都会有的。我想炳南已给你讲过吧，我们这里也有

人想和日本军队拉关系还没有拉上哩！他们中间有几个还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博古似乎很难过地补充说。

我随即明白，他指的是汪精卫。汪后来投降日本人，被捧为由日本人一手炮制的沦陷区亲日政府的首脑。此外，博古所说的高官大概还指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对那些热烈希望参加爱国活动的青少年鼓吹恢复儒家的传统；又有人说，他甚至要年轻人以希特勒德国的青年为榜样。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并不象博古那样悲观。她协助由蒋夫人创立的“中国妇女支援国防会”的工作。邓颖超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争取更多的妇女来参加这个组织的范围极为广泛的工作。

“我们常常不分昼夜地工作，”邓颖超富有献身精神地说。“不过，要做好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妇女们的合作确实是很出色的。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基督教徒还是共产党人，不管是持有新思想的人还是保守的人，我们妇女现在考虑的，只是怎样做才能好好地配合前线。”

炳南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旅馆里找到了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间，这真是个奇迹，因为这时候汉口的房间极为不足。我们的住处旧在德租界，这里离被认为是安全地带的法租界不远。炸弹几乎都落在武昌和汉阳，所以即使遇到空袭我们仍留在旅馆里，当高射炮撕裂的轰鸣和炸弹的沉重爆炸声响起时，我们则在屋顶花园上观察敌机的情况。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日军的轰炸并未取得成效。如果日本人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一般市民的士气低落的话，那么他们是打错了算盘，这种情况后来在重庆也可以得到证明。重庆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特别是在夏季，每天都受到猛烈的轰炸。但市民的士气却毫不受挫。欧洲受空袭之际，人们恐怕也有类

似的体验吧。

“日军正好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美国的陆军武官史迪威上校这样说。史迪威后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看到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尸体和被炸坏的房子，即使是还没有见过日军的人，也对他们怀有强烈无比的敌意。”

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不久之后，欧洲也遭到同样的空袭，城市沦为废墟，难民和死者每天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九三七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在欧洲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惨剧——，还没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正因为这样，美国和英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然不断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可怕的破坏，使千百万人死亡或成为难民。

“现在有三千万难民，”一九三八年夏天已经有人对我这样说过。这个数字到这时恐怕又增加了不少吧。日军每次空袭和攻击，都造成成千的难民。仅武汉一地，便有五万人进入难民营。收容不了的难民，便和上海的一样流落街头。

一条生命获救了

抵达汉口不久，我便与老朋友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相见。我在上海时曾把他们想象得很乐观，现在看来，他们两个人都并非如此。他们正为工业合作社的创设以及怎样才能按既定计划走上轨道而大伤脑筋。

起初，这个计划进行得颇为顺利，突然间一切停滞了下来。

如果不是路易·艾黎，换上别的人，对或明或暗的各种方式的反对不予抗争的话，工业合作社的计划恐怕已完全流产了。

“‘圣人’根本不想把政府答应拿出来的款项拨给我们哩！”路易抱怨说。“圣人”是我们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取的外号。因为他常常以自己是孔夫子的后代而自豪。孔夫子就是大多数外国人所知道的孔子。

“也许，他认为合作社这个组织多半是‘左’的吧，”斯诺说。“大家合作，老板不赚钱，工人有合理的工资。以上这些，当然都难免有‘左’的嫌疑！”

路易指责，这是“宋家王朝”亦即宋的一家的阴谋。孔对他的内弟宋子文赞同的事情一概不予支持。蒋夫人则是蒋夫人，要她帮别人出一把力是很难的。

“为了使第一批合作社的建立不至于延缓太久，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施展一些外交手腕，”路易不平地说。

路易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有时徒步，有时乘舢舨，有时坐一辆破旧的小汽车，到邻近各省去，为寻找合作社的适当地点而东奔西走。他遍访难民营，寻求熟练的技术工人，又到军医院去召集那些恢复健康后不能重返部队的伤病员。我也常常和路易一起奔走。

一天，我们在途中发现有一人僵卧在马路边，奄奄一息。看样子是被货车压了。我们连忙下车，看看有没有办法救他一命，他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兵。只看他一眼，我心想：不好了！他的头盖裂开，满是尘埃的地上滴着一洼鲜血。不知道他倒在地上已多少时候了。

他还活着。路易和我把他抬进我们乘坐的小汽车，飞快地驶向军医院。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是我的老相识。他看了看那

个少年兵，然后，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你们的努力白费了。抢救恐怕是无济于事了。”

“可是，他还活着呵！”我不肯作罢。“再说，他是这样年轻，求求你，不管怎么也得救救他！”

我们约定明天再来才离开医院，但并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真是奇迹！”第二天，我们到医院时，主治医生说。“你们救起送来的那个士兵，现在还活着。不过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昏迷状态持续了四天之后，这个士兵令人深感兴趣的征兆开始显现出来了。违背一切医学上的原则，他竟然活了下来。他的伤口总算设法缝合了——除了头部，身上还有多处伤，大概是被压了多次所致——现在，这个看上去是面无血色、缺乏营养的孩子，正在生死边缘挣扎着。

到了第五天早上，医生找我们去。“他已经回复了意识！昨天傍晚，他张开了眼，手也动了动。过一会儿又陷入沉睡。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医生接着说。“他身体极度虚弱，现在还不能说已过了危险期。他现在靠的是人工营养，还要看看他能否自己吃东西来吸收营养。”

路易和我靠近床边去，他默默地以不安的目光看着我们。他的头全部扎上绷带，路易对他说了几句劝慰的话，他乌黑的眼睛里那种不安的神态便消失了，脸上泛出微笑。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瞬。

“我告诉他，救了他的命的是你们，”次日，我们到医院探望，照顾他的那个亲切的护士这样说。“不过，我大概不该这样说。他知道了以后便说，你们不来的话他便不吃东西。他认定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要害他的。我向他解释并不是这样，但结果是白费口舌。”

每天到医院去，对我们来说自然是有点麻烦的，但对受伤的孩子来说则是莫大的安慰，我们也就不感到有丝毫的麻烦了。到他已大体康复时，我们终于说服了他吃医院的人给他的食物。

他复原之快是出人意料的。由于日军接近，医院不得不在十月份要把病人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他的病体这时已能适应转移。他说他不想回到河南省的故乡。大概是怕回去的话又会再次被征召入伍。在路易的照顾下，他后来在西北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我想，他会在那里迎接战争的结束吧。

红十字会与前线

每天每天，都有几千人牺牲，但所能拯救的却只是其中一二，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和护士们，曾多少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呵！尽管条件不好，人员缺乏，但他们还是为完成自己的使命，与难以想象的困难作斗争。患着痢疾、疟疾的士兵，拖着衰弱的身子，好不容易来到车站或码头，按顺序轮候运送到后方医院去，他们的脸上浮现出无可奈何的茫然神色。到汉口后，这种情况我已见过多次了。当时，我已获悉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正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卫生机构而努力，他的这种勇气从何而来，我真觉得不可思议。

我曾和孙夫人约定，要尽快地把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以及伤病员和难民问题的有关报告，送给“保卫中国同盟”。为此，我决定经常参加前线访问团，与他们一起活动。外国记者和陆军武官们，对官方的新闻机关所传达的经过修饰的战况报告并不满意，大家都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到实地去辨别真伪。

炳南赞成我的意见，即必须到现场考察，为我的报告收集真实的资料。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汉口后，她一贯具有的充沛精力得到发挥，尽力扶助红十字会的工作。她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经长沙往前线去的小组，我当然高兴地答应了。黎明由炳南和杨妈照料，离家几天我是可以放心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战线从长江畔的九江之南，一直延展到江西省省会南昌之北。往南昌去，除了经过在武汉南面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别无他法。

如果是平时，乘火车从武汉到长沙大约六小时可到。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用十五小时乃至二十小时能够到的话，已经算是顺利的了。这是因为经常要让路给开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军用列车，客车只好停候。列车进入岔道，盛夏的太阳象烈火一样。在酷暑当中，无穷无尽的等候，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小组一行人，对酷热和尘埃，都若无其事地忍受住了。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此行是为访问新设在长沙的那所以培养红十字工作人员为目标的学校。她写下了许多调查提纲。史迪威上校和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交谈战况。为协助路易·艾黎的合作社的工作而辞去美国的通讯社职务的英国青年乔治·霍克，大概是自己、也为我们打发这一段无聊的候车时间，开始唱起歌来。

这一天，虽然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但我们乘坐的火车所驰过的地区并没有受日军飞机的轰炸。因此，我们不必慌慌张张地跳出那比车外的酷热多少总好一点的车厢，也不必在铁道旁的土堤隐蔽。

到达长沙，我们访问红十字会办事处，受到林可胜博士的热

烈欢迎。林博士是位年轻、看来精力充沛的医生。他是新加坡出生的华侨，著名的科学家。他在英国的爱丁堡留学，取得好几个学位后回国，战争开始时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战争爆发后，他立即抛弃优越的职位和科学家的生活，向政府要求参加抗战服务工作。我们在林博士处遇到的军部卫生部长卢致德博士，也是一位与林一样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人。我们倾听这两位医生的谈话，听他们谈到工作的内容和困难。我们在交谈时，也不知喝了多少杯茶，那纠缠不休的蚊子，用圆蒲扇驱去又来，令人不胜其扰。

卢博士不顾军部司令官们的反对，坚持贯彻自己的主张，并作出了很大努力。司令官们认为卢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职权。历来，卫生部的领导职务，都被视为领干薪不做事的美差，而由司令官分派与人担当。因而，卫生部长往往是担任司令官的某个将军的近亲，或者是他的亲信。很少有能力与职务相称的人当选。那些卫生部长就任后，与将军们一样，对卫生部应做的工作，大都毫无所知。已被司令官克扣了的卫生用款——此外，相当一部分还落到了卫生部长的腰包——，连支給称职的医生和护士的薪金几乎还不够，更不要说做别的事情了。

由于以上的原因，军队必需的优秀医生，很难征集到。据卢博士的报告说，中国有六千人具备医生的资格，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医生在前线任职。不过，他对医生们这种不合作态度，好象并不抱怨。这是因为谁要是在军队内工作的话，就都会知道：与官僚主义和上级的那一套丝毫不达下情的做法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不准备持续不断地作这种斗争的人，是不能在军队内工作的。更何况，薪俸很低，前线的工作又十分危险。

因此，经过一年激战，到了一九三八年夏天，中国全军仍只

有二百七十五所野战医院，共计二十二万三千张病床。而且，这些野战医院——我亲自看过的——，大多数只不过是肮脏的洞穴；衣衫褴褛的伤病员，大都只能睡在木板上或泥地上。连疟疾蔓延地区不可缺少的蚊帐也没有。为了补医生和护士的不足，林博士在长沙办起红十字学校，培养了几百名青年男女，分成小组把他们分配到前线去。“这个学校最初培养的几批医疗小组，”林博士自豪地说，“在前线都表现得很出色。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负了伤，损失不小呵！”

一九三八年夏天，已有五十八个红十字队活跃在各个战区。后来，我常常与这些红十字队见面。在许多地方，他们的工作，他们那种献身精神，在各种困难面前都不屈服的乐观主义精神，使我惊叹不已。

在往南昌去的崎岖的公路上，除了为敷急需匆匆用土填上的炸弹坑以外，看不到有其它战争的迹象。为了避开这些弹坑，我们的汽车司机不得不吃力地在公路上绕来绕去。如果说这一带的人是在恬静的和平环境中生活，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农民在宛似庭园、精心耕作的农田里干活；在村子的手工场里，可以看到铁匠在挥锤打铁，雕刻匠在雕木，还可以看到干其它零活的工匠。饭馆和小吃店里挤满了顾客，孩子们在乞丐和瞎子之间穿来穿去互相打闹。摆水果摊的小贩，高声叫卖石榴、桔子，招徕顾客。到处是话声、笑语，熙熙攘攘，闹成一片，好象压根儿没有打仗这么回事，或者好象战争只是在这个辽阔无比的大国的遥远的他方进行着一样。

到了南昌，情况就为之一变。这里到处都看得见明显的战争印记——受伤的人们、难民、一个称为红卍字会的佛教徒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在轰炸之后就出来掩埋尸体。如果没有这

个以古代的佛教符号、红色的大卍号作为标志的人们的劳动，在夏日炎炎的季节里，恐怕是难免发生可怕的传染病的。

南昌几乎每天都受轰炸。我们住的旅馆，就曾几次挨炸而损坏了。

“警报！”也就是空袭警报的叫声一响，迅即传遍四面八方。

“请你们尽快离开市区。旅馆附近有军事设施！”

其实，到市郊的田野，也并不比在被认为是危险的旅馆安全。我们所在的郊野，周围都是高射炮阵地，当日军的飞机接近南昌市上空时，我们的耳际便都是可怕的炮声、轰炸声。

空袭后的南昌市，满目疮痍。这种情景，是任何一个受轰炸的城市都一样的。每当看到这种惨状，我都非常难受，不忍正视。孩子在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母亲的尸体旁嚎哭；老婆婆在冒着黑烟的断壁残垣和家人的尸体旁蹲着，茫然无语；奄奄一息的负伤者在呻吟，这种呻吟声，即使多年以后，在睡梦中还会在我的耳边回响……。

战争的死难者，几乎都是贫民。有钱人早已逃到安全的地方去避难。可是，穷人怎么能逃呢？如果抛弃工作逃难，他们又怎么能得到每天仅可糊口的粮食呢？

我们离开南昌往北去时，天已入黑。由于夜间无需担心空袭，货车、驮物象山一样高的骡马、苦力，充塞于道路上。他们组成了一个弯弯曲曲的长蛇阵，缓缓向前移动。运送的货物都是供应前方的弹药和大米。混在这个队列之中的，是一小队一小队的士兵，他们相连不断地行进着。士兵们的背上，挂着麦秆编成的防空帽。来到渡口，流动的行列停了下来，大家都挤在那里，混乱得简直无法收拾。这个渡口的渡船非常原始，无法运载源源不断开来的队伍。

在黎明的晨曦中，伤病员的长长的队伍就象幻影一般地出现了。他们有的在战场上成了残废，有的患病，这些人的行列漫无止境。有许多士兵因为身体衰弱，寸步难行，便躺在路旁。那些患着疟疾的士兵，蹲在树下，等候热度减退。谁知道，他们还要等多久呢？

“那些伤病员，常常向我们红十字队扔石头，”在渡口碰到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担架队员对我们这样说。“他们每天、每天在路上象爬行似地来到这里，等了又等，仍然完全没有希望，使得他们心情烦躁，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靠近他们的身边，就会被当作敌人看待。”

我们来到这次公出的目的地——伤员收容所，那里活象一幅地狱图。那些军服上血迹斑斑的伤员，被炸弹炸掉了手脚，身体半裸着，他们被收容在几个临时搭成的肮脏的茅草棚里，挤得满满的。有的伤员两眼绑着的绷带，已经被血凝住了。他们夹杂在其他负伤的战友之间，一动不动地坐着。几乎听不到呻吟声，不过，从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显然是非常痛苦的。

“头部和腹部中了弹，便没有什么希望了，”在我们一行人默无言地走向汽车的路上，一位送我们的医生这样说。“即使是轻伤员，因伤口坏疽而死去的也不少。这里人手太少了，我们竭尽全力也只能用绷带给他们包扎伤口而已。想增加一些房子，至少搭一些帐篷多收容一些伤员，但连这也办不到，”他继续说。“日军的飞机，常常把这类房屋作为轰炸目标，伤员们担心受炸，不愿搬到医院去。”

运送重伤员，缺少必不可少的担架手；而且，野战医院数量少，而能够行走的轻伤员又不断涌来，野战医院已经住满。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要把伤员运到后方医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返回南昌的火车上，我们谁也不说话。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这一天的可怕图景。看到这些，又使我想起在城市里的官僚和靠战争发财的人们大排宴席、夜夜笙歌的情景，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离城不远，士兵们沾一身泥巴在战斗，他们却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毫无自肃之意，好象贫穷、痛苦、烦恼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真难想象，这些有教养的阶层，招待客人时如此殷勤有礼，但竟然是一帮冷血动物。他们这种对贫苦农民、苦力毫不关心的态度，实在使我难以理解。对为了糊口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来说，官僚富豪的同情简直是奢侈品。穷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受苦受难地活着，或者悲惨地死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抵达南昌后，谁也不说想睡一觉。“无所事事地等待空袭警报，还不如再次到前线看看好哩！”史迪威说。恰好，有一辆满载弹药的货车要开往前线，我们立即乘上，往当地驻军司令部去。一路上几乎连人影也看不见，我们着实感到有点不对味儿了。

傍晚，货车抵达司令部所在的一户大农舍，可是，蚊子大军也追逐而来，令人非常厌烦。当我躺到硬木做成的床上，支起蚊帐后，终于从传染疟疾的元凶、吸血的饿蚊大军的威胁下得到了解放。连续两天的奔波累得我一躺下便呼呼入睡，甚至两台不断地铃铃作响的电话机也没有把我吵醒。

第二天早上，我们徒步继续向前进发。虽然天气酷热，但士兵们还是要我们一刻也不停留地尽快行进。否则，就会被定时而来的日军飞机发现。我们和士兵们一样，用皮带下悬着的毛巾不住地擦脸上的汗。毛巾渗着泥和汗水变成了黄色。我们走的小路上，看不见其他的人影。坡度不大的小坡、流水潺潺的农田、青翠苍郁的竹林，都象被人们弃而不顾似地，一片宁静。在

这明媚的风光中，是一片可怕的寂静。谁也不说话。仿佛敌人在寂静中隐伏着，一张嘴说话就会有被敌人发觉之虞。

“我们的司令部每天都得搬一次家，”一位军官告诉我。“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唯一的防御方法。”

晚上，我们齐集在月色映照下的农家前，一边点着用杂草捻成的长绳熏蚊子，一边谈话。除了我们的话题与战争有关之外，周遭的气氛是恬静的。我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和平气息。恬静中唯一听到的，是蟋蟀的高亢而又传得很远的鸣声和夜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

难道只有我们才这样清晰地领会到这场战争是多么的疯狂吗？在离我们不远处的敌军，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有同感呢？我想，他们大概也在听着唧唧虫鸣，看着草丛中的流萤闪闪吧。一位军官把战死的日本兵的日记和信件拿给我们看。日本兵虽然缠着“千人针”的围腰布^①和护身符，但这些也不能使他们逃脱死亡的命运。许多战死的日本兵，在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中都表达了自己成为共犯者参与杀戮的厌恨，以及对残虐行为的憎恶。

我把木床搬到园子里，钉起蚊帐而睡。我这样做，比同行的友人在热烘烘的房子里睡要舒服得多。早上，一睁眼，我的床四周是一群小猪，鸡群象是很好奇似地啄着我的随身行李。几个农民的孩子也围上来，看着我洗脸。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大喊“飞机！”的声音，我们便分头跑去隐蔽。“不要进竹林！”士兵们对我喊道。“那个竹林被日军炸过好几次！”

我们一直等到下午很晚才踏上返回南昌的归程。躲避空袭

① “千人针”是日本的一种迷信，由一千名妇女在一块布上每人缝上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祝平安。

时，史迪威和贝尔登在细谈战况。霍克与我，在看一个农民割稻。我们一边看，一边不时地注视着隐伏有危险的蔚蓝天空。一听到隆隆的敌机声，我们俩便立即与农民一道，躲进杂草丛生的防空壕里。

归途中，由于从傍晚起公路上便充塞着人和车辆，我们的汽车也只得缓缓而行。在拖着疲乏的脚步向南昌进发的弯弯曲曲的行列中，有的是受了伤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想，即使能让几个伤员乘坐我们的车也好。于是向司机提出要求，却被他很干脆地拒绝了。

“如果停车的话，会有二十多甚至更多的人要挤进车里来，这样我们就不能往前开了。我是接受了命令的，要在天亮以前到达南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可是，在我们的再三说服之下，他终于同意让五名疲累不堪、蹲在路旁的士兵乘车。

“真是令人惊奇！”史迪威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贫苦的人们，竟然这样有礼貌，守规矩，真是值得惊叹。我一直这样想，比起汉口那些高谈阔论的家伙来，还是这些农民的子弟能勇敢地保卫祖国！总有一天，他们的权利会回复，他们会受到平等的待遇。”

一个美国叛逆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大约有四十名外国记者驻在汉口，为的是给他们各自所属的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的报社，报道有关保卫武汉和日军占领武汉的情况。我们全都预

料到日军将占领武汉。这些记者，都是一些不寻常的人物。尽管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们并没有被称为“中国通”的人所特有的缺点，他们没有偏见，不妄自尊大，也没有那种愚蠢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中国人的那种宽宏大量、富于同情心的精神的影响。这些外国记者理解中国人，爱中国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人抱有幻想，对中国人性格的弱点盲目地信从。相反，对某些中国人面对别人的痛苦而无动于衷、贿赂横行、官僚不关心民众等等，他们都非常愤慨。

各条战线的战况充满矛盾的报道——头一天从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中听到中国军队取得令人惊讶的、几乎是不可信的赫赫战果，次日来自可靠方面的传闻却说日军正在进击。对这些，外国记者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他们之间引起巨大震动的，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的事件。一名美国军官在中国北部战线长途跋涉回来，这一点已够耸人听闻了。这名军官就是埃文斯·卡尔逊上尉，他是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他曾亲自和朱德及其他八路军的指挥员们交谈，在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地区纵横走访了三个月，遍及五个省，行程三千公里。卡尔逊把此行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众。这对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确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举动。

回到汉口后，卡尔逊随即在外国记者团的面前露面。这个晒得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旅行用的长靴，高高瘦瘦的个子，穿着茶褐色短裤和衣袖挽到肘部的旧衬衫。卡尔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革命家也不是。他是在双亲身边受教育长大的——父亲是挪威系人、马丁路德派的牧师——，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对他影响很深。因此，

在他的心底里，绝对相信人具有善良的品质，具有为使人们和睦相处而献身的义务感。这种信仰和义务感在他的身上已浑为一体，不可分离。

从北部战线旅行回来的卡尔逊确信，他在游击区体验到的，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善”。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

卡尔逊对任何问题都高兴地予以回答。有一些问题，如果是其他美国军人，恐怕就会以“关于这点，无可奉告”来拒绝回答了，但卡尔逊还是乐意一一作答。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有一位记者特别对他说：“卡尔逊上尉，你坦率的谈话，使我们深为感谢。当然，我们的报道是不会登出你的名字的。”

卡尔逊的蓝眼睛，因吃惊而睁大起来。“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与他的见解却大为不同。特别是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这使华盛顿方面颇不满意。用不着说，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因此，卡尔逊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随即接到不准再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的命令，并要他立即回国。

事态竟然发展成这般模样，但卡尔逊却毫无不安之感，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沮丧的神情。与此相反，一天傍晚，在海军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花园里举行的定期恳谈会上，他以很镇定的态度告

诉我们，他已向海军陆战队申请辞职。朋友们再三忠告他，请他再次考虑这种做法，但他不予理会，却说：“没有理由不让我发言。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还要继续说。这是我的义务！”

“你在海军陆战队已经服务了二十三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似乎带着一种指责的口吻说。“现在开始新的生活，可不容易呵！你准备回美国做什么工作？”

“还是再看一看吧！”其他的朋友也劝他说。“你可不能就这样轻率地毁掉自己的前程呵！这样做，对你自己对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好处。不管是谁，都不能只按照自己的固执看法而行动呵！”

种种劝说，都不能使卡尔逊改变主意，他的决心更坚定了。此后三年间，他不断地就他在北部战线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后来，他终于有了强有力的盟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把卡尔逊提升为将军，并委托他以八路军为榜样，组织与日军作战的部队。由卡尔逊命名为“工合突击队”的这支队伍——取同心协力之义——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卡尔逊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合突击队”队员的英雄行为，后来被拍成电影传诸后世。

日军的进击

数月以来战争的形势并没有什么变化，到了九月，日军开始向长江中游地区发动进攻。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已相

当接近武汉了。日军利用长江的高水位，得到进击之机。这是因为万吨级的大船在雨季水位升高之时，才能在长江的中游航行。

汉口的人心动荡不安。仅在数月前，许多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人从内地来到武汉，现在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而去。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那些想发国难财的商人，还有那些纯粹因为害怕的人们，都到安全的香港去了，其中有的甚至迁往日军占领下的沿海地区去了。不过，大部分人疏散的地点是重庆。也有的人往中国南部广西省的桂林。关于四川、广西这两个偏远省份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这两个省对沿海地区出生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充满着神秘感。

“你们上哪儿去呢？”中国朋友们问炳南。“磨磨蹭蹭可不行呵，往上游去的船全都满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炳南和我都有许多工作。我除了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发表有关战争造成的影响的消息之外，在艾格妮丝转往长沙红十字会本部工作以后，我还担当了她原来担任的大部分工作。炳南为周恩来工作忙个不停，稍有余暇，便全都用在救国会的工作上面。许多别人难办的事情、被认为是无计可施的工作，炳南都接受了。

即使我们两人的去留问题暂且不论，怎样处理孩子却是不能不当即决定的。除了与孩子分开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这是使我们最为难过的。我们和黎明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很短，这短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是珍贵得无可替代的。黎明会说的话越来越多，听到他的笑声，看到他欢闹的样子，日间许多悲伤的事情也可以忘记。黎明这种年龄的孩子最淘气，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让他抓到就往窗外扔，领这样的孩子住在旅馆里，的确

是很辛苦的。可是，现在要和他分开，而且很可能要长时间的分开，对我来说，要下这样的决心，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左思右想，几个晚上都难以合眼。最后，还是按炳南的意见，由杨妈领着黎明回炳南在陕西省的老家去。“现在铁路还没有被切断，”炳南说。“杨妈往西安去，不会有很大困难。如果再晚的话，到处都会充塞难民，而且，日军的进攻速度再加快的话，陆路交通就会全部被切断了。”

炳南的说法很对，我是能够理解的。只是我们两人的话，最后关头大概也仍然可以逃出，带孩子就不行了。我也明白，孩子交给杨妈，尽可以放心。她照顾孩子比我还照顾得好呢。这里每天都有炸弹落下来，飞机的隆隆声，高射炮的吼鸣声，震撼着整个城市，而那里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狗的叫声。相比之下，当然是让黎明回到老爷身边，在和平、宁静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为上策。

离别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到车站送别杨妈和黎明。尽管已经决意，但我还是哭了。我无须再次委托杨妈好好照顾黎明。杨妈也含着泪，再三地对我说：“你放心吧，太太。”

“我们抵达重庆后，立即让杨妈和黎明也到重庆去。你很快就可以见到黎明的，”炳南安慰我说。可是，事实上，我们的重聚不是很快，而是一年以后……。

到了十月初，武汉陷落的日子越来越逼近，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武汉的撤退工作正在急速进行中。每一条路上，都是接连不断的人力车、手推车、牛车的行列，车上的人和家具行李堆积如山。长长的队列从市中心现代化的大楼前通过，来自农村地区的难民的人龙跟在撤退行列的后面，向南或向西移动。

十月中旬，一个恶讯传来。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遭日

军突然袭击沦陷了。因此，武汉政府的各部门发出通告，命令在十月二十五日之前要完成武汉全市的撤退工作。剩下的全部车辆，连人力车也被政府征用，用于政府部门的撤退和运送伤员。

炳南和我出发的时刻也逼近了。周恩来让我们乘坐八路军在汉口的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往重庆。这只汽船是载共产党机关报的编辑、共产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周恩来本人在视察长沙和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之后，也准备往重庆。他预定到重庆以共产党和八路军代表的身份担任政府的工作。

炳南继续担任周的“副官”的职务。在汉口，炳南完成了各种任务。周说他值得信赖，工作热心，很重视他。“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周恩来曾这么说过。事实上，由于炳南与政治家、军队领导人等都保持个人的关系，通过这些，他不断为公务十分繁忙的周恩来收集各种珍贵情报，让各界人士都知道周恩来的立场。炳南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也很出色。

日子一天天过去，乘客名册上预定和我们乘同一只船的人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不顾一切地找机会离开汉口。办公室的印刷机和文件等搬往船上时，士兵们一直把守着。尽管如此，除了原定乘客外，还有约五十名“无票乘客”登船成功。数百名绝望的人，涌到江边停泊着的各条小船上，甲板上挤得水泄不通，后面的人不住地往船上挤，在船边的人几乎要被挤到江里去。当船的入口挤得不能通行时，有的人便企图从船的外侧用绳索攀到甲板上去。

我们乘的船快要启航时，想不到来了一位外国乘客。她就是名叫简·尤恩的加拿大护士。几个月来，她曾在华北战线八路军那里工作，现在终于来到汉口。我们呆呆地注视着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正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来汉口呢？我们得尽快设法把你送走！”

简·尤恩对目前情况竟然一无所知。因为消息不能及时传递，人们虽然早已听说武汉“将要陷落”，但大概还不会想到形势会象现在这样紧迫吧。如果稍早一点，简本来是能够经汉口往香港去的，现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不可能了！

“那样吧，我就坐这只船先往重庆去吧！”简丝毫不感到遗憾地说。

她并非有特别急着要办的事情。她本来是为支援加拿大有名的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受加拿大一个委员会的派遣而到中国，准备在中国住几年的。可是，她和严厉的白求恩在一起实在难以共事，现在正考虑回国。

这真是令人惋惜的事。我曾听到许多人说她不错，有的人称赞说：“她能吃苦。”这是中国人给外国人的最高级的赞辞。实际上，不管条件怎样困难，她都是笑容满面，保持爽朗、乐观的态度去生活和工作。不久，我便有机会得以亲自看到她的这些优点。

十月二十三日，所有的机器、箱子和柜子等都已装上船。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日军已经越来越逼近，使我们觉得面临危险。这一天下午，我们乘坐的这只满载乘客和货物的小船启航了。后来，每当我们回想起在这只汽船上度过的唯一的一个夜晚时，就好象置身于豪华的客船中一样。

七

彷徨之旅

遇 炸

旅行中常有这样抒情的描写：船驶离港口时，乘客凭栏向渐渐远去的风光如画的市街告别……。我们离开汉口时，却没有能够这样做。甲板上挤得密密麻麻的，要走到栏杆边，除非从人群上爬过去。所以，我们宁肯呆在小小的、在我们看来犹如安乐窝的船舱里。就这样，我们未能与这座注定要沦陷的城市作最后的告别。炳南在船上遇到了一小队八路军的领导人李克农。他略胖，人很和蔼。此外，还有两个在船快要驶出的瞬间才登上船的乘客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东北人^①，是被日本人从老家驱赶出来的。还有一个穿着八路军军服的青年，是周恩来的通讯员。周恩来本人不久前已乘汽车往长沙去了，八路军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办事处。

入黑之前，我们的汽船在离岸不远处抛锚。这是因为只有长江下游航行经验的老板（即船长）认为，对这里的情况无精确了解却要于夜间在多险的河流上航行，是行不得的。远处的天空中，可以看到火光和黑烟。汉口被炸后难道连救火的人也没有了吗？

第二天早上，船行两小时后，再次停航。这次是李克农下的

^① 其中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员李延禄。

命令。这是因为前几天，日军对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进行了轰炸，只有那些停航、而又看不到人踪的小船，才能幸免。

日军飞机通常是在早上八点至九点之间开始行动，一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停止轰炸。因此，我们便决定全都上岸，白天躲在附近的村落，到下午将近三点时再回到停船的地方去。只有舵手、周恩来的通讯员、几个哨兵和带着孩子的妇女留在船上。这些留在船上的人被严令：听到飞机声要立即就地隐蔽。

乘客们离开连呼吸也感到困难的狭窄的船舱，陆续上岸，哪怕是只离开几个小时也好。就象徒步旅行似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宽坦的岸边步行，歌声遍野。

天气并不冷，我原先准备把皮大衣放在船上。只是因为我的大衣有几个口袋，很方便，而且我习惯将护照和一些钱放在里面，所以才穿着。简·尤恩却把行李全都放在床上，反正下午我们便又回到船上了。

一片荒凉的景色，难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堤的那一边，是宽广的草地、棉田。农民们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白光闪闪的棉花。

李克农不安地仰望着蓝天。“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他叹息着说。“每天只能够航行几个小时，怎么能走得远！”

一上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李克农的不安消失了，他给我们聊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惊险的经历。

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小茶馆休息。虽说是茶馆，其实只是一间板房，入门处挂着一张草帘而已。不过，店主倒是做了一笔好买卖。店里出售的食品本来就不多，这一下全部卖完了。为了准备点吃的带到船上，我还从一个老乡那里买了十几个鸡蛋，让店主帮我煮了煮。

到了下午，不久，几个“徒步旅行者”便开始向岸边走去。他

们不习惯在户外新鲜的空气里东奔西跑，他们已经感到很累了，并且他们指望，趁现在平静无事，如果早上船的话，船可能会比预定的时间早一些出发哩。在茶馆里，可以眺望到堤岸和船只。“我们殿后吧！”李克农说。“等大家都上船了，我们再走。”

三点钟刚过，我们走出茶馆。正走到堤上，突然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响。不久，三架大飞机便在空中出现。

“糟糕！”李克农嘟哝着说。“全体隐蔽！”

在这块没有一棵树的平地上，怎么隐蔽呢？附近连一个土坑也看不到。要走到棉田那边，又太远了。飞机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向我们俯冲过来。

“散开！”李克农叫道。“不要聚在一起，分散！”

只要对这种情况有过一次实际体验的人，就会明白，执行这样的命令是多么困难啊！不管是谁，遭遇危险的时候，如果身旁有人，不安之感多少会减轻一些，若此时只身一人，恐惧则会大大增加。我们设法至少在堤边的草丛中隐蔽。这时候，李克农喝道：“安静地躺着，不要动！”我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眼看着恐怖向我们袭来。

炸弹投下了。飞机飞得很低，因为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他们。几颗炸弹准是落在我们的船上。数分钟后，船上炎炎大火。“他们又来了！”不知是谁嚷道。

“快点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躺下，别动！”李克农喊道。“分散！”他三番五次地重复着。我们象落荒的兔子一样四散奔逃。

“你为什么不把脸藏到草丛中？”在离我身旁几米处匍伏着的炳南，小声地问我。可是我动弹不了，就好象中了催眠术似的眼睁睁地看着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来。我的惊愕几乎比恐惧更甚。离我不远的一个坑洼里，横陈着那个年轻有为的摄影记

者的尸体。难道我也要死在这里，死在长江畔，紧紧地贴着丛生的杂草？

飞机的轰炸持续了三十分钟。飞机把全部炸弹投下以后，就以四处奔逃的人、从燃烧着的船上跳到河里的人为目标，用机枪猛烈扫射。等到爆炸的声响完全远去以后，我们默默地走到堤上，看着我们那只燃烧着的汽船。然而谁也没想到，我们的财物正在那里被烧成灰烬，那些无可代替的贵重的东西，可爱的纪念品……。

我们的船长因为这场轰炸，失去了夫人和四个孩子。

我们没有悲痛、默哀的余裕。李克农马上给我们安排任务，让男人们到河岸、田间去寻找死者和伤者。他自己和几名渔夫到河边去看看是否能用小船把幸存者救上来。可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不谙泳术，落在河里的人生还的希望太小了。

“炳南，你和这两位女士一起到离这里最近的农家去，请她们给准备一下开水、手巾等等。此外的必需品恐怕在农家是弄不到的。我们随后将全部伤员抬到农家去。”

李克农然后转过脸来，对着我和简，用他少有的柔和的调子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未回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两位还懂点医学。我们得先考虑一下怎样治疗伤员。”

我们在农民那里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搞到。手巾和作绷带用的布少得可怜。脱脂棉根本没有，最后我们只好找了点刚采摘下来的棉花，去掉里面含油的棉籽，然后用土制苏打蒸煮，使它们有吸水性。

我们的第一个病人是个战士，他抽抽搭搭地哭着，全身颤抖。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地给他水喝，幸好，他的惊慌很快消失，哭泣也停止了。他为了表示感谢，说愿意协助我们做些事。

简是一个出色的护士。她在前线工作过，所以学到了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之下进行救护的方法。没有镊子吗？她立刻把一双筷子放在沸腾的热水里，然后用它们取出伤员腿上的弹片。中国的烧酒，成了药用酒精的代用品。

最后几名伤员抬来时，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借着微弱的烛光给他们治疗。治疗完毕后，我们累得腿都站不住了。这样倒好，我们没有闲暇去烦恼了。不仅如此，在这个恐怖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有个协助我们做护理工作的战士，拿了五个鸡蛋来给我，脸上浮现着不知如何是好的笑容。这五个鸡蛋，就是我在茶馆里煮好的！原来，当我奔跑着找隐蔽物的时候，就象复活节的兔子一样，边跑边把手里的鸡蛋撒到地上。据给我送鸡蛋的战士说，农民不敢去捡，因为炸弹的“弹”与中文的“蛋”同音，炸弹是不是会爆炸的蛋呢？农民恐怕我的煮鸡蛋会是小型炸弹哩！

到了傍晚，李克农又显现出他的组织才能。大概长征时的经验在这里也起作用吧！他说服农民提供住处，让我们在这里过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再继续南行的旅程。

将近傍晚时，李克农将全部幸存者——约八十人，占全体乘客的三分之一——集合起来，商量今后的行动。他说，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必须设法尽快地向前行进。因为我们的情报来源已被切断，敌人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李克农又提议，把各人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不管什么情况，也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他斩钉截铁地说。“否则我们便寸步难行。”

最后，李克农把全体人员分成八组，并为各组指定了负

责人。

我们一行人之中，有一名年轻的记者打算和他的一位朋友独自继续行进。他表示愿意在到达附近一个小镇之后，打电报给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告诉他们这次遇难的情形和生还者的姓名。这封电报并没有送到。长沙的人们只听说在武汉附近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部被炸，但对我们的情况，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毫无所知。到了晚上，我们便在农民和渔夫的破旧的小房子里过夜，躺在薄薄的稻草上。我们谁也没有带毛毯、外套或大衣，只好互相紧挨着身子以抵御夜寒。合上眼睛，白天那些可怕的事情又浮现出来，大概也是为了战胜这种恐怖，大家才挨得紧紧的。那两个东北人对我们讲了他们所看到的船上的可怕情景。船上遇炸起火时，带着孩子的妇女全被活活烧死了。他们两人跳到河里，被渔夫救起。其余跳到河里的人，有的溺毙，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周恩来的通讯员在起火时还在船上，后来则不知所踪，连尸体也找不到。

二十岁的李摄影师死了，一个年轻的女作家死了，许多男人、妇女和孩子死了，而当他们脱离充满危险的汉口时，是多么高兴呵……。

“短 征”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行人慢慢上路了。伤员中，有五名是必须上担架的重伤员，可是临时要找到担架和十名抬担架的农民，可真不容易。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们放弃原先从陆路抵长沙的行进

计划。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十五公里。这是因为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大家便都慌慌张张地逃进棉田里，躲在高约一米的灌木丛中，为此耗去了不少时间。此外，抬担架的农民都想回家。虽然出重酬，也找不到替换他们的新的担架手。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们都情愿呆在自己的家里。

有几个人提议，把队伍改编成更小的小组。李克农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够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据农民说，这一带盗贼很多，特别是最近，见到难民就不加区别地袭击，将他们仅有的财物劫掠一空。我们象现在这样分成大组，又有武装的战士随着，土匪就不敢动手。”

亏得李克农有经验，和农民打交道，向他们求助，很有办法，否则，我们恐怕会一筹莫展哩！每当我们一行人接近一个村子时，疑虑很深的农民们，便上了锁，往泊有小船的岸边跑去，一眨眼工夫，他们就在这纵横交错的水路和湖泊上失去踪影。

“这些家伙怎么这样薄情啊！”我们的行列中有几个人骂道。“他们对我们这些逃亡者难道一点也不同情吗？我们只不过想买点吃的，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罢了！”

“人们看得出，你们还未曾离开过城市，”李克农很能理解农民的心情，这样说。“你们没有坏心，农民们究竟怎么知道呢？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陌生人几乎都是坏人。如果将他们的那一点点存货拿走，或者进一步把他们的小船也征用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

李克农说得对。我们和农民、船夫谈话时，常常听到“拉夫”这个词。国民党的官员和军队，只要自己认为需要，便毫不留情地征用——不管是米、鸡、柴、运输工具，还是人。农民们为军队搬运了几个星期东西，什么时候被放走，就算是好的了，因为农

民们怕被拉到军队里去。这种不安的心情一直威胁着他们。

“农民们什么过失也没有。我们倒是犯了一个错误哩！”李克农解释说。“成群结队的人使他们产生不安，以后我们试试用别的办法吧。”

此后，我们派出几个孩子做侦察，当他们回来报告说“看到村子”时，李克农便和三、四个年纪稍大点的人一起先行。我们在离村子不远处休息等候。

“你也一起去吧，高鼻子！”有一次，李克农这样要求我。“高鼻子”就是鼻子高的人，这是中国人叫外国人的浑名时常常用的。他坦诚地叫着我的外号，和我开玩笑，看上去很开心。如果把我们都叫作洋鬼子，就颇不客气了。但李克农即使这样叫我，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恶意。这是因为我明白这一类的词的含义。况且毕竟还有好鬼。只要想想红军里的“小鬼”，我就不以为忤了。

“大概农民们会觉得你是个传教士吧。或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的妇女哩。所以，你说的话，他们一定会很好奇的，”李克农胡乱猜想着说。“不管怎么样，你和我们一起去交涉，决不会有什么坏处。”

就这样，我有幸看到李克农那无可仿效的谈判才能。他那圆得象满月的脸，很自然就给对方一种靠得住的感觉，说两三句笑话，叫句“老乡”，最初态度冷淡的农民们也就和他热和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村长的家里，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交谈——农民们实在是穷得连茶叶也买不起。李克农并不立即向对方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先是和对方寒暄一番，互相介绍。我也被郑重地介绍了，当然不说我是洋鬼子，而称我为太太，说我是为战争所迫，不得已而踏上这样多灾多难的旅程的贵妇。

在敞开着的门口，成群的妇女、孩子，想尽量靠前一些看我。这时候，李克农也和他们开玩笑。“你们是想仔细看一看这个高鼻子的妇女吧？”他就象马戏团的班主一样高叫着。“那就别不好意思。不过，要交参观费呵。一个人一个铜板，碰一碰的要五个铜板！”孩子们哄笑着散开了。坚冰裂开了。孩子们的父亲向我温和地微笑着，亲切地点着头。

李克农问得很巧妙，很快就打听出附近是否有日军。这一带地方很偏僻，不能指望住在这里的人爱国心很强。他们对战争和日军的认识都非常模糊。他们的无知并不亚于他们的贫困。被盗贼、军队、贪官污吏不断地缠扰，农民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盗贼与拉夫，是农民们的凶祸之魔，在他们眼里，这一切要比他们尚不认识的日军更可怕。

李克农全面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并和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融洽之后，才把自己原来的要求提出来与农民商洽。他先是强调了三点：不管使用什么东西都一定付钱，只住一晚，一切借物都原物奉还。李克农对我小声地说：“这是红军一大纪律。”

接着便是定价钱，定了之后李克农先把应付的总金额的一半交给村长。村长开始对农民们说明他与李克农的协定时，李克农便把在等候中的大队人员叫到村子里来。

还有一件事令李克农更伤脑筋。我们一行人全都躺在泥地的房间里休息了，李克农却要几个村里人商量今后如何行进。谈了很久，几个船夫表示愿意用船把我们送到洞庭湖去，而且是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的水路，这样可以不被日军发现。据船夫们说，划小船到洞庭湖去要两个星期，从洞庭湖到长沙就不难了。如果挤一挤的话，有十只小船就可以载上所有的人。

我们已适应了行舟生活。大家从不脱衣服，不久对此也习

惯了。狭窄的船舱底只铺着竹席，每天晚上我们象罐头沙丁鱼一样互相挤着睡觉，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惯。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看到黄浦江上行驶着的大帆船时，不由得便想起这时的情况。如果与我们逃难时乘的破烂的小船相比，上海的帆船就有如宫殿一般了。

我们现在至少已用不着每晚向农家求宿了。偶尔，我们上岸购买食物，村长便给我们提供住处。有一次，简和我在岸上住宿，可是，为了对付大老鼠闹腾了一夜。自此以后，我们宁愿睡在拥挤不堪的船舱里，再不上岸过夜了。

吃的问题也不太使我们发愁。当然，好几个星期之久，我们每天只吃两顿，只有三种、最多也只有四种东西可吃。三种东西是米饭、干的红辣椒和用大豆做的豆腐。有时候托赖船夫，钓到了鱼，我们的菜单便生色不少。

许多人都称赞中国人有烹调的才能，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认为：烹调不是男人应做的事。男人谁都以自己的烹调技术而自豪，并且喜欢显示自己的这种本事。同行八十人出生于中国各地。所以我们决定举行烹调比赛，也就是说，以我们的四种食物作为原料，各省的人都做出自己本省的花样。于是我们今天吃的是湖南式的豆腐，明天又做一种北京式的吃法。为了评定哪一个省或者哪一个市的做法好吃，竟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按照我的口味来评定，李克农是优胜者，他做的安徽式加辣汁的烧豆腐，味道非常鲜美。过了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再次见到李克农时，他已是外交部副部长。“我忘不了的！”我说。“你现在这样高的地位并没有你做的豆腐使我那样佩服，那真是少有的杰作呵！”

关于医疗方面

我们的力量极为有限，对伤员的医疗只能采取非常原始的方法。如果考虑到这些客观条件，我们的病人情况还是不坏的。病人由于流血过多而身体虚弱，首先要恢复他们的体力。鸡汤对他们是很合适的，但不能常常给他们喝，因为我们共有的全部财产实在不多，而且，还不知道要多少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可是另外有一种又多又便宜的东西，这就是甘蔗，含有葡萄糖的甘蔗。于是从早到晚，我们可怜的病号不住地嚼甘蔗，直到后来他们一看见甘蔗就觉得讨厌。

每天诊病两次。一次是早上，在我们的“船队”出发之前；另一次是晚上，在松明或油灯之下。诊病时，我们从一只船走到另一只船，给伤员换绷带，对他们的伤势作出指示。我们所能做的仅限于此。伤势回复很快，没有出现并发症，这真是奇迹。我在这次“短征”中积累起来的医学实践知识，使我后来在华北前线，被珍视为“大夫”。“大夫”这个词的意思是有本事的医生，其名声并不亚于自古以来就为人所知的中医。正如一个比喻所说的，在盲人国里，独眼是国王；我在德国学到的急救知识，加上我在中国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使我成了——正如后来卫生部长李德全对我说的——“中国最有名的‘蒙古大夫’之一”，意即一流的庸医。至少，我有资格说，我曾受到数百名病人的感谢——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的病人不只是伤员。夜间天气很凉，毛毯、外套和御寒的裤子等仍然不够。为了预防感冒，我向李克农提议，每天晚上

让每个人喝一杯象伏特加酒似的白干。喝上一杯，会使长时间在船上生活的我们浑身暖和。李克农暗暗笑了笑说：“这种药并不坏呵，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只不过战士们大概会抵制抗议哩！因为我们军队是禁酒的。”

事实果真如此；战士们对我们说，他们不打算违反军规。酒？它差不多和鸦片一样的坏！不行，不行，绝不能喝。但简并没有就此罢休。她对我说：“你得去对李克农说，让他下命令叫战士们喝白干。现在重要的不是军规，而是健康！”

事实证明，简的这种担心是非常对的。早上巡回诊疗时，有好几个人说他们泻肚子。白天，因为这些病人要上岸解手，不能不停好几次船。原来白天一般停船三次，停船后，便发出“妇女下船”的命令，我们这些女兵便一齐跑到草丛里面。女的完了，便轮到男的。现在却要经常靠岸，船夫们很不高兴。“这个样子，两个星期怎么也到不了洞庭湖呵！”他们抱怨说。

鸦片对治疗下痢很有效。尽管如此贫困，尽管官方的禁止，鸦片却无论在哪一个村子都可以弄到。甚至村长常常送鸦片给我们，作为给客人的礼物。

对于礼物，李克农通常是赞成收下的，理由有二：出于礼仪，出于友好。但鸦片却是个例外，他怎么也不收。这是一个原则，丝毫也不能动摇。所以，为了我们的鸦片疗法，要李克农向这个原则让步是很不容易的。他并不是不懂得鸦片可作药用，可是他担心，这样一来，难民和船夫可能就会认为：和其它军队一样，八路军也抽鸦片。我们对他解释，鸦片仅用于三名重病人，如果不管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行程。最后他终于作了让步。他立即召集各小组负责人开会，向他们讲明了情况。鸦片发挥了我们所期待的效用，在病人的肉体上和群众的思想上都

留下坏的影响。

饮酒疗法的实施，困难稍微小些。中国人不是善饮的国民，所以无需担心我们同行八十人中谁会从此染上酒瘾。在我们一行中，大部分人连每天喝一杯白干，脸上都会露出象喝苦药一样的神色；战士们看到开始分配白干便企图逃走的事情也不断发生。

十一月的天气越来越凉，但并没有人患重病，简和我，更加相信我们两人的白干疗法是正确的。

过了大约一年以后，即一九三九年八月，在一个生动活泼地讨论饮酒疗法是否正确的会上，我为这一疗法辩护。讨论是在重庆的防空地下室进行的，我的对手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位印度政治家作为中国政府的宾客，当时正在重庆逗留，遗憾的是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地下室里度过。关在地下室里，一呆就是几小时，这使他感到很厌烦，所以每次他都坐在入口处，直到飞机出现才离开。

我们的讨论无边无际，以此来消磨时光。正是为议论而议论。当我们谈到甘地的禁酒论时，我便把我们的饮酒疗法获得成功的事例讲给尼赫鲁听。“我们全体能够保持健康这一事实，就是饮酒效用的有力证明。”但尼赫鲁并不认输，他脸上露出微笑说：“你不能进行反证。假若有一半人你没有给他们酒喝的话，你的论证才能成立。也许不喝酒的人也没有得病！”

参加八路军的故事

李克农、炳南、简和我乘的小船，共住八个人，其中一个八

路军的战士，他穿着清洁、整齐的制服，眼里充满着对人生欢悦的光芒，他喜欢笑，也喜欢逗别人笑。这个战士就是马正君（译音）。他不但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受欢迎，船夫和农民也喜欢他。连李克农在某些事情上也宽容他，而这些事情如果是别的战士干的，可能会受到责备，因为李克农虽然非常和善，但他对军规是很严格的。

马最引以自豪的是他那支手枪。枪装在一个大木匣里，匣上饰以红缨，挂在皮带上。他老是担心着，怕水进到枪匣子里。他经常花许多时间，用各种办法来保护这支枪。

马把我们乘的这十只船称为“红船队”。他认为，即使不能说这是一支威风凛凛的船队，但总可以说它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他常常给我讲他那富于冒险性的个人经历。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皮上衣的口袋里有一个小笔记本，便在本子上逐一记下他讲的故事。说也怪，这个笔记本经历了难以计数的迷途、轰炸、混乱，却安然无恙，至今仍在我的身边。

马是在内蒙古边界的察哈尔省出生的。他的少年时代和战友们并没有多大不同。贫农家的情况，到处都是一样的，占有的土地那么少，而人口却那么多。十五岁时，他不堪凶恶的继母的虐待，离家出走。后来，他代替被强制入伍的叔父，参加了傀儡军，傀儡军即是与华北日军狼狈为奸的中国军队。

当时，他不大懂得政治，但他在这支军队呆的两年间，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令他不愉快的是，在军队里，日本人、蒙古人和中国人是分别受到不同对待的。其中对中国人最差，战斗进行时——也就是以中国人为敌的战斗——，中国士兵作为炮灰首当其冲，甬想开小差，这是因为强迫入伍的新兵所出生的村子要对他们负责，如有开小差的，整个村子要受到重罚。

马说，这种惩罚是极为残忍的。持枪逃走者被抓住后，本人及家庭全体成员都要被处死。不带枪逃走者被抓住后，本人要被枪毙。马补充说，“这是为了以儆效尤。”那时，在他心里已产生对日军的憎恶，虽然他承认，他从日军那里受过出色的军事教育。

尽管日军采取各种各样的报复措施，部队依然整批整批地逃到国军一边来。马和他的许多战友一起逃出来参加了二十九路军，在那里干了四年。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在华北的战斗。尽管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这个年轻的反叛士兵对他在二十九路军的际遇仍然不满。

“二十九路军的军官们和傀儡军的军官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谁也没有对我们说，现在和从属于日军的时候不同了，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战士。我们这些士兵，对祖国的政治变化毫无所知。‘你们是士兵，必须服从上级军官的命令。其余一切，与你们无关！’我们所受的教诲，只此而已。”

正因为这样，他对战友们讲的红军的事情非常关心，倾耳细听。这些战友中，有的是自己亲身和红军接触过，有的是在故乡听人说过红军的事情。红军被称为“穷人的队伍”，据说作风与其它军队完全不同。村里的人还说，这支军队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而战斗的。从北京来的学生们，不时给士兵们念书和念杂志。马本人上过几年学，于是他便借了几本书，象饿兽扑食一样——他这样比喻——贪婪地读着关于红军的文章。

现在这支军队已不叫红军而叫八路军了，名称尽管不同，但这正是他要去投奔的那些人啊！

“当时，我不知道八路军在什么地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一定要找到这支军队，即使踏遍全中国我也要找到它！”

“你想，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干了些什么呢？”和我一起听马讲述的李克农插话说。“他莽莽撞撞地又逃离了军队，从这支到那支，逃了好多次，几个月之后终于找到了戴八路军臂章的队伍。”

马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他那精神爽朗的孩子脸涨红了，努力为自己的行动辩解。

“噢呀，我也知道，老这样逃是不对的。其它军队，也是和日军打仗的。可是我又非要达到我的目的不可，为此，除了逃之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起初，由于他逃的方向错了，好几次都被其它军队捉住并被强迫入伍。这和许多其他战士的遭遇一样。这些士兵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的连续激战中，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因而到处流浪。

“那么，最后是怎么成功的呢？”我问这个为了寻找“穷人的队伍”而走了几百公里的年轻无畏的战士。

“我走了许多地方，最后终于来到江苏省的北部。在那里找来找去，找到了八路军的兄弟部队新四军的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经历，都笑了，他们说，我现在应该安心加入他们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前身也是老红军。不过，我并不相信他们。”马惭愧地坦白说，“这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无知，又缺乏经验，另外，在其它军队里，人们也一直对我说，在哪儿也跟日本军队一样。”

于是人们劝他到武汉去找八路军的办事处，那里的人肯定会接纳他——这个固执的小伙子。

“七月，我到达汉口，”马最后说。“我寻找八路军的经历终于结束。这一次我是决不会逃了。”他自豪地看了看自己戴着的

八路军臂章，让我看了看中国士兵上衣上都有的布制名符，那上面写着“八路军战士马正君”。

“是什么原因使你相信现在参加了真正的军队了呢？”我问。

“八路军的战友之间的情谊，是我未曾见过的。每个普通的战士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全体军官都和我们这些战士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当我有什么苦恼或者有什么不懂时，他们就帮助我解决。他们对其他战士也是如此。”

马还强调说，他在八路军部队里不仅接受军事教育，而且接受很好的文化教育。使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旅程中不能够看书，在这次“远足”中，他只带了一本小册子，是毛泽东的论文，他几乎能够背出来了。

马的求知欲和他的毅力一样强。他每天跟我学十个德语单词，跟简学十个英语单词。他得意地在旧报纸上写出他学过的拉丁字母给战友们看，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用拉丁字拼写出来，好象很佩服似地笑着说，只要用两个字母“Ma”就行了，真简单！

老红军战士们的自述

我这个组的战友，除马以外，还有六个八路军战士。与马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红军的老战士。我对李克农说，是否可以每天请他们来一个人到我们船上作客呢？这次旅程，是了解他们经历和思想的难得机会，机不可失啊！

“你们这些高鼻子对这些事的兴趣可真大啊！”李克农惊奇地说。“战士们给你讲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在中国有成千、成万以至几十万的人有着同样的经历哩！”

“正因为这样，我想把它记下来！”我坚持地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将来发生的事情，是与这几十万人每天的经历休戚相关的。”

首先，我请教这些战士们的姓名。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他们的外号。这些外号遵从农民的习惯，大都以动物为名。战士们以与某人的特征有相同之处的动物，加上一个“老”字，作为外号。“老”本来是有年长、尊敬的意思，在这里只是用以表示战友之间的亲密。比如，一个动作敏捷的年轻战士的外号叫“老狗”，另一个勇敢的战士叫“老狮子”。

二十三岁、身强力壮、有点粗鲁的战士“老熊”，他原来的名字叫洗可德(译音)。他出生于四川省，因饥荒父母双亡，在祖父母身边长大成人。洗的祖父母本来有一块虽然不大却很肥沃的土地，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他们忍饥挨饿。三十年代初期，他们已被征收到一九六二年度的税金了！

洗的生活转折点是从一九三二年开始的。这一年，红军到了他家乡附近的村子。“红军给我们土地。”我在几百个小村子里，从几百个人的口中，都听到过这样的话。“土地革命”这个具有魔力的词就象交响乐里的主旋律一再复现。我在西北初次听到了“土地革命”这个词，现在，又从这些战士口中听到了。此后，无论走到哪一个省、哪一个村，“土地革命”这个词都在我的耳边回响。

洗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参加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军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年轻人，红军在激战中所受到的兵员损失不断得到补充。洗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初的三年，他是当不拿武器的少年兵，后来，被编入正规军。在部队里，深获好评的“红军教学法”使他能读能写。我所学到的汉字，也得助于“红军教学

法”。这个方法是，首先，把准备要学的字，写在一张大的旧报纸上，然后把这张纸贴到走在自己前面的战友的背上，在行军中，整天都看着这个字。这样，不管是怎么复杂的字，慢慢地都能记得住，一划也错不了！

长征以后，洗在延安当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政治家王明的通讯员。后来洗又随他到汉口。

我问“老熊”，想不想家，想不想回家乡看看呢？

“我在汉口给家里寄了信，”他答道。“不过，我们村子现在又是地主掌权了，所以我家的生活很苦。在这支军队里，我过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的快乐生活。军队现在就是我的家了。”

“你一定能回到四川去的，”马正君插嘴说。“有一些反复算什么！只要想想我为找八路军，流浪彷徨了这么久就明白了。”

从马的神色里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往南方去的遥远的旅程是满意的。

下一个来和我交谈的战士，也是四川人。他叫冯延孝（译音），才十九岁，但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他的儿童时代，比“老熊”更惨。五岁时，便要给人去放羊，生活真象在地狱里一样。

“雇主待我真不如一条狗，”冯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我每天都要挨打。我挨的打，比分到的米粒还要多。有一次我想逃走，被抓回来后，便挨鞭子抽，以至昏迷了过去。”

冯十二岁那年，红军到达他的故乡。他倾耳细听其他的放羊娃谈及红军的事情。有人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但有人说，红军会把所有的人象牲口一样杀死，非逃不可。

“我一点也不害怕，”冯说。“因为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帮助穷人的话，他们也会帮助我的吧。我过猪狗不如的生活已经够

了。我身上穿的，一直是破烂的衣服；长年累月，都饿着肚子。”

不久，红军分配土地，还把逃走的富农的财产、衣服发放给穷人。冯分到一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的新单衣。这对他来说，就是革命的象征。他已经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人！他要参加这支军队。

因为冯年纪太小，便先做“小鬼”，学读书写字及其它种种。他显然进步很快，因为他不久便当上一位指挥员的通讯员了。长征时，他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号手。后来，他在延安受到很好的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但他最大的心愿还是尽早上前线。简认为应将他培养成为卫生员，因为他是我们进行“门诊”的最好的助手。到后来，他已能很熟练地包扎，分担了我们的一部分工作。

战士中年纪最小的是“老狗”向叔富(译音)。这个“老兵”十六岁不到点。他儿童时代的身世，与战友们相仿。农民的命运，是大抵相同的吧。他十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是宣传队的队员，到村里演出一些小节目，使农民接受新思想。不久，他慢慢锻炼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了。后来，在华北前线时，我在一个剧团里遇到了他。

我不用问他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从他的表现就可以得到答案。傍晚，当我们的“船队”抛锚时，最先以敏捷的动作跳上岸执行任务的总是他。每当李克农呼唤他时，不管在哪里，总是听到他响亮地回答：“有！”然后大步流星地跑了过来。生活的欢乐和对工作的热情使他那孩子气的脸充满着生气。在船夫和农民中间，“老狗”是很受欢迎的。他帮助他们干活，给他们唱歌，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讲得滑稽有趣，把他们乐坏了。他的四川方言夹杂着西北的土话，有的地方很难听懂，这时候，便以手势和

面部表情来帮忙。他真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红军战士是否全都是四川省出生的？”趁下一个和我交谈的战士还没有来时，我急急地问李克农。

“大部分，”他答道。“当四川省有苏区时，有几千人参加了红军，其中多数人还参加了长征，因为他们恐怕我们离开苏区之后，会受到地主的报复。其他人参加红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新的生活。你已经听到许多了，孩子们为什么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呢？受到人的待遇、战友之间的感情、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为这些，他们不惜付出代价，备尝长征的各种艰难困苦而不以为苦。”

“我们乘的船受到轰炸时，我总是叫‘散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李克农说。“长征途中，我们多次这样叫过。在下了必死的决心之后，这样做甚至还觉得颇为幽默。我们必须散开，这样，万一有人被炸死了，总会剩下一些人来埋葬死者……。”

“我的这位姓赖的战友不是四川省出生的，”马向我介绍下一个战士。“他出生在江西省，已经二十二岁了！”

被介绍的战士不知如何是好地笑着。我对他的经历感到兴趣的地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他的战友之中，有的人还不到二十岁，因为仰慕红军，走了几千公里而来参军；有的人从穷得无立锥之地的悲惨生活中解脱出来，成为有知识、有才干、能够负起责任、独立工作的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为什么我要找他谈呢？

他的儿童时代和其他比他早参军的战士相比，所不同的只是环境而已。江西省的农民大都是佃农，也就是孙逸仙的纲领所说的“耕者有其田”的对象。

一九三二年，红军终于到达他的故乡。“开始，我们是害怕

的，”赖坦率地说。“人们传着可怕的流言。有人说，红军打家劫舍，共产共妻，对地方的风俗和老人全然不尊重，等等。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从来也没有发生过。”

一九三三年，赖加入先锋队。先锋队是一个青年组织，担任宣传、通讯等工作。赖在这里学习文化和政治常识。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都非常重视学习政治常识。有一次，马正君曾对我说：“如果脱离了政治，就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也就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而战斗，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国民党的士兵厌战，打不出一场象样的仗来，——正因为他们是不讲政治的！”

湖南省和江西省也有许多青年农民参加红军。赖是志愿参军的，后来参加了长征。因负重伤，他从战斗部队退出，接受无线电通讯训练。在汉口，他作为通讯技术员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我对赖也问了象对其他战士一样的问题：有没有收到家里的信息。他答道：“我给家里发了很多信，可是，连一封回信也没收到。家里人可能都死了。我们的苏区被国民党再度占领时，许多帮助过红军或者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农民，都被杀死了。”

第二天，两个战士一起到我们的船上。这天，简到一个病人的船上去了，不这样的话，我们的船就不能同时容纳两位客人。不过，这对简来说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她对那个病人似乎很感兴趣。这个病人是边参谋长，边是出生在华北地区的中国人，是个风度翩翩的知识分子，作为简的同伴似乎是不错的。可是，不能指望他们会产生罗曼谛克的关系。边对八路军制订的严格条例是非常注意的。况且，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从来都没有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当然，李克农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他们两

人的关系。因此，李把我们的各个小组另编，让边参谋长和两名“东北代表”互相对换。这可说是李克农防患于未然的手法。

马向我介绍两个来访的战士，说他们是出生在华北地区的。

“否则，你大概仍然会认为红军的战士全都是南方人吧，”北方出生的马正君强调说。

这两个战士中，年纪大的一个是二十岁的张兴礼（译音），出生在与陕西省相邻的山西省。他决心参加红军的决定性原因，并不象他的南方出生的战友们那样，仅仅是共产党的农业政策；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对他的影响很大。张的故乡被日军破坏之后，他作为“小鬼”，成了游击队的一员。后来，一个同乡告诉他，他家里的人全都被杀死了。“他们帮助游击队做事，所以日本人对他们进行了报复，”他强调说。“连我那年迈的祖母，他们都没有放过。”

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相信张所说的这些。当然，我并不认为张在有意骗我，但我估计张很可能将流言误认为是事实。所以我安慰他说，可能不会象他们对你所讲的那么残酷。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当我亲眼看到华北地区的情形之后，才知道张那时对我讲的都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被日军烧毁的村子，听到许多人说的和张所说的都一样，日军是非常凶残的。

另一个战士杨作艾（译音），他说是十八岁，但看起来不会超过十五岁。关于他的出生地，用不着怀疑，我是知道的，因为他操着纯粹的陕北方言。和其他战友相比，他的家境算是不错。土地改革时，他家分到足可供养八口之家的土地。他父亲由于开垦荒地有功，曾受表彰。那些地，是在大旱和饥荒年代，被土地所有者放弃而荒废的。

这个十八岁的“老兵”，曾参加过对日军的战斗。他负伤后，被送到延安去接受系统的教育。三个月前，他作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来到汉口。

我对每一个来与我交谈的战士都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到此为止，所有战士的回答都是：不是。最后来的一个战士，是被大家称为龙副官的通讯员龙飞虎，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回答。他是江西省人，出身于赤贫的农家，在我“采访”过的红军战士之中，他的身世可算是最惨的了。他七岁时父亲死了，他的长兄到城镇当苦力，妹妹则卖给人家。他给人放羊，靠那微薄的工钱与母亲勉强糊口。饥饿和鞭打伴随他长到十二岁。

龙飞虎的故乡是最早的苏区。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的农民军和朱德率领的革命军会师，龙的故乡就在朱毛会师的山岳附近。一九三〇年，他的村子被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完全毁坏了，龙飞虎参加了红军。从那时候起，他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从未间歇过。他三次负伤，负伤时，被强令休养，他便利用休养时机不断地学习。他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就读，不久便成了干练的宣传工作者，在西安的东北军中发挥了出色的本事。在汉口，他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交通技术部部长。他早已不是“副官”通讯员了，但他那“副官”的称呼似乎还一直叫了下来。

在 老 苏 区

与战士们交谈时，我注意到在旁的两名船夫在凝神谛听，而他们向来很少和我们谈话。李克农本来很有本事，对方即使是

沉默寡言的人，他也能够从他们的口中打听出重要的情况来。可是，当李克农向他们问及政治问题时，船夫们便立即守口如瓶，再也不开腔了。

只有一次，那个比较年轻的船夫带着满腹狐疑的神色问道：“听说这些士兵是什么八路军属下的，八路军究竟是怎样的军队呢？”后来，他对我说明了自己疑惑的原因。“因为士兵们并没有佩戴写着中文‘八’的袖章，我们便以为，那个写着外国字的8的袖章准是冒牌货！”

船夫们原先好象已经知道八路军的前身就是红军。或许，他们是从我们的谈话中觉察到的。

约经过一周水上旅程，我们进入了一个景色非常优美的湖区。李克农说：“洪湖一带曾有一个老苏区。贺龙曾在这里住过。他的姊姊是赤卫队里著名的指挥员，她也住在这里。农民是否还会记得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不向船夫打听一下？”我说。“他们都是这个地方的人。上年纪的船夫大概还会记得老苏区的情形吧。”

“他们不会对不认识的人讲当时老苏区的情况的。因为他们曾无意中说了漏了嘴，有过受严惩的教训，”李告诉我。“这些痛苦的教训，使他们学会了谨小慎微。”

事实上正是如此。当我问老船夫，洪湖地区是否曾是苏区时，回答只有一句：“不知道。”年轻的船夫问道，红军现在怎么样了，红军现在真的和国民党一起打日本军队吗？“我们这些人确实是八路军。我们中间有的人过去参加过红军，”李克农很肯定地说。

“可是，八路军不是在北边和日军打仗吗，你们为什么在南边呢？”这个船夫又疑惑很深地问。

对这个问题，李克农给他作了说明：八路军在各大城市都开设办事处，为的是取得与政府的联系。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李克农还谈到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带来的变化，等等。船夫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其它反应。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引致的。

那是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李克农边在甲板上晒日光浴，边给我们讲述贺龙和洪湖岸边老苏区的故事。我们——炳南、来自东北的“代表”、快活的马正君、简小姐和我，沐浴着暖和的阳光，心情舒畅，悠然欲睡。周围是一片恬静，全然不觉时光在流逝。此刻，我们并不去考虑还将在船上生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大城市里，什么时候才能得知世界上的消息。

李克农缅怀往事，低声哼起一首旋律动听、给人印象很深的歌曲。这时候，突然，老船夫高声问道：“这，这首歌叫什么？”

李感到很意外，反问道：“你知道这首歌吗？”

船夫又回复默言无语的神态。看他的样子，好象心里很矛盾：是相信我们好呢，还是不相信好？终于，他还是说：“不知道。”

但李克农并不就此作罢。他说：“你是知道的吧。这是红军唱的歌。我们几个都是红军，也就是今天的八路军。你们用不着害怕。”

这时候，年轻的船夫嚷道：“是呵！我们会唱这首歌，红军的事情我们也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就住在苏区。”

坚冰裂开了。一个星期以来，这两个船夫观察我们，注意听我们的谈话，内心里怀疑我们——戴着“冒牌的”8字袖章的人——是不是红军属下的。现在，听了李克农的歌，他们开始相信我们了。

情况立即好转。沉默寡言的同行者，现在成了健谈的朋友。在这以前，我们一行每到傍晚便到村子里去购买食物。和船夫的关系好转以后，每当我们上岸时，便受到村里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就象是欢迎久未会面的老朋友到来一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不会相信，经过了这么悠长的岁月，红军的名字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究竟船夫们是怎样把我们要上岸的消息，告诉下一个预定的登岸地点的人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大概是通过自古以来就受到赞誉、被称为“竹电”的通讯系统吧。

在这以前，每当上岸购买食物时，李克农总要絮絮叨叨地对我们讲一番：一定要付钱。现在，他却要想方设法说服农民，无论如何请他们收款。农民们不肯收，他们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也就是亲人一样，你们现在遇到困难，钱不多，还是留着作不时之需吧。但李克农还是坚决执行八项注意，即使是“一针一线”，也不得无偿地收受。“否则你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冒牌的八路军哩，”李克农笑着说。

我们同行的战士，感到有如回到自己家中。“老熊”说：“能与自己家里人说话的语调和老百姓说话，感觉就的确不一样了！”

现在，傍晚时，我们常常和农民在一起。我们和农民交谈时，战士们就去挑水，打扫散落在泥地上的花生壳，洗菜，帮着做各种事情。然后，他们在油灯下擦枪——就象是作某种仪式似的，他们劲头十足，从不疲倦——，并让村里的孩子们在旁边欣赏他们的枪。年老的农民和船夫，则围聚在李克农、边参谋长、从东北来的“代表”身边。我们常常在一起直到深夜。

当然，简小姐和我也是农民们深感兴趣的中心人物。许多

村民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的好奇心很大，不过对我们非常友好。食物本来已不多了，他们还是给我们找出好吃的送来。“喂，你们看呵！”李克农对他们高声地说。“我们八路军，不仅来自中国的南方北方，海外的外国朋友也来和我们一道战斗哩！”

至于我的兴趣，自然是红军为什么能深受洪湖农民的拥戴。我对许多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回答只有一个：“土地，他们给过我们土地。”

在这里，“土地”这个具有魔力的词又出现了。数百万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正是那个有魔力的词起了作用。在所有被煤烟熏黑了的农家，我都听到“他们给过我们土地”的说法。接着，总是说：“国民党一伙回来时，又把我们的土地夺走了。地主还乡，对我们这些‘抢’去他们土地的农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于是，过去那种严酷的时代又来临了。佃农要把收获的百分之六十交给地主。如果冬天把仅有的粮食都吃光了，需要借种的话，收获时就要双倍偿还。政府的税，照例也是以农产品征收。地主一般都兼管分派捐税，因此，地主把每个村民应纳的税额定得很高，而把自己的份额定得少到无可再少。当然，这样征收得来的税，原封不动地上交给政府的情况是极少的。这些税在官府层层转手中，每到一处，每个官员都中饱私囊。

看来，农民现在想知道的是，红军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把他们从剥削者的手中解放出来。我发现，对李克农来说，向农民讲清楚共产党的新的政治路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会问：和那些可恶的国民党合作？地主的土地不再没收了？——对在这偏僻地区生活的人来说，日军还是个未知数；但他们不久会明白的。

“我们不能不改变农业政策，”李克农向农民们解释说。“即使政策改变以后，我们解放区的农民也比你们现在的生活要好。在我们那里，有关利息和地租的规定订得很详细，高利贷、任意附加的杂捐是不存在的。”

上年纪的农民微微地点头称是。他们想，这样做，是挺不错，不过，分配土地不是更好吗？如此一来，就可以和地主一刀两断了。如果红军，即八路军——红军这个叫法对他们来说更为亲切——走了，地主又重新把持权力，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要消除农民的这种担心，是不容易的，”回船的途中，李克农边走边说。“在解放区，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农民悄悄地到地主那里，要如数交付以前借款的利息。这是因为农民害怕‘变天’时地主进行报复。许多代的农民不是都有过‘军队来复去，地主权力不改’的感受吗？农民起义常常发生，但最后上台的势力总是将农民的土地夺走。”

不久，我和朋友们分手的一天到来了。我们到达湖南省北部一个叫做新市的小县城。李克农从这里发电报，与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长沙大火

名为新市的小县城，只不过是到处都有的小城镇中的一个。它与中国其它地方的城镇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现在在我们眼里，它却是大城市了。我们睁大眼睛直看着久已不见的电灯光，看着那商店里货品很少的柜台。投宿的“旅馆客房”，

也令我们激动不已。

“客房”这个名称，无论怎么想也是不贴切的，充其量不过是有间隔的房间而已。狭窄的走廊两边，并排着用木板隔开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只放着两张床，此外便别无任何家具了。电灯只有一盏。为了使每个房间都能得到一点亮光，隔板的上部未与天花板相连。

尽管这样，在我们看来，它已是豪华的旅馆了。当房间顺利分配完时，无论谁都乐得手舞足蹈。我们在凉台上交谈新的情况。按照中国南方的习惯，凉台设置得都环绕着庭院。

电报联系成功了。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一直在为我们担心，得到我们的消息，心头总算落下了一块大石。几个小时后，为载我们而来的两辆货车开来了。

到达湘江之畔的大城市长沙时，血红的太阳，正沉入西方的地平线。“象火一样，”炳南说。不过，这时候炳南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诗一般的比喻当晚便成了恐怖的现实。

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所大建筑物之内。这所建筑物原来是一个中国富翁的家，八路军把它租了下来。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就象做梦一样：宽敞而雅致的房间、明亮的灯光、与怀念着的朋友们的重会。显得非常激动的周恩来欢迎我们一行时，用双手一一拥抱每一个人。我未想到，周恩来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和我们紧紧握手。他问候每一个人，不管是年纪最轻的战士，还是地位最低的印刷工人，他问他们的健康情况，问有什么要求。他毫不掩饰为我们平安无事归来而高兴，为他的通讯员的牺牲而悲伤。“我差不多要陷入迷信了，”周恩来说。“在这三个月中，我失去了三名副官。”

这天晚上，周恩来本人和办事处的其他人都睡在地板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我们了。我们抗议说，我们并不是伤病员，可他们说我们是贵客。最后只好领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象着迷似地细细看着房内挂着的各种颜色的刺绣。室内摆设着用中国红木制的古老而美丽的家具。湖南省熟练的刺绣女工以及她们所绣的壁毯，在全中国都很有名，受到珍爱和重视。睡觉前，当我们和周恩来一起喝茶时，我问他，估计还有多久日军会到长沙。他答道：“可能很快，他们离这里已很近。现在武汉和广州都沦陷了，日军继续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看着这个以贵重的家具装饰的房间，心想：不久日军就要住在这里面吗？

“这所房子的主人，已经搬到内地去了，”周告诉我。“他对我们租用他的房子，非常高兴。所以，租费很便宜。”

我的目光落在床架帐顶的手工精巧的刺绣镶边上。我忍不住说：“多漂亮的花边，太可惜了！如果日军来了，它肯定完了。只要他们喜欢，不管周围是什么东西，都要抢走的。我真想把它取下带走。”

周恩来很为难地摇摇头。“安娜，你知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纪律吧，是的，你肯定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是八路军的一员了。”

我们交谈后，只过了几小时，这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在我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的这个晚上，长沙被火团团围住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的中国司令官下令在全市纵火。他为什么下这道命令，现在似乎还未能完全弄明白。据说是因为误解了电话的内容所致。无可置疑，日军的攻击常常是闪电般的，可是为什么要在市中心，在许多街头同时纵火，而

事先对市民不发出警报呢？这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后来，有人认为，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亲日右翼集团放的火，这是他们叛变的信号。这就是说，借此使蒋介石走上穷途，逼迫他对日妥协。这个右翼集团的领导人汪精卫在长沙大火后，立即飞往印度支那，提出对日合作。不管怎样，长沙大火数日后，蒋介石到达已烧成一片废墟的长沙，追查责任，对当事者进行了简单的审判。包括司令官在内的三名高级将领，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后来我们听说，这场引致严重后果的大火，是在半夜快到三点的时候烧起来的。半小时后，我们被嘈杂的声音吵醒。“起来！”许多人尖声喊着。连解释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失火了！这条街烧起来了！”一个战士对我们喊道。“赶快到河边去！”

我们没有什么行李可收拾。身无一物，有时倒也有其长处。周恩来沉着地发出指示。最重要的文件和物品包捆起来，扔到货车上去。幸而，通往湘江方面的道路仍可通行。救火是没有任何指望的了。到处火光冲天，到处都是绝望的人群，他们试图从灼热的地狱逃脱出去。

“运气还算好，”李克农说。“我们一个哨兵及时发现有人放火。这个哨兵在夜间巡逻时，在月色下看见一个国民党士兵向近旁街角的一所房子点火。哨兵以为这个放火的人是发疯了。当哨兵高声喝问时，放火的士兵只回答了一句话：‘这是命令’。”

无论哨兵怎么喝止，那个放火的人并没有住手。这时候，到处都是滚滚的浓烟，天空已被火光染红，要想救火已来不及了，只好把人们吹起来避难。只听见警报乱打，更准确的说是警报乱吹。“吹”，是确切的说法，因为周恩来立即让号兵到附近的各街道边走边吹喇叭，把居民从酣睡中唤醒。可是，在这个恐怖的晚上来不及逃走而死伤的人仍然不少。要计算有多少死者是很困

难的。有人说死了二千，也有人说是二万。

衡阳郊外的“远足”

寒夜已尽，天亮了。我们乘货车离开烈焰熊熊的长沙时，李克农说：“我们可真是赴汤蹈火哩！我们还会发生什么呢？”

周恩来劝我和简小姐乘他的汽车。他是乘汽车走最近的路往桂林，然后乘飞机到重庆。我们则决定和其他战友一起行动。特别是因为需要接受我们“医疗”的还有好几个人，我们这样决定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的目的地也是桂林。从桂林乘飞机往重庆或香港可以通航。不过，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湖南省南部的衡阳市。到达衡阳后，也许将乘火车往桂林去。通往衡阳的公路很窄，满是难民的队列和军队的运输车，我们不得不在码头等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大家，当然简小姐和我也一样，在长沙时，都脱去穿得又旧又脏的褴褛衣衫，换上清洁的军服。从货车上爬上爬下，穿军服也比我们一直穿着的裙子方便得多。当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穿上军服竟招来了流言：八路军现在带着两名苏联军事顾问，而且是女的！

当我们在衡阳附近的红十字会临时总部访问林可胜博士时，他给我们讲了这一活灵活现的流言，然后他说：“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两名女军人是谁了！原来是一名加拿大妇女和一名德国妇女！”

为了等候去桂林的车，我们在衡阳呆了十天。在此期间，我

们每天都去“远足”，当然并非自愿。那是因为每天早上日军的飞机都象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衡阳市上空，所以，市民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最晚在八点半，商店和饭铺全都关门打烊，人们把重要的物品整理好拿在手上——裁缝抱着拆开的缝纫机的机头，卖帽子的把二十顶以上的帽子掣在自己头上——，走出城门，往荒野和山岗隐蔽。既没有防空地下室，住房的结构也很不牢固，如果炸弹在附近落下，房子就会象纸扎的一样，马上倒塌。

就这样，每天早上在衡阳市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出门，就象集体远足一样。队列的前头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继之，男人殿后。快到九点钟时，铜锣和号角齐鸣。“警报！”在队列最后面的人便慌慌张张地跑起来。时间已不多了。日军的飞机场就建在离衡阳市不远处。

“快，快！”人们向排在队列最后面的人这样喊着。喊声过后，一切归于宁静。每个小山岗上都聚有几千，有如巨大的露天剧场的观众。舞台位于我们的前面：澄清的秋日天空和天空下面的这座城市——衡阳。路上，尘土仍在轻轻飞扬，那是落在队列后面的人一溜烟地奔逃所带起的。孩子们全都被叫到父母的身边。香烟的烟头都灭掉了，太阳伞也关上了。谁要是穿着颜色显眼的衣服，必须马上躲起来，同时还会招致人们对他的普遍不满。颜色鲜艳和浅淡的服装易为敌机发现，这种看法支配着当地的居民，有时甚至到了无可理喻的程度——有的人因此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抓起来。人们的服装都是藏青色的，几乎很少有人敢穿其它颜色的。由于我们已完全适应了这一习惯，所以直到几个月以后，简小姐和我到了平静的上海，也仍然不敢买颜色鲜艳的服装。

我们一行滞留在衡阳时，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但市区只遭炸三次。每次空袭警报解除时，铜锣、寺院的钟、警报解除信号都响起来。人流重新返回市内，可是，许多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了。

桂 林

我们终于与衡阳和每天的“远足”告别了。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南方十二月的寒冷。我们在衡阳车站的月台上接连过了两个冰冷的夜晚。火车是不定期运行的，连续两天，连列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几百人以极大的耐心继续候车。李克农最后搞到了两辆货车。乘没有篷的货车，当然不是好受的，但总比在月台上无休止地等候要好。

广西省的中等城市桂林，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无需为住宿操心。但李克农却为简小姐和我的问题担心。“你们两位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是不大好的。你们一定听到过八路军里有‘苏联女军事顾问’同行之类的谣言。以后还会说八路军有不道德的行为哩！”

炳南想尽早往重庆方面去，他希望在桂林能与周恩来见面，与周商量今后的各种事情。炳南也认为李克农的意见是对的，我和简小姐应到浸信会的传教团那里去。

“如果找到旅馆，”他安慰我们两人说道，“立即把你们接回来。”这时候，向来是冒冒失失的马正君，和我们约好，每天来看我们。他还很肯定地说：“如果你们在那边住得不好，我会想办法的！”

“浸信会的人见到我们，会怎么说呢？”简小姐边敲着浸信会总部的大门，边对我耳语。“我们既不象可敬畏的外国人，更不象传教士啊。”

与预想的正相反，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出来招呼的两名美国妇女听说我们迷了路，对我们深表同情。她们拿红茶给我们喝，是加了牛奶和沙糖的“立顿”红茶，并马上答应了我们借宿的要求。其中一人，还很抱歉似地补充说：“可惜我们只能给你们两位提供一个房间，因为另一个房间要留给一对往香港去的传教士夫妇住。”

离开汉口之后，我们俩第一次单独躺在雪白、柔软的床上！一个浴室、一张床——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们和这种西洋式的环境已完全疏远，此时颇有些惶惑。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与浸信会这个安乐窝一样，早餐也是美式的——炳南来接我们。炳南说，周恩来在政府专用的旅馆里有一个房间。周夫人已乘飞机去重庆了，周恩来马上把空房让给了他。

“周恩来也要在这几天乘飞机去重庆，”炳南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们也给简小姐找到了一个住处。”

“陆军社”——这是政府专用的旅馆的名称。它和我们住惯了的宿处真有天渊之别。如果要打比方的话，一个象是希尔顿酒店，另一个则象难民所。“陆军社”是现代化的建筑物，前厅宽大，铺着地毯。周所住的房间即使和欧洲的一流饭店相比，也绝不逊色。

周恩来衷心欢迎我们的到来。他得知我们在途中饱受各种劳苦之后，对我们深表歉意。接着，他便开始和我们商量今后的计划。简小姐希望到香港去，所以我得设法把她送到香港。

听我们说完以后，周恩来对我说：“我已经和炳南谈过了。原先，我考虑到你们两人往重庆已走了半路，而且我自己也希望炳南尽快往重庆去。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有一个新的考虑。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香港和上海？又回到海边，回到大城市？周恩来从我的脸上一定看到了失望的表情。

“当然不会呆得很久，”周恩来保证说。“大概一个月以后，你便可以往重庆去。”

“可是，我不能象简小姐那样，直接飞往香港，”我插嘴说。“我虽然很幸运，把我的中国护照保存下来了，可是它已经过期了。当我最后一次在香港时，人家告诉我，我需要持有英国的签证。”

周恩来有了好主意。他说：“在进入印度支那的边界上，有一个地方叫龙州，外交部在龙州设有办事处。你可以在那里办护照的延期手续。巧得很，我的一位朋友，边防警备司令李将军，正在桂林。请他回龙州时把你也一起带去吧。”

“那么，在上海见面吧！”我和简小姐分手时说。她要乘一位政府顾问的私人飞机往香港去。

“假如我们一本正经地穿上西欧人的服装，夹杂在众多的高鼻子当中，我们相互还能认得出来吗？”简小姐临别时说。友好的浸信会传教士觉得简小姐身穿红军制服，足登中国帆布鞋，

到英国的殖民地去不合适，于是便把她们的旧传教士衣服借给简小姐穿。简穿上以后，那副滑稽的样子，自己看了也不由得笑出声来。那位政府顾问只是耸耸肩，什么也没说。他大概会想：“这些红色分子原先穿着制服走来走去，样子委实难看，可是现在穿上洋装，也还是怪模怪样，挺吓人的！”两个星期以后，他再看看简小姐的装扮吧！

我还得等几天才能出发。这对我反而是一件好事。很早以前，我对广西就有兴趣。在与炳南一起到中国来之前，我就想看看这个在中国最南端的地方。当时，炳南认为这是幻想。他说，要到广西是太困难了。可是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在广西了吗？而且，是在比和平年代的条件要困难得多的情况下成行的！

我对广西感兴趣，是因为它被称为模范省。我常常听说，许多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无法实现的事情，在广西都办到了。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名将军，把广西作为自己的地盘加以建设，这无疑是事实。不过，他们并不仿效军阀的老一套，而是采取了新的、先进的方法。首先是修筑公路，兴办工业和实验农场。尽管他们搞起来的农业改革，是按照上面的指示，遵从权威性的原则去办的，但是，他们这种改革毕竟使广西面目一新。广西和其它省的不同之处，只要越过湖南省与广西省的边界便能觉察到。广西的士兵和政府工作人员给人的印象也不错。尽管广西自然条件并不好，但农民的生活，却比富裕的稻米产区湖南省要好。在广西的旅途中，因已入夜，我们恐怕走夜路会遇到土匪的袭击，便向一户农家求宿。这一家的农民自豪地答道：“广西一个土匪也没有！”虽这样说，他还是高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夜的宿处。

抗日战争开始前，广西省的两名将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一直十分紧张。直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两方面还发生过武装冲突。但是，抗战爆发时，广西省的军队立即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远离故乡的战场上英勇作战。广西省派出的军队比中国其它任何一省都多。

至于风景，广西省是富有魅力的。桂林城东墙附近，碧绿的河水在流淌；河上有两座桥，水面上浮荡着水上人家的船只和渔舟。大量的阔叶树、针叶树和各种柑桔果树及其它亚热带植物，使这里的景色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最美的要算拔地而起、形如大石柱的山了。这些石山简直不象是山，而象是童话里白雪公主的住处。即使在市街的中心，在住宅和树丛之中，到处也可以看到奇峰兀立。

桂林的居民也觉得这些山具有神话般的特征。流传着的许多故事，就以这些山岩里的超乎自然的神怪为主角。据说，某座山上，有两只美丽的狐狸精，另一座山上，则住着一头老虎。河对岸的一座山里，有天然的隧道可通，传说这条隧道是二千多年以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一箭射穿的。无数的宝塔、寺院、园亭等等，都充满着幻想般的奇趣。

童话般群山中的那些天然岩洞，深受桂林市民的欢迎。进入这些岩洞，空袭的时候也若无其事。来到分布在山上的佛教寺院里，还可以吃到味道不错的素食，喝到僧人自制的葡萄酒，长途跋涉的疲劳顿时一驱而散。市内的连环拱廊、美丽的公园以及为花园所环绕的有游廊的平房，使得桂林成为一座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欧洲式的城市。

周恩来乘飞机往重庆前，介绍李将军给我认识。我要和这位李将军一起，乘三天车到广西省南部。他风度翩翩，精力过人，年龄大约是三十五岁，举止很有广西人的特色，或者说

是“普鲁士式”的。

炳南已订了往重庆的飞机的座位。与所有同我们一起长途跋涉的亲密战友们分手的时刻来到了。机智灵活、任何时候也不会束手无策的我们一行的队长李克农、鲁莽的勇士马正君、“老熊”冼可德、边参谋长以及其他一些人，一一与我握手惜别。我们还会重逢吗？

过了多年之后，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旅行时，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一位高级公安干部走近我的身旁。“你还认识我吗？”他边笑边问。“一九三八年，我们曾一起辗转湖南和广西的啊！”我记起了，他是在桂林分手时与我告别的战士中间的一个……。

八

继 续 漂 泊

由旱路进入印度支那

我们乘坐的汽车终于出发了。这是一次在农村的道路上奔走的漫长旅程。汽车本来是坐五个人的，我们竟坐了九个。坐在前面的是司机、李将军和他的传令兵。在后面的是我和一对军官夫妇，他们的小女孩和保姆在我们脚下蹲着坐。李将军的随从卫兵，站在车外的踏板上。汽车就这样开出了。车辆超载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只要能坐上车，就该谢天谢地了。

和我们同行的，除了保姆、随从卫兵之外，都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信奉的宗教，对我并没有什么妨碍，但种种清规戒律却让人为难。我们一行到达我们在广西的第一站柳州时，天色已入黑了。他们提出，要到回民饭馆吃饭。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家。我的肚子饿得咕咕作响，于是我提出一个折衷办法：随便到一家饭馆去，只要不吃有猪肉的菜就行了。他们说：“菜可能是用猪油做的。”我的意见遭到断然拒绝。

广西的旅馆，给人的印象不错。很清洁，而且也很安静。连麻将牌的声音也听不到。可是，第二天早上，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大噪音并没有少——空袭警报！我们旅店的四周都是罕见的圆锥状山峰。发出警报的，是对面小山上那座寺院里的钟。在警报发出的同时，树丛里响起麦克风传出的嘶哑声音，报告有多少敌机正向广西飞来。

我们立即坐进汽车里，眼看着无数的人们只提着行李往郊外跑去，我们的汽车擦过他们，离开了市区。约十五分钟之后，小山上的瞭望台，亮出了两盏红灯，这是第二级警报信号，逃难的人们跑得更快了。麦克风嘶哑的声音依旧响着：“敌机到柳州来了！”

飞机越过柳州上空向南飞去。大概是去轰炸连接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那条通道吧。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幸运的是，我们到了码头，在长长的行列中等候渡船时，一架日本飞机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天傍晚到达南宁。这里还没有难民。市内繁华的街道上，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因为在出中国国境往印度支那之前，人们都在这里停留休息。

“龙州还要美哪！”李将军说。事实也是这样。龙州这个小城位于密林幽谷之中以及河床很深的河畔。这里是我到中国后所见到的美景之一。龙州的天空和意大利的天空一样湛蓝，空气里荡漾着香槟酒似的香味。虽是十二月，天气却暖融融的，仍可穿着夏天的服装出门。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好好欣赏一下龙州近郊的美丽风光。小路两旁是野生的香蕉树和菠萝树，沿路走去，可以登上象画一般的耸立着的石山之巅。远处，可以看到寺院屋顶的优美曲线。可是，我却要利用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往“衙门”——那些令人郁闷的政府办事处去办理护照手续。法国领事以疑惑的眼光望着我，又看看我的中国护照，幸而有李将军的帮助，他们便在新护照上为我签上往印度支那去的入境许可。

真幸运，往印度支那去的机会不久也让我得到了。有三名八路军代表，其中一名军官，两名战士，乘汽车到越南的海防去

接收几辆货车，途中他们在龙州小休。他们很高兴地让我同乘，因为他们之中谁也不会说法语。由于是初次出国，他们显得很拘谨，这正如他们身上穿的簇新的便服一样，他们一直觉得挺别扭的。

在边境上的东丹村，战争的气氛很浓。在那里，可以看到由战争引起的各种混乱情形。法国的海关官员，也象那个龙州领事一样，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一个外国妇女，却持有中国护照，而且，同行的人很难说是绅士，相互之间只用中国话交谈——这的确有点不寻常。尽管如此，我们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还是成功地绕过一长列等候边防检查的货车和堆积如山的货物，迅速开走了。

进入印度支那国境后不久，我们到达一个就象在酣睡一般安静的小镇兰桑。在这里，我们引起人们更多的惊讶。我以为，比起人口极度膨胀的河内，在兰桑找旅馆会容易一些，于是便提议在兰桑住宿。我们来到一家叫“特罗亚·玛丽松”的旅馆，三位节俭的军人似乎觉得价钱太贵，但毕竟已到了外国，无可奈何，只好住进去了。

我忽然兴致来了，请他们三人吃西式晚餐。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使过刀、叉吃饭，用起来就象初次拿筷子的外国人一样，引人发笑。邻桌坐着一些法国人，显然是此地的名流——法国官员、军官和他们的女伴。他们以责备的眼光不住往我们这边看。诚然，在法国殖民地，并不象英国殖民地那样有极度的种族歧视，但在当时的印度支那，中国人不能说是得到友善对待的。

由于海防港有大量货物要卸上岸，并要运到中国边境去，许多法国政府官员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悠闲度日了。以前，只要他

们高兴，一天可以休息好几回，喝喝咖啡和苦艾酒，舒服得很。现在可不行了，他们要不停地看公文，检查行李，妥善处理货车及其它车辆的出发和抵达。因此，他们便迁怒于中国人，让他们长时间地等候，用各种手段故意刁难。

第二天，我在海防和同伴们分了手。由此我得以知道，在海防的海关，运往中国去的物品是会受到如此这般的对待和阻拦的。“周恩来竟交给了我这样一个美差，”我有点不安地想着。“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

在往香港去的船上，我从同船的中国乘客口中得知，香港的人口已经住满。香港的“难民”都是由广州或上海迁去的商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资产免受轰炸而逃往香港。他们的服饰华丽，面色红润，这和我在中国的农村小径遇到的那些衣衫褴褛、悲惨的流浪者，是根本不同的。

香港旅馆的房租，真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幸而，“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可供我暂住。从孙夫人、朱迪·廖到“保卫中国同盟”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衷心地欢迎我，关心我。长途跋涉的疲劳不久便消除了。

重返上海

与在印度支那一样，在香港，我也无须为空袭警报和飞机轰炸而担心，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也不会被人侧目而视了。但这样的生活我反而觉得不习惯。在香港，有时候我和朋友们在凉台上眺望着这灯光闪闪的城市，这时我觉得前几个星期的经历好象是一场梦。我真的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境吗？我真的是

在比香港海面上的帆船小得多的一叶小舟上飘荡过吗？

朋友们对我的遭遇甚表同情，常来慰问。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只作简单的回答。因为，在香港这样的和平环境里生活的人，怎么能体会我每天度过的那种令人心惊胆战的可怕生活呢？

“我想尽快到上海去，”我对孙夫人说。“回来的时候反正还要在香港停留得久些。”

“在你再次往内地去之前，还应当休息一段时间，”孙夫人亲切地对我说。“上海也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做，而且现在上海并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城市。等你再回到香港时，我们一起到海边去作几次愉快的远足。”

在开往上海的船上，在中国乘客之间，交谈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战争的，当然，对于做买卖也谈论得不少。善于发战争财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乘客中有不少就是这类人。由于中国广大的内地和沿海工业地区的联系被切断了，黑市买卖开始猖獗。日本的商品和日军管理下的工厂的产品，通过非法途径运往内地。这是很赚钱的买卖，战争的时间越长，赚的钱就越多。

上海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只有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以及我乘坐的船驶过吴淞口时所看到的焚烧的残迹，还能使人想起战争。市内的街上，几乎看不到难民。他们大多数已回到农村，或住在市郊。

上海市内的日占区，中国人必须有证件才让进入。很少人愿意冒这个险，去受日军哨兵的凌辱和折磨。进入日占区时，中国人必须向哨兵深鞠躬，恭恭敬敬地出示证件。日本哨兵对中国人的态度、表情稍有不满，便用枪托殴打。

“这种情况，每天在外白渡桥那边都看得到，”我的老旅伴简

小姐这样告诉我。她现在住在日本占领的虹口区，和一位加拿大朋友同住。

“简，倘若这些家伙得知我们是刚从日军的轰炸下逃出来的，怎么办？”当我和简小姐平安无事地通过外白渡桥时，我问道。“他们从未让你出示过证件吗？”

“不会叫外国人出示证件的。你安心地去虹口住下来好了。你虽然持有中国护照，但又没有写在脸上，谁知道？”

从外表上看，简小姐在上海的外国人中间是一个美丽的妇女，是许多年轻男子追求的对象。但在和她谈到八路军的战友们，我们照顾过的伤病员和船夫的时候，她又变成从前的简了。而对边参谋长的回忆仍能使她那朝气蓬勃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她象是在梦中见到了不能忘怀的过去。

“我真羡慕你还能回到八路军中间去，”一天晚上，简小姐颇有感慨地说。“我是想回去的，但我无法战胜对炸弹的恐惧。那时候我认识的那些人，是多么不平凡呵！”

我在上海停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委员会的商谈上。我们谈到了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委员会急于知道的是，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在上海已收集到的物资如何运往内地。为了提高委员会的工作效率，我被邀请给几个志愿做这方面工作的小组谈谈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我的房子问题使我恼火。事情解决起来并不象我设想的那么快。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离家时就替我看家的朋友胡关露，想把强住进来的房客赶走，但没有成功。拖男带女的一户人家占用了我的客厅，另一家占用了我的卧室，我和关露只好住到房子后部那间暖气不足的房间里。我原先并不准备在上海住很长时

间，所以想让那些房客继续住下去算了。但看到他们对老实的关露那么无理，便气得我要在离开上海之前把他们赶走。

“要把那些寄居的人赶出去，现在是办不到的，”关露这样说。朋友们也都这样认为。正当我想放弃我的决定的时候，一天，一位朋友问我：“你以前不是在杜月笙当会长的一个委员会里做过事吗？”

“做过的，”我惊奇地答道。“可是，这和解决房子问题有什么关系？”

“如果杜先生认识你本人，把那些房客赶走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简直不可相信，我凝视着他的脸，说道：“律师和法庭的官员都对我说过无法收回房子，杜先生能帮我什么忙？”

这位朋友只是微微一笑。然后，他很有把握地说：

“你等着瞧吧！你还不了解上海。”

过了一星期左右，这位朋友领了一个身穿大褂的人来。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能干的生意人。这位李先生——向我介绍时是这样称呼的——说话，我听得很吃力，他说的是难懂的宁波方言。

“李先生是在杜先生手下帮忙的，”朋友告诉我。“你把事情给他讲讲，他一定会给你出力。”

李先生对我非常友善地微笑着。被视为富裕的标记的金牙，在他光溜多肉的脸上闪闪发亮。只有他那尖利的目光暗示出，也许他并不象他的外表那么善良。

当我向他讲述我这桩烦恼事情时，他默默地听着，但脸上分明露出一种不耐烦的神色。他原先显然期待我托他办的事是袭击某人，或者是干掉我的对手。如今让他解决极其平常的房

客问题，在他看来似乎是大材小用。

不待我详细说明，他便打断了我的话，简单地说道：“最晚在两个星期以内，你的房客便会搬走的。只要把这个名片交给他们，一切便会顺利解决。”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他给我的名片，看上去它与普通的名片并没有什么不同。

“你说只拿着这张名片就行了？”

李先生已经准备走了，他的时间是极为宝贵的。“你还可以对那些家伙说，我是你的堂兄，非常关心房子的事。”

“我的堂兄？可是，你姓李，我姓王，而且我丈夫是另一个省的人，”我反驳说。但我的“堂兄”不想告诉我这里面的奥妙，我想再谈“堂兄”的事情，他便站起来要走了。“没有关系，”他微笑着若无其事地回答。我鼓起勇气，最后再一次问他：“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反应，你准备怎么办？”

“到那时候，就去找他们的麻烦，”李冷冷地说，但微笑却消失了。“不过你不必担心，他们不会没有反应的。”

事情果如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房客们接到我的“堂兄”的名片之后两天，便告诉我，他们最晚在两星期内一定搬走。李先生没有再来我家，我只好托介绍我认识他的那位朋友，向他表示谢意。后来，我听别人说，这种看来普普通通的名片，是印有某种记号的。这种记号在上海住的中国人都认得。这种记号表明，名片的持有者是黑社会组织“青帮”的成员。凡是这个组织所提出的要求，人们宁愿照办，也不想去招惹李先生所讲的那种“麻烦”。

在 敌 国

到上海不久，意想不到，接到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K博士给我打来的电话。K博士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他在德国留学时，我正在柏林大学学习，彼此常常见面。

在中国非沦陷区的经历，使我在接到他要求与我面晤的电话时并不觉得高兴。可是如果我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很可能登门来拜访我。出于这种担心，于是我便约他在外白渡桥那边、日军占领的虹口区的阿斯打酒店见面。当时，阿斯打几乎成了日本人的专用酒店。我心里想，和他见面时，我一定要开诚布公地向他谈谈我对日本侵华的看法。以前，我曾和K博士议论过中国东北的问题，当时他批评我，说我的看法是受了外国的宣传所骗。这一回他不会这么责备我了吧，我现在的看法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得来的。

K博士深受日本方面教育与宣传的影响，要扭转他的偏见并不容易。他认为，中国人是堕落的病夫，只会吸鸦片，不会开发本国的资源，以致国家衰亡。因此，他认为，只有让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秩序和进步，才是最妥善之策。

“也许，”我反驳他说，“你所认识的中国人是这种情况。而年轻的、新时代的中国人，却认为这些家伙是叛徒，是充满奴才相的人。”

我对K博士谈了我所认识的中国朋友，他们充满爱国精神，宁愿长期过贫穷困苦的生活，也不愿在日本统治区为日本人工作；我还谈到日军的轰炸和难民的情况。K博士好象很认真地

听着。

一天，K博士和我交谈时，反驳我说：“如果你对日本有所了解，如果你能亲眼看到我们的国民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态度，你对日本人的看法就不会这么坏了。”

“我并不反对到日本去看看，但是得等战争结束之后，”我顺着他的话说。“我知道，日本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国家，日本的国民是值得爱的。但是我想，即使我去了日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正如你知道的，我现在到日本去，在手续上并不可能，我拿的是中国护照。”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K博士并没有和我联系。我已准备往香港去，这时他又打来了电话，希望再次和我面晤。

“如果你真的想亲眼看看日本，而又能抽出几天空暇的话，”K博士说，“那么现在我就邀请你，和我一起到日本去。当然，用你的中国护照是不行的。”他紧接着补充说，“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个日本护照，这样便没有什么问题了。”

他说，他为他的德国籍的弟媳从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到了证件，我可以冒名顶替，加上他本身是有名的实业家和科学家，不会令人生疑。“如果你没有意见，只要一张护照用的照片就够了。乘飞机去，几个小时便可以到东京。”

这时候，我的脑袋里真是思绪纷乱。该如何是好？该接受他的邀请，还是该谢绝？去的话，有没有危险？无论如何，亲眼看看日本，了解一下战争对日本国内有何影响，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最后，我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

乘飞机旅行，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是相当珍贵的。我们乘坐的是日本大型军用飞机。因为K博士是陆军的御用商人，所以能乘军用飞机。他对我说，乘军用飞机是

最安全的，特务警察对军用飞机的乘客丝毫不会怀疑。

途中，在福冈稍作停留，随即直飞东京。我们都沉默不语，直到看到富士山时，K博士才开口，自豪地说，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

走马看花的话，不大能觉察到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东京是个繁华美丽的城市。它有雅致的商业区、大型的百货公司、宁静的公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孔庙（汤岛圣堂）。这一建筑物的线条构图非常完美，与这位思想家的精神很相称。日本的佛教寺院，特别是日本有名的寺院，有着许多杂乱的装饰，不如中国的寺院那样令人觉得舒畅。进入日本寺院宽阔的大殿时，必须脱鞋，到了里面也不能象在中国寺院那样可以吃花生、喝茶；在日本人看来，那样做是有亵神灵。

每天早上，K博士的秘书，一位有着美国血统的漂亮的日本妇女，便到我住宿的帝国酒店来，陪我去参观东京及近郊的名胜。参观项目是K博士亲自安排的。我愉快地呼吸着松林的清新空气，享受着海岸无与伦比的宁静，欣赏着白雪覆盖着的富士山的秀丽容姿。此刻，灾难深重的中国、战争及其每天所带来的痛苦，都仿佛离我非常遥远似的。

“日本美丽吗？”K博士问我。“在这里住下去吧！”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把你的小儿子也接来。然后我把我的第二个儿子交给你，他不比黎明大多少。这样，你可以同时教育两个孩子。他们会成为彼此相爱的兄弟。不要在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上浪费你的才能和精力了！”他竭力劝我。“你为反对希特勒而葬送了自己在德国的前途，甚至曾被投入监狱。——这有什么作用呢？纳粹牢牢地掌握住政权，反抗他们毫无意义。你现在又在为没有希望的事情尽力。谁去过问政治上的正义和不正义？日

本曾忍受过许多‘不义’，可是现在我们是强大的，我们粉碎了中国的抵抗。然后，我们将帮助中国人建设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没有这种能力。”

“尽管我是站在那些你认为是在进行毫无希望的斗争的人一边，但我还是愿意继续做些能够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工作，”我说。“我很感谢你的邀请，使我能在你的美丽的国家住了一些日子。但我觉得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必须回中国。”

在日本逗留期间，我每天并不只是寻幽访胜。依照K博士的安排，每天下午都有一个不同的人到酒店来访问我。这些访客被介绍说，我是个中国通的德国人，可以与我直率地交谈日中问题。来客都能说英语，无须译员。与我谈话的对手，K博士选得不错。他们的职业不同，政治见解也各异，年龄在二十岁到六十岁之间。

除了一个青年学生以外，这些来客全都是反来复去地讲那一套论点和标语口号式的东西。——看上去，他们似乎充满信心。这些内容，是多年以前日本早就向全世界宣传了的。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由神的意旨选定的，奉有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混乱不堪的中国建立新秩序的使命。他们认为必须帮助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当然，这种“建设”需要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

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一无所知。各种报章，每天都大肆宣扬日军大捷，中国的大部分已被占领，和平即将来临。中国人究竟为什么不希望和平呢？每个访客都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并不用许多例证。我只对他们说，认为和平不久就会来临，只是一种错觉，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只要日军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不会有和平。这一点，他们当时恐怕是不会相信

的，但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大概已想起了我的话。

在印度支那负责运输

和上海告别，我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最担心的问题——让房客迁出，也毫无困难地得到了解决。关露仍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怕关露又找来一些蛮不讲理的房客，便把其它的房间借给从北京来的一户善良的人家。能从原来狭小的住处搬出来，他们感到很高兴。

我把自己的东西几乎全都留在上海。汽船挨炸沉没时，许多珍贵的记录和纪念品都失去了，吃过这个苦头，我随身便不带重要物品。我想，上海现在局势平稳，大概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为慎重起见，我还是对关露说，如果她离开上海，或者有什么危险的话，请她把我的装着最重要物品的两个包袱，送到德国朋友处去。

遗憾的是，关露未按我的要求去做。我留在上海的东西全都失去了。战争结束后，关露哭着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一天，日本警察对我们家进行彻底搜查。可能是因为他们怀疑那家北京人，或者是怀疑关露与在上海郊区活动的游击队有联系。关露没有来得及把我的包袱转移走，日本警察把所有的物品都没收了，连只是贴着我在德国时拍摄的生活照片的几本照相簿，也拿走了。

我在香港逗留的时间不长。孙夫人亲切地邀我到浅水湾的美丽海滩再休息几天，但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办，实在没有心情接受她的邀请。

在香港滞留时，我经常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商洽我到印度支那的工作。这项工作看来简单，其实非常麻烦。说它简单，是因为只办理通关手续，把在数周前已进了海防港仓库的医药用品和野战医院用的医疗器械，用货车运到中国境内去。说它麻烦，是因为虽已采取了种种通关手法，法国人的海关官员仍是诸多留难，持一种令人简直不能相信的恶劣态度。两个星期以前，有两名外国医生专程到海防进行交涉，但毫无效果。甚至他们乘坐的开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海关也不放行。

分手时，孙夫人对我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我们还谈到了我到重庆以后的工作。孙夫人反复向我说明：关于野战医院和得到“保卫中国同盟”支持的许多计划的情况报告是如何必要。我答应她，我尽早去华北前线，这是因为来自华北前线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太少了。

往印度支那去的船只，在几个月前已预订客满。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很快坐上船，这是因为得力于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的船舱里还有一个空床位。她就是安丝·李。这位年轻姑娘长得很漂亮，是香港一户富裕人家的女儿。她家里并不高兴她只身到不安定的充满危险的内地去。可是，和香港、新加坡以及其它华侨集中地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由于爱国心的驱使，安丝决心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她申请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的秘书。好几年，她都安于这个薪俸很低的职位。这份薪俸，还没有她在香港上学时从家里拿的零用钱多。

我们乘坐的是法国船，除我们之外，还有二十名司机。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向“保卫中国同盟”提出志愿担任滞留在海防的货车的驾驶员。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在旅途

中要对他们负责。对我来说，这项任务并不轻，因为他们只会说广东话，如果没有安丝代为翻译，我几乎不能明白他们要表达的意思。

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除了一件小事，我们和他们相处得还不坏。因为这件小事，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恨我。这件小事就是种痘。进入印度支那的国境，必须持有种痘的证明书。这种证明书在香港是一宗大买卖。这是因为许多中国人由于迷信，对一切免疫注射都害怕，或者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人办的办法使自己生病呢？不能否认，常常有人种了痘后会发热。由于上述原因，这二十名司机早就弄到了假的种痘证明书。在船上，他们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证明书是花一元港币买的——其实，种痘的话，一分钱也不要花，那又何苦呢？

我想来想去，该如何是好？因为我对这些青年人负有责任，万一以后出了事故，我是难辞其咎的。于是，我毫不理会他们的抗议，到了海防，要他们一个个在我面前种痘。他们肯定认为这是外国人的诡计，不高兴了好一阵子。幸好，只是种痘的部位稍为有点肿，除此之外并无其它任何不良反应；而且，我还给他们每个人一元港币，作为那张已没有用的假证明书的赔偿。这样，他们和我才算是言归于好。

安丝和我，是船上罕见的乘客。我们两人的护照常常弄错。她虽是中国入，但住在香港，所以有英国护照，而我却拿着中国护照旅行。检查后把护照交回给我们时，总是把中国护照交给安丝，而把她的英国护照递给我。

据两个星期以前已到了海防的那两名医生说，在旅馆不可能找到房间。他们自己都在暂泊于海防港的外国船上过夜。在我们从香港出发之前，他们一直设法给我们找旅馆，结果还是徒

劳无功。

在海防迎接我们时，他们不安地告诉我们：未找到房间。我们却得意洋洋地答道：“住处吗？我们已经有了！”

他们的脸上浮现出惊奇的神色。在坐进小汽车离去时，我们对他们说，“今天下午在海关见面吧！”他们更加觉得惊奇了。

真想不到，我们竟能这么幸运。这是托两位中央银行的先生之福。我是在船上和他们交谈认识的。他们得悉我和安丝的护照常常弄错，觉得很有趣。他们还等待着更有兴趣的事情：海防港的法国官员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当作中国人——用粗鲁的态度对待，还是把我看作外国人呢？

“在海防港，我们中国人可惨了！”其中一位先生说。“法国的海关官员，故意为难，把我们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课税品的定价表，完全由他们随意抽税。而且，检查以后，还要奔波好些天，从这个机关跑到那个机关，填写各种表格，才能领回自己的东西。”这两名富裕的银行职员非常担心，不知这回对他们满装着高级物品的箱子，海关会怎样处理？对此，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当我和安丝对这两位先生坦白谈到在海防没有住处，正为此而为难时，想不到，竟找到了公平交易的好办法。我的脸是外国人，虽然拿着中国护照，但海关官员一定仍会当我是外国人。而且，对一个妇女，他们不见得就会诸多留难。商量的结果，决定把四个人的行李全部当作我个人的来申报。提箱不下十二个之多。但妇女有时不是也带几十件行李旅行吗？我为他们带行李所得到的报酬是：可以在中央银行供来宾用的客房下榻。我们到达海防后，对那两名医生夸口说，不必为住宿而担心，实情如是。

一切事情如期进行，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快一些。这是因为，法国的海关官员对说法语的外国妇女的态度是殷勤的。我用手指着周围堆积如山的十二件行李说，这都是我的，然后签了字，海关官员并没有说什么不满的话。当他们知道我是说德语时，态度显得更为亲切。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竟都出生于亚尔萨斯^①。“我的”所有行李，在很短时间内便盖上表示已经通过的“O”的印记。搬运工人随即把行李运到汽车上。安丝和那两名银行先生已在那里等候我。皆大欢喜的神情是很难描述的。安丝和我的喜悦不相上下，按“互利协定”，我们可以住到漂亮的房间里去了！

两名男子早先专程到海防来，未达目的。而我这个妇女，和法国的海关官员打交道，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结果。——这是孙夫人的推理，这个推理现在已证明是正确的了。但有一点是孙夫人想错了的。她认为我的法语定能发挥作用，实际上德语更有用处。这是因为在海防的法国官员，全都是亚尔萨斯地方出生的人。两名医生中的一人，是英国人托尔伯特博士。他对我能顺利通关，显得似乎颇为激动。“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英法同盟吗？”他嘟嘟囔囔地说。“说是同盟国，竟还是德语的势力大。用英语和他们说话，那些海关官员的脸色总是没有好看的。”事实上，英语在印度支那用处并不大。因此，在外国语中只能说英语的中国人，碰到这种情况，可就苦了。

我初次往海关去时，几乎把海关也震动了。“夫人，你说什么？”出来接待我的官员这么说。“你是妇女，准备干运输货物、办理货车公文手续之类的麻烦事吗？这可不是一个夫人所能做

^① 法国东北部一个操德语的地区。

的呵！”

我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向他承认，“我对海关事宜一窍不通，但这个工作又不能不做。我相信，海关的各位先生一定会热情帮助的。”

事情果真如此。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可以领取“我的”货车了。而讲着笨拙法语的托尔伯特医生却非常失望，十一点五十分，办事员对他说，办公时间可惜已过，让他星期一再来。他已等了两个星期，结果竟然如此。英法同盟，英国方面又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星期日一早，我的堂堂皇皇的车队，沿着两旁是茂密的香蕉树和竹林的道路，穿过绿油油的水田，向河内奔驰。虽然还只是三月天，却已象初夏一般暖和。河内的空气非常柔和，市内满是灌木和馥郁的花香。我多么想摆脱海关的课税表和货物证件这些伤脑筋的事情，而沉浸在这充满罗曼蒂克的闲适气氛里。

我领着安丝·李到河内的红十字会办事处。她此后的旅程，就靠这个办事处关照了。我原先听说在河内也很难找到旅馆，为此而忐忑不安，结果还是租到了杜·拉·嘉鲁旅馆的一间很清洁的房间。经营这家旅馆的是两个岁数不详的法国妇女，她们很热情，人品也不错。看起来不象一家旅馆，而象家庭式的寓所。这两名妇女好几次对我强调自己的旅馆环境好，在这里住，不会有任何不安。她们还举了许多例子告诉我，单身旅行的妇女，在高尚、豪华的大旅馆里住宿，会遇到可怕的事情。

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傍晚时独自外出是危险的。好象所有的殖民地城市都一样，河内也不例外，哄聚着不少没有妻子的男人。因此，虽然很可惜，我还是打消了傍晚以后外出的念头。否则我会在花香弥漫的林荫道上散步，吹吹湖边的凉风，

或在设于人行道上的许多法国式咖啡座上喝喝咖啡的。

晚上不能外出，我便利用白天每分钟的闲暇，去逛游这个美丽的城市。河内比我在亚洲东部看到的其它城市更象欧洲。在欧洲人居住的区域里，街道宽敞，树影扶疏，再加上别墅和公园，酷似巴黎的郊区，很少看到越南人。但是当地人的踪迹还是能清晰地看出来的。在白色的墙壁和浅色的马路上，特别是在颜色对比非常显著的地方，都被血红色的槟榔汁弄脏了。那是因为越南人喜欢吃槟榔，故意把槟榔汁巧妙地吐在路上和墙上。看到他们被槟榔汁染黑了的牙，实在有些恶心。

当时，从外表上来看，印度支那的一切都非常平静。然而，法国对谋叛的人采取了何等残忍的报复手段，越南人是很清楚的。据说，叛乱分子，或者被视为叛乱分子的人，都被处死，首级被悬在发生叛乱的中心示众。当地居民有一种迷信，怕当无头鬼，法国人便以此来儆众。

但法国的文明力量并没有达到农村。我在这遥远的旅途中，直到中国的边境，沿途所见都是破破烂烂、拥挤不堪的小房子，贫困和疾病在里面蔓延。

与在其它殖民地一样，在印度支那也会遇到一些小人物，即下层的官员和职员，他们在本国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到了这里，便有权有势，作威作福，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管怎样欺人，甚至使用暴力，也不会因此而受处罚。越南人默默地无表情地忍受着。可是他们的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呢？这种被压抑的痛苦能持续多久，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朋友和越南朋友，往往非常激动地向我讲述他们过去所受的屈辱，他们说，这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王太太来了!

待我的“继任人”——从中国国境来接替我指挥货车运输的人——到达河内，我们便又出发了。在东丹的海关与我办交涉的一个法国人又是亚尔萨斯地区出生的。他说办理通关、押货不是妇女应做的事，与我开了几句玩笑，就把我交上的证明文件还给了我。他连货车上装载的东西也不看，就让我们通行。我们的司机把等待海关检查的汽车队列甩在后面，以最高速度驶向中国国境。

我在中国国境的运气也不错。运输货物表和其它文件的检查结束后，当我接过盖上大印的通行证时，我注意到一个曾经与我有一面之缘的青年军官，他是李将军的随行人员。他也认得我，所以手续非常简便就办完了。这个军官还特地用自己的小汽车载我到龙州。到达龙州时，李将军热情出迎。

“有你的一封电报，”他大声地说。“八路军办事处打听你来了没有，要你立即回海防去，新的待运货物又到了。”

此后数周内，我反而常常为我能顺利地通过海防和东丹的海关而烦恼。随着我的“名声”到处流传，各方面的求助纷至沓来：“哪怕是只帮一次也好。”红十字会、中央银行、广西军队都向我提出这个请求。此外还有数十家私人开设的公司求我给它们办理通关手续，度过这个名符其实的难关。如果有求必应，此后几个月我恐怕都要在海防与中国国境之间来来去去了。求助的人中，有的以“你既然是爱国者，帮助我是义务”为理由，有的则提出给我钱或者将运输货物所得的利润分一份给我。

但光是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办运输已够我干的了。通往东丹路上的每个弯道，每个村庄，我都熟悉了；当然，每个海关官员我也都认识了。

“王太太，身体好吗？”卫兵见到我时，都这样笑容满面地说。

我在广西南部一带成了知名人士。这是我与红十字会的一个青年医生往南宁去时，在旅途中得知的。我和这个医生前一天晚上在河内吃晚餐时才认识，当时我求他让我搭他的汽车，因为我必须在次日傍晚前从中国边境继续北行。红十字会规定，不是该会工作人员不得乘坐该会的车辆。我也知道这个规定，所以，医生虽然答应让我同乘，但并不怎么高兴，对此，我也不觉得奇怪。

在往南宁去的三个小时里，我们在小汽车里一言不发。抵达南宁时，他第一次开口，问我住在哪里。我答道：“还没有决定。”他说，政府的招待所恐怕是住不上的，于是他提出把我送到浸信会去。

其实，我在政府招待所已住过好几回了，不过，我对他的建议并没有拒绝，反正住在哪里都没关系。医生在送我到浸信会之前，想查问一下他已订好的房间有无变化，于是将汽车开到政府招待所门口，他急匆匆地走了进去，把我一个人留在车里。

招待所门前，有一个卫兵站岗。他是李将军的下属。这个卫兵看到我在车内，便大声地叫道：“王太太来了！”这时候，招待所里正开着军事会议，卫兵的喊声使会议也中断了。当医生从招待所出来时，一些将军和上校们正围在我的身边。他们是想看看卫兵这样大喊大叫的王太太，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李将军向我打招呼，并把我介绍给大家认识。不用说，我很快就得到招待所的一个房间，而且是国宾用的房间！

青年医生目瞪口呆地瞧着这种情景。他显得非常尴尬，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道歉的话，然后又问我：“明天还和我一起乘车去桂林吗？”

“谢谢，”我有点客套地回答说。“明天我和李将军一起到龙州去。你太好了，用车一直把我送到这里。我知道红十字会的车是禁止给外人坐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你的上司林可胜博士也不会说什么的。”

随李将军往龙州去的两名军官，用非常漂亮的德语与我交谈。他们曾在德国的陆军大学留学多年。这两名军官回忆当年的情景，十分激动。就象许多人把广西省称为中国的普鲁士一样，如果不看面孔，一定会以为这两名中国军官的老家不是南宁，而是波茨坦哩！

在汽车里，我坐在这两名军官的中间。因此，我在上海买的安哥拉兔毛织的毛衣的长毛，免不了要粘附在他们的军服上。到达龙州后，这两名普鲁士式的一丝不苟的军人想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尽早把粘在他们非常考究的军服上的安哥拉兔毛弄掉，样子为难极了。如果不弄干净，他们就会有故意紧靠着我坐之嫌。对此，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人都会忍不住要发笑吧。但对当事人，这两名中国产的普鲁士军人来说，可不是好笑的事情哩。

在云之南的云南省

如果我搭乘货车队去重庆，至少要走十天。行车时间长我并不怕，使我觉得可怕的是，途中如果遇到象在印度支那时那

样的委托，就会占去更多的时间了。炳南来信说，从朋友处借了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间，现在重庆还没有受过猛烈轰炸，但孩子还是以寄放在祖父处为宜。孩子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老爷完全没有让他离开的意思。“无论如何，你先到重庆来，”炳南在信中写道。“一切面谈。”

为此，我立即下决心，订了下一班飞机的座位往重庆去。我想，再过几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但实际上却花了三天时间。由于飞机引擎发生故障，必须在云南省的省会昆明停留。云南——正象字面上的意思一样，它在云之南——是与西藏、缅甸、泰国以及当时的印度支那相邻的高原地带，它较晚才被汉人征服。当地的居民被汉人赶到深山去，就在那里生活。但他们的语言和古老的风俗习惯，历数百年依然持续不变。

在昆明的街上，除了汉人以外，我们看到许多少数民族。其中有“山胞”，也就是身体魁梧的藏人。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一边肩袒露，另一边肩披着毛皮。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文明”的模样。电灯、电影院、铁路等等对他们来说，就象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奇迹。好几个不同民族的妇女，穿着刺绣得非常漂亮、色彩艳丽得简直令人目眩的衣服。这和汉人清一色的服装，恰成强烈的对照。这些少数民族妇女身上还装饰着许多银制品，饰物闪闪发亮，就象要和花衣服斗丽争妍。

云南有一千二百万居民，只有三百万汉人。其它的少数民族与邻近诸国的民族有着血缘关系。云南省主席也不是汉人，而是在云南省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彝族人。

这些少数民族中，有许多都拥有几百万人，以人口论可与欧洲各国匹敌。可是，无论哪一个少数民族，生活都是非常悲惨

的。从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汉人移民云南，占有了昆明周围肥沃的高原地带。他们夺得的土地面积虽小，但土质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却非常优越，而且因为当地被夺去土地的少数民族成了廉价劳动力，这些汉人的子孙一直过着地主的生活。厌恶体力劳动的地主世家，坐吃山空，渐渐成了飘零子弟。他们虽然穿着绸子大褂，并且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把指甲留得很长，可是那衣衫已经脏了，且破旧不堪。

在这一带荒山僻岭里，几乎没有汉人有勇气涉足其间。因为他们害怕那些受过他们的祖先残酷欺压的少数民族，会采取报复行动。驻防边境的中国军队，对少数民族非常残虐。他们把所有少数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对他们采取蛮横的态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少数民族负担奇重，要比汉人提供更多的谷物和壮丁，摊派更多的苦力和筑路劳工。

十九世纪末以来，法国人把这个与其殖民地印度支那相连接的省份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铺设了从河内通往昆明的铁路。除了飞机，这条铁路是云南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现代化交通设施。在很长时间里，从中国内地到这个边陲省份，除了骑马或步行，别无他法。后来，从重庆经贵阳到昆明的公路修通了。在沿海地区通往内地的公路和铁路全都被日军占据的情况下，这条公路在战略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八年，著名的滇缅公路开始修建。这条公路由昆明通往缅甸的腊戍，全长约一千一百六十公里。滇缅公路一九三九年通车，这是日军占领印度支那以后，中国与外界连结的唯一通路。

打个比方说，中国所有的大门都被封锁了，云南却成了与外界相通的唯一的后门，因此，它的地位非常重要。而且，云南又是矿产的宝库，它的锡藏量占世界第一位，金、银、铜、铁、铅的藏

量也很丰富。

云南省的面积有德国和波兰合起来那么大，但因为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处于孤立状态。龙云当省主席的时代，云南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不仅弄得很僵，而且非常紧张。因为远离南京政府，地方军阀的举止行为都有如专制君主。云南省甚至拥有自己的货币和外交部。表面上，云南省主席和其他知名人士都是国民党员，这诚然不错，但尽人皆知，这些人原先都是盗贼，后来却被称为“省立银行经理”，成了大地主、大企业的经营者，他们支配锡矿，独占鸦片的买卖权，以投机成为巨富。有的工于心计的人还把大部分所得存入外国银行。

云南到处都弥漫着鸦片味。不管哪一个市场，都出售吸鸦片用的烟管和烟灯，鸦片就象买米一样容易得到。为了哄哭闹的婴儿，有的母亲竟把涂有鸦片的甘蔗给婴儿吃，这也并非罕见。

鸦片被强迫种植，并公然被奖励吸食，获利甚厚。用不着说，这些利润都流进统治阶级的腰包里。一般民众则日益贫困。大部分土地——我听说是三分之二的土地——为住在城里的地主所有。在中国，不管到什么地方，农民的命运都是悲惨的。特别是在云南，农民为了得到很少的钱便把女儿卖掉，在昆明的市场上，只要几元钱便可以买到一个少女。中国西北的农民，只是在极为困顿的时候出于无奈才卖儿子。与此相反，云南每年都有几百人被卖到锡矿当奴隶。

我的一位朋友，是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教友派教徒派到中国的救援组织“教友联合会”的成员。他曾经向我描述过云南省锡矿的情况。矿井的坑道窄得可怕，背着背箩的孩子只有在地上爬行才能通过。绝大部分矿工由于过重的劳动及非人的劳动

条件，都患有营养不良的疾病，身体也变成畸形，非常痛苦。

从前的地图把昆明记作云南府，到现在，昆明仍残留着一道旧城墙和几个巨大的城门。昆明的城门和中国其它城市一样，为连结城内外而建。城墙内是旧城，那里的道路与北京和西安相同：纵横走向，方方正正。

马和骡的长长行列，在巨大的城门进进出出。昆明果然是边境城市，到处都洋溢着热烈、刺激而又带点粗野的生活气息。这里的傍晚，终年都令人觉得舒畅。由于地处海拔二千米的高原，这里的自然条件使得昆明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往远处可以看到座座青山耸立，发出淡淡的光。到了傍晚，便是阔绰的将军、地主和商人的行乐时光。剧场、电影院、饭馆、澡堂等处的灯光，都明晃晃地照耀着。

在昆明市郊，建有现代化的楼房，它们都是为法国人造的，这些人在法国经营的铁路上和大公司里工作。有西式的住宅、学校、医院和办事处等。我住宿的欧洲大旅馆，也在这个地区。欧洲大旅馆住有许多外国商人，大都是法国人，他们是军火商、顾问和飞机驾驶员等。

昆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但唯一令人不满的是这里的生活条件以及在这里居住、在城门进进出出的无数人的命运。

九

战时的首都——重庆

重庆的旧与新

重庆所在的省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但重庆却是一个极丑的城市。尽管如此，抗日战争中凡是在重庆住过的人，都会深怀感慨地回忆起这个长江之畔的城市的闷热夏天和大雾弥漫的冬天。灰濛濛的雾，在每年冬季几个月里，在日军飞机空袭时护卫着重庆。在这里生活着的各种各样的人，也是我不能忘却的。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的战时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日难以想象的。共渡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

抗日战争前，到重庆来“云游”的外国人和来自东部各省的人很少。战争把国内外的人都唤到重庆，聚集到一起来了。这一来，这个有如处于睡眠状态的省会，便成了临时的首都。

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末，全市都覆盖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磺的气味。

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

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

当地居民绝大多数人都患过疟疾，每年有好几千人死于霍乱和伤寒。

冬天的雾浓得使人难以忍受，夏天水蒸气多，闷热异常，日子也不好过。只有植物得到了宜于生长的温度。一年四季，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亚热带的树木生长之快，令人吃惊。在近郊的山岗上，长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鲜艳耀眼。

我到达重庆，是一九三九年春季的一天。那天下着雨，炳南到机场接我。这个飞机场是与众不同的，它建在长江的沙洲之上，涨洪时顿成汪洋一片。因此，只搭了几间小木房作机场的办事处和候机室。这样，洪水来时人们可以把这些小房子拆掉，到远郊的飞机场避难。

从沙洲到对岸坚牢的石阶，坡度很陡，这之间临时搭起一座木桥。健壮的人可以徒步登上石阶，上年纪和图舒服一点的人，便坐滑竿。滑竿在重庆非常普遍，登高时它是一种很实用的工具。抬滑竿的是两名苦力，远程的话便多一名替换的。有些外国人，初次看到气喘吁吁的苦力和浮在半空中随时都会摔下来的坐客时，便发誓永远不坐滑竿。但到了闷热的夏天，连动一动身子都觉得疲倦时，他们会很快把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一狠心坐上了滑竿，不由得便闭起眼睛，边被抬着走，边祈求自己能平安无事地下来，他们始终担心轿夫在容易滑倒的石阶上滑了脚，将他们从高处摔下来。

坐人力车比坐滑竿更危险。上坡时象蜗牛爬行，自然用不着担心它会出事，但下坡时却快得出奇，使坐客胆颤心惊。尽管如此，比起拥挤不堪的破旧的公共汽车，人们还是愿意选择人力车。何况，公共汽车只在大街通车，人力车就方便得多了。

重庆由于有许多外省人流入，新旧交错，成了一个奇特的城市。带有巨大城门的古老的城墙内，密密麻麻地并排着许多灰色的住房，道路多是没有铺上沥青的狭窄的小路，宽阔的街道很少。摇摇欲坠的古老的宫殿四近，是破陋的竹房。在旧城外的市郊，已出现了一个新区。新区的房舍都建在山丘上，有花园相绕，美丽如画。这里，每天都有新房落成，力求短期竣工，工事并不讲究，这是因为赶着给几千名政府官员盖办事处和住宅。建筑材料是粘土和本地盛产的竹子。

除了滑竿和人力车外，在重庆也可以看到美国制的吉普车和小汽车。来自沿海各省的人都穿西服，穿着长袍马褂的四川人以侮辱的口吻称他们为“下江人”，而他们则嫌四川人迟钝、落后。当地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善于经商、多礼得令人不快的外省人的非凡才干。

我们最初住在旧市区。住处是战前建造的一所坚固的大房子。房子盖在巨岩上，岩洞里自然挖有防空设施。不久我便知道，在重庆，防空洞比其它条件都更重要。这所房子是炳南从他朋友那里找到的，我们租住其中一个大房间。因为这所房子曾是军用建筑物，我觉得可能会有危险。但炳南却安慰我说，以他过去的经验来看，日本炸弹几乎不曾命中过军事目标，大都落到旁边去了。

四月，还是幸得大雾弥漫，我们的家也免受日军轰炸。我家大门有两名哨兵守卫，门前的各条小巷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卖米的，制作铜器的，卖布的，卖菜的；写信佬和算命先生也摆出了档口。中草药香和小饭馆的饭菜香混杂在一起，满街飘荡。流动小贩肩挑的筐子里装着蔬菜或灰褐色的大盐粒，扁担上下晃动着，他们则边走边吆喝。不亚于这种吆喝的怪声怪调，是叫

卖商品的小贩们发出的。在噪音之中，还可以听到砰砰的爆竹声。这大概是某处在举行婚礼，或者是送葬时为避邪逐妖而放的。

在直通长江畔的石阶上，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堪。几百名抬着轿的轿夫，在石阶上上上下下，高声呼喝着要人们让路。还有不少人挑着满装带黄褐色粘土的江水的水桶爬台阶，这是因为旧城区只有少数人家有自来水。

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往外望，只见一只小渡船终日在这里的岸边与南岸之间往返。这是一只残旧的汽船，随着水位的变化要在不同的码头靠岸。它满载着乘客和货物，常常被江水翻弄得摇摇晃晃，几乎撞着涨洪时隐在水里的尖锐的礁石。天黑后，便用小舢舨代替汽船渡江。小舢舨被看不见的漩涡卷去，是常有的事。

只在几个小时内，江水的水位往往就上下几米，为了在长江上航行的船舶的安全，岸边放着几块大黑板，记载水位的变化情况。江水水位升高时，大型的船只也可以在重庆停泊。外国的炮舰——美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各一艘——就是利用洪泛到重庆来的。但水位下降时，这些炮舰就必须更换码头。否则，某一天早上，整艘舰便会被架在礁石上动弹不得。战争期间，随着水位变化而更换码头，成了这些炮舰唯一的活动。因为长江下游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它们不能沿江而下了。

装着机器的木箱接连不断地在长江两岸卸货。木箱上面有来自“上海”或“汉口”的标记。这些货物往往要好几个月才运抵重庆。随后由搬运工人挑运到正在建设新工厂和工场的地方去。

随政府来到重庆这个战时首都的人，都有在这里长期居住

的精神准备。四川省四面八方是崇山峻岭，日军入川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也没有人相信和平会很快降临。几乎所有在重庆的“异乡人”都有家人留在故乡。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炳南的朋友是陕西省人，他们也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宁静的西北老家了。我是这所房子里唯一的妇女。

对中国人来说，与家人如此长久的离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有不少在求学的男人，常年累月离开家人生活；也有的人经济丰裕，在时局不稳时便把妻子儿女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中国的现代妇女，如女医生、女记者、女技术员等，由于工作的缘故长期与丈夫不在一起生活，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要把黎明接来重庆，朋友们却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说，与其让孩子到受威胁的城市来，还不如让他仍旧在宁静的农村，留在祖父身边。但炳南和我都想让黎明离我们近一点。残暑时分，当我结束了往华北前线的长途旅行时，我们便给老爷写了一封信，虽然千里迢迢，也希望杨妈把黎明带到重庆来。

柳夫人的故事

我到重庆不久，便有两位朋友来访。他们和我在印度支那停留时常常见面。其中一位是萨空了，他聪明能干，风度翩翩，是作家兼记者。萨空了刚从印度支那运印刷机到达重庆。他此行是奉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把印刷机从印度支那运到遥远的新疆去，现在正在运送途中。新疆是中国西部边陲的一个大省。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被认为是进步的，因为他请了许多有名的作家、记者、教师、艺术家到新疆的首府迪化（即今乌鲁木

齐)，为该省的文化建设出力。

萨空了也是应聘者之一。在海防，他好几次劝我乘他的货车一起回重庆。但看起来他并不急于动身，我便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他动身的日期一再推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妇女。这是我不久以后知道的。那个妇女就是柳夫人。我和她曾在海防见过面。一天，萨空了与柳夫人一起探访已回到重庆的我们。

他们的来访，使我非常高兴。和萨空了谈话，是一种享受。他见多识广，读过很多书。他不只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而且长于讽刺式的批评，常常一语破的，尖锐而洒脱。而且，他说的是口完美的北京话，光是听他说话便是一种享受。

柳夫人亲近萨空了，对他怀着强烈的思慕之情。萨空了是否已回应了她，这是很难断定的。但萨对女性的义侠情怀，无疑已使他对柳夫人动了心，况且，柳夫人不惜为爱情而抛弃一切。柳夫人是国民党一个有名望的官员的太太，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出身于四川省一个富裕的旧家庭。她的这一行动，局外人无论谁也是不理解的。她所追求的，不只是摆脱现在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且更带有政治色彩。

萨空了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民主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左派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看来，民主同盟与共产党几乎一样，非提防不可。因此，萨受到与他有政治关系的朋友们的尖锐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也因此，被激怒了的柳先生抨击了民主同盟，指责民主同盟是骗子和奸夫的团体。

“不管怎样，我也一定要离婚，和萨空了一起到新疆去，”柳夫人对我说出心里话，此时，萨正在和炳南谈话。萨也就此和炳南商量。

我对柳夫人说，还是不要感情用事，要为两个孩子着想，希望她能够明白过来。但她却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了。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做。我讨厌我的丈夫，十六岁时，我家里就把我许配给他了。我也讨厌这些年来一直过着的太太生活。整天梳妆打扮，玩‘麻将’，招待客人——这就是我的生活。如果我回到柳的身边，只是重复同样的生活而已。萨却使我懂得新的世界，即使是妇女也能够做点什么的世界。”

此后，我和柳夫人只是偶尔见面。她的丈夫柳先生不仅不答应与她离婚，而且还禁止她与萨空了和萨的朋友见面。到五月空袭开始时，她与萨空了才得以在重庆市内会面。因为轰炸非常激烈的时候，谁也不会跟在他俩后面，观察他们的行动。两人在空袭时会面，好几次遇险而幸免于死，这只能认为是奇迹了。

对多愁善感、纤弱的柳夫人来说，这些日子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她的两个孩子，受了父亲的教唆，反对她的行动。孩子们再三恳切要求柳夫人回家去。住在成都的柳夫人的父亲，听到女儿的“过失”，立即要她回娘家“改邪归正”。

这个故事并非以喜剧收场。相反，以悲剧结束。一天，柳夫人的父亲终于来了，他把重庆的社交界传为“病人”的女儿带到成都去。他让女儿在“恢复健康”以前留在成都。

柳夫人从成都还给我来过一封信。这封信还是她的女佣偷偷寄出的。信上说：“我被禁闭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逃出去，便是死掉。”

三个星期后，我听到了她的死讯。

贵 州 之 行

“我想，你在重庆休息的时间不会太久，”炳南说。“周恩来说，有事请你办，听说是紧急的事情哩。”

“多半是让我到华北前线去吧，以前也说过，”我说。“我也想尽早出发。现在到八路军那边去不会太难，以后就不知道了。”

我们在八路军用作办事处的一所宽敞的旧房子里与周恩来会面。这所房子大概在现在重庆的城郊一带，座落在一条阴暗的小巷里，以前可能是农村的房子。客厅的一面墙上贴着地图，有两名穿着蓝色制服的战士在烛光下工作。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有几名战士在低声唱歌，大概是在练唱新歌。

周把我们领到一间布置得很朴素的房间里。那是他和邓颖超的住房。他让我们喝茶、吃花生，详细给我交待工作。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北方而是南方。“只是一次小小的旅行，”周恩来说。在中国，到达目的地要花上两三天的行程，也叫做“小小的旅行”的。

我的任务是往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与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借此机会，我准备向林博士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向他说明我已任该同盟驻重庆的代表了。

“我会让八路军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周恩来说。“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这样的话，路上即使要检查证件，查问的人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

也会有帮助。”

一个雾濛濛的早晨，我和四名八路军战士同乘一辆货车，从长江南岸出发，离开了重庆。往四川省邻省贵州的省会贵阳，早已有为行商而修筑的道路可通，但把这条路修成可通汽车的公路，还是最近的事。只要天气不坏，路是好走的。公路有足够的宽度，汽车在几乎所有地段都可以并行。有数不尽的急弯——在称为“蛇区”的区间，便有七十二个弯——但技术好的司机并不难通过。不过，雨天时路面的泥土就象肥皂一样滑，开快车很危险。

从贵阳前行通过昆明直达缅甸的这条公路，是与中国大后方相连的唯一补给线。这条公路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在悬崖峭壁的深谷之下，有各式失事的车辆残骸。失事者的遗体没有人去寻找。一旦翻车落到这个无底深渊，就万事皆休了。过不了多久，事故的现场便会被丛生的杂草掩盖掉。

我们的货车司机尽量紧靠着山边行驶。整天行车对他来说不算一回事。尽管如此，天黑以后找个适当的地点过夜才是聪明的办法，否则万一汽车抛了锚，就得在路上宿一晚。人们说贵州省土匪出没，并非全然没有根据。据说这些土匪专门袭击入黑以后停在公路上的货车和公共汽车，抢劫司机和乘客。

只有大城市才有汽车修理厂。不用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是没有的。如果汽车抛了锚，司机不能自己修理的话，便只好把它扔在那里了。

尽管在交通运输方面汽车的作用很大，但在这条公路上只有很少量的车辆行驶。这里的机械化车辆太少了，汽油也不足。几乎看不到小汽车的踪影。从重庆到贵阳或昆明旅行的人，都选择行程只要几个小时的飞机。车辆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军用

货车，上面坐着去守卫中缅国境和剿匪的士兵。

我们在途中接连不断地遇到骡子的行列和挑着行李的苦力队伍。人仍然是最廉价的运输工具。我们看到有的男人用背篓背着很重的行李，有的竟背着粗重的木头。在他们所背的货物之下，缚着一根似乎撑不住重物的木棒，这是苦力们在走斜坡多的路时，用来支撑货物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卸下背上的货物而能稍作休息。苦力们背着象山一样高的货物，弯着腰前行，身体几乎全被货物压盖住，许多时候只看见打着晃的脚。他们连流入眼睛的汗水也不擦一擦，使出浑身力气，象虫子蠕动似地一步步前行。这些成了运输工具的人，双目无光，他们的生活现实与任何希望都无缘，这是我未曾见过的惨状。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痛苦的繁重劳动和鸦片。

我们还遇到双轮胶皮大车，用人或马拉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它们常常把通路都占住了。这时候，赶车的苦力就得喘着气把满载货物的大车拉到旁边去。在坡度陡的上下坡的拐弯处，这样做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也常遇到公共汽车。不管哪一辆都挤得满满的，使人不由得担心，乘客的重量可能会把车子压垮。手、脚，乃至上半身从公共汽车没有玻璃的窗里伸了出来。汽车的外侧，缚着好几个装着各种家畜的笼子，连车顶也装满了。

我们的货车司机是新加坡华侨，每当挑着行李的苦力和马车挡住去路不能前进时，他便不住地用广东话高声叫骂。因为谁也听不懂他的话，所以并没有多大效果。他在八路军工作已经几个月，也学了一些普通话，但他那穿着皮上衣的模样，仍然给人以一种“异邦人”的印象。他的驾驶方式是鲁莽的，但技术并不差。有时候，货车在悬崖边行驶，只差几厘米便是深渊，往

下看时令人目眩，我不由得闭起眼睛。司机看到我这样便大为得意。他是修理、使用汽车部件的能手。汽车的某一个部件损坏时，他便在装着各种工具的箱子里翻来翻去，务求找出合适的代用品。找到了，他便说：“这还马马虎虎。”他立即进行修理，车子又可以行驶了。我虽然坐在他身旁的“特等席”，但驾驶室里没有玻璃，所以我吸的尘土并不比坐在货车行李上的士兵们少。

我们一行人在一家又小又脏的旅馆住宿。如果在战前，外国人在这个地方住宿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临时搭的几间房子，都是廉价的木头房子或土房子。非常简陋，只可聊蔽风雨。我们一行中的“旅行元帅”，也就是担任领队的下级军官，是个节俭的人，他没有挑最好的，但也没有住最便宜的，这大概是因为考虑到我和来自新加坡的司机吧。

我们的“旅馆”里，并排着两列只是木板隔开的房间。每间房都有两张木床。床与床之间仅可勉强容一个人通过。我们一行六人，领队便租了三个房间。司机被分配与我同住，大概是因为他的薪水仅次于我。

与人同房住宿，我并无任何异议。老鼠是这类旅馆不可避免的一害，但我总不能坦然处之。乘货车长途跋涉之后，我已疲累不堪，有一位同房的人给我赶老鼠，实在值得感谢。这里的老鼠大得象猫，我虽然通夜都点着蜡烛来吓唬它们，但这些鼠辈仍然出来四处觅食，闹得很凶。

下面说的是从贵阳返重庆途中发生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在住宿的小镇闹了一个笑话。这个小镇的居民、警察对外省人差不多已见惯了，但还没有见过外国人。而且我这个单身外国妇女，竟和士兵们同乘货车来，又和士兵们一起到小饭铺吃

饭，此间群众为之哗然。

不久，“有个极为罕见的人住在我们这里”的流言便在镇上传开来了。他们听说我会说中国话，所以议论我时，总是低着声，不让我听到。我到了这里的消息也传到警察那里。我们吃饭时，警察在离我们不远处频频张望，直到我们吃完饭要返回住处时，还好奇地目送着我们离去。我累得要死，回到旅馆立即跳上床睡觉。同房的司机也已经睡了。突然，听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司机嘟嘟囔囔打开了门，见是警官，吓了一跳。更为吃惊的是警官，他们看到一个外国妇女和一个中国司机同住一室，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

他们目瞪口呆地对司机说，把那个外国妇女的证件拿来看看。我虽然已完全睁开了眼，但觉得没有必要为此起来，仍然躺在床上。因为我知道，他们此来无非是出于好奇。我从床上随手把我的军人证件递给了司机。我不知道警官的那种惊慌的神态随后是否已经消失，因为我马上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极为有礼地向我打招呼，这显然是我那个中国军队的少校军衔起了很大作用的缘故。

贵州是一个穷省。所以俗谚有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身无三文银。”贵州省的大部分（一千三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居民不是汉人。就象云南省的彝族一样，在贵州省，苗族都退居到险峻的山岳地带。苗族妇女穿着五彩缤纷带有衣折的裙子，颈上饰以银质项圈。她们常到市集上贩卖自己制作的美丽得令人目眩的手工艺品。

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与我们经过的几个小县城并无不同，只是面积较大。战前，贵阳市只有八万人，由于难民流入，人口增加了两倍。后来虽然只受过一次空袭，但贵阳市竟有三分之

一沦为废墟。

红十字会的大本营设在市外的山林之中，不怕日军的轰炸。林可胜博士自豪地让我看新建的茅草顶房子。这些房子便是红十字会总部、医务人员训练班、军用医院和手术室。红十字会的人都相信，日军大概不会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输送到前线的卫生队，都在这里接受训练，并从这里派出。

一九三九年，十六名欧洲医生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我们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团”，实际上连一个西班牙人也没有。他们来自欧洲中部各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西班牙语是他们共通的语言。现在挪威的红十字会派他们来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这些医生在中国的生活费用也由挪威红十字会负担。

这十六名医生没有一个人进入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因为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封锁，红十字会的运输队要进入八路军地区已完全不可能。

林博士把这个“西班牙医生团”的几名医生派往在前线的几支国民党部队里，另外几名则留在总部，任命他们为学校的教官。我担任联络工作，任务是给他们送书报，把他们的报告交给“保卫中国同盟”或交给为支援他们而献金献物的外国组织。每当从前线回来时，他们便到我在重庆的家稍事休息，和我谈心。他们非常不安，极为苦恼，这倒不是因为生活和工作条件过于原始，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各个部门的贪污腐化越来越厉害。这一点，军队也不例外。

最初，林博士对医生们很理解，倾听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用他们提出的有关改善伤病员治疗机构的建议。用不着说，林博士是个廉洁清白、说干就干的人，但他不够老于世故，对来自

政府和国民党的毫无道理的批评，不能坦然处之，结果，他从贵阳被召回。随后，红十字会本身也逐渐腐化，陷入泥沼之中。

过了好几年以后，我遇到了穿着少将军医制服的林博士。这时候他已升为蒋介石军队中的一名高级军官了……。

由于我们的领队的节俭作风，归程延长了一日。他打算在途中买些竹竿回重庆，以供部队按计划兴建新房之用。在贵州买竹竿只要重庆的一半价钱，但与农民讨价还价、采伐、装运等等，花了好多时间。

随着接近重庆，我们便觉得路上来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不是已经见惯了的挑行李的苦力行列，而是全家带着家具和杂物离开重庆的人群。好象各种车辆也都向南行驶。人们不时向我们挥手，意思是叫我们停车。但我们仍继续赶路。只是当人群将道路堵塞时，我们才停了车，问道：“怎么这样人山人海呵？”

“噯呀，你们难道不知道重庆全城都烧着了？日军飞机投下了燃烧弹，到处都烈火熊熊。能够从长江南岸逃出来的，都离开了重庆。日军飞机一定还会再来轰炸的。”

我们该怎么办好？“不管怎样，我们先到南岸去。”领队和司机下决心这样做，我才松了一口气。“到了南岸，能不能渡江进入市内，到时再打听看看。”

在南岸，我们出巨额船资，确实找到了一个肯载我们往北岸去的船夫。火还没有烧到北岸的街道，但炸弹落下造成的惨景却随处可见。

我们躲开已经不成形的人体的尸体，避开断壁残垣和断落下来的电线，用手帕捂着嘴和鼻子，拚命地向目标走去。火仍在燃烧，空气灼热得令人难以忍受。

放眼望去，在一片废墟之中，只有我们的家安然无恙。炳南

曾说，炸弹是很难命中军事目标的，果如其言。我们家没有受蔓延起火，大概是因为它建在巨岩之上，而且又有高高的围墙与外面的街道隔开的缘故。

回到家一看，炳南和我们的房友都在家里，使我感到极为欣慰。我到家时，他们正在商量是否也应离开这个住处。空袭即使再来，这所房子的地下室也能顶得住，但是，如果大火继续蔓延，我们留在家里就有与外界隔绝的危险。

日军连续三天轰炸重庆以后，突然停止空袭，大概是他们认为市内各种建筑物都已炸得一间不剩了吧。我回到家里的这天晚上，是轰炸结束的第一个平静之夜。

我们的“房客合作社”

五十万重庆市民约有五分之四，在五月空袭后离开了重庆。市内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切交通均告停顿。政府利用第一次空袭后的空隙，成功地建成了防空设施。仅在数月之间，重庆便改变了面貌，甚至可以说它成了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由于四川省的石工努力开凿，在岩山里修建了巨大的坑道。每个坑道都可容几百人。

只有黑色火药才能炸坏岩山。从早到晚，爆炸的声音接连不断，震得大地都摇撼了。第一个“炸弹的季节”即将结束时，即一九三九年十月，建成的防空洞已能容纳全市居民，但政府仍然号召没有必要留在市内的居民疏散到周围的村落去。尽管如此，大多数市民还是陆续重返市内。因为在大城市毕竟比较容易谋生。

就这样，日军的恐怖轰炸毫无所得。政府的办公厅、办事

处、剧场，没有一处迁出重庆。相反，这种轰炸加强了市民共患难的互助精神。由于轰炸，日本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万次政治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些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

六月，炳南和我搬到旧市区外面的一座新房子内。在这里比在旧市区的废墟中生活舒服得多。房子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树木和绿色的原野，我们家的小花园里有许多香蕉树和开着花的灌木，就象热带地区一般繁茂。

登上路旁的石阶，在一个小丘之上，便是我们家的大门，它与一道高高的白围墙相连。围墙内有三座房子并排着。最下面的一座是办公室兼住宅，住房不足时，来自东北各省的代表们便住在这里。最上面的那座住着一位将军和他的小老婆。我们住在中间的一座房子里，在三座房子中，这里住的人最多。一楼被一个银行的总经理借去，二楼和三楼共有六间大房、一间小房，最初是三家合用，后来增加了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两家，成了五家同住。

我们把这个合住的家称为“合作社”。“合作社”的社长由社员中年纪最大、深孚众望的沈老先生担任。我和值得尊敬的沈钧儒先生在上海便认识了。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仍然担任救国会会长的职务。除了作为律师进行广泛活动外，他还以充沛的精力完成了许多政治任务。几年后，他最小的儿子和儿媳也搬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们“合作社”组织的第二号成员是沙千里，他是沈老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他讨论问题的对手。我和沙千里在上海和在苏州的监狱里都见过面。他迁出后，名作家茅盾搬进了他的房间。茅盾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茅盾也是救

国会的成员。救国会在重庆与五个小的政治团体联合组成“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但政治影响力很强。

炳南和我占了两个房间，这已经算是够奢侈的了。而且，孩子和杨妈来后，又增加了一个房间。由于住房不足的问题非常严重，面对正在找房子的朋友们，我们如果继续住三间房，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但我们家常用来商量事情和开会，我的工作也需要有个安静的地方，为此，我坚持给我留一个房间。

二楼一个有阳台的漂亮房间原来也是给我们的，我就打算用作客厅兼饭厅。但因为轰炸的缘故无家可归的人数日增，我们在二楼的这个房间便让给一对年轻的夫妇。这对夫妇是记者，在以自由立论而得到好评的日报《大公报》工作。《大公报》在战争开始前在天津和上海发行。后来象许多大报一样，它的工作人员和印刷设备都迁来重庆。这些报纸中有不少到重庆来已是第二次迁徙了，它们原先有一个时期曾以汉口为根据地。由于纸张不足和技术上的原因，各报在重庆几乎都是只有两个版面，而且版面也小。还有一种叫做《汉口先驱报》的英文报纸，迁到重庆后仍用这个名字发行。

大学和专科学校，教授和学生，图书馆，实验和研究设备也一起西迁重庆。行程往往达数千公里，许多学生步行了几个月才到达目的地。德国开办的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搬了三次，最后才在昆明附近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中国西部的二十所大学中，有十五所从沦陷区迁来。四川省原来只有三所大学，战争期间增加到十二所。重庆郊区有的地方已成了“大学区”。

这些大学都建在市外，大学本身的建筑物和教师的宿舍都

由于缺乏资材而草草完工，但它们后来还是逃脱不了挨炸的命运。

蒋介石与国民党

炳南大致给我谈了政府迁到重庆后的政治情况，对时局作了预测，看来决不可乐观。炳南指出，自政府西迁以来，国民党的各个领导集团都没有实行武力抗战的决心，却为复活各自的派系独裁而费尽心思。日军占领武汉后，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也随之缩小了。在相对稳定的战线上，战事显得比较平静。

没有人敢接受日军的和平方案，公开主张投降，即使在重庆遭到猛烈的轰炸之后，也没有人敢这样做。可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也落了空，政府并没有实行它所承诺的进步改革，也无意动员所有的政治、经济力量和人力进行抗战。

炳南说：“C·C系增强了对官僚机构的影响力以后，凡是自由主义的提案，都被鄙视为‘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党以外的反对派，都被他们用各种手段削弱，他们根本是想消灭这些反对派。”事实上，被臭名昭著的特务总头子戴笠逮捕而牺牲的，不只是共产党员，其中也有不少自由主义者。

C·C系的命名，是取其领导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两人的姓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这个集团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是最右的。多年前，C·C系早已掌握了国民党组织部与党务部，它通过其属下的地方党部，对国民的政治活动进行全面的恐怖监视。

与C·C系相对抗的最强有力的派系是黄埔系。黄埔系的

名字取自黄埔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许多都是黄埔系的人员。这个集团掌握了军队，当与他们与C·C系之间发生权力争斗时，蒋介石便巧妙地利用他们互相厮咬，防止他们任何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

第三个大集团就是“宫廷派”，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宋家王朝”。蒋介石与这个集团虽有至亲关系，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集团也同样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宋家王朝”控制着中国的经济生活，用不着说，他们凭此而大大得益。据美国的资料，战争期间中国的富豪，特别是国民党的干部，携带了几百万美元出国。另一种说法，只是“宋家王朝”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一亿美元。

这三大集团独占特权，互相划定势力范围，但得占便宜的却并不只限于这三大集团的头子。他们的亲戚朋友、党羽喽啰，都在这个私人的“宫廷国家”里分得一杯羹。他们或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或取得国家的援助，或从征税上取得优惠办法，以各种方式大发其财，此外，还从大规模的投机和黑市买卖中分得巨款。

在政治的体制和形式方面，以欧洲式的观念来看中国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只有弄清楚各个集团相互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其中有友好关系、敌对关系、血缘关系、所属派系等等——，才可能了解在政治力学关系上的那些决定性的因素。对各部门有决定性影响的，并不一定是各部门的首长。拥有最大影响力，掌握最有效情报的，实际上是“大人物”的秘书，他们在后台起牵线的作用。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曾出色地描写过的这种权谋术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中依然是政治家很喜欢用的手段。

现在的国民党离开孙逸仙先生创设时的国民党已越来越

远。他们越发注重那些徒具形式的毫无意义的仪典。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里都挂着孙先生的肖像，每周星期一各学校和政府机关都举行缅怀孙先生的仪式，装模作样地大谈其“三民主义”。然而如何实现三民主义，对这个问题，国民党早已不加理会。

炳南和我两人谈论政治形势时，自然总是谈到蒋介石，因为他毕竟是握有强大权力，可以左右中国命运的人。恐怕他本人也不单自视为国家元首，而且也象中国的历代皇帝一样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化身吧。也就是说，“朕即中国”。

因而，他绝对不原谅别人有辱于己。一九三六年在西安逮捕他的两名将军后来受到追究，从这两名将军的下场，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的报复性是多么强，他已失去了政治家的理性。他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并不是出自治国的策略考虑，更多的是由他个人的厌恶而决定的。

由于岳母与夫人宋美龄的缘故，蒋虽然勉强信奉了基督教，但在他的内心里刻上深深印记的，还是家以父为尊的儒家思想。由此，他相信自己被赋予了作为国父的权力。蒋介石的信徒们不住地赞美他的质朴，说他努力提倡公德。但蒋对他的亲信及其家族的贪污行为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对他们的发财，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也默不作声。蒋的信奉者们有意无视上述事实。

“蒋介石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人了，”炳南这样说。这恐怕是对蒋介石所下的最为致命的评语吧。他把国家越拉向倒退，他就越加执拗地死抱住完全不合时宜的原则行事。他不能理解本国的根本问题。他从来也没有试图去争取农民——那几百万被剥夺了权利的文盲。蒋介石和国民党口口声声崇拜孙逸仙先生，但连孙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也不打算实现。结果是：中国的未来不是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敌人——共产党人。

+

前往华北前线

穿过四川踏上旅程

我决定在六月出发前往华北前线，这倒不是为了躲避轰炸，也不是畏惧令人难以忍受的闷热之夏。这是因为孙夫人给我来信，再次提醒我，让我勿忘我的许诺。这是指把华北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有关计划尽早报告给孙夫人。可怕的空袭使我们一再打消把久盼的孩子接来的念头，不过，炳南和我还是决定，等夏天快结束时再让黎明来。来了之后，则让他与杨妈一起先在市内安静的南区居住。待“轰炸的季节”过了，只要我们的住房尚在，我们一家人便可以团聚一堂。

使我下决心出发的决定性原因，是因为进入八路军地区的困难与日俱增。已经有人听说，往延安去的学生们遇到了封锁及其它的阻碍。因此，周恩来向我提出忠告：“如果不抓住机会赶快动身，就不能突破南京政府军队的封锁了！”

周想尽办法给我收集了许多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社会设施和文化设施资料。我把这些资料译成英文寄给孙夫人。“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需要真实的、生动的材料，这一点周是非常明白的，可是他所能搞到的有用材料仍然不足，而且有些单调。

炳南因为有必须替周恩来办的事情，不能离开重庆。他也劝我早点出发，不要再耽搁了。于是我便把最需要的物品打成

背包，在一天早上日出之前，趁着每天必至的轰炸还未开始，由炳南把我送上开往陕西省的公共汽车。陕西省在我要去的目的地山西省之西。

“望健康归来！”炳南用德语说。当公共汽车开动后，他又喊了一句中国人告别时常用的话：“一路平安！”但这句话对往前线的我来说，并不怎么贴切。

我到山西省去视察野战医院和社会设施，到达目的地究竟要花几天或几个星期，谁也不能估计。因为这取决于道路的情况和所乘的交通工具，有时也取决于司机的性格和心情。

我的运气不错。从重庆往宝鸡“只要”一个星期，或许还短一些。宝鸡在西安以西，是当时铁路的终点。从重庆往四川省的正式省会成都花了两天时间。

公共汽车在典型的稻米产区的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奔驰。巧妙地倚坡而建的一层层美丽的梯田，与原野上的水田相映成趣，秀丽如画。那一块块的水田被纵横交错的田埂和水渠分割得整整齐齐。

四川省的意思是四条川，指省内流入长江的四条河。它是中国非常富庶的省份之一。在红色的土壤上，稻米和其它谷物、甘蔗、烟草、茶、水果都长得很好。这个全省有如一个大花园的四川，由于有高山挡住寒冷的北风，气候出奇的好，稻米每年两熟，甚至有可能三熟。

但与大自然的丰裕恰好相反，四川省的居民非常贫困。农民们辛勤劳动得来的几乎用之不尽的农产品，却不能落到自己手中。据同车的乘客说，农民很少吃到大米、水果和肉类。多年来都是这种状态，使得农民缺乏营养的症状非常明显。公共汽车经过的各个村庄，随处可见腹胀、关节肿大及其它营养失调

的人。

凡是没有岩石的地方，每一公分的土地都被种上了作物。清晨，可以看到男男女女和孩子们在田埂上排成一列，走向田间。那些照着他们倒影的水流，便是他们以自己艰苦的劳动引向农田去的。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们，从早到晚不停地踩动着木制的大水车，将水引进水渠里。四川省的土地之所以肥沃，完全是依靠这些灌溉设施。在离成都不远的灌县的田野上，公元前二百年已经有了这种设施，今天仍在继续使用。

各个小城镇的模样，看来从三国时代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些城镇住宿，绝不是愉快的。旅馆虽有“观澜轩”一类很有诗意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多年没有打扫过的木房子。走廊兼作便所，床上满是跳蚤及其它虫子，种类之多只能使昆虫学家为之欢欣。四川省的这些旅馆，到了晚上，争吃食物的老鼠便展开激烈的斗争，这是极为寻常的事。

公共汽车和货车的司机们驾车在公路上行驶时，俨如贵族。他们自己亦如是观。他们自成一体，各有六名跟车的随从，包括一名机械员、一名司机助手、两名专门换轮胎的，此外还有两名杂工。行车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司机的心情和善意。他们兴之所至，汽车便在某个茶馆前停下来。有数不清的茶馆，每一间都象是俱乐部似的，各种年龄和职业的人聚集在那里，我看这些人大多数都象是游手好闲的有钱人。他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换情况和流言，或者打上几个小时的“麻将”，以此度日。司机把车停在茶馆前，乘客们只好耐心地等候，此外别无他法。这还算好了，有的司机竟把“黄鱼”硬塞到已经很满的车子里来。所谓“黄鱼”，是指不买车票的乘客，他们把一些钱塞到司机手里，司机便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与一千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苦力们用竹棒抬着沉重的行李和货物。司机和他的随从们从车上用轻蔑的眼光望着他们。苦力们搬运的东西有：水、石头、大捆的稻草、装着鸣声吵耳的鸡的笼子、一袋袋的米、“嗷嗷”叫个不停的猪，等等。他们差不多都半裸着。那没有血色的蜡黄身子汗光闪闪。他们急匆匆地小步走着，看来很难承担这样的重荷，仿佛随时都会支持不住而倒下。

还有的人坐着竹轿，让苦力抬着，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有的苦力气喘吁吁地抬着沉重的黑漆棺材爬上陡坡。棺材上往往绑着一只鸡。按自古以来的迷信说法，鸡上附着死者的亡魂，棺材抬到墓地时才可以把鸡杀掉。吃饭和在途中休息时，苦力们都坐在自己抬的棺木上，似乎并没有受到死者及他的亡魂的作祟。苦力们那象病人呻吟似的歌声，是他们为合力共事而唱出的。这些单调的音节很象长江上那些纤夫们的凄凉歌声。他们只是反复地唱着“嗨呵！”“嗨呵！”象是微弱的回声。

我们的公共汽车快到成都时，遇到了一队奇怪的行列。行列里全是男人，他们象牲口似地被挨个绑着，其中有些非常年轻，可以说还是小孩子呢。我同情地目送着这队行列。司机说：“这是新兵。”被拉去当兵是农民最痛苦的事情，这比起饥饿和自然灾害更来得可怕。有钱的农民出钱便可以免受征兵——这是官员们一笔大的收入来源——，而贫苦的农民便都成了牺牲品。这些被拉来的营养不良的新兵，要徒步走几百公里，再加上领队的人贪污了他们的一部分口粮，所以一路上他们变得瘦骨嶙峋，许多人患了赤痢和疟疾，身体衰弱得倒在路旁不能行动。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走到前线。

这样摧残人命是非常可怕的。据可靠消息说，从四川征集到一万名新兵开往西北，能走到兰州的只有七百人。到达新疆时，七百人中只剩下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人也被活活地冻死了，因为正值隆冬，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

还有比这更为可怕的，那就是有人借征兵之名搞贩卖人口的勾当，从中攫取利润。人口贩子用少量金钱把贫农的儿子买来，然后以双倍的价钱卖给官员，这些官员又以买来的三倍价钱转售给富农，富农则把他当作替身交给军队。

新兵的领队不仅私吞掉一部分口粮，而且，由于他们把死了的新兵仍然列在花名册上，所以把照领的口粮也全部吞掉。甚至死人也可以用来赚钱。军队遇有死亡时，向办理死亡登记的官厅呈报，司令官可以领到一笔埋葬费。但这笔钱被从司令官到发放埋葬费的各级官员从上至下都捞一把，等交到最后一个人的手里时，只能用来请人挖一个坑把死者埋掉。他们从不把死讯通知死了儿子或丈夫的遗属。

成都有中世纪的城墙，有古老的寺院，还有许多卖乡土的手工艺品的商店。不少中国人把成都称为“小北京”。看到成都使人联想起在北方的首都。由于战争，成都与北京类似之处就更加明显了。成都成了学术中心。除了美国传教士在这里创建的华西协和大学之外，这时又有了许多从敌占区迁来的大学。

在盛夏的傍晚，和北京一样，成都的市民也喜欢在长达十五公里的城墙下漫步。但巨大的城门晚上十点钟就要关闭，据说城外有盗贼出没。

在高高的城墙内，有钱的地主和军阀的住宅，一座连着一座。到了下午，在东大街便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女眷。东大街的古旧阴暗的店铺，出售中国著名的华贵绸缎。十岁左右的孩

子们在店门口精巧地绣着绚烂的刺绣品。毛皮商人的店里，挂着几十张狐皮，里面还挂着羊毛的皮大衣。从成都到西藏和新疆都不太远，在这里可以看到翡翠的雕刻品、黄铜古镜、贵重的藏族饰物等，光看不买的人很有兴趣地欣赏着。

成都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大概是因为吸鸦片在这里已经成了风气，人们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在从成都往北延伸的新建公路之旁，是一条古来就有的长长的石板道。石板道两侧长着茂密的杉树，溪水向峡谷流去，常年冲刷着岩石，使岩石的表面变得非常光滑。河上可见野鸭戏水。我们的公共汽车在河边经过时，白鹭张开它那银白色的翅膀飞了起来。在过去几百年中，就是沿着这条石板道，各少数民族朝着帝都西安北上，去给皇帝进贡。诗人和画家厌倦了宫廷生活后，便到南方来，在郁郁苍苍、松杉茂密的山岗上找个寺院，过他们的闲静生活，欣赏大自然的美色。

走了两天，我们的公共汽车到达广元。广元在嘉陵江畔，与陕西省相接。嘉陵江在重庆附近与长江合流。广元是个中转地，北方的小麦、羊毛、皮革等，用骆驼驮到这里，然后装上帆船运往重庆。战争前，甚至可以运到上海。

我们的车子，在带有粘土层的荒凉石山的山谷中蜿蜒行驶，越走越高，终于来到荒凉的秦岭山脉的隘口。

这个地区很荒僻，那些裹着头巾、扛着旧式枪的山民，也给人一种寂寥之感。与我同车的乘客们不安地低声喊着：“土匪！”

从秦岭的隘口眺望陕西省广阔的黄土平原，令人浮想联翩。几百年前，三国时代的英雄豪杰曾在这里展开过波澜壮阔的斗争，他们也曾站在这里，遥望远方那陡峭的连绵群山，那里就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渭河的河谷。

在这里，我再次看到了华北特有的光秃秃的黄土丘陵！这里并不象南方那么湿热，微风轻轻地吹着。空气也象黄褐色的原野那样干燥。我，又踏上了陕西省的土地！

在“工合”的旗帜下

在秦岭山脉北麓的宝鸡，是大多数公共汽车和货车的终点。从宝鸡便可以乘火车往西安去。战前，宝鸡只是个不发达的小城镇，在这里，可以看到牵着骡子的人和骆驼队的商人卸货的恬静风光。一九三九年，宝鸡已经有六万人口。城内肮脏的街道上，除了骡子和骆驼之外，还有马车、货车、公共汽车以及行进中的士兵，乱七八糟。旧市区里有中世纪的城墙、破旧不堪的寺院和政府的官厅；城墙外侧已出现了一个新城。在有钱的难民建造的商店和工场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土房子，那里住着几千逃难的工人。

工业合作社本部设在宝鸡。路易·艾黎在汉口时就打算在宝鸡办几个小规模的合作社，用当地可以得到的羊毛、棉线等原料，生产各种日用品，例如土布、肥皂、皮制品等。在“工合”的旗帜下，渐渐地出现了一系列的合作机构，除了各种生产工场外，还包括几家供销合作社、一家银行、一所合作社成员的子弟学校 and 一个小医院。此外还有住宅和招待所。

我来宝鸡初次看到：当年在上海，在路易·艾黎家里，我们反复讨论才得出的那个计划，已经得到实现。亲眼看到蓝图已成现实，不能不感慨良多。在简朴而清洁的房子里，不同年龄的男人在工作。他们穿着的棉布制服上印有“工合”的标志。“工

合”生产的一切产品上，也有这样的标志。工人们参加合作社的管理，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工钱和工作时间。

当时的中国，只存在具有中世纪特点、按照行业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只是在个别的几个城市才有现代工业的萌芽，因此，共同管理的合作社，的确已是革命的了。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合作社在中国的战时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点已得到证明。合作社廉价生产消费品，而且使失业的几千难民有了工作。

照我这样讲，可能谁都会认为，合作社运动一定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汉口计划办“工合”时，政府只消极地表示赞成。合作社所受到的各种援助，包括财政援助在内，大部分是由外国、特别是华侨富翁提供的。在美国，罗斯福夫人和赛珍珠带头号召民众支援合作社，其它各国也成立了援助“工合”的委员会。

但在中国，由于国民党内保守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合作社在政治、财政方面遭遇的困难也越来越多。政府当然不能公开封闭合作社，这是因为它在国外深得好评，为本国赚得了外汇。所以，政府只能以经济、行政、政治的各种手段来向“工合”施加压力。政府把外国为促进“工合”发展而送来的款项加以扣留，只把其中一定数量的金额交给“工合”。而这方面的负责官员，还公然要求“分一份”。据说，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秘书官，要求至少得分给他五万美元，才答应尽力把政府许可的金额迅速支给合作社。

政府所采取的政治压迫手段，首先是在合作社的领导层内安插暗探。有些工人和技术人员被当成“共产党员”而被密告、逮捕。路易·艾黎说，合作社总部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为优秀的技术人员出狱而奔走。有能力的技术人员在承认工人也有管

理权的组织里工作，只此一端，立即便有“共产党员”之嫌。支持合作社运动的进步官员，因为政府对他们不满意，便被免职，宝鸡县县长就是一例。其后这个职位被一个没有能力但与保守的官僚和地主亲近的人所代替。

自然还有其它困难。有过苦痛经历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顾虑重重，因此，象合作社这样崭新的事物，要取得他们的合作并不容易。为了建立合作社的组织而到农村去的工作人员，常常受到敌视，这是因为农民们认为他们是政府的间谍，到农村来调查是为了征收新的税金。合作社要盖新的建筑物和工场，事先得请教风水先生，让他们决定施工地点和日期，这样才不会触犯所谓的鬼神。

但合作社最缺乏的还是进步的青年男女。这些进步青年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定的抱负，即使工钱少也愿意为合作社运动出力。与中国红十字会一样，合作社要募集到必要数量的非共产党民主志士，也是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员以外的进步分子本来就少得可怜。代表这一类人的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民主同盟，在全中国只有几千名成员。他们是少有的例外。认为必须进行一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有知识的中国人，其中大多数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的纲领正是实现他们目的的最善之策。

八路军和游击队

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已占领了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所有的重要城市和铁路线。因此，要进入敌后并不容易。日军

对铁路和公路实施严格警戒，设立坚固的据点，所以，要到敌后只能迂回，或趁夜间悄悄地突过去。我要到的目的地是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它是由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的部分地区构成的，自一九三八年以来，便成了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游击区。游击区的中心在该区北境的五台山。

山西省南部也有一个八路军的根据地，即太行山区的南部，八路军的大本营便设在这里。由于这里是山岳地带，比较安全，八路军和八路军组织的游击队便以此为根据地，向附近的平原地区出击。

战争开始后的头两年，在日军占领区内出现了许多游击区（后来称解放区）。当时，日军在正规战的前线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占用了它的大部分兵力，因此它无较大的力量来对付华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时前线已得到巩固，它在华中和华南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

日本军部在东京洋洋得意地宣布，所向无敌的日军现在要转过头来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了。日军占有军事优势，但他们缺少最重要的因素——当地民众的支持。

八路军的部队最初进入山西省时，动员民众抗日并不容易。东逃西散、士气沮丧的山西省败兵的种种掠夺行为，使得农民憎恶中国的一切军队。他们甚至认为日军会比中国的军队好一些吧。

不久他们便认识到并非如此。“日军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宣传，”当我们一行通过被日军焚毁一空的村子时，八路军一名军官对我这样说。这名军官向我讲述了日军的种种残暴行为：拷打、枪杀、奸淫、掠夺，等等。他说：“日军为‘以儆效尤’而采取了

种种恐怖手段，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老百姓帮助八路军，不再组织游击队。但结果适得其反。农民们都知道，与其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不如起来抗争。”

为了使大部分是文盲的农民能够迅速而彻底地了解八路军的纲领，同时也为了宣传抗战的根本思想，编演了大量剧目。

许多剧团不断到敌后各地区去，在各村子巡回演出。他们演的虽然纯是宣传剧，但剧本都是出自名家之手，演员的演技也极为出色，农民看了深受感动。

一个拥有二十五名团员的剧团，由著名的女作家丁玲率领。全体演员都过着战士一样的简朴生活。他们被发给一套制服，供膳，每月有两块零用钱。演员们住在农民家，并在那里排练。在剃着光头的孩子们以及鸡、猪、驴等的围绕中，他们热烈地争论现代戏剧的种种问题。

在地主家的库房或马棚里临时搭起舞台，观众坐在长凳或泥地上。节目非常丰富，一般都演上五个小时。除了许多短剧之外，还有魔术、传统戏曲的选段，等等，内容多种多样，富于娱乐性。短剧演出后由政治宣传员进行简单的解说。有时候由说书人讲英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而是讲当今的英雄事迹。有不少故事是以当地发生的事情为题材的。

我进入敌后根据地时，已有三种部队。这就是正规军（即八路军）、游击队和自卫队。

游击队主要由年轻的农民组成。他们平时种田，当对日军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时便参战。游击队用的武器有步枪、手榴弹、长矛、铁锤、石头，等等，总而言之，能作武器用的一切东西他们都用上了。步枪全是袭击日军的货车和小部队夺来的。

游击队的军事教育主要从战斗实践中来。正规军的战士利

用战斗的间隙给他们讲授军事常识，只过一个很短的时期，他们便参加实际的战斗。游击队在执行任务时，他们的口粮由本村供给。农民游击队员如在播种和收割季节参战，所在地区的自治会便派人给他替工。游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或因受伤而失去劳动能力，他们的家属会得到照顾。

以上这些，在欧洲人看来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至今为止，连正规军的家属都得不到照顾。养老金或抚恤金之类，在中国农村还不为人所知。

游击队员得到的光荣和尊敬，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以前，人们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古老的格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自卫队的军事任务一如其名，是保卫自己的村子。但他们还参加其它许多重要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协助运送粮食和给伤病员抬担架。这一切活动都是自愿去做的。“拉夫”这个令人讨厌的词，在敌后根据地我从未听到过。

自卫队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能出色地传递情报和消息，这对八路军的帮助极大。自卫队能将日军的各种行动及时地告知八路军，使其立即采取对策。依靠自卫队的帮助，八路军不仅能免受日军的突然袭击，反而能向日军进行奇袭，把他们打进峡谷和断崖，聚而歼之，缴获无数的武器弹药。

青少年担任侦察工作非常活跃。他们同时还查“路条”，到处出没。有时候，他们在兀然突出的岩石暗处出人意外地跳出来。看到陌生的路人要进村子，他们便立即向上报告。有一次，我们走夜路搞错了方向，正在徘徊不定之际，突然听到尖声喝问：“谁？”我回答：“八路军！”但光是这样回答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拿出通行证，还要回答一些详细的盘问。

传递情报使用简单的方法，比如：竖起或拔掉一根木棒、点火报信，等等。路标则用粉笔画记号，写着距离和其它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石栏杆或梯田的梯坝上。

为迅速传达重要消息，还利用古来已有的方法。名为“鸡毛信”的一种通信方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鸡毛信”是附着鸡毛的信，这种方式只有在传递紧急的要件时才能用。“鸡毛信”送到一村，又立即传到下一村，直到这封信送到指定的地点为止。拒绝传送这种至急要件的事情，万中无一，因为谁都可能出现需要发出一件重要消息的情况。

八路军在进行奇袭和采取其它各种军事行动时，他们在红军时代以蒋介石的军队为对手的丰富实战经验，被有效地灵活应用。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一九三八年写的两篇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成了官兵必学的教材。

在 敌 后

山西省是个多山的地方。我们一行穿过深山峡谷，沿着险峻的山路爬上一棵树也没有、仿如断崖绝壁的山头，然后越过山脊来到山溪旁，在溪流中凉一凉走疼了的脚。溪流的水，是不煮沸也可以喝的唯一饮用水。盛暑之中，在沙尘滚滚的陡峭的山路上攀行，嗓子渴得要命，这时候喝到水，是多么痛快呵！

在浅窄的峡谷里，难得能遇到一个村子。说是村子，其实只不过是几座破旧的小房子，象悬着似的，建在野杏树长得很茂盛的石山腰上。从山腰到山顶都是接连不断的梯田，象一级级的

大楼梯。造这样的田是很费力气的。最高处的梯田只种着蓖麻。即使是一丁点的土地，也毫不浪费地用上了。农民们精耕细作，就象是护理阳台上的盆景似的。

听说，年景好的时候，山上的农民吃的也不过是小米、玉米和蔬菜，很少吃到肉和蛋。如果年景不好，只能吃高粱、荞麦、甘薯之类。战时不用说了，即使在平时，也很少人有驮东西的牲口。绝大部分农民都只有一头骡子的一部分。如果四个农民共有一头骡子，那么，每个人就叫做各有“一条腿”。

我们在湖南、湖北旅行，时有不安之感，但在这个偏僻的地区即使走来走去也无须担心。不错，我们现在正受着日军的包围，但我们可以不断地得到现在日军离我们多远的正确情报。另外，这里也没有土匪。当然，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动，因为白天日军飞机不停地在这个地区的上空盘旋。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好几个小时急匆匆地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对我来说，最初并不那么容易。虽然我已习惯了徒步行军，但有时我还是担心，怕跟不上同行的中国人。他们看起来很柔弱，但实际上却强韧得令人难以相信。俯视着脚下断崖的深处，在贴着崖边的小道上排成一行徐徐行进时，我突然感到自己被一种强烈的不安魔住了，但我仍然尽量不让它表现出来。原先，我的同伴对带我徒步到敌后去，很不放心。一个妇女，一个外国妇女，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太危险了。我偷偷地紧握着走在前面的骡子的尾巴。骡子这种牲畜，不管怎样狭窄、险峻的山路，也能很安全地走过去。

同行的人让我骑骡子，我拒绝了，因为我看见几名护士和女学生也同样在步行。这些在北京和天津的有钱人家长大的女学生，和我一样，并不习惯战地的艰苦生活。她们和战士们一样穿着

凉鞋或布鞋,吃的也和战士一样,睡也睡在农民的炕头上。一个女学生对我说,最初她们觉得农民比大学的外国教授更象外国人。

我们这一队,前面有三人担任侦察,后面有两名战士作后卫。妇女在队伍中间,包括几名护士、某剧团的几名演员和几名女学生。女队员的前后都是战士,他们各有两个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个子弹带。这么长的子弹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过日军占领的铁路时,护送我们一行的战士增加到约三百人,他们的武器都很精良。这些战士年纪虽然都只有二十岁多一点,但都是华南出生的有经验的老战士。他们还是按照华南的习惯,背上系着宽边的草帽。用不着说,这是用来防雨的。他们还用破布条编成凉鞋,就象罗马人穿的凉鞋似的,用彩色的带子系在脚上。不久我发现,象我们这样攀山,这种鞋最方便不过,趟水后干得也很快。

天亮时,我们必定在村子里休息。先行的侦察队已经在村子里为我们准备好一切。树干和墙壁上,用粉笔指示着我们的住处和吃饭的地方。不管哪一个农家都很乐意给我们提供住处,但炕沿的木头已经成了虫窝,虱子和臭虫在蠕动着,要想安眠是不可能的。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我说:“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真正算是中国人!”这样说的话,我现在是属于中国人了。来到这些村子,要想不长虱子是不可能的。我想起虱子会传染伤寒病,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注射过伤寒预防针。随着时日推移,我们都成了听天由命的人,成了对危险和虱子的天然的免疫者。

我们吃的是小米粥和粗玉米粉做成的“玉面”薄饼,这便是山西省农民的主食了。鸡蛋、萝卜、干辣椒,都成了高级品,很少能吃到。食油和砂糖根本看不到。考虑到农民的粮食很紧,我

们各人都背了“铁饭碗”。这就是西北称为“托托馍”的东西。这是一种用小麦粉和水做的厚圆饼子，硬得象石头，吃的时候把它一点点敲碎放在开水里泡软。

使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每一个农家主屋后面的猪圈上，总有一间小屋子。这到底是什么呢？“是厕所，”一个女学生告诉我，“这里的猪都是吃人粪长大的。你去上一次厕所，便可以看到那些猪怎样争粪吃，你去好好看看吧！我们有时可真害怕这些猪！”

很普通的东西，却成了珍贵的宝物。我把缝衣针或别针送给一个农民的妻子，她竟高兴得不知如何答谢。纸是无处可买的。幸而我随身带了许多笔记簿。我们各人所带的，都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包在背包里。各人都带有万用的搪瓷碗、筷子和小手巾。大家看见我带的一条浴巾，都觉得很奇怪，同声大笑。

山里的冬天一定是严酷的。据农民说，这里的冬天冷得很，冰天雪地的日子并不罕见。燃料只有玉米秆和干树枝。

难道农民已完全习惯了贫困，不再向往其它的生活了吗？每当我看到他们身上穿的那带补丁的蓝色衣服，缠在头上的那用毛巾捲成、两端象鸟翼似的头巾，我不禁惊叹他们那无穷的忍耐力。到何年何月，他们才能和和平平地种田，享受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呢？

一个农民告诉我，他一年的收入是二十元。他给一个地主干活，地主管饭，但衣服得自己买。我问他：“你的妻子呢？”他答道：“钱不够，结不了婚。”

有一次，我住在一个农妇家里，我问她：“不够吃的时候，经常把刚生下不久的女孩子扔在山里，这是真的吗？”

她点点头，答道：“这是很普通的。灾年的时候，想卖孩子还

没有人要呢。有的人家全家都饿死了。”

我们睡觉时，农民便在地里干活，同时替我们留神，看是否有可疑的人或敌军出现。同行的中国人准备了一手：情况紧急时便化装成农民，躲在家里或圈里。我早就知道我是化装也不象的，幸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时间也好，空间也好，都成了无意义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没有去计算，连今天是几号也不知道。夜行军时，我只注意到月亮渐渐变圆了。日子天天如此。我们白天都是休息，晚上吹起床号，然后集合，整队出发。出发前，领队说明路上的注意事项。他还指出，某某地带是危险区，非绝对肃静不可。但我们离下一个目的地有多少距离，从来未说准确过。凡是农民提供的有关距离的情况都是不准确的。他们把里分为大里小里，比如，上山时的一里就比下山时的一里要长。而且农民计算距离常常从他们自己的家算起，而不管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问他们：“战士们什么时候到那边的？”回答是：“那边吃晚饭的时候。”问他们一座山有多高，回答是：“高得耳朵觉得冷”，诸如此类。

我们一般每晚行军四十公里。在石头多的山路上行走时，透过布鞋的鞋底，连一块一块的小石头都可以感觉出来。但是同时，我也能回忆起那被美丽的景色完全迷住的时刻。行军时我曾遇到的景色是多么美呵，使人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流水潺潺，山的高处则有一座小小的寺庙；兽头瓦装饰着的庙顶上，那柔和的屋檐曲线鲜明突出，月光静静地泻下窗格子的浮影，看来就象是巨大的蜘蛛巢；山顶四周是银灰色的云，象妖怪在摇曳……。看着看着，我喃喃自语道：“和平后我要到这里来逍遥一趟。”

蓦地，一道闪光眩眼，那是一名侦察兵寻找路标时发出的手

电筒光。我们越来越接近全程中最难走的地带了。这个地带是两侧都被日军占领了的铁路沿线，我们要穿越这一危险地带。就在不久之前，这个地带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日军部队和弹药运输队企图与长江北岸的日军部队会合。八路军的一支队伍袭击了这支敌军，把他们击退。但是可以预料，日军会增强力量，卷土重来。

穿越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

要穿过日军占领的铁路线，事先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游击队经常破坏铁路，日军在铁路线及其附近道路上都加强了警戒。日军守备队所驻屯的位于铁路左右两侧的村落，也加强了防范。在日军驻扎的村落后边，是一片“焦土”地带。日军将这里的一切都烧光，破坏光了，使游击队、农民不能在这里居住。

深夜，我们快要到达危险地带时，队伍再一次停下来，对队列作最后一次检查。前卫和后卫都是由少数老练的战士组成。无线电话队和演剧队，卫生员与学生，位于两部分战士之间，病人和我插在卫生员与学生的队伍中。详细说明了这次行军命令之后，传达了口令，最后，又详细指示了出现危险情况时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

领队说，我们越过铁路线时可能会看到武装人员，但不必惊慌。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武装人员只是伪军——即由日军组织的中国部队。据过去的经验，他们不愿与八路军冲突，他们宁愿装作不闻不见。夜间，除非日军正好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或者

抢掠，否则他们大都不敢从坚固的据点出来。

我们一行排成一列纵队，终于出发了。过一会儿，便传来命令：“不要说话！不要咳嗽！”接着又来了第二个命令：“带上臂章！”我们预先都领到了白色的臂章，这是为了在夜行军时便于认清自己前面的队员。这时，再一次得到警告：一定得盯住自己前头的人，行进时注意不要发出声响。

我们穿着布底鞋，无声息地在黑夜中行进。身边，萤光闪闪，象颗颗流星。万籁俱寂，只有青蛙和蟋蟀不知道战争和危险，与往年一样，合奏着夏夜协奏曲。

突然，好象是骡子叫唤了一声，迅即又回复宁静。听得见鞭子抽动的声响和战士压住嗓子的责骂声。

“别让牲口出声！”

“他妈的！”牵骡子的人说。“我有什么办法？骡子有蹄，走路当然有声。”

走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便休息五分钟。这样，人和驮行李的牲口都可以喘口气，因为我们行进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快要进入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地带时，我们来到一个无人村。每人发了三个馒头，然后命令说：“快吃！”

我们溜烟似地跑向铺在山谷里的铁路线。呵，看到铁路了。我看到了铁轨的闪光。由于走得很快，我觉得喘不过气来，但我还是尽力不出声响，免得引起战友们的责备。我紧紧跟着我前面的人。过了一会儿，再回头看时，高高的柱上孤零零地飘着一面日本旗，远处闪烁着城镇的灯火。

但难关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还得越过铁路另一侧的危险地带，才能安下心来。我们在日军修复得平平整整的路上走了大约五十米。途中，一名战士迅速地“接收”了一卷日军通讯用的

电线。

我们再次穿过一个凄凉的村子。村里的路上，在残壁断瓦之旁，躺着曾经住在这里的村民的骸骨。饿狗把尸体的肉都啃掉了。能活下来的村民，则躲到山洞里去了。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座被毁坏得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小休时，差不多已是凌晨二点了。大家累得要命，都躺了下来。我很快便入睡了。一小时后，我们被叫了起来。我们身上的夜间寒气还未消失，便又继续行进，直到黎明。

到达八路军的一个师部时，才算离开了危险地带，可以安心睡觉了。为掩日军的耳目，这个师部每隔三、四天便转移到别的农家。每天晚上，师部通过无线电接受指示和命令，迅即传达给各方面。

一位八路军军官看见我冷得直打颤，便给了我一件日军军官大衣。八路军的一支队伍和当地的游击队，刚刚对日军的运输队进行了一次奇袭，凯旋而归。战利品之中，不仅有制服之类，还有武器、整桶的汽油，此外还有许多高级罐头。因此可以招待我们美餐一顿，请我们喝咖啡、抽英国香烟。战士们则为能分到好的手电筒而高兴。

取得出色战果的这支队伍的指挥员把一面日本太阳旗送给了我，说是为了纪念这次奇袭以及我们来到“敌后”。这面旗子我现在还保存着。旗子的白色部分，写满了“力”字，但它们并没有帮助旗子的主人免遭失败。旗子的中央是颜色鲜艳的红太阳，太阳周围的白底染着斑斑血迹。

有许多阵亡的日本兵，对咒语一类的东西迷信若狂，他们的各种遗物说明了这一点。这类物品以“千人针”为最多，还有祈求安全的徽章、“守袋”、佛像画等。他们把这些东西用绳子系

着，佩戴在脖子上。然而，这些护身符多么不起作用啊！

指挥员告诉我，要俘虏日本兵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说，“这恐怕不只是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假如他们向我们投降，我们就会杀死他们。他们的长官总是向他们宣传，说当了俘虏，就会被八路军严刑拷打、杀掉。他们信以为真。”

为数不多的日本俘虏兵中，有一个是军医，他后来在山西省中国军队的医院里工作了好几年。他承认上面那位指挥员所说的话是对的。“多数日本兵是反对战争的。”他很肯定地说，“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仇恨战争的，但是，他们能够拒绝到中国来吗？拒绝就意味着坐牢、死亡。在前线，老是向他们灌输：与其当中国军队的俘虏被杀，不如战死。因而，受伤的日本兵用刺刀割断动脉而死，是常见的事。”

“日军侵略山西省和其它许多省份，杀人放火，对这些残暴的行为，你怎样看呢？”我问道。

“尽管日军的军纪一般来说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属下的士兵即使疯狂杀人，军官对他们却也非常宽大。有些日本兵喝得烂醉，连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军官们不仅容忍，甚至还加以鼓励。”

后来，我还见了几名日本俘虏兵。大部分俘虏被俘后立即被送到远离前线的延安，在那里学习。后来成为日本共产党总书记的野坂，也在日本俘虏兵中工作。

由日军组织的伪军士兵，一有机会便向八路军投诚。被日军抓来当劳工的农民也是这样。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是从遥远的东北被日军带到这里来的。他们衣衫褴褛，衰弱的身体上伤痕累累，那是奴役他们的主人日本人干的好事。他们的神情非常

痛苦。

一个农民对我说：“如果不是想家想得这么厉害，我们是愿意留在这里的。”当时，这个农民正在一所野战医院当护士。

我们在持续行军往五台山地区之前，队长还让全队人员休息了一天。队里的妇女和病人在一座地主的房子里休息。我和两名女学生睡在新郎新娘的双人床上。在这张床上睡觉是多么舒服啊！贺新婚以示如意吉祥之类的红色剪纸，仍贴在窗上。床头还贴着一些流行的廉价画，画的是一个拿着石榴的妈妈领着一群孩子，这是多生育的象征。两名女学生告诉我，在房间的四个角落，还有用红纸条缚着的小弓箭，她们笑着说：“那是用来对付恶魔的，特别是用来消灭移情别恋的恶魔。”

五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取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的简称为名）是中国最大最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五台山地区是这个根据地的中心。五台山地区的面积几乎和意大利一样大。这个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地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各部分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情况都完全不同。其一是以神圣的五台山为中心的山区，这里的地形极宜于开展游击战，但这里的居民非常落后，多为文盲。其二是河北中部肥沃的平原，这里对游击战是不合适的。其三是北京的北部和西部的丘陵地带。

日军占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后，八路军的师长聂荣臻将军随即把河北和山西两省溃散的中国部队和抗日组织加以合并，使之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已经处于统一的指挥之下。

聂荣臻将军大约四十岁，是个沉静的人。他用法语和我谈话。在整面墙都贴着地图的师部——师部循例每隔几天便搬到另一个村子——的一个简朴的房间里，他对我说，他曾在巴黎学化学。他和周恩来、陈毅以及其他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二十年代初期，他在施耐德—克鲁索和雷诺等工厂一边劳动，一边积极参加欧洲的工人运动。聂荣臻在一九二五年回到中国，回国之前，他在莫斯科停留一年，在那里完成了政治教育课程。回国后，他在蒋介石当校长的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任教官。他的军事才能，在内战和长征时期得到了证明。

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地区，继军事上的整编之后，不久便进行了行政上的整编。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五台山地区召开的会议上，选出了新的政府。这个政府由各党派的成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共产党人、基督教徒、喇嘛僧侣、北京的教授和学生以及不识字的农民共聚一堂，这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制订了一个共同纲领，并决定实行普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都有选举权。他们直接选出村长和村委会。

我问政治宣传部部长：“不识字的农民怎么选举呢？他们连选票也看不懂啊。”

“我们用一种极为简单、容易的投票方式——‘豆选’。”他给我解释说。“选举的那天，事先从村里选出的候选人——候选人的人数一般是当选者的两倍——在室外或者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坐下来。他们每人背后放着一个碗。然后发给每个参加选举的人一些豆子，豆子的数目与要选举出的村委会委员的人数相同。选举者只要把豆子放到自己希望选的候选人的碗里就行了。投票结束后，将碗里的豆子数一数，谁得的豆子最多，谁就当选。

就这样，民主选举这个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自由选举和民众参政，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当然是极其普通的事。但在中国，这却是令人惊奇的一种革新。在晋察冀边区，各阶层人士，主要是贫农，代替了地主和党棍在村里行使政治权力。他们要对选举自己的选民负责。选民如果对他们不满意，可以将他们罢免。

这是一个青年政府。各县政府的主席，几乎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才二十九岁。

宋是个典型的北方人，肩宽体壮。他说起话来慢悠悠的，没有废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我阐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在北京念书时参加了爱国青年运动，但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故乡山西省，被任命为该省北部一个县的县长。日军入侵时，许多国民党官员纷纷逃跑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后来，八路军希望他协力参加光复地区的政府领导工作，他立即答应了。

毫无疑问，共产党由于它的经历以及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能力，在边区政府中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但与此同时，共产党不仅不拒绝其它党派的合作，而且还发展这种合作。这是当时的一个特征。同样，共产党还积极努力建立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最有名的是被称为“抗日救国会”的这个组织，其属下有各以青年、妇女、农民为不同对象的分会。

除了地主和商人，五台山地区的男子几乎全都加入了工人协会和农民协会。工人中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象样的工厂，产业工人很少。这些协会的责任是建立自卫队，帮助部队运送弹药和伤员，修桥补路，等等。

取得最大成果的是妇女组织。它们使妇女摆脱了家长制的

家庭束缚，在愚昧无知中睁开了双眼，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日军的侵略，使妇女们离开了日常生活的单调世界，而不管她们愿意与否。当与八路军一起来的宣传员号召她们与丈夫一起参加抗日运动时，她们便纷纷响应。这些宣传员中，有许多与我们同行的女学生们一样，是来自北京、天津的女学生。但年纪较大的妇女参加抗日运动的并不多。日军在这方面也巧妙地做了离间工作，他们的破坏成功了。

妇女们为了克服自己的无知而努力学习的劲头，令人惊讶。几乎每个村子都办了夜校，由地主的女儿和女学生们任教师。有一次，我在一座小庙里，看到二十名妇女在认真地学文化。她们使用的课本是油印的小册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句子，从日常生活中选材。为了易于理解，还附有图解。第一页画的是一个妇女在厨房里，标题是：“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下面的句子是：“我的儿子是游击队员”，或者是：“我的女儿是村委会的委员”等。事实上，有许多妇女被选为村委会的主席，甚至有几位妇女担任了县政府的主席。

妇女们也参加军事行动，当然主要是担任急救护士和抬担架。但一位女宣传员自豪地对我说，许多妇女在袭击铁路时，特别是在偷获日军的电线和电线杆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

连佛教的僧侣们也适应了新的生活。他们自动要求政府使用寺院。寺院里，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代表团在汇报情况，学生小组在展开热烈的讨论。僧侣们全然不受这一切的干扰。他们躲在有金色佛像的屋内，仍进行庄严的佛教仪式。单调的念经声，在关闭了的门外仍可听到。

“开会了！开会了！”到了傍晚，村里常常响起这样的喊声。铜锣声和喇叭的号声，传遍远近。集会总是有许多人参加，有各

群众组织的成员、战士、僧侣等，五花八门。我想，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电影导演，大概也不能同时汇集这么多的角色吧。会上详细报告战况，或讨论军民的合作。经济问题尤其使人感兴趣，提出来进行研究的议题都很实际。

我在山西省各地走了走以后，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脑际：“敌后”的几千名战士的粮食是如何调配的？农民自己都还不能吃饱，我吃的也只是玉米和萝卜等粗食。我可以想象，入冬之后粮食调配是很困难的。通过出席各种集会，以及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负责人谈话，我得知，为了整顿紊乱不堪的经济生活，提高生产，实际上也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最初采取的措施是，全区减租百分之二十五。被没收的仅是站在日军一边的地主的财产，其它的私有财产一律不触动。行政上厉行节约，没有贪污之类的事情。减租减息的结果，使得农民有余力购买新的农具和牲口。但是在这一时期，日军进行了报复和“扫荡”，通过“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使整个地区都受到严重破坏，所以，为了提高生产，还必须采取其它一些措施。

“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个运动的重点是开垦已经荒芜了的农田，配给良种，减轻税收，实行信用贷款。此外，军队和行政机构实行自给自足，以自己的力量，利用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等。

进入四十年代，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敌后各根据地的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仍然受到日军的破坏，但已比国民党统治区要高。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而敌后根据地已经被称为“解放区”了。

八路军的一个旅，在前线打了三年仗以后，撤退到黄河以西的地区，在南泥湾的峡谷开荒，垦殖出许多肥沃的农田。这片荒

地以前只有野生动物，了无人迹。这个“南泥湾方式”，后来被八路军所有的防卫部队采用了。当然，在战斗进行的地区里，常常是一支部队播种，而由另一支部队来收割。

在重庆，我听到有关毛泽东和朱德的“生产成果”的许多轶事。以吸烟出了名的毛，除了种洋葱和蒿苳，还为自己和朋友们种烟草。朱德种西红柿非常成功。当时西红柿在西北还不为人所知，朱德把它引进栽培。延安的阳光充足、空气干燥，很适合西红柿的生长。西红柿不久便成了很受欢迎的一种蔬菜。西红柿意为“外国的柿子”，因为它的颜色、形状都与本地的柿子相似。

国际和平医院

“明天骑马到国际和平医院去，”一位女护士告诉我。这位女护士为了当一名八路军的医务人员，最近刚从北京“突破封锁线”来到这里。访问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主持的这个医院，本来是我此行的目的，因为我在香港时答应过孙夫人，要以书面向她详细报告这个医院的情况。国际和平医院是“保卫中国同盟”创立的，费用靠外国和中国国内捐献，由“保卫中国同盟”主管。

为了组织医护人员能灵活机动地在前线展开医疗卫生工作，白求恩大夫正要往河北省的中部去。在他出发的前夕，我已赶上与他会晤。

“负伤的战士或游击队员常常要在担架上躺十天才运到医院来，”他说。“有不少伤员在路上死去。而且在途中染上传染病的危险性很大。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也一定要有一支能够在战

斗中进行工作的巡回医疗队。”

他领我去看设在各种建筑物内的诊室，设在寺院里的手术室，边看边谈工作情况，并让我把他所担心的和希望的详细地记录下来。

“‘保卫中国同盟’一定会把工作上的必需器材调配给你的，”我保证说。“不过，我们是否能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敌后根据地的封锁，得到这些器材，我就知道了。”

“我们缺少最必要的器材，”白求恩大夫对我诉苦说。“不用说，还缺少X光透视机、输血设备。其它各种医药用品也少得可怜。这个医院的情况，你现在已亲眼看到了。我们阻止了日军的进击，但是，这付出了许多人的生命。”

尽管白求恩向我诉苦，可是我在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中，仍高度赞扬了五台山地区的医务工作在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绩。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聪敏的青年人，并没有轻易地向困难投降，而是开动脑筋，想方设法为医院配置简陋的、然而必要的器材和设备。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实验来确定当地的中草药有哪些是有用的。数量较少的药品，从沦陷区的城市购买，并通过前线悄悄运进来。大量的绷带和医药用品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在南方的前线，伤病员没有接受任何医疗，带着伤行军，有的就在路边倒毙；想到这种可怕的情景，我就不能不感到国际和平医院——这所简陋然而清洁的农村野战医院是出色的。

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们几乎都在红军的医科大学或者后来在“解放区”内新设的医学专科学校受过教育。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水准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只是个治治外伤的医士。但他们的外科知识以及与战争的实际要求相适应的知识，还是

够用的。白求恩大夫对他们非常满意，这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他是个从不赞扬别人的人，许多和他合作的中国人，对他几乎都害怕，因为他容易激动，常常暴跳如雷。白求恩大夫对中国的旧习惯不满时，便以西方人的方式，毫不掩饰地直接发泄出来，这是常有的事。他不是象中国人那样，用有礼貌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可是，白求恩大夫毫无疑问是有赫赫功绩的。他在短时期里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军医院，培养了一支卫生队伍。这些组织工作完成后，他随即着手训练医务人员。因此，一九三九年九月开办的培养医务人员的学校，在白求恩大夫死后以他的名字命名，是无可非议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白求恩大夫在给伤员做手术时，感染了病菌，因缺乏必需的治疗药物而可惜地死去。

白求恩的继任人是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他到达汉口时我曾与他会晤。柯棣华大夫后来也因药品不足而殉职。他死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国际和平医院一带的风光，很有魅力。高大的松树，树枝盘曲，四季常青；古老的寺院便在这些松树的环抱中，宛如一幅古画。清晨，露珠在庙顶的绿瓦上闪闪发亮。古代的名画家，大概曾以这一带的景色作为素材吧。

医院所在的村子，到处都是黄土的房子、黄土的围墙。围墙上，游击队写的口号鲜明可见：“军民一致，对日抗战！”“我们不做亡国奴！”“拿起武器！为把日军全部赶出中国而战斗！”只有富裕的农家，才有漂亮的红木家具。我曾在这样的人家住了一夜。这家人都逃走了，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留了下来。木窗框上的雕刻很美，但窗纸已经破了，大概是因为已入夏，天气暖和，这个老人觉得没有必要换上新的吧。从窗外可以透视室内

的一切，好奇的人便接连不断地来窥看我这个高鼻子黄头发的怪人。非常疲累的时候，只希望一个人安静一下，这是人之常情。这时候，如果有人来打扰，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和蔼相待的。可是，在入黑以前，好奇的“客人”们还是在我们的窗前站立不散，我的同伴挥之再三，他们也不加理会。有些人说我是日本俘虏，另一些人则说我是从大洋那一边的国家来的。他们甚至不时地争论我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妇女们看着我的“大脚”窃笑，而她们对自己那双象马蹄一样的缠足，却不以为怪。不过，他们都只是好奇，完全没有恶意。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几乎都对我伸出大拇指，这是中国人称赞别人顶呱呱的一个动作。

重返国民党地区

我访问白求恩大夫的医院，是绕路前往的。回来时，好消息已经等待着我了：几天之内，八路军的一支大部队出发南行，我回家可与他们同行，这样安全就有保证了。这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许多时候，为等待大部队适应新的情况而转移，需要好几个星期。

这一次我的旅伴是两位北京的教授。他们的年纪都在三十五岁左右。两人过去都在大学教化学，现在则是爆破专家，特别是爆破列车的专家。他们告诉我，最初是用炸药爆破日军运送部队的列车，后来因为炸药缺乏，便挑选铁路的拐弯处拔去铁轨的道钉，火车的重量会把铁轨压开，这样，火车多半会脱轨，这一条线路很长时间便不能通车了。这两位教授现在不给学生上化学课了，他们教游击队制造地雷。“地雷”这个农民起的名字非常恰

当，的确是“地里的雷”。制造地雷的材料山西省有，必需的化学药品则由军队提供。农民在各村的入口埋上地雷之后，他们就不再怕喝得烂醉的日本兵进村抓妇女了。全村只有一个入口没有埋雷，而这个入口只有村民才知道。

当侦察员传来日军大部队进犯的消息时，大家便撤离村子。轻便的东西各自带走，带不走的便藏起来，或者加以伪装，伪装得非常巧妙。旅途中，我走进一个村子，看到农民正把用绳子吊在繁茂的大树上的家具放下来。日军几天前曾在这个村子驻屯过。日军进村后，总是把屋里的东西都一一破坏、烧毁，很少花力气去搜寻那些隐蔽起来或伪装好的东西。这是农民所深知的。

归途的行军，也是在山西省的山岳地带和深谷之中，并没有出什么意外。疲劳、饥饿、夜间的危险等等，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二十个小时连续行军，几乎没有休息，而且已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我就象喝醉了似的踉踉跄跄地走着，边走边睡，有时候绊了一下，才突然惊醒。停止行进时，大家立即就地倒下，很快就睡着了。

穿过铁路和公路时，为防患于未然，我们总是事先拟好妥善的对策。我们一行在一个村子里待机而行，通讯员、侦察员等接连不断地来报告日军的动静。我们接到指示：一步也不要出门。这是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们。这个村子就在日军的兵营附近，当地的农民还没有抗日组织，是不大能信任的。因此，我们的计划和要去的目的地都必须对他们保密，否则，他们很可能泄露给日军。

我们越过铁路和公路不久，便接到侦察员的报告：日军袭击了我们前一天在那里休息过的村子。日军显然已得到关于我们

一行的一点风声。幸好连绵不断的雨使得山路滑脚难行，阻挡了日军的追击，当然也使我们的行进变得困难了。

原先我们以为越过封锁线之后可能会休息几天，可是新出现的这一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刻不容缓地继续行军。由于看到日军有加强警戒的征兆，我们部队的军官们深感危险。铁路边的木板房，亮着明晃晃的电灯。我们的后卫部队穿过铁路三十分钟以后，便看到远处的上方有一辆列车在我们越过的铁路上停了下来。机枪声使我们忘记了疲劳，一溜烟似地向倾斜的山路上奔去。

第二天，我们和八路军的部队分开了，只有几名战士护卫我们到黄河。每一个日子都觉得很长。有时候还听到飞机的声音。有一次，突然遇到空袭，我们大为吃惊。当时我们正在一个惨遭破坏的村子里休息。我急忙跑出来，躲进一个象小池子那样大的弹坑里。坑内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几个老人象蝙蝠似地紧紧地贴着坑壁肮脏的泥土上。他们跑起来很费力，所以只能在这个最近的弹坑里隐蔽。也许是因为他们深信已经落过炸弹的地方该不会再挨炸了，所以才躲到这里来。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常常是错误的。

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最后，我们终于到达黄河边。为了躲避空袭，渡船在傍晚后才开动。我们乘的一叶扁舟离岸而去时，黄河的河堤已被夕阳染红。打着补丁的大帆在江风中哗啦哗啦地响着，几只桨打着浅水向前划动。这些桨长约九米，每只桨由三名船夫合划。我们乘坐的船被岸上的缆牵着，徐徐地逆流而行。突然，船缆松开了，船夫们为统一动作，喘着气似地呼起号子，沿着几乎是对角线的方向，用力逆行。渡船被波浪翻弄着，象树叶似地在河中旋舞。正如从奔驰中的列车的窗内眺望外面

的景色一样，眼看我们刚离开的河岸越来越远去。黄河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它就象一条龙，随时准备吞下它的祭品。

黄河的南岸尽管已被战火烧成废墟，但处处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气氛。排成长列的牛车，运载着好容易到这里来的伤员。各式各样的人群——难民、农民、商人、士兵，等等——向着铁路的方向走去。我真觉得奇怪，这里竟然还有一条铁路在通行。我可以乘火车到西安了。当然，在陕西省边境的潼关，我们必须换一次车。这是因为对岸被日军占领了，线路常常被破坏，有三十公里不能通行。不可思议的是，日军象是完全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从潼关上方的山上眺望，便可以看到日军的货车正来来往往——几百头驴、骡、人力车、手推车等，运载着旅客和行李，把他们从一辆列车送到另一辆列车！

幸而，只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便可到达西安。车厢内乱七八糟，满是人、背包、筐子、箱子，要想找到座位，几乎是不可能的。行李架这个“特等席”被走运的人占领了，他们直条条地躺在上面；架下挂着许多鸟笼。热得象火烧的铁皮车顶，也满是乘客。列车停驶时，孩子们从窗口走下去或者从车顶上用绳子吊下来。

到处都是互相推挤，人们各自为自己的家人找座位。一名高级官员带着一群随行人员和堆得象山一样高的行李，让士兵在前面开路，毫不讲理地把坐着的人赶开，谁也不敢吭声。难民和士兵们在议论：日军会进攻到什么地方，中国军队会退却到什么地方。“没有办法！”这句话，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在敌后根据地，我从来也没有听人这样说过。尽管困难重重，强大的敌军就在身边，在敌后根据地人们总是说：“有办法！”

十一

战争的岁月

政治前途乌云密布

一九三九年，似乎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存在的最后一年了。统一战线，是指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为抗日的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表面上，统一战线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但实际上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表明，它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已经“有名无实”。

如果说两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唯一的共通之处，这便是以日本为敌。共产党的军队击退日军后，在光复的地区实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蒋介石也不能有任何异议。因为在国民党的公开纲领中，也写着这方面的改革。在“解放区”里，共产党起领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共产党并没有通过强制和武力，而是通过劝说和范例来实施它的从当时来看既非共产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纲领。“解放区”的人口到战争结束时大约仍有一亿人。

当时，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施政要民主得多，这是我亲眼目睹所得出的结论。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来自各国的非亲共的观察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实施，对爱国者、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此，蒋介石只知以武力进行封锁，别无他法。

在抗日战争的最高潮时，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控制地区

之间长达数百公里的分界线上筑有许多堡垒。三十万以上装备优良的士兵驻扎在这些堡垒群中，长期不能投入与日军作战。与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联系，逐渐受到限制，最后被完全隔断。周恩来曾提醒过我，到华北前线去要尽快出发，他的意见看来是对的。

归途中，我听说，在西安有许多青年人，因为有所谓“危险思想”或者想到延安和前线地区的学校而被捕，然后被送到集中营去接受“再教育”。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协定中所规定的对八路军的武器供应停止了，甚至连医药用品也不准越过封锁线。美国和英国赠予的野战医院用的设备和医药用品等，“保卫中国同盟”好多次都运不到目的地——国际和平医院。由英国的救援组织派来的两名成员所率领的运输队，虽然已取得重庆政府的运输许可，但负责封锁的军队就是不让他们通过。经过数月交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把医药用品交给政府军的卫生队，可实际上这也没有办到。这批医药用品索性被地方的政府机关没收了，不久却在西安的药房里出现，以黑市的价格出售。

按照国际惯例，红十字会不仅对己方，而且对敌方的伤员也伸出医疗之手。而中国的士兵，却由于本国政府的阻碍，因外科器械和药品不足而眼睁睁地死去。我把八路军卫生队的广泛活动，以及它所发挥的卓越的能力等详细情况综合起来，与急需的医药用品清单一并送交“保卫中国同盟”和孙夫人处，但这些药品未能运到，白求恩大夫白等了一场。

公布如上事实，国民党自然是不满意的。官方所竭力宣传的，一直是一个新的、即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形象，国民党不想使这一形象在国外受到损害。甚至外国驻中国的特派记者，为了

维护中国的利益，对报道这些他们所熟知的腐败情况也踌躇不已。即使报道，也得设法瞒过比以前更加严厉的新闻检查机关才行。新闻检查的对象不仅是外国特派记者的报道，中国的报纸也全部在内。

为了压制各阶层人民日益增大的不满情绪，政府所采取的手段不限于新闻检查。战争爆发时处于“暂停营业”状态的特务组织，又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复活了。到抗日战争快结束时，该组织已有一百万名特务。以臭名昭著的戴笠将军为总头目的特务组织取名为“调查统计局”，光看名字，仿佛与特务活动无关。这个组织所搞的“清洗活动”，开始只限于在战时的首都——重庆以外的其它各省进行，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外国的注意。

我在贵阳时已听说特务曾对中国红十字会施加压力。在宝鸡，也听说过特务给工业合作社所制造的种种困难。每当有人来我们家时，不管是来自湖南还是江西，陕西还是河南，我们从他们口中总听到一些关于逮捕、压制乃至政治暗杀的情况。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可怕的敌人的战争，而这场战争迫切需要全中国有一个团结的阵线。从这一考虑出发，真不敢相信朋友们的话是真的。但他们所讲的确实都是自己的见闻，其中有许多人本身几乎被捕。

有关各地非常事态的报告，决非夸张之语，这一点我们在重庆也得到了证实。一九四〇年年底，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博士，受到警告，被宪兵监视起来了。

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马教授，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即使是他的反对派，也不曾指责过他是共产党人。但是他敢于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公开批评政府的财经政策，甚至敢于抨击最高

领导层的贪污腐化、利欲熏心。

“我是一个老人，”白发如霜的教授对那些忠告他要慎言的朋友们说。“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对那些可怕的非正义行为加以抗议，我认为这是我应尽的爱国义务。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容忍贪污，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加在穷人身上，对此，我不能不抗议。”

国民党有一个很得意的口号，叫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这也是有名无实的。富翁们根本不曾考虑过要出钱，相反，他们攫取巨额利润，并把自己的金钱拿到国外去投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于马教授在学生中很有声望，反对迫害马教授的示威和骚动发生了，结果导致继续逮捕。

马教授所在的大学被置于保守的教育部长的直接监督之下，校内特务遍布。后来，大学还短期被封闭，进行“改组”。马教授并没有受到正式的控告，却被秘密关了四年。后来他被“释放”了， just 却不准他重上教坛，而且要他立誓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意见。

此后过了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寅初教授由于批评共产党的经济计划而招致党的不满。虽然他在一九四九年明确表示支持北京政府，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可是一九六〇年，他的校长职务被免掉了，理由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当然，仍保留着他在人民代表大会里的席位。他的《发展农业的八项计划》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国家经济计划中被采用。

马教授事件及其他自由主义的科学家、新闻界人士所受到的迫害表明，无党派人士和“救国运动”的成员，以至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受到残酷的镇压。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控制

的地区，因此，在重庆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由周恩来负责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到保护的。政府之所以肯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给国外一个真正民主的印象。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则是赤手空拳，他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作自己的后盾，而他们的报道机关则受到镇压。

这样，到一九四〇年，这些阶层的许多人，开始逃到出版和言论自由受到保障的香港，逃亡人数逐渐增多。这些“流亡者”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曾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茅盾，他在重庆是不能发表自己的任何作品的；著名的出版家、文学家邹韬奋，他是救国会的七名领导人之一，我在上海和在苏州的监狱里曾经见过他；政论家胡愈之，他以前曾是哈瓦斯通讯社的工作人员。

从桂林逃出的，还有著名剧作家夏衍和记者范长江。后来，范长江和沈钧儒先生的女儿结了婚。他们能够从重庆政府的通缉令中逃脱，完全是因为得到桂林地区司令官之助。这个司令官为他们弄到了往香港去的飞机票，直到他们安全逃脱之后才执行逮捕命令。

象过去的孙逸仙博士一样，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受到华侨的亲切的接待和援助。他们在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爪哇等地，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在国内是办不到的。著名的华侨百万富翁，帮助这些从祖国被逐出来的自由主义者，提供必要的资金，让他们出版报纸、杂志、图书和资料性的作品。这些出版物中，有好些被秘密带进中国。为了抵销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国民党派了许多官员到华侨中间去活动，但毫无效果。华侨们向这些官员提出许许多多的质问，官员们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一九四一年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些“流亡者”中有好些人又逃回中国。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没有被宽恕，也没有被遗忘。他们的名字立即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所有的报章杂志都被警告，不能给他们以工作或发表他们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我听说我在印度支那认识的一位朋友萨空了，在桂林失踪了。萨空了在新疆呆了没多久，便加入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行列，逃到香港。他在香港发行批判国民党的报纸，成了有名的人物。萨空了返回桂林后，各方面人都提醒他，让他注意，说特务组织要绑架他。但他认为由此而畏缩不前，停止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是有失尊严的。

过了两年，他突然在我们在重庆的家中出现。在重庆，他仍然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不过特务给了他几天“休假”，让他在新年去探访朋友。

特务绑架萨空了并立即把他关进集中营，显然是为了阻止他与外国的著名人士接触，不让他把中国的实情告诉他们。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著名人士越来越多。萨所属的民主同盟多次发表这样的见解：如果美国知道中国的实情就会对国民党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能说非常漂亮的英语的萨空了，是民主主义者的一名很好的宣传家。

萨告诉我们，他被中央政府下令逮捕，在桂林却只受到省政府的看管。省政府只是勉强地执行了这个命令，所以对他的态度并不是那么严厉。他自豪地说，在这两年间，他做出了大事情，写了三本书，但都不是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作为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许多美国小说），他有许多笔名。

皖南事变——新四军突遭袭击

镇压进步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不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但镇压的对象毕竟是一小部分少数派，尽管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对这样的镇压，不仅一般的国民党人士，甚至国民领袖蒋介石，也没有说过一句不赞同的话，他们默许或称赞这种行动。这使得政府和军队内的反共狂热分子认为，他们也可以向共产党人动手。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如果大肆进攻共产党的军队，那就会使国共两党之间内战的战火再度燃起，结果只会对日本有利。内战在最后一瞬没有发生，这是由于共产党的节制以及蒋介石的让步，特别是英美两国对蒋施加的压力。英美两国威胁说，如发生内战，便撤销已签订的财政援助。尽管如此，所谓“新四军偶然发生的事件”事实上已经意味着统一战线的结束。

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攻击，决非偶然。新四军是八路军的兄弟部队。它的作战区位于长江下游沪宁杭三市所形成的三角地带，是国民党的经济基地和政治据点。国民党从这个富庶的、高度发达的地区撤走了它的精锐部队，把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在这个地区急速发展，活动频繁，重庆政府对此越来越不安。

新四军的核心是由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省的老红军部队中幸存下来的人员所组成。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同意编成新的部队，这支部队就叫做新四军，成为国军的一个部分。新四军由老共产党员项英将军和非共产党员叶挺将军指挥。这支部队最初

只有几千人，不久便成为拥有约三万正规军和七万游击队的强大部队。

“你是非共产党的职业军人，怎么能与共产党战友合得来呢？”一次，趁叶将军在重庆稍作逗留之机，我这样问他。叶告诉我，他在有名的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德国学了一段时间的军事科学。他给人的印象是个一丝不苟的将军，他那一身极为称身的制服，与由他指挥的共产党的战士们那朴素随便的军服比起来，总显得非常与众不同。

叶将军对他麾下的军队非常满意。“共产党的战术如果能够打赢日本，我当然只能支持这种战术，”他说。“我们征集新兵并没有困难。这一点，你只要看看我们部队在短期内增强得这么快，就会明白了。我军在日军占领的城市附近作战，使得日军不敢从上海和南京出来一步。政府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武器，我们的武器都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还从叶将军那里得知，政府显然不怎么愿意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对日军进行骚扰。这大概是因为国民党内的地主们担心，战争结束后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民不想再受旧的封建关系的束缚了。

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共产党方面同意把新四军转移到长江北岸。一月初，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少部分部队还留在南岸，这些部队包括军参谋部、政治部、军官学校和军医院。最后，新四军的转移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必须通过敌占区，因此，采取了非常周密的预防措施，以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的一天，炳南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要他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深夜，炳南从八路军办事处回来，他告诉我，向长江江岸行进的新四军后卫部队在

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这次袭击由于国民党军队用的是伏兵，事前经过极为周密的布置，新四军部队只有极少数幸存。项英将军被杀害，叶挺将军身负重伤被俘。叶挺过了五年的俘虏生活之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在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我在汉口认识的博古也在这次事故中牺牲。

日军对这次中国人之间的互相残杀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所以在重庆有不少人推测，蒋介石的军政部长曾与日军秘密谈和，和解的条件是必须歼灭共产党的军队。

“周恩来认为事态严重，”炳南说。“延安会有什么决定下来，要等一等才知道。周恩来请你明天也一起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下，看看在重庆采取些什么措施才好。”

这一夜，我们两人都辗转难眠。我们交谈着关于中国，以及我们大家所面临的种种可怕的可能性。

国民党方面对这次事件保持沉默，但这一新闻有如燎原之火，在关心政治的人们中间广泛传开。一大清早，就已经有人来拜访我们了，他们想从炳南那里打听较为详细的情况。

当我们两人在周恩来的对面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

“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至于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我们不讲，这个消息也会传开。”

数日之间，这一事件便传遍整个重庆。起初，外国记者们就此向政府机关查询，但没有答复。他们根据从共产党方面得到的情报所写的报道，也都被新闻检查处压下了。中国的报纸对皖南事变没有任何报道。

国民党最初企图以沉默把这一事件完全抹杀。当他们知道

这样做不能持久时，便把它当成是一件小事来处理。但这一企图仍然以惨败而终。

中国的爱国者对皖南事变异常愤激，他们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抗日因此而受到彻底破坏。政府则并不过分担心他们的愤激，因为可以采取恐怖手段予以镇压。棘手的是如何对付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质问。

关于这一事件，驻重庆的美国大使向本国的报告显然是依据中国政府所讲的内容，即这一事件是单纯的“军纪处分”问题，毫无政治意味。不料，碰巧那位卡尔逊上尉在中国。卡尔逊过去在汉口曾发出许多关于八路军的引人注目的报告。这次来中国，准备第二次到华北去。皖南事变发生后，卡尔逊随即回到美国。因为他本人认识罗斯福总统，所以，他向总统提供了有关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美国记者经香港秘密传出来的报道，证实卡尔逊的消息是正确的。据此，美国政府便通知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英国政府也有同样的反应。事件发生后，我曾立即把事件的真相报告了我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凯尔爵士。于是他便把他非常钦佩的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收到大使的报告后，英国政府也表示非常关切，并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苏联对中国政府虽然也公开表明了态度，但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观察家而已。

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及其军队中的极右分子，除了让步别无他途。对新四军的攻击已经发生了，蒋介石也无法可施，但针对八路军所有部队的反共军事攻势只好取消。

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呢？会不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公开与国民党一刀两断？会不会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报复？这是重庆的每日话题。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即使这样做也是正当的，但却又害怕共产党这样做。

可是在延安，人们很清楚，无论如何得避免内战。就象一九三六年在西安时一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采取克制的态度，将民族利益和对日的抗击置于党的政治利益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因此承认既成事实，对党的政策不作根本性的修正。裂缝实在太深，不能一味地幻想“团结”了。

周恩来为了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商讨今后的政策，到延安去了。他重返重庆时，已是一九四四年。

对国民党的反对日增

往延安去的飞机起飞前，周恩来又一次把和他密切合作的下属唤到一起来。我们聚集在一起，大家脸上的神色都很沉重。这之中，有聪明的龚澎，她就象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的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抱她有恶感。她的丈夫战死了，几年后，她与记者乔冠华结了婚，乔也是共产党员。目前乔担任外交部的副部长，这几年来是国际舆论界所熟悉的人物。一九四九年后，龚澎在北京一直任外交

部新闻司司长，一九七〇年因脑肿瘤去世。

年轻的陈家康，很用心记笔记。他极象学生。在老练的同志中，他看上去往往象个新手似的，可周恩来对陈家康的勤奋好学的精神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物。

只有炳南和我两人不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是外国妇女，又不是党员，住在中国军队的办事处会惹起不必要的注目。另一个理由是，炳南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与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保持接触，为此，还是不住在八路军的正式代表机关为好。

周恩来详细给我们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袭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治上的变化。共产党今后虽然将继续为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但它将明确阐明它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它将要求得到发表意见、提出条件的权利。周恩来又说，毋庸置疑，蒋介石对反共势力的复活应当负责，但当前要避免对他个人进行严厉批判。不管怎样，不可指责说他想放弃抗日。舆论的压力，以及华盛顿和伦敦不希望中国内战的态度也许会使蒋介石改弦易辙吧。

“现在有一项重任摆在你们大家的面前，”周恩来说。“希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里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共产党的立场，向他们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报。”周恩来接着对我说：

“我知道你特别关心的是什麼。你每次到办事处来，总是要求得到关于医院、幼儿园以及关于所有由‘保卫中国同盟’和外国友人所慷慨支持的事业的情况。我知道他们需要这方面的报告，但要从前线得到这种报告是不容易的。这一点，请你向他们解释一下。关于你所要的漂亮的照片，我尽力设法去搞，但恐

怕希望不大。”

就这样，周恩来离开后，他的这座在阴暗胡同里的房子，便成了重要的情报中心。由于这座房子的门牌是五十号，外国记者们便管它叫“五十号”。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和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密探，监视着在这座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但外交官和记者们对此毫不在意，还是照样来访。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共产党对政局是怎样看的，哪怕是听到一点点也好。他们把听到的写成报告，秘密带往国外去，这使国民党非常恼火。

不久，我们家也被特务盯上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炳南是周恩来身边的助手。而且，我们的朋友，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救国会的成员，全都是有“嫌疑”的。

对新四军袭击而产生的危机使留在重庆的几个小政党的成员也甚为不安。由于国民党不容许这些小政党在政治上有共同决定权，再加上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的复活，使这些小政党的活动也和共产党一样备受威胁。所以，这些小政党强烈要求国民党履行它曾经许下的实现议会制民主的承诺，也就是说，政党之间的矛盾，不应依靠军事手段，而应以政治的方式解决。

小政党提出要为国民党与共产党调停。对此，国民党最初是客客气气地谢绝，后来则是非常露骨地坚决拒绝。而共产党则表示愿意听取和考虑小政党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小政党开始倾向共产党，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友党，转而激烈反对国民党。

连国民党有名的老党员，也常常到炳南处，发泄他们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来得最多的是著名的冯玉祥将军。他是老军阀，外国人大都把他称为“基督将军”。

在我认识的不平凡人物中，冯将军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他与他的许多敌手和盟友一样，敌友关系

是常常改变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他才好。由于他的才能与果断的性格，使他爬上了大军阀的地位。即使对蒋介石，冯玉祥与他时而是敌人，时而则是盟友，彼此联手与其他军阀对抗。冯的军队在中国被认为是军纪严、战斗力强的部队之一。但他一手支配华北的好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军队，但由于他是一个有声望的国民党员，所以他的话在党内仍很有影响力。

国民党内只有少数人可以公开陈述自己的意见，与共产党员和自由主义者交往，冯将军便是其中之一。在他波涛起伏的生涯里，盟友虽然几经更替，但他对日本的恨，对老百姓的爱，却始终不变。因此，随着对日抵抗的松垮以及战争开始后人民的日益贫困，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判越来越激烈。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受到一般会被扣上“国贼”帽子的处分，这是因为他深得人望而且很有地位。

我们家受到特务的特别注意，在皖南事变之后，更为明显。这也难怪，在重庆，除了八路军办事处外，找不出第二座住着这么多“可疑分子”的房子，而且还有那么多客人——其中有中国人和外国人——进进出出。

但有一点是与八路军办事处不同的：我们的房子并不在阴暗的胡同里，而是在小小的山丘上，而且，还要登上一段石阶，这使得特务难以隐蔽，再加上监视我们的特务不是一个，而始终是好多个，即对我们“合作社”里的每个成员都分别派特务监视，所以他们隐蔽起来就更加困难。

但特务还是有办法的。我们不久发现在我们石阶的路边，新开了一家茶馆。与其说是茶馆，不如说是个茶房。它的出现完全归功于我们的那些“影子”们。他们在茶馆里可以看到石

阶。当我们之中某一个人出门，他的“影子”便开始跟踪。盯我的那个特务，工作可不好干，因为我走路的速度很快。后来，我听说，他要求特务机关再派一个人来盯我，因为一个人盯不住我。

“这都是些什么人？”一天，我问炳南。“我真想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炳南十分生气地说：“你怎么对这些家伙有兴趣呢？对于这些渣滓，无人过问。所有正直的人都鄙视他们。八路军办事处的战士们一看到他们就骂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他们一听到骂，就鬼鬼祟祟地躲起来。”

“这至少表明，正象许多人所说的，国民党的中国与纳粹德国还是不一样的，”我说。“你想想，如果在德国，把纳粹的特务唤作狗，会平安无事吗？而这里，看起来，害怕的不是我们，而是特务哩。”

不管炳南怎样生气，还是不能捺下我的好奇心。好几次，我都试着去堵住我的跟踪者。我突然在一个商店前停住脚步，或者有时候故意在一座建筑物前面走来走去，装着想进去找什么似的。不过跟踪者并不会那么轻易地让被跟踪者逮住。

一次，象猫和老鼠似地追逐了一阵之后，我突然在无法逃走又无法藏身的一条人迹罕到的胡同里，成功地在特务面前叉开两腿站着，总算把他拦住了。当他听到我和他说话时，他显得非常吃惊。

我说：“究竟为什么，你总是跟在我后面？要是想从我这里打听点什么，你可以问我嘛！如果你要给你的老板戴笠将军打报告，那么我能给你提供的材料，比你侦查所获得的要多得多，因为你这样跟着我，充其量不过知道我到过什么地方而已。而我在屋里做什么、讲什么，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无言可对，只是呆呆地望着我。我继续安慰似地说：“有时当你和你的同事们一起吃午饭时，不巧我要外出，非打扰你不可，真对不起呵！今后你尽可放心地呆在茶馆里，我会把当天去过的地方详细告诉你，使你每天打报告时不会为难。另外，因为你和我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所以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走，边走边聊聊哩！”

以后好几个星期，我们都这样做。当我们走到那家茶馆视线不及之处，便开始交谈。当我责问他为什么要干正当的人所鄙视的职业时，他向我诉说着心中的苦楚，说因为很难找得到工作，并说象狗一样到处尾随着人，被同胞臭骂为狗，决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但要使自己和家人糊口，不干这份差事又有什么可做呢！

这一类的话，我已经听过许多次了，所以他的话并不能使我感动。但他的话对那些在中国为特务机关干事的小人物来说却还是比较典型的。大部分人主要是为了糊口才干这一行的，况且这行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后来当他们看到，国民党似乎没有力量保住他们的饭碗时，他们便摇身一变去投靠另一边了。这是我后来在一九四九年亲眼看到的。当国民党这条船开始沉没时，船上的老鼠便星散而去。

我与跟踪我的特务的谈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大约谈了两个星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对话便引起了双方阵营的异常愤怒。炳南狠狠地批评了我；在那家茶馆里，我的那个“影子”也一定好受不了，他的同伙不会轻易放过他的。结果是，他被调走了，到大学区盯一位教授。后来，有一天，我在重庆市内和他偶遇，他暗暗地告诉我，新的工作并不象以前我们在一起散步那么愉快。

特务认为我可疑，除了因为我与许多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保持密切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旅行。我往华北前线之

行结束后曾给“保卫中国同盟”寄过报告。这件事特务一定是知道的,而且报告的内容,他们肯定也知道了。因为有一天来了一个能说德语的姓刘的男人——他以前曾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工作——要我把护照交给他。他说要对护照作例行检验,过几天才能还给我。刘先生用德文给我写了一张收条,上面同样保证说,我的护照“一经所辖部门检查完毕”,就立即发还给我。可是我从此再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护照。

我多次去询问发还护照的事,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与中国国民结婚,领到中国护照,这并没有错,但我必须再一次向内务部提出申请,使我的国籍能够得到确认。我没有再提出申请,因为我很清楚,重庆政府无非是企图取消我的迁徙自由,就象对我的中国朋友们一样。

“你等一等吧,到中国的新政府成立便好了,”沈老先生说。“新政府会把你的护照发给你的。重庆已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不过,在集中营里的人比监视人员要快活哩!”

总之,我要等上好几年,才能够再自由地旅行。一九四五年年底往上海去,是我自己想方设法,加上幸获美国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成行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中国之后,当外国人,包括加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都不许可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时,我却第一个领到上海军管会发给的通行证,凭借这张证明,我顺利地到了北京。

经济的破产

从一九三九年起,一年比一年更加清楚地表明,国民党既无

力解决政治问题，也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使大多数市民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初，每月物价的上涨率约为百分之十至十五，后来竟达到百分之一百。公务员、职员、教师和教授的待遇本来就低，而薪金要隔相当长时间才加一次，所加的金额与物价上涨比起来根本不成比例。因此，他们越来越贫困，他们的不满也日益增大。

中国的工业城市被日军占领而造成产品不足，这是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还有可能在国内外大量购买机器和工业品，然后运到内地。后来就办不到了。于是中国富翁，其中包括许多政府要员，便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国外或者在香港和上海的外国租界区购置地产和工厂。

对那一小撮发战争财的富翁来说，政府的规定措施是不足为惧的。他们本来与政府就是一丘之貉。禁止外汇投机与囤积居奇的法令公布了，但在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他的皇亲国戚看来，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因此，其他人仿效他们，也并不意外。整个经济成了大规模的投机买卖。其中获利最多的是大米的投机。投机家们把从农民处杀价廉购的大米贮藏起来，高价卖出，获得暴利。他们把投机所得，又放到纺织品、医药品、日用品的投机上去。这样人为造成的物品不足，导致物价不断上涨。

所有的银行，都把资金投到商品和土地上面，而不贷款给为数不多的尚存的生产者。这使得许多经营工厂的人无计可施，只好关闭工厂，也去搞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生产情况越来越坏，政府对此却不闻不问，结果是被囤积的货品价格直线上升，搞投机的人大获其利。

由于货币的迅速贬值，受薪者也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搞囤积、投机。一位中国女友告诉我，她家的一个女佣从来没有吃

过一片西药，但她却买了德国拜耳公司的阿斯匹林药片囤积起来。外国药品在黑市买卖中特受欢迎。这些药品的大部分，尤其是磺胺片，都是从外国救援组织的贮存品中偷出来的。一个教友派的会员告诉我，寄给他们组织的医药品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成了赃物在黑市市场上贩卖。

运输部门也逐渐成了投机买卖的工具。货车车主、司机因为可得暴利，都为投机服务。军用品被卸下，装上其它物品，特别是黑市买卖的物品，这是常见的事。

与沦陷区、甚至与日本人的黑市买卖大行其道，这是公开的秘密。前线平静无事，日军阵地与中国军队阵地之间的无人区，成了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是日本制的纺织品、日用品，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黄金以及钨之类战时的重要金属，互买互卖。大米也大量卖给日军，而这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由于饥饿而死去。

在黑市交易中获利最多的是那些将军们。他们的夫人到上海及其它日军占领下的城市买进奢侈品，再高价卖给大发战争财的人，大大得益。士兵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为他们搬运买来的奢侈品。自然，其他军官也仿效自己的司令官行事。

这些行径使军队的士气完全败坏了。因此，一九四四年日军再次发动攻击时，不经一战，便蹂躏了广大的地区，并加以占领。

有少数工厂经营者毫不畏惧地继续干下去，但他们却要缴纳非常高的税金。而那些靠战争牟取暴利的人和黑市商人，却连一文钱的税金也不必付。如果政府认真考虑改变这种情况的话，只要在重庆的饭馆稍为窥视一下，便可以发现从事非法交易的人。但这势必要搞到高级官员和高级军官的头上。所以，一

道道布告、禁令和警告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最先违反取缔投机和黑市禁令的，往往就是国民党的党员和政府的官僚。

最初，有关物价飞涨的报道，全都被新闻检查处禁止发表，后来，终于发表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庞大计划。谁都知道，这个计划只是一番梦话而已。

一九四〇年秋天，政府制定了法律，规定农村地区的租税不用现款而缴谷物。由此可见，政府本身已对它的货币失去信任了。

通货膨胀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比城市还要严重。米价不断上涨，但农民却并没有因此而得益。因为农民除了向国家和地主交租税外，借了高利贷的还要还债，这样，连自己吃的米也所余无几了。因此，收入的增加也抵不上棉布、油、盐、农具等价格的高涨。在战争期间，不仅是佃农，连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中农的数目从百分之四十减至百分之二十。他们的土地被大地主、大发战争财的傢伙、投机商人等收买。由于拥有土地是较为安全的投资，因而造成了生活在城市里的地主数目激增。

就这样，在一九三九年以后的战争年代里，渐渐出现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极为严重的堕落和腐败，以致使造成这种事态的罪魁祸首——政府和党无法摆脱其失败的命运。城市的中产阶级不用说了，不属于垄断资本集团的较为富裕的实业家和商人，也日益贫困，成了激烈的反政府派。

农村到处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使得在战争结束前的几年里，农业生产日益低下，可怕的饥荒发生了。与此相反，共产党在其控制的地区内却懂得在战争期间去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经济状况。这就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所以，共产党和

国民党的胜负并非在一九四九年，实际上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已见分晓了。

轰炸季节与平静的冬天

在重庆，人们象是谈论足球季节开始似地互相谈论着轰炸季节的开始。四月底，当浓雾散去、晴天来临时，空中立即出现了日军的飞机。经过一冬天辛辛苦苦建设和修复起来的建筑物，再度化为废墟。不过，我们也逐渐习惯了空袭。而且，由于可以看出日军的飞机是按照准确的时间表行动的，为炸弹所困扰的重庆市民的生活和工作，便与之相应而行。几个星期都是上午轰炸，于是我们便在下午开始工作。当日军变更他们的时间表之后，我们的工作时间也作了相应的改动。

朋友们的请柬上，总是附记着：“如无空袭，敬请光临”，或者写着：“敝处设有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后者是为了让客人放心地离开自己家中的防空洞而来应约。

令我惊讶不止的是，孩子们会那么好地适应了炸弹和动乱。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们把三岁的儿子和杨妈叫到重庆。次年春天，当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时，黎明对红色警报球、警报汽笛和防空洞非常熟悉，我想，战争时期的欧洲孩子们大概也是如此吧。我们这时暂住在重庆市南面山中的一座别墅里，当听到风吹松林沙沙作响的声音时，黎明便说：“这象是炸弹发出的声音。”

当我们的住处被轰炸破坏得很厉害，必须另寻住处时，我们非常偶然地找到了这座别墅。我们原来的房子的一边已全被夷平。在重庆，这种被炸坏得象是演戏舞台似的房子，仍然有人居

住。但到了夏天，我们觉得还是搬到危险性很小的南岸去为好。最初我们把杨妈和黎明安置在农民家里，但我们去他们那里不方便。这时候，正好有一位朋友因工作关系调往云南，他让我们“继承”这座别墅，真是值得感谢。

别墅在第二个山脊上，周围的景色美得使人不由得屏住呼吸。从位于第一个山脊上、海拔约四百米的黄果桤眺望长江和重庆，景色极为秀丽。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横卧着的重庆市，看起来就象是远古时代的巨兽。空袭开始时，这只巨兽便吐出黑色的烟柱和红黄色的火焰。此时，如果将目光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则看不到任何东西会使人想到战争和炸弹。第二个山脊上到处耸立着秀丽的林木，山前是一望无垠的稻田。山顶上长着疏疏落落的针叶松，那蜿蜒奇妙的松枝，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明晰可见。沿着九曲十三弯的小径攀上去，便是称为“人头山”的一座石岩，我们的别墅便座落在巨岩之上。

连续两个夏天，即两个轰炸季节，这座别墅是我们的理想住处。我可以不为空袭警报所扰，搞我的翻译，书写给孙夫人的报告。周恩来委托我把毛泽东著作中最重要的文章译成英文。此外，他还为我提供足够的资料，让我定期给“保卫中国同盟”写报告。

炳南每天到市内去，往返迢迢。几乎没有朋友自远道来看望我们。对我们的儿子来说，在这里过夏天是很惬意的——至少到一九四一年八月底某一天的下午为止，我们都这样认为。

那一天，炳南突然吃惊地说：“我听到飞机的声音，但没见到飞机。”当我跑向房前廊道的另一头时，突然看到闪光闪向脚下的宁静山谷。

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还是因为我们别墅附近的山里，隐

蔽有军事目标，被日军的间谍侦探出来了？这一次轰炸，有五个农民死亡。战争的恐怖也降临到我们所居住的偏僻的山里。

进入十月，重庆上空云遮雾盖，市内忙得就象蚁群似的，处处都在着手修缮被破坏的住房，或者在废墟上重盖新房。已被完全破坏的市中心，也部分地进行了修建。当然只是在小商店和饭馆的前面用竹子和黄土修个相配的门面而已。房屋后面仍是一片废墟，因为现在清理废墟得不偿失。

夏天疏散到附近村落的商品，又运回到市内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许多新的商店开张，售卖着高价的奢侈品。这些商品从何处买进？还是不问为好。正如俗语所说，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堂皇地贴着外国商标的瓶子里，其实往往装的是中国出产的最普通的烧酒。

热衷于做买卖的中国“下江”人，很快便经营起咖啡馆和饭店，里面满是穿着讲究、显然是富裕的中国顾客。

买卖过于兴旺了，“新生活运动”便出来加以牵制。但钻“新生活运动”条例的空子，有的是办法。由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倡议开展的这个运动，以“恢复儒家美德”的动听言词为口号，花了巨款大张旗鼓地宣传，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成果。如果说这个运动有新颖之处的话，那便是青年基督会也参加了。市内的墙壁上写着号召过朴素生活的标语。此外还举行各种与卫生、清洁有关的演讲会。但这一切都起不了多大作用。用这些方法，是不可能消除社会不均，实现真正的改革的。

随着带有强制性的“过朴素生活”的宣传，高级饭店和咖啡馆被官方命令停止营业。但这一措施总是只实行几个星期而已。高级的豪华饭店的主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另外，他们在钻法律条文的空间方面，很有些创造性。许多高级饭店伪装为对外

文化俱乐部而继续营业。只要缴一大笔费用，什么都可以弄到手。一下子促进了与这么多国家的文化交流，太令人惊奇了！

“我想请阁下吃饭，您接受吗？”在重庆的大酒店里，外国人常常被这样询问。这当然不是出于客套，因为那个“新生活运动”规定，只要有“外国朋友”同席进餐，食物和饮品便可以不受限制地供应。在重庆和其它城市，人们都谈论着：抗战期间，好些并不富裕的外国人被当作“国际友人”，出乎意外地得以过优裕的生活。这样的事过了许久仍然成为大家的话题。

饥荒及其后果

由于日军袭击珍珠港，中国对外的政治状况起了根本变化：美国和英国在对日作战中成了中国的盟国，但是，这并没有使国内的政治状况得到改善。政府高级官员和国民党的干部，谈到美英两国军队打败仗时，并不掩饰他们得意的神情，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美国借款给蒋介石，再也不能提出象新四军事件^①时所提出的那些条件了。

在大发战争财的家伙们看来，流入中国的大量美元借款和所谓贷给中国的各种物资，简直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支持中国的通用货币的美元借款一到达，马上就被政府最上层的投机者瓜分了。

对农民的掠夺，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大规模饥荒发生了。仅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次大饥荒，就有数百万人饿死。

^① 指皖南事变。

关于河南省的饥荒，我们是从两位美国朋友那里听到的。他们在河南旅行一个短时期，却带回了这样可怕的报告。这两位朋友是谢奥多亚·维特和哈里逊·富曼。据他们说，路上满是尸体和象骸骨一样瘦得可怕的人；所有的树皮，都被饿得绝望的人吃光了。维特当时是《时代》杂志的记者。

“看到这种情景令人毛骨悚然，但更为可怕的是政府高级官员邀请我们参加的丰盛的宴会，这些高级官员就住在受饥挨饿的人和死于饥饿的人的附近，”维特说。

美国记者认为，造成这次饥荒的原因是，政府不顾年成不好，仍毫不留情地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使得他们连种子和自用的粮食都不能留存。数以万计的人逃到西部或沦陷区去，但无论逃到何处，他们都得不到救济。许多人只好又逃了回来，死在家里。

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农民们靠吃树皮、树叶、黄土等来维持生命。在洛阳，一磅树叶竟值一元。“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在各个城市的街头响起。农民们卖女卖妻，他们希望借以维持到明年收割时，然后再把妻女赎回。然而这种希望是何等渺茫啊！

连平时避免对政府作任何批评的传教士，也就河南省一带发生的无法想象的惨剧，写出了愤怒的报道。他们在报道里说，洛阳的各条街道上都满是饿得奄奄一息的难民，但在饭店里，政府官员和军官们却吃着珍馐美味；商人和贪官囤积大米，大发其财，然后又派人拿赚到的钱去买濒于死亡的农民的土地、孩子和财产。

传教士的报道里还说，外国救济机构赈济给饱受饥饿之苦的灾民的小麦，是以高价买来的。甚至政府官员和军官们出售的小麦，价格也高得出奇，而这些小麦是他们不久之前刚刚用武

力从农民那里夺来的。

重庆政府也利用饥荒的机会来发财。海外响应救济机构的号召，捐款救灾，这些钱在法定的金融市场上换成中国货币，但汇率只及黑市兑换价、亦即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政府的银行至少吞没了救济金的一半。

政府对河南省饥荒的目击者所写的报道极为不快。但因为这些报道绝大多数都是出于传教士之手，所以不宜简单地斥之为“共产党宣传”。正在这时，蒋夫人在美国大作动人的演说，称赞中国的勇敢和民主，同时极力抱怨说，有关饥荒的报道起了很坏的影响。她不要求政府对河南省予以援助，反而要求加强对报纸的检查。

饥荒发生后的第二年，政府终于同意发放数百万元救济河南省——这笔救济款还没有政府的银行在用不正当手段兑换来自外国的救济金时的得益多——可惜太晚了，对饥荒的受害者并无用处。发救济金的人正好是那些发饥荒财的人，所以大部分救济金都落到这帮家伙的腰包里。

两年饥荒，河南省死了二百万至三百万人，由这一悲剧而产生的上述丑闻，是战争后期的最大丑闻之一。

一年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也发生了大饥荒。这次也是一样，一方面是天灾，同时又是政府官员和军官囤积、投机而引起的人祸，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而在重庆，蒋介石和国民党却说，农民的饥饿无非是为逃避纳税而制造出来的口实，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机关的工作缺点所造成的。国民党宣布要罢免和处分招致这种不幸事态的负责官员。其实谁都明白，不管是在河南省还是在广东省，那些大发饥荒财的家伙，理应比下级官员的罪责重得多。下级官员宁愿受处分，也不敢讲出实情去惹

怒自己的上司。

对饥荒所引起的种种现象，政府的报刊连只字都不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长时期生活过的人，谁都不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骨瘦如柴、衰弱不堪的农民，有如走尸，看起来他们连对这悲惨的命运进行反抗的气力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尽管这样，中国各地还是发生了农民起义。河南省有好几个城市的中国军队都要求增援以镇压农民起义。一九四二年年底，贵州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连贵州与湖南之间的交通要道，也受到了威胁。

因为报刊对暴动的情况不发一语，所以在重庆，便有种种关于暴动的原因和规模的流言。只有极少数人相信参加暴动的是共产党人。比起重庆的流言来，从旅行者口中传出来的消息远为可靠。据说，穷苦不堪的农民、逃避兵役的壮丁和从部队开小差的士兵汇集在一起，他们对政府在深山村野征税抽丁的做法极为不满，起而反抗，酿成暴动。

参加贵州暴动的主力不是汉族而是苗族。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除了对经济剥削的反抗外，还有对汉族压迫者的憎恶。甘肃省的伊斯兰教徒、内蒙古的蒙族，也都发生了暴动。这都是由于国民党对这些少数民族毫不留情地任意征用骆驼、马、牛，使 they 和失掉最后一点赖以糊口的小麦、大米的农民一样，濒于饿死的边缘。

军队的腐败，在受饥荒之苦的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同日本人做走私买卖。他们的军事行动，只是镇压农民暴动。

一九四四年，当日军打破五年来的沉默，对中国展开最后的大攻势时，中国军队的腐败所造成的结果显示出来了。在这以前的几年间，除了小规模掠夺和破坏性的军事行动外，整个前线

是平稳的。日军首先进攻河南，原因是：其一，为了摆脱从中国内地起飞的美国轰炸机的威胁；其二，由于海上的补给线不断遭到轰炸，日军必须确保较为安全的南北相通的陆上补给线。

一九四四年夏天，河南省的中国军队完全处于崩溃状态。四处溃逃的中国士兵甚至被怒火满腔的农民所袭击、杀死。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最严重时，中国军队干了许多坏事，因而引致农民的复仇。

南方的事态也同样如此。在这里，中国军队也根本不进行抵抗，日军在短期间内便占领了湖南、广西两省和贵州省的一部分。许多美军机场被破坏，有些是美军自己炸毁的。大量宝贵的军用物资落入日军之手。

在重庆，人们开始担心日军会打到昆明和重庆。一个流言广为传播：首都可能会再次迁到西藏附近。

数百万的难民，就象战争开始时一样，再次淹没了道路，开始向西移动。但那时人们还相信退却只是暂时的，许多人还期待着蒋介石会聚集兵力开始反攻。可是一九四四年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受到日军进攻威胁的地区，完全处于无政府和恐慌的状态，没有一个人想到抵抗。蒋介石失去了民众和军队可能尚存的最后一点信任。现在，各阶层人民充满辛辣嘲讽地公开这样说：“‘服从元首！’这对我们有过什么好处呵？现在是他本人和政府转变的时候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史迪威将军的使命以失败告终

最初有一段时间，美国曾计划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作为

美军的前沿阵地，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对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可是，当日军席卷东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之际，中国是继续展开抗日战争的唯一国家。因此，在华盛顿，人们主张，应该对中国政府采取宽大态度，对中国的抗战应作出适当的评价。美国政府是倾向于这种意见的。之所以产生这一主张，也许还有另一种因素，即当中国在独力抗战时，美国曾向日本供应过原料和石油。

驻华美军是由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他是我在汉口滞留时认识的老朋友。后来罗斯福总统又把这个有才能的将军任命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将军是有名的中国通，对中国的军队自然也很熟悉，所以参谋长这一重任由他来承担，比其他任何人都合适。

将军来到已面目全非的中国上任时，我和他在重庆重聚。这时候，他对我回忆起当年我们一道往汉口以南的前线的情况。“那时候，中国军队的士气还是好的，”他很不痛快地说。“那时，连将军们也有决心与日军作战哩。我总是很相信中国士兵的战斗能力和他们的难以想象的顽强精神的。但现在，领导已腐败无能。他们不想打仗，只想发财。那时候我们批评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没有得到良好照顾，而现在，士兵们还没有上前线便象苍蝇一样毫无价值地死掉了。”

后来，我常常听到史迪威将军和他的下属对他们在改善中国军队条件时所遇到的困难发出抱怨。他们说：“我们为了改善军队的健康状况，给驻守云南的师增加了配给口粮，并分给他们一些美国药品，但军官们却把这些粮食和药品弄到黑市上卖掉了。他们用白粉造的药片来冒充奎宁。而在这个地区，死于疟疾的人比被日军杀掉的还多，但他们竟敢这样干！”

由于这个美国将军坚持，根据贷款向中国提供的武器应由他本人控制，所以他与中国将领的矛盾便越来越大。他这样主张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将领不会把这些武器用于抗战，而只是中饱私囊。除了这个主张外，史迪威还建议与共产党会谈，商量在华北和华中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共同对日作战等问题。这样一来，便促使蒋介石下决心要华盛顿把这个不受欢迎的顾问召回美国。

在蒋介石身边开始活动的最初几年里，罗斯福总统曾保证无条件支持史迪威将军。罗斯福的见解是，只要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决意抗日，就应对双方进行援助，即使国共不和，也应分头援助他们。虽然共产党并没有得到美国的武器和贷款，可是有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被派往延安，其成员在敌后自由旅行，得到有关日军动态的重要情报。

美国军事观察团的成员，以及在沦陷区上空被日军击落而为八路军所救援的飞行员，都就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状况，作出了感人的报告。用不着说，这些报告与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事态相比，成了非常明显的对照——这些方面，也是使蒋介石在感情上转而反美的理由之一。

炳南对我讲了他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会见的情形。华莱士得到蒋介石的直接批准，得到延安作短期旅行。

“华莱士和朱德交谈了，”炳南说。“朱德表示愿意同美国人合作，这使华莱士非常感动。华莱士说，他们在延安一个星期，比在重庆一年见到的东西还要多！”

美国卫生部队卡斯巴库少校写的报告，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得到发表。他在报告中高度评价八路军和游击队伤病员的护理情况，并称赞士兵们的健康状况很好。

史迪威将军主张，为了保证统一指挥作战，应把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同盟国军队的总指挥权移交给他。这时候，在国民党内便响起了这是“外国干涉”的抗议之声。这种抗议无疑受到蒋介石的鼓励。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了。在这本书里，蒋陈述了他的见解：西欧的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之类本质不同的思想，不宜于中华民族。他赞美自己极度加以理想化的古代以及儒家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效忠和对权威的服从被当作最高美德而受到赞赏。蒋在这本书里所反映的思想具有令人厌恶的极权主义的气味。这一点，在重庆担任政府工作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因此，驻重庆的外国特派记者都被禁止翻译此书，也不准在他们的报道里引用。

对接受外国制造的最新式武器和美元，蒋介石一点也不反对，由美国人任最高指挥，他却认为是有损民族尊严。

国民党巧妙地利用了一九四四年总统竞选时罗斯福面临的困难。选举就在眼前，罗斯福不敢轻易去招惹一场国际性的危机。这在政策上是不容许的。因此，当蒋介石提出把史迪威召回美国的要求时，他只好同意了。

后来，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出版了。在日记中，他公开叙述了他与蒋介石和蒋的将领会谈以失败告终的情况。史迪威将军回国时，蒋介石派代表到飞机场要把中国的最高勋章赠给他。但将军确是军人本色，他以不礼貌的话，把勋章退了回去。这一段情况，史迪威在日记中也未加隐瞒。

史迪威的继任人是魏德迈将军。他是一个保守的军人，对中国的事情，他缺乏史迪威那样的知识；对中国的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他也缺乏史迪威那样的理解。与新任的美国驻

华大使赫尔利一样，魏德迈也着力提高重庆政府的威信。为此，魏德迈认为，要立即把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前驻华大使高斯的几乎所有下属都予免职。这些下属包括美国外事机构中最优秀的“中国通”，他们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不仅能流畅地说中国话，而且对中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国民都极为了解。

这些人被免职以后，从重庆发往华盛顿的报告，又开始充满乐观调子，这是不足为怪的。但因为这些报告太缺乏真实性，几年后，它们所造成的不幸后果就显现出来了。

与孙夫人合作

一九四〇年春天，孙夫人搬到重庆来了。但我只偶尔去探访她。她作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宫廷”里。尽管宋家内部的关系表面上是相当融洽的，但孙夫人却觉得还是在香港自己家里自由。

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姐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拚命照个不停。

“不久我便要回香港，”孙夫人坦率地对我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象这里那样，当展品。”

在盛大的宴席上，孙夫人虽然总是笑容可掬，但与穿着时髦、希望惹人注意的两个姐妹相比，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审慎

的。在宴会上看到孙夫人，大概谁都会认为她极为满意自己能够使一家和解。在姐妹之中，看起来她似乎比较喜欢姐姐孔夫人。

孔夫人身材苗条，穿着总是非常华丽。从其外表可以看出，她是个有主意的人。人们对这位首相夫人的恐惧远远超出财界的范围，然而实际上，她却是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健谈的。她和身世不同、观点不同的人交谈，也并不认为有失体面。

相反，蒋夫人总是被恭维和崇拜自己的随从所包围。这些恭恭敬敬侍奉她的随从，俗一点说也就是“太监”。这些随从，还有几名作为“顾问”的传教士以及以蒋夫人为会长的福利机构的领导人。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很少有人敢于持与这位独裁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简直是冒渎神灵。这个聪明的、在美国人的认识上是进步的蒋夫人，竟然信赖他身边的那些伪善的阿谀奉承者，真是令人吃惊，也令人遗憾。而且，出于宗教的偏见，对所有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不仅是共产党人，就连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左派青年，她都全不信任。

在这两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妇女面前，也就是在孔夫人、蒋夫人的面前，她们的有权势的丈夫显得黯然失色。

被中国式的灰色丝绸服裹着身子的孔祥熙博士，在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几乎可以说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家。但看上去，他给人的印象更象一个富商或中国的哲学家。

总是穿着普通咔叽制服的蒋介石，也并不着力显示自己的权力。对蒋夫人主办的盛大欢迎宴会，他大概不会觉得高兴。他用生硬的中国国语与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中国客人谈上几句。此外，便是蒋夫人显示她的才华，把总司令短短的几句话给客人“翻译”成长长的一大串，蒋介石在旁边听边唧唧啾啾地说：“好、好、好。”

当我在这种场合进行观察时，我常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她总是讨厌人多，对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经常有一种羞怯感。特别是被迫发言时，她觉得浑身很不舒畅。约她出席某个集会时，她常常要求我打电话告诉她讲演何时结束，这样她可以估计时间，以便在讲演快要结束时才到会场，既逃避了讲演，又不得罪会议主持人。

有一次，当我问她我的拜访是否会给她添麻烦时，她答道：“在重庆，我当然可以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见谁就见谁，但是，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着。为了避开这些监视的眼睛，我还是想回香港去。”

“大概又会说我是怕炸弹才回香港去的吧，”她耸了耸肩说。“不过，无中生有的话我已经听惯了。”

对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以及蒋夫人不适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词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不仅由于她在政治上是惊人的老练，而且是因为长年以来她已学会了控制自己。她不愿意象共产党人那样激进，因为她想试试，如何用智慧和外交手腕，而不是用与统治权力公开对立的办法，去促进进步设施的建立和有益事业的发展。

表面上，她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宫廷”的态度，是非常恭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顺从的。尽管如此，她从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信赖。因为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

对此十分了解。人民称她为“中国的良心”。

她为中国革命事业热情献身的精神，在她的周围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影响啊！要把这描述出来，对每个认识她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对一个多年来与她息息相通的人来说，则更加困难了。她的乐观和勇气帮助我们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在重庆你将受很多苦哩，”孙夫人乘飞机回香港之前，与我道别时说。“我知道，如果请你去香港你一定会拒绝。而且我也认为你的拒绝是正确的。不过，我并不是出于利己的动机才请你到香港去。”她微笑着，又说：“我当然知道，你在重庆对‘保卫中国同盟’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与八路军保持联系，需要有人把华北医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

她让我继续从周恩来处要材料，然后以这些不全面的、凌乱的、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材料为依据，写点东西，以满足我们的外国朋友的要求。

孙夫人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为医院准备的医药用品送到医院去。

“实际上是政府阻止这些医药用品的输送。家丑不可外扬，难道我们能够对外国朋友说明这个情况吗？”她从香港给我的信写道：“我本来还没有下决心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不过，连英国救援机构的成员都被政府阻挡不让通过封锁线，我怎么还能瞒得住呢？”

此后数年间，我们事实上停止了设法把医药用品送到医院去的努力，外国为医院募集的捐款，只交给驻重庆的八路军代表部门。这样做，我们至少可以保证把外国寄来的钱全都用在华北的伤病员和必需救助的人身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常常发生外国捐款落入少数政府官员的腰包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即停战的前一年，我们才又能够把医药用品送到华北，当然运送的数量并不很多。这是因为美国顾问团驻在延安，他们的补给靠空运，“保卫中国同盟”获准用他们的飞机运输医药用品。美国人也能够用自己的双眼看到，华北是多么需要医药用品，哪怕数量不多也能起到巨大作用。

直到日军袭击珍珠港以前，孙夫人一直过着她自己选择的在香港流亡的生涯。当日军占领这个英国殖民地时，因为孙夫人如不撤离必然遭捕，她便再次迁到重庆，直到抗战结束。我们两人的密切合作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五年我离开中国为止。

政府给她提供了一座宽敞的房子，她便与忠实的女佣李妈一起在此闭门静居。由于“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并没有象香港那样的办事处，孙夫人的家便给我们当办事处使用。最初，我们办事处总共只有三个人：孙夫人、我和朱迪·廖（廖梦醒）。廖也到了重庆，她象在香港时一样，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而献身。

这时，我与孙夫人虽然经常见面，但几乎每天我们总还是习惯交换长函短柬。她还常常让佣人给我送点使我欢心的小东西，比如在重庆弄不到的一点美食，这是她出席豪华宴会时，悄悄地为我藏起来的，或者给我的儿子一件玩具，等等。

她在重庆还是过着在上海和香港时一样的朴素生活。以她的宋家为首，政府的领导阶层的成员都把巨款花费在奢侈的穿着和住房上，唯恐落后于人。而在这个时候，孙夫人却穿着四川产的苧麻织的衣服出门。丰裕的物质生活，通常都与孙夫人绝缘。这是由于她无力以高价购买黑市市场的东西，而向自己的某一亲戚求助，又是她的自尊心所不能容许的。她的两个

姐妹，以函购方式从美国买进奢侈品已成了习惯，孙夫人对此曾率直地提出批评。

我们常常在重庆南面的群山之中漫步。后来，孙夫人经常对我回忆起这时的生活。当然，在山间散步的行动是极为秘密的。但她仍然总是放心不下，怕被人发现。作为当政的宋家的一名成员，穿着朴素的衣服，在老百姓当中步行，或在寂寥的山间小径逍遥自在，是极为罕见、没有先例的。因此，能够猜出这位温和的青春常在的妇女便是“国父”孙逸仙的遗孀的，只是极少数人。但她的脸为好几百万中国人所熟悉，在路上擦肩而过时不期而遇，常常有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不由得喊出：“孙夫人！”这时候，她象一个年轻少女似的，脸顿时变得通红，立即匆匆离去。我在她后面保护着她，怕她被发狂般聚集而来的群众挤坏了。

在路上的小茶馆里歇息时，她不必担心那些令她讨厌的视线。这个茶馆里的客人，除了我们两人之外，便只是抬滑竿的苦力或农民，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在这里喝一杯茶润润嗓子。这些苦力大概连孙逸仙是谁也不知道。而在农民们看来，她的妹夫蒋介石就象是一个寻常人见不到的有权势的皇帝。蒋介石那黑色的大型华贵轿车被警卫和随从的车辆保护着，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驶。如果说重庆市民有机会看到蒋介石，也只是这个时候而已。

长途跋涉之后，又饿又累，这时候，我常常在孙夫人家里弄吃的。

“请把你的煎锅带来！”她事先打电话对我说。“我们还是做薯仔薄饼。”

在重庆，只有我有西式的扁平煎锅，我为此而得意。这是一

位德国女朋友送给我的，我很小心地使用它。中国的煎锅又大又深，不宜于做薯仔薄饼。孙夫人很喜欢吃这种饼，这大概与她怀念柏林时代的生活有关。

不管在外国人之间还是在中国人之间，大家都一致认为要见到孙夫人是很难的。许多人都说，她只见少数亲密的朋友，也很少接受邀约。这种说法相当夸张，但孙夫人对此并不更正。亏得这样，孙夫人才得以不受许多不值得欢迎的客人所扰。如果孙夫人接见了这个或那个中国人，那么她就会得罪几百个求见而不得的人。许多求见孙夫人的人，都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事后可以夸耀说，“这是孙夫人说的”，或“最近，我和孙夫人见面时……”等等。孙夫人对这些是很清楚的，正因为这样，她所见的中国人，仅限于亲密的朋友和在工作上有必要与她会晤的人。

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常常请我代为斡旋，希望能与孙夫人见面。“只花一点点时间，只问很少的问题，”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孙夫人。这时候，我仅限于介绍我所知道的他们的简况或他们给我的印象，类似推荐一类的话一概不说。当然，她对外国人的态度是慎重的，因为说错一句话或者不小心用错一个词都会引起对她非常不利的后果。

不过，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孙夫人喜欢开朗的年轻人围聚在自己身边。她觉得这些人在她面前不会象在一个偶像面前那样吓得讷讷不语，也不会向她猎取隐事或政治上具有危险性的发言。她常常邀请我的几位朋友吃晚饭，饭后有时候跳舞。孙夫人喜欢跳舞，舞术高明，她特别喜欢跳华尔兹。跳华尔兹时她几乎总是邀请我作她的舞伴，这是因为她认为只有我才能够和她跳标准的舞步。但在正式的盛大场合，例如“保卫中国同盟”定期举行的慈善舞会，她是绝对不跳的。这恐怕是因为不合

她的地位和身份。

孙夫人从香港来后不久，便考虑在重庆募集“保卫中国同盟”各种计划所需的款项。她向我们解释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

我们首先演剧筹款，所得收入捐给“保卫中国同盟”。剧场的经理、剧本作家、演员等，他们的经济收入都不算好，但他们总是愉快地与孙夫人合作。他们知道，孙夫人也作出过许多努力帮助生活困难的艺术家的。

战争结束前的几年里，到重庆来的外国人，特别是年轻单身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决定举办慈善舞会。孙夫人说：“这样并不会花太多人力和钱，就可以筹到许多款。”

但开一个舞会并不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得到有关方面的正式许可，这就得组织由名流组成的委员会。“新生活运动”禁止跳舞，为求破禁，我请重庆市长贺将军的夫人给予协助。贺夫人长得漂亮，性格果断，我们经常可以指望她的帮助。她不但自己参加了委员会，而且让重庆其他名流的夫人也参加了委员会。她们的丈夫为此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怕这样会引起蒋介石夫人的不满。蒋夫人也正在为她任会长的福利机构筹款。这位第一夫人对她的姐姐大受公众欢迎很不高兴。

我们组织的委员会中，最著名的外国妇女是英国大使的夫人华莱·西摩亚女士。在舞会上不管是谁邀她共舞，她都有求必应，她把这视为自己的义务。不过，有一次，当一个有点醉意的美国兵“啪”地在她们的臀部打了一下以示亲热时——这位女士大

概从来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她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坐在桌旁的孙夫人。孙夫人甜蜜地微笑着，温和地对她说：“我们大家都必须付出一些小小的牺牲呵，西摩亚女士！”

第一次舞会把我搞得精疲力尽——尽管我已动员了所有能够参加的妇女，但舞会仍然以男子居多——，此后我便决定通过另一种稍为清闲点的工作来付出我的“小小的牺牲”。于是我约了一位法国女朋友，到通常是男子聚集的酒吧卖酒。这个买卖非常成功，收益很大，许多人都对我称赞不已。这位法国女朋友马丽丝和我坐在高高的柜台内的安全的座位上，看着象战场一样喧哗的酒吧，用法语与顾客们闲聊。

孙夫人主张不仅招待美军军官，也应该招待士兵。她的主张得到实现，在美军中间大受欢迎。“凡是买票入场的我们都欢迎。”奇怪的是，孙夫人的这个主张，西摩亚女士表示赞成，却遭到民主主义之国美国的代表们的反对。

这些慈善活动筹得的款项，当然不是提供给共产党控制地区内的设施用的。如果以此为目的，我们便不能从重庆社交界得到必要的援助。“保卫中国同盟”的纲领明确强调援助一切需要接受援助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得到其它方面援助的中国人。因此，“保卫中国同盟”向工业合作社提供资金以便设立新的难民合作社，负担购买小麦的费用，给闹饥荒的地区送粮食，对贫病交迫的艺术家予以照顾。

尽管重庆的政治空气越来越坏，但孙夫人从未让人怀疑过，她在全力以赴为华北的共产党根据地尽力。她一般不在公众场合发言，偶尔发言，她都用不妥协的语言明白表示自己的见解。用不着说，对国民党创始人的遗孀孙夫人是不应进行攻击的，但躲在暗处对她诽谤和粗暴地加以中伤之辈仍然不断出现。“这种充

满恶意的攻击，在我的生涯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曾对我这样写道。“然而它的复活，现在却使我难以忍受下去，我真想用自己的嘴辩明真相，立即进行反击。但当我想到自己对这样的敌人是无能为力时，真是忧郁极了。”

对她个人的攻击，孙夫人没有必要回答，也不打算回答。但对那些说她袒护共产党人的中伤，却有必要辩明。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她给海外的中国朋友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公开信中，她明确地说：“保卫中国同盟”和她本人都并不是只考虑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利益，并没有想给这些地区过多的援助。她还强调说，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华北地区，这几年来没有得到弹药、金钱、医药用品等任何一种援助，因此，她有义务对这些地区起码提供与其它地区相同的待遇。

在孙逸仙博士的忌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孙先生的遗嘱。她说，孙先生在他的遗嘱中把世界各民族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要求和国内争取真正民主的要求结合起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还必须由国民自己，按照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建立为所有国民的利益服务的政府。

外国人与外国来的客人

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以前，住在重庆的外国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很久以前便住在这里的，他们是商人、传教士和总领事馆的官员；另一部分是因战事随中国政府和外国大使馆一起疏散来的。一九四二年之后又增加了一批人数众多的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从而使得在重庆街头看见外国人已完全不是什么罕见

的事情了。

很久以前就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仍然常常在南岸的重庆俱乐部聚会。他们交谈着往昔安静的岁月，少不了骂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数量显著增加，他们一点也不高兴，他们把年轻、富有生气的人基本上视为和平生活的扰乱者，对这些年轻人中大多数人的亲华立场，更是反感。外国人中的“老重庆”，住在并排建在南岸的宽敞舒适有如别墅的房子里。那些住在北岸的新来的人，因为轰炸房子毁了，南岸的“老重庆”把自己宽敞的房子让一些出来供他们在“轰炸季节”时暂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些“老重庆”对初到重庆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所表现的那种更为自由，亦即更为民主的精神，完全缺乏理解。

国籍、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到了地下防空洞和匆匆修好的建筑物里，便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担任重庆政府财政部首席顾问的美国人，与比利时的新闻记者频频举杯，边喝杜松子酒，边再三地解释越过喜马拉雅山开辟通往印度的航空路线的必要性。他们所喝的杜松子酒，是以前的两个德国顾问在重庆酿造的，这种酒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朝露”。一位荷兰水利工程师对一名法国邮局职员频频倾吐他对中国现行的书信检查制度的不满。由于这一检查制度，英语以外的外文信件，有不少被长期搁置。一个国籍不明的军火商对英国大使馆的书记官们讲述有关蒋介石的最新俏皮话。

新来的外国人对重庆俱乐部那古老得象博物馆似的气氛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在被美国炮舰的士官邀请时，他们却总是高兴地应邀参加。炮舰的餐室里有许多纯美国制的饮料。他们整夜整夜地在这里娱乐，试图借饮料的威力忘掉炸弹、尘土和酷热。不过，在餐室里，有时也会展开激烈的政治争论。争论的组

织者是列特拉中尉。他是一个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很关心的知识分子，后来发表了有名的作品《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最初的素材大概便是在重庆滞留期间收集的。

在长江南岸的半山腰里，设有一家优雅的饭馆。前来光顾的水兵之中，搀杂着固执的、个人主义色彩很浓的人。店主是个上年纪的怪癖的德国人。他对重庆“社交界”人口激增，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才好。

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以前，在长江南岸避难的只有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官。当时的美国大使，与年轻的大使馆官员们相反，并不怎么喜欢交际。他很少邀请客人，只是在正式的招待会上才露面。战争在欧洲开始后，德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方·普列仙在重庆的友好关系，都自然而然地完全断绝了。

最威风凛凛的苏联大使馆，设在象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物原来是四川一个军阀所有的，建造在山上，就象统治全市似地耸立着。苏联的潘友新大使的招待会，是外交官们所渴望的。这是因为大使的招待会上有最好的酒菜。苏联大使馆的人拥有经由新疆省上空的直航机，可以从本国直接送来高级的食品和酒。其它国家的大使则相反，他们储存的本国珍贵食品很少，只限于招待少数选定的客人，其余的客人便只好以中国菜来招待。

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举行的盛大庆祝宴会上，真正的俄国伏特加酒表现了它的真髓，为各民族和各政党之间的融和发挥了它的威力。重庆的著名人士全都出席了这个庆祝宴会，其中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自由主义者；盛装的政府官员、看上去令人觉得寒伦的教授、作家；各族中国人、各种国籍的外国人，等等。因为在这个季节无需担心空袭，所以这一天从上午开始，华丽的

小汽车和神情愉快的步行人群便川流不息地拥上山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有着严格的区别。可是几小时之后这些区别便消失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治家请进步记者坐到他们的小汽车里；胸前饰满勋章的将军和共产党办事处的龚澎谈笑风生；古板的学者请激进的艺术家的演唱最新的革命歌曲。

但是，法国人是否参加了这次皆大欢喜的友好联欢，是颇有些疑问的。住在重庆的法国人，分为维希派和戴高乐派。维希政府的正式代表保尔·波库与自由法兰西临时办事处的负责人多丹耶上校有意互相回避。波库是同名的著名政治家的外甥。“如果我的酒库空了，我可能也参加戴高乐那一派哩。”当有客人走过来时，这位维希政府的代表老是这样说：

多丹耶上校对酒库并不担心，令他烦恼的是：虽然支持戴高乐的人数不断增加，但真正的法国支持者却是少数。从印度支那赶来支持戴高乐的都是外国人，他们说德语比说法语还好。上校在公开的场合虽然称他们为亚尔萨斯人，但他们的名字，如米勒、施耐德、贝克曼无可置疑地说明他们是德国人。

外交官中我最接近的朋友是英国大使克拉克先生。从反对因循守旧这一点来说，他真是个爽快的苏格兰人。他对路易·艾黎的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及其它有益的计划甚表关心，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英国大使馆所在地区受轰炸的危险特别大，但克拉克对搬到较安全的南岸的建议怎么也不接受。他的理由是：“中国人能够在这里坚持下去，我也会习惯的。”

他和跟自己合得来的记者们谈话时，开口总是说：“当然，我们社会主义者是这样看问题的……”，使记者们都笑了起来。他毫不隐瞒地表示他很钦佩周恩来。至一九四〇年奉召回国为止，他在任期内经常访问周恩来。他认为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

慧的人，这不仅使香港和新加坡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吓了一跳，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也为此惊惶失措。当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时，他拒绝蒋介石为他饯行，而在八路军办事处度过了他在重庆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早上，在飞机场，他非常得意地把临别时周恩来送给他的日本军刀拿给几位前来送行的政府官员看，此时，这些官员酸溜溜地微笑着。

坚持留在北岸的人中，还有全体外国记者。他们都住在新闻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位于宣传部所在的山丘上，四周有篱笆围着。招待所的房间很小，一个个象小盒子似地间隔开。在轰炸季节接近结束时，这个临时修建的住所的墙面掉得也差不多了，看起来大家就象是同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在这里，既无秘密也无什么“内幕消息”，凡是一个人知道的，其他人也都知道。

苏联记者租了专用的房子，一对美国夫妇住在教会总部，此外，我的朋友比蒂·库拉哈姆也幸运地得到自己专用的房子。不过这间房子极小，而且已多年失修了。比蒂是个年轻、很有魅力的美国姑娘。因为她是记者中唯一的单身妇女，所以，宣传部长的信奉基督教的夫人坚持不让比蒂与其他男记者同住在那小箱子般的建筑物里。

住在新闻招待所的记者大部分是青年人，挤在那么小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出乎意外地融洽。到了晚上，他们便聚集在连象样的家具也没有的小房间里。在夏天炎热的夜晚，他们走到疏疏落落种着几棵芭蕉树的小院子里，边啪打啪打地摇着蒲扇，边议论着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挖苦那些初来重庆的人。这些人在遇到第一次空袭时，也只是在第一次空袭时，故意不进防空壕，或迟迟才进，以显示自己的勇敢。

挫伤记者们情绪的不是重庆的生活不便，而是他们在工作

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限制。他们大多数人都清楚，国民党所宣传报道的乐观景象是虚伪的。但他们收集可信情报的可能性很小。此外，他们还要受到所辖官厅的严密检查。年轻的共产党员龚澎和炳南，虽然一直被特务的爪牙监视，但他们仍坦然自若地在招待所进进出出，其他“可疑”的中国人则对这座建筑物敬而远之，不敢走近。

炳南的英语还不够好，自然只得依靠少数能说德语的记者。能说英语的我，总是高高兴兴地做周恩来或炳南的“传声筒”。我从家里到附近不远的招待所，往往返返不知有过多少次。有时候被特务盯着，有时候没有。

那轰动一时的访问团是大家共同的笑料。这一次是著名的作家和新闻界人士来重庆作几天的短期访问。他们受到盛大的欢迎，蒋介石和他那有魅力的夫人邀请他们参加精心准备的“家庭”茶会或晚宴。这样便极为巧妙地把他们与中国的现实隔开了。不过，在访问团一行中，有的人也许根本不想了解真实情况。模范工厂或军官学校是准备给海明威他们浏览的。亨利·鲁斯和他的夫人古丽亚·普斯·鲁斯视察了几个孤儿院之后，“远征”到黄河边的前线，在那里用望远镜观望日军士兵，这使他们分外感激——挖苦的人说，那只是假人。而与伊芙·居里夫人交谈的科学家，则是事先接受了周密指示的专门指派的人。然后，这些著名的外国客人，受到彬彬有礼的欢送，在天空中消失了。回国后他们写出热情洋溢的报道，歌颂蒋介石的天才领导以及前线 and 后方军民一体的精神。

不过，在这些访客中，有几个人要求与一位中国真正的“红色分子”会面，并把这视为他们来访的首项日程。因此，日程尽管排得很满，负责接待他们的人也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周恩来

接见这些有名望的访问者时，和往常一样，脸上露出和颜悦色的愉快笑容。谈了几次之后，周恩来便知道，他对当前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并不怎么使他们感兴趣，他们更有兴趣的是，让他了解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直到现在，我有时也还回想起与海明威会见的情况。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两三句话，其它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独自讲演。内容与解决远东诸问题有关。他的讲演富于空想，与根据具体事实得来的认识距离太远了。

伊芙·居里夫人发挥了她的积极性，以至接待方面感到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她求我务必照顾她，安排她与孙夫人见面。她终于如愿以偿，与孙夫人进行了长时间坦率的交谈，气氛融洽。她到我家拜访过我好几次，与聚集在我家里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交谈。有一次，当我向她提到我在重庆的日本朋友时，她垂涎欲滴似地要求与他见面。“你说日本人？”最初她满脸不可置信的神色，反问说。“真是日本人吗？他们在重庆干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自由行动？”

我对她说明，我所说的日本人是叫鹿地亘的日本青年作家和他的妻子幸子。就象反纳粹的德国人一样，这两名日本自由主义者，因反对日本政府丑恶的战争政策而离开了祖国。他们化装成演员先到上海，然后从那里通过秘密途径潜入内地，为中国政府服务。鹿地亘从事的工作是对日本俘虏进行宣传。起初这个工作相当困难，并没有取得成果。成了俘虏的日军军官，大部分仍狂热地确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有意与鹿地亘这个“叛徒”谈话的，只限于少数几个人。

中国政府方面对鹿地亘也横加阻挠。他提出有关在前线进行效果良好的宣传活动的建议，中国政府不予重视或以“过左”

的理由而加以拒绝。直到日军进攻珍珠港以后，美国方面开始重视对在中国和缅甸的日军进行宣传，鹿地亘才从被动地位中解脱出来。

经过多年的努力，鹿地亘最后得到约六十名日本俘虏的合作。他们写宣传材料，在俘虏收容所讲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满不错的剧团，上演反战剧目。由于他们的演出场场客满，被国民党以“有左翼倾向”为理由禁演了。

特别重要的是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到重庆的访问。由于欧战已经开始，他在重庆停留的日子较原定日程缩短了。对当时单独与日本作战的中国来说，这次访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访问本身就表示，一个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民族拒绝日本人宣传的所谓“亚洲是属于亚洲人的”政策。由于日本在中国以极为残酷的办法推行它的侵略政策，亚洲诸国对日本这个亚洲唯一的现代化独立强国的敬意，很快便完全消失。不过，正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表明的，并非所有亚洲的领导人都象尼赫鲁那样态度鲜明。

尼赫鲁是以中国政府客人的身份来访的，政府原来准备只让他看有利于己的东西，只让他见对国民党有好感的人物。但尼赫鲁看穿了这个企图，巧妙地将计就计。我积极地帮了尼赫鲁的忙，国民党对此一定是极不愉快的。

尼赫鲁原来预定访问在中国的印度医疗队。这个医疗队从一九三九年初起便在延安和华北前线展开活动。政府对此不好不同意，但内心是非常担忧的。不料，由于欧战开始，尼赫鲁接到电报要他迅速回国，只好决定取消这一访问计划。这时候，政府毫不掩饰他们松了一口气的神色。我每天都和尼赫鲁见面，当他决定中止访问印度医疗队后，便向我提出请求，至少也

让他见见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不巧，周恩来刚乘飞机去了延安，可以与尼赫鲁对等交谈的、精通国际事务的老练对手没有了，我只好引领他去见政治家博古和叶剑英将军。尼赫鲁对他们的评价有点过于苛刻，认为他们两人“生硬”、“令人发闷”。我想，如果尼赫鲁与他们有进一步的交往，他的评价便会改变的。

因此，尼赫鲁对与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会谈，期望更大了。事实上，尼赫鲁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有关中国的印象，比从政府接待者方面所得到的远为客观，远为正确。这些自由主义者大都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也得以免去苦心翻译之劳。他们处在国共两大党之间，并不是定型的人物。他们的进步的但不受教条束缚的见解，对尼赫鲁来说，比左右两个极端的教条政治家的意见贵重得多。

尼赫鲁和我施展诡计，在国民党安排得满满的日程里，硬挤出时间来与自由主义者会谈。尼赫鲁事先对接待方面提出，由于夜间空袭，一部分睡眠时间被剥夺了，希望中午休息的时间能长一些。这样，在尼赫鲁的午睡时间里，我便带领约见的人到他的住处去访问他。尼赫鲁毫无倦容。晚上，他和我在地下防空洞里交谈日间会谈的感想，并且决定第二天会谈的对手，商洽有关的安排。

尼赫鲁送给我一张有他热情地亲笔题词的他本人的照片，可惜我在空袭时丢失了。但他的信以及当时一起会谈的朋友经常使我回想起在重庆与他“共同策划”的情景。

除尼赫鲁之外，还有一个人在战争期间从印度来重庆访问过。她便是国大党的领导成员卡玛拉迪威夫人。介绍我与她见面的是我的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幸而得到‘英帝国主义

者’介绍你和我认识，并通过你我得以和中国共产党的诸位先生会见，这真是我一生中难以想象的事情。”卡玛拉迪威夫人对我坦率地说。

大概国民党对她不怎么重视吧。她在重庆停留期间，国民党对她的接待与对其他外国客人不一样。总之，她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许多有益的会谈，并有机会到近郊村子共产党机关报工作人员的宿舍访问。在这个宿舍里，为她举行了一个欢迎晚会，许多人致辞对她表示热烈欢迎，还特地为她演出了出色的戏剧和音乐节目，使卡玛拉迪威夫人深受感动。

战争结束前数年间的生活

一九四二年春，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而不必提着小箱子往防空洞里跑，这还是第一次。这时我们才意识到美国参战后重庆所起的变化。不管在路上和广场上，或是在阳台和山岗上，欢呼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对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激动地挥着手。

这支名为“飞虎队”的空军，是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前由陈纳德将军创设的美国志愿兵部队。最初，这支“飞虎队”作为独立大队加入中国空军。“飞虎队”所用的是P—40型飞机，飞行员在机头画上露出大白齿的鲨鱼口作为标志。不久，这种P—40型飞机在中国云南和仰光之间的国境上空，使得日军飞机为之胆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这支空军在仰光上空对日军飞机进行极为大胆的挑战，此后六个月中，击落日机约三百架。

后来，这支“飞虎队”编入中、缅、印战区的美军战斗部队中，称为第十四航空队，其总部仍在昆明，重庆附近的机场则驻有小

分队。在重庆街头，常常可以看到吵吵嚷嚷有点粗野的小伙子，他们的上衣的背后缝着一条很宽的布，用中英文写着“美国空军”。这是为了预防被击坠跳伞降落时，会被当地激愤的居民误认作日军击毙。这种误杀事件实际上已发生过几起。

“飞虎队”队员都很有钱。这是因为他们是志愿兵，工作性质富有冒险性，所以待遇很高。此外，他们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空军人员，官阶也很高。而且，他们不久便仿效中国人，学会了轻而易举的赚钱方法。在缅甸，由于日军推进很快，各种物资和贵重物品都四处散放，无人看管，他们便用飞机把这些物品从缅甸满载运往昆明和重庆，在黑市市场上出售。后来，他们又带来外币，利用黑市兑换的巨大差价，牟取暴利。同时他们还从印度购买货品偷运入境。在飞行员中有不少人就靠黑市买卖发财致富。司令官陈纳德将军对他们的“买卖”眼开眼闭，只要队员是个好的战斗员，其它便不予过问。

这样，在重庆又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外国货了。特别是一大批美国陆军人员到达重庆之后，黑市市场上到处都有罐头食品。而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我们只有做梦时才看得到这类罐头。

不过西式服装之类依然难以弄到。因此，外国人，特别是外国妇女离开重庆时，衣服、鞋、化妆品等是不准带走的，或者是全部送给朋友，或者是卖掉，这已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大家都默默地遵守。特别是衣服，往往在原主离开重庆很久以前就被人要去了。在朋友相聚的场合里，常常可以看到被定为继承人的幸运儿，以不安的神色盯着将属于他们的衬衫，他们心里祈求着：但愿这件衬衫别穿破了才给我！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在他的生病的妻子离开重庆以后，抱怨地说，他被迷乱的幻觉困扰不堪。当他在街头看到穿着他妻子遗留下来的衣服的妇女时，便

产生错觉以为妻子还在重庆。

名贵的晚礼服，数度易主之后，又拿到义卖会上出售，这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为了穿新衣服出席晚会，便牺牲绫子质地的窗帘布，用以制成精致的服装。

最受妇女欢迎的是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之类的人。这位顾问虽然穿着非常旧的衣服四出办理公务，但当他到国外去时，总是带着塞满好东西的箱子回来。在长期滞留重庆的外国人中间，只有很少几个是女的。美国顾问从国外旅行回来后，便把这些外国妇女请到自己住的旅馆里。当他把箱子打开时，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但从未争吵过。当一样物品有两个人希望得到时，便由两人商定轮流使用。“这双鞋真合适，给我吧！”一次，爱米丽·哈恩对我这样请求。她和我一样也长了两只大脚，在重庆只能买男人的鞋穿。“我很快就要离开重庆了，到时我便把它让给你。”为了表示感谢，她送给我一盒化妆粉。这盒粉是蒋夫人给她的礼物，但不合她的肤色。爱米丽著的几本书后来很出名。

嘉陵江饭店象一个大燕窝似的建造在一座岩山之上，矗立于嘉陵江边。它是重庆最高级的饭店，但在这里举行的正式招待宴会，大多数外国人都是敬而远之的。被蒋夫人任命为“新生活运动”总干事的黄上校——记者们把他称为“宫廷高等帮闲”——尽管努力得就象发了狂，但这种聚会毫无例外地沉闷得令人难以置信。

约三千名美军官兵驻在重庆时，除了为他们修建了专用的住宅以外，还建造了许多俱乐部和酒店。美国的新影片不时上映，有名的演员和电影明星有时来作短期演出。连红十字会的职员和军属等美国妇女，也得到魏德迈将军的许可来到重庆。住在重庆的外国妇女很少，正如美国人常说的，外国妇女在重庆几乎

成了女王，稀罕得很。所以，这批美国妇女的到来大大增加了外国妇女在重庆的人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虽然兴建了美式的新建筑物，一时之间增加了大量多姿多态的外国游客和居民，但重庆多少带有的小城市情趣并未消失。人们彼此间不象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那样熟悉了。但不管外国人或中国人，喜欢传播流言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他们对朋友、邻居大大小小的丑闻和个人私事等，仍然很感兴趣。住在现代化建筑物里的人和住在纷杂阴暗的胡同小巷破房子里的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在尚未看到战争有结束的征兆时，重庆的居民已经开始在议论“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情了。可是中国在战争的舞台上已成为不太重要的角色。自美国对日作战取得初步的成果以后，人们便相信，美国人会打胜的。外国人和由各地来的中国人，都知道他们迫不得已在重庆的生活已接近结束。大家都开始计划着“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情。

战 争 结 束

“周恩来又回到重庆了！”一九四四年年底的一天，炳南从八路军办事处带来了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大概延安认为当前的政治状况并非没有希望吧。不管怎么说，军事上的败北使蒋介石的威信略为降低了，”炳南说。

事实上，蒋介石是决心改组政府的，但他这样做是企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要追究那些无能而招致军事上败北的阁僚。而实际上一切都完全照旧，只是调换阁僚的职务而已，并非真正

的改革。

“由什么人来担任政府职务并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是周恩来在我们的客厅里，对为欢迎他而来的许多客人就政治形势谈话时所说的话。由于客厅窄小，客人挤得满满的。周恩来接着说：“如果我们把共产党的军队和解放区交给国民党，蒋介石甚至答应给我们一个乃至几个部长的职位。”

来客几乎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员，周恩来的话使他们大为震动。有几个人认为，蒋介石提出这个条件实在宽宏大量，值得尊重。这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但周恩来的意见并非如此。他说：

“对政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主张，将来成立的政府，不只是由共产党员，也应该由你们的组织，也就是‘民盟’的成员参加。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最近会发表一篇论文来阐明。中国能不能在战争结束前事先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作一次全面调整，我想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便可以知道。”

共产党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要求，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被热烈地议论着。从早到晚，我们的客厅就象蜂窝一样，热气腾腾。学生和教授们、作家、工厂主、医生——其中有许多是关心政治的妇女——这些聚拢到我家里来的人，谁都知道，共产党的新纲领对自己的团体和整个民族有多大的意义！

在参加讨论的最热烈的妇女中，有一位是住在我们隔壁的著名律师史良女士。她从三十年代起便为救国会而献身，一九三六年因参加反日活动，与其他六名成员一起被捕。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

这位精力充沛而又聪明的夫人特别引我注目的是，她虽然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代表性的一名战士——有人说，她是重

庆能干的律师之一——，但是她并不象其他许多中国现代妇女那样给人以美国化的印象。由于她的非凡才能受到蒋夫人的高度评价，史良曾在蒋夫人参加的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担任过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是抗战期间她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统一战线而工作的一个时期。

史良懂得幽默，有下面的一个事例为证。

史良的母亲去世了。令我惊奇的是，史良按照佛教仪式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这符合你的主义吗？”我以外国人的方式单刀直入地问。“你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你也反对旧的风俗，但你却请僧侣来做法事，你所做的与守旧的中国妇女并无不同呵。”

“我母亲是迷信的，”史大姐对我说。象她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也称她为史大姐。“佛教的葬礼最花钱，但是为了尊敬母亲，我决定这样做。母亲临死之前，我答应她这样做。这对她来说，是在世间最后的愉快。”

一位朋友的父亲柳亚子曾告诉我，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意识，与旧传统是能够并存的。柳亚子是“南社”有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他在那满是书籍和轴画的书斋里，强烈地表现自我，他以难以辨认的字体写含蓄的诗、尖锐而充满热情的随笔。但在这个举止大方、文采横溢的老学者身上，却潜藏着炽烈的革命家的热情。他无情地批判社会现状，为此，尽管他是孙博士的老盟友，一九四〇年仍被国民党开除了。

在国民党内，象柳亚子这样的人物是不少的。他们支持废除一党独裁，特别是排除党和政府内少数有力人士的独裁统治的要求。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这是很自

然的，因为罗斯福总统常常强调，实行抗战的同时，必须建设一个民主、独立的中国。

罗斯福之死使重庆充满了悲伤。不久，这种悲伤变成了对美国变幻不定的中国政策的失望。

“在延安，美国大使赫尔利认为我们共产党的要求全都合情合理，他不但明确表明了这种态度，还签了字，对自己说过的话确认无误，”炳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在重庆，他却对蒋介石说，合众国不管怎样都支持蒋。换句话说，就是叫蒋不要为反对派而苦恼。这样，我们对美国怎么能信任呢？”

炳南对局势甚为悲观，他说：“蒋介石自愿作出让步那是不可能的事，国民党也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独裁地位，决不会把权力分一些给其它势力。”

“不过，美国会从中调停的吧，”我插嘴说。“中国现在的情况，美国应该是很了解的。你好好想想这几年来和许多美国人谈过的话吧，他们比许多中国人都还要熟悉中国的政治状况。”

炳南耸耸肩，固执地坚持说：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大谈民主，但他们援助的却是蒋介石。”

事实证明炳南的话是对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但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仍未解决。战争是结束了，但仍未达成统一。蒋介石以战胜者的身分受到全世界的祝贺。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有和平的喜悦，也有对和平不能持久的不安，这两种心情交错在一起。

告 别 重 庆

如果一个人被迫长期呆在一个城市里，一时一刻也不得离开，那么，一旦这种状态结束，他就会象长年被监禁而重获自由的人一样，不知所措。

我们在重庆住了六年多，我们的儿子已上学了。炸弹和地下防空洞的生活，在他看来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仍然象爱母亲一样爱杨妈，心里有什么不安的事，一定先到杨妈跟前诉说，这和以前完全一样。但学校以及与他一起玩的小朋友，在他的生活中已占了相当的比重。我尽量使黎明不受西方的影响，只有一点是例外，黎明很想听格林童话——除了不能翻译的诗句，我全都用中文说给他听。我希望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混血儿。由于他是在杨妈身边长大的，失去学习两个国家的语言的机会，炳南和我对此都感到后悔。他三岁时重新回到我们身边。与长久没有见面的儿子说话，是我最大的愉快。当然，我和他只能用中文对话。实际上，他多少懂得一些德语，那是他听我和炳南谈话时自然记住的。他自己努力学习德语，是他长大以后的事情了。

就这样，我有意识地把黎明培育成中国人，但同时并没有忘记使他养成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在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要目中是没有的。当然，我这种尝试是在炳南完全同意之下进行的。但每一种尝试都遭到杨妈反对。比如，每当我们让黎明在花园里学做一些轻活儿时，杨妈便抗议。“孩子不是苦力呵！”她埋怨说。“让他做这样的事，手弄粗了，就写不出好看的字了。”

“这孩子不做什么书法家，”我毫不在乎地说。“中国需要的是有才能的技术人材。因此，孩子弄脏了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别了，我们那常常挨炸、已摇摇欲坠的房子；别了，眺望青山的日子；别了，长着热带花草的庭园；别了，携着忠犬的看门老人；别了，所有的邻居！我们的邻居都要返回自己的故乡。沈老先生往上海，两名记者去北京。萨空了又出现了，他竟要回内蒙古的张家口去。

我们呢？停战了，不管愿不愿意，也得作出决断。我们这个决断，在战争中得以延缓不作，实在是不得已。现在，该是作决断的时候了。几次长谈之后，我和炳南决定，与重庆的告别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分离之日。这次分手是暂时还是永久，我们还不清楚。使我们分手的因素很多，但使我们结合的原因也不少。所以我们两人都赞成暂时先分手，它将来也许会导致我们的重新结合，或者到时即使决心离婚，我们也不会太难过。

或许，我们重新恢复夫妇关系确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么还是趁着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更大的纠纷，象好朋友似地分手为好。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须归依他的“信念”，也就是说，必须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指责我，说我太“无政府主义”，说我不管对党有利还是不利，都把坚持己见看成是当然的权利。

在炳南看来，除了共产党的道路外，别无他路，只有共产党正确，其它一切都错误。与此相反，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我与中国共产党是共鸣的，而且对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我不能放弃坚持己见的权利，也不准备放弃这种权利。对此，周恩来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他对我的工作给予评价，他知道，我象许多非共产党员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与旧的、落后的东西作斗争，为新的、

进步的事物而献身。

与炳南分手，是以若无其事的方式进行的。他因工作的关系必须留在重庆——周恩来为与政府交涉仍留在重庆，而且八月底毛泽东也来重庆——，而我则随孙夫人到上海，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重新组编。黎明在我们的问题未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暂时留在炳南身边。

我再一次在那仿佛没有尽头的石阶上走上走下，从绿色的山头上，眺望着秋阳映照下闪闪生辉的长江峡谷，眺望着帆船舢舨交相行驶的长江激流，以及横卧在两条大江之间、有如一艘巨船的重庆市。看得出来，雾季即将来临。不久，重庆便有好几个月被迷雾所覆盖。不过，那时候，我已经远离重庆，在这条大江的入海处了。

在这游移不定的迷雾中，也覆盖着我的将来，我们所有的人的将来。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和平，还是内战？是平静，还是更大的动乱？或许，还有一条统一之路，使长久以来期待着的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留在重庆的人们，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后 记

一九四五年年底，当我离开重庆时，中国的命运还没有最终决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既不能保持现状，也不能回到战争末期数年间的状态，国共之间已经无法商谈。蒋介石坚决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拒绝放弃国民党的独裁地位，这就意味着，他已决意选择军事对抗，选择内战。

持悲观论的人们说——或者按照他们后来的说法，他们早就这么认为——，蒋介石也好，美国也好，对和平解决国共之争，从来也没有寄予关心。同样，也有人认为，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成立毛泽东所建议的联合政府。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数月间，人们似乎觉得，至少在美国和共产党方面已作出了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以使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不再发生战乱。

罗斯福总统在临死之前还保证说，他打算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商谈，直到两党都表示愿意统一为止。继之而任总统的杜鲁门，尽管非常倾向支持蒋介石，但在一九四五年年底，仍把他的最有力的顾问之一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仲裁者派到中国。结果，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要求，请毛泽东到重庆去进行谈判。

这个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但表面看来终于成功了。马歇尔

将军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在一九四六年年初签订了《关于停止敌对行为的协定》。

一九四六年一月召开的所有政党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作出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改组政府的决议，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终于打开。

一九四九年，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合众国对华关系》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只是在舆论和美国方面的仲裁者的压力下才表示同意让步的。一九四六年三月，马歇尔将军回华盛顿一个月，蒋介石马上宣称，不管是军事协定还是政治协定，他都无意执行。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肆意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减少国民党以外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数，扩大蒋介石总统的权限。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和华北开始攻击共产党的军队。至此，已经没有人怀疑蒋介石选择的是军事对抗的道路了。

一九四六年年底，连马歇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马歇尔作为中间人，徒劳无功，终尝失望的苦汁。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初，奉杜鲁门总统之召回国，被任命为国务卿。

马歇尔将军在他写的详细报告中认为，他的使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未能得到共产党方面的信任，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动集团对协定的破坏。这个反动集团，从一开始就搞各种阴谋诡计，暗中破坏协定，后来发展到了公开破坏。但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也很清楚，美国对事态的恶化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是的，正是美国促使蒋介石决意打一场内战。

据美国方面的资料，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相当于数十亿美

元。终战后，国民党也得到大量军用物资的援助。美军的飞机和舰只把蒋介石的军队运到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去阻止共产党扩大其收复失地的地盘。与此同时，曾经在日本军队指挥下的“傀儡军”，借助美国的援助被编入国民党的军队。

不错，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在中国的军事顾问曾警告过蒋介石，不要冒险发动内战，可是蒋介石肯定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使他拒绝与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实现统一，即使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了，他也会得到美国的继续支持。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内战的结果，已经是众所周知。在这两年间，共产党的军队几乎解放了中国的全部领土，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好，美国的援助也好，终不能挽救国民党。中国人民实现了上天的委托。就象中国历史上许多实例一样，上天的委托，就是将统治权转移于革命的新生力量。

贫困和饥饿，恐怖和腐败，使得不仅是一无所有的农工大众，而且使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阶层，都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是由于苏联的援助，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以及决心创造新的国家基础和社会基础所致。

我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这十年间的事情，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序曲。这是旧的体制灭亡、新的体制兴起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期。

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也正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揭开它的悠久历史中新的一页的日子。共产党人能把这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数亿人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吗？孙逸仙博士曾经梦寐以求的独立、统一、繁荣昌盛的

中国现在能得以实现吗？一九四九年是象中国所说的是个解放年吗？

至一九五五年为止，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六年。这与我在此之前在中国生活的岁月一样，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的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

在这本书的续篇，我将试着回答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人们一直从自己的爱憎出发而给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在许多年内都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这是因为拿破仑把中国喻为沉睡的巨人，并警告人们不要将这个巨人唤醒的预言应验了：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

